

The History of England

DAVID HUME

英国史Ⅲ

都铎王朝早期

[英]大卫·休谟 著 | 刘仲敬 译

与《罗马帝国衰亡史》齐名的历史著作

中文版首次面世

大卫·休谟跻身历史学家的成名作



T H E H I S T O R Y
O F E N G L A N 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I N S I X V O L U M E S

B Y D A V I D H U M E, E S Q.



V O L U M E III

目 录

第二十四章	亨利七世(一)	003
第二十五章	亨利七世(二)	019
第二十六章	亨利七世(三)	041
第二十七章	亨利八世(一)	067
第二十八章	亨利八世(二)	091
第二十九章	亨利八世(三)	109
第三十 章	亨利八世(四)	137
第三十一章	亨利八世(五)	167
第三十二章	亨利八世(六)	207
第三十三章	亨利八世(七)	231
第三十四章	爱德华六世(一)	263
第三十五章	爱德华六世(二)	289
第三十六章	玛丽(一)	313
第三十七章	玛丽(二)	337

第二十四章

亨利七世(一)

亨利七世继位——登基——新君疑忌约克宗室——伦敦狂欢拥戴新君——加冕——汗热病——召开国会——王位限定继承权——国王大婚——叛乱——民情不洽——兰伯特·西蒙内尔——爱尔兰叛乱——勃艮第公爵夫人密谋——兰伯特·西蒙内尔入侵英格兰——斯托克之役

里士满伯爵博斯沃斯一战克捷，乾坤落定。王师尽殮，国王殉社稷，破亡残卒溃不成军。将士骤然大捷、喜不能抑，群起推戴其凯旋统帅，称尊即位。“亨利七世万岁”呼声响彻沙场各处，发乎自然，不待谋而众意同。理查德国王在战役中佩戴的王冠遗落于骸骨中，为威廉·斯坦利爵士获致。斯坦利将王冠奉于胜利者头上，令军前举戴稍具体统。亨利本人尚未汲汲干求大位，但他即刻接受奉上的大礼，未有片刻犹疑。他已身居幸运的巅峰，必须排除万难、当机立断。此公想必久有成算在胸，一旦野心驱策、王业炳勋，决断自然不在话下。

亨利称孤道寡，自当不乏理据。然而，凡此种种理据，无论衡以公义、抑或较以政略，无往而非窒碍。

多年来，兰开斯特宗室党羽奉亨利为传人。然而，普遍认为此说牵强过甚、王权依据薄弱。亨利干取大位，从来未能明白界定王权要求的可靠依据。他公然破坏继承序列，未闻国民选举推戴。确实，国会经常认可兰开斯特诸王的王位资格。不过，这些投票几乎没有什么权威性，无非阿附在位君主的家族而已。随着兰开斯特宗室最近丧邦于约克宗室之手，这些议案相应撤销。明哲保身之徒为和平着想，也乐于屈身侍奉任何既存权威、不欲兴灭继绝。他们声称，兰开斯特宗室死灰复燃，则君统继承翻覆无定、多生枝节。何况，纵然兰开斯特堪居正朔，亨利亦非其宗室嫡裔。兰开斯特党羽奉里士满伯爵为首，原因无非党性偏执、不甘屈膝敌党。诚然，亨利的母亲、里士满伯爵夫人乃是萨默塞特公爵的独生女和继承人，出自兰开斯特公爵约翰·根特一系。不过，萨默塞特自身即为庶子、通奸所出。虽然理查德二世殊恩授权，经国会裁可，特许庶子扶正；然法案可曾准许小宗继承大位，仍然有充分理由质疑。上谕所许殊恩，已经充分枚举、明确排除王国继承权。^① 兰开斯特一朝之定国本，萨默塞特小宗从不与闻。非待嫡裔尽绝，无人留意小宗疏族的继承资格。尤犯众怨者，亨利宗室血统源自其母；而里士满伯爵夫人仍然在世，继承资格显然优于亨利。

无论仅仅考虑理据，还是从近年来爱德华四世颇得人心的统治出发，约克宗室的继承权普遍更符众望。亨利拟议联姻约克宗室传人伊丽莎白公主，将继承要求嫁接到约克宗室上。他庄严承诺大办婚事，认为以往的成功主要有赖于此。不过，许多理由阻止亨利采取这样的权宜之计。他明白：如果仅仅以王夫身份登基，权力就会非常有限。亨利所欲不在礼仪君主的虚衔，而在附属于君位的实权。如果公主先他而死，没有留下后嗣，则大位自然归于公主血亲近支，亨利理应逊位让国。即使天佑御榻、子孙昌盛，诸王子孝敬父亲的虔诚

^① Rymer, tom. vii. p. 849. Coke's inst. 4. Inst. part 1. p. 37.

与干取大位的野心孰胜孰负，亦难逆料。确实，召集国会、通过法案、授亨利终身王冕，并非难事。不过，亨利心里有数：血亲继承的资格比一次会议的权威强得多。^① 这样的会议总是受到暴烈的竞争挟制，更多地受到事态的急迫需要驱使、很少会考虑理据或公益。

亨利还可以把王位要求建立在第三个基础上：他战胜了目前占据君位的理查德。不过，理查德自己就是公认的篡位者。何况，亨利的军队大抵是英国人，不可能据此建立征服英格兰的权力。伸张征服者的权力，引申的意义可能就是建立绝对君权、废止英国人的权利和特权。^② 干犯举国众怒，莫此为甚。诺曼人威廉虽然统率强大的外邦常胜军，一开始就拒绝众矢之的的征服者头衔。他不到根基稳固，绝不冒险启用如此横暴而危险的头衔。

不过，亨利明白：权力还有一种基础，也就是事实占有。事实占有有多少少类似征服的权力，勇武和干练足以久据王位。亨利四世有例在先：他没有更好的理据，就平定了众多叛乱，和平传位于子孙。他注意到：虽然约克宗室资格居优，兰开斯特王朝仍能享国三代。若非亨利六世暗弱不堪其任，鼎之轻重未可问也。亨利根据近来的经验，决意径自据有王权。他昭示敌党：只有武器的力量和战争的胜利才能驱逐他。他断然以兰开斯特宗室继承人自居，不容置疑。他希望：这个权力有兰开斯特党羽的青睐、辅以他目前的实力，可以保证他始终享有不受约束的权威。

亨利的意图建立在明智的政策，甚至某种必需之上，因此没有面对多少责备。不过，他的一切举措和方略还有另一种动机，无法依靠同样的借口辩护。敌对宗室的狂暴斗争为时已久，冤冤相报、诛戮无已，党派仇恨如火如荼。亨利本人的大多数密友近戚若非殒命沙场，大抵被祸刑场。他自己饱经患难、身历奇险，对约克党人深恶痛绝、浸淫入骨，时间和历练都无法磨灭。他没有抓

① Bacon in Kennet's complete History, p. 579.

② Bacon, p. 579.

住当前良机、消弭夙仇积怨，王室夫妇一体、两族一视同仁。相反，他把属于党派首脑的一切偏见带进御座。如此意气用事，乃是一切真正政治家在这种情况下的一大忌。他仍然致力于提拔兰开斯特党人、压制约克宗室的追随者。终亨利一朝，他从未忘记早年的先入之见。他本性难移，不能施行更博大、慈惠的系统政策。他的王位资格源于王后。他太急于防范未来丧失王权的可能，甘受目前诸多不便。他视约克党人为敌，不久就把他们变成了敌人，教会讨论他的王位资格、察觉其虚弱与不义。而他小心翼翼，就是为了不让王位资格受到触动。

亨利意气用事、心存猜忌的政策，我们归因于他在博斯沃斯战役两天后采取的举措。理查德国王出于猜疑，将他的侄子、克拉伦斯公爵之子、沃里克伯爵爱德华·金雀花监禁在约克郡的舍里夫-赫顿。年轻王子爱德华的王位继承权优于理查德本人。现在，沃里克伯爵有理由期待较好的待遇，因为他不是亨利或伊丽莎白继位的障碍。他幼小的年龄不可能构成像样的威胁。然而，亨利命令罗伯特·威洛比爵士前往舍里夫-赫顿，把爱德华带来，关进伦敦塔，严密监视。^① 威洛比爵士也接到指示，把扣留在伦敦塔的伊丽莎白带往伦敦，准备迎候亨利，举办大婚。

亨利自己向首都进发，车驾缓步徐行。他为了不致引起国民的疑忌，刻意避免军事胜利的外表，由此压制胜利者的骄横，事事表现为当国君主和平巡行封疆，而非率军向御座挺进。民众一路大声欢呼，由衷挚诚。年轻的得胜君主继位，自然会受到大众欢迎。举国期盼盛运新开，因为内战和扰乱已近百年，王国四野萧条。然而，干戈之声虽歇，竞争和怨恨仍然威胁新秩序。亨利与伊丽莎白联姻，似乎可以保证两个敌对的宗室合为一体、推翻可憎的暴君。这位暴君甚至再度扰乱了约克宗室的继承顺序，让自己的家族充满了血污与谋杀。

^① Bacon, p. 579. Polydore Virgil, p. 565.

亨利所过之处，无不受到国民真心拥戴。大批绅士和贵族统率精兵，沿途响应。他一到伦敦，市长及其同僚就前来接驾。市民争先恐后表示欢迎。然而，亨利在普遍的喜悦中，威重矜持的性情依然如故，耻于博取民众的欢心。他轻车简从入京，没有满足民众一睹新君天颜的愿望。

不过，国王并没有忽略民众的支持，毫不迟疑地宣布迎娶伊丽莎白公主。他知道，举国寄大婚于厚望。亨利离开布列塔尼时，处心积虑地留下若干暗示：他若逐鹿得手、黄袍加身，就会迎娶公国继承人安妮。婚约的音讯传到英格兰，民情忐忑不安，甚至伊丽莎白本人也颇为焦虑。亨利不待枢密院和大贵族集议，就庄严重申迎娶英国公主的大婚承诺，驱散了种种流言。虽然他的荣誉和利益都要求践约联姻，但他还是决定推迟大婚，首先举行自己的加冕礼、取得国会的认可。他急于取得个人和家族的王位继承权，担心先娶公主会留下两人共享王权的暗示、动摇他身为兰开斯特宗室传人的资格。

那时，疾疫席卷伦敦和王国各地，为其他时代、其他邦国所未知。汗热病导致大批群众暴毙，虽然并非接触传染，而是源于人体和气候的一般状况。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病人通常不是康复，就是死亡。不过，瘟疫肆虐数周后，人们发现：改变空气、适当调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病情。^① 此时，亨利的加冕礼正在筹备中。他为了让典礼场面更加壮观，封授了十二名方旗骑士，将其中三人提升为贵族。他的叔父、彭布洛克伯爵加斯帕封为贝德福德公爵。他的岳父、斯坦利勋爵托马斯封为德比伯爵。爱德华·考特尼封为德文郡伯爵。加冕礼别开生面：国王为了安全和气派，以五十名弓箭手护驾，号称王室卫士。不过，他担心国民会把这些破天荒的戒备措施视为国王对臣民缺乏信心的表现，就宣布这些排场为永久性制度。加冕礼由坎特伯雷大主教、红衣主教波切尔主持。

^① Polydore Virgil, p. 567.

国会在威斯敏斯特集议，多数议员立刻表示衷心支持亨利一党。全体敌党人士或是不肯在这样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或是被迫隐藏其原则和倾向。兰开斯特党人在各处的选举中大获全胜。约克党人得势时，他们许多人受到严刑峻法的制裁、剥夺公权、不受法律保护，现在得以回国、跻身议院。他们的当选资格受到质疑。全体法官在财政法庭（the Exchequer Chamber）集议，深思熟虑如此微妙的案件。裁决极为审慎，斟酌于法律与权宜之间。^① 诸位法官判决：被剥夺公权的人士不应列席国会，直到相应的撤销法案通过。撤销法案毫无困难地通过了，一百零七位王党人士名列其间！^②

不过，还有更加严重的顾虑才刚刚开始。国王本人就受到剥夺公权的判决，因此他的王位继承权也面临同样的质疑。诸位法官借以下箴言，从这种危险的状况下脱身：“王冕不受一切瑕玼和血统中绝的影响。自国王享有大位之日，泉源既已清澈，一切剥夺公权和玷污血统的判决都不复存在。”^③ 此例出于紧急状态的需要，无须深思熟虑。此外，诸位法官可能考虑到：没有任何法庭管辖权足以中断王位继承权；王位继承人通常都会面临嫉妒，嫉妒可能经常滥用而不利于他的法律和正义；王子即使在前朝从事非正义的活动，也不会因此被剥夺与生俱来的王位继承权。

国会曲意迎合，国王无论需要什么决议，都不难如愿以偿。他似乎仅仅在决定采取怎样的即位借口时，才会有所犹疑。他向国会致辞，声称他的王位继承权与生俱来、毋庸置疑。但他担心这种理据不能获得充分的尊重，又以上帝的裁决为补充——上帝保佑他战胜敌人。他又担心这种说辞可以解释为僭越征服者的权力，于是向臣民保证：他们可以充分享有原来的产业和财产。

根据国王的意旨，可能还根据国王的钦命，王位限定继承权随之产生。他

① Bacon, p. 581.

② Rot. Parl. I Hen. VII. n. 2, 3, 4 – 15, 17, 26 – 65.

③ Bacon, p. 581.

无意让伊丽莎白公主或其家族享有继承权，但法案在其他方面则显得相当克制和温和。在他坚持下，法案并无宣示或承认前朝先王权力的内容，但也避免公然颁布新的法律或条例。他折中处理，未能完全避免歧义和模糊。在这样的情况下，模棱两可是难免的。国会投票通过：“王位继承权寄于、归于、保于国王。”^①但国王是合法的继承人、抑或仅仅是当前的托管人，不予明示。亨利以类似方式，满足于继承权限于他本人的直系继承人；但他假装约克宗室被剥夺王位继承权并非因为战败，也没有明示兰开斯特宗室享有优先继承权。他听任此处要害目前仍保留在模棱两可的状态；相信如果有必要作出裁决，尽可以等待未来的事件瓜熟蒂落。

不过，虽然采取了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国王对自己的理据仍然极不惬意。第二年，他向教皇的权威申诉、要求确认。罗马教廷很高兴抓住诸王由于轻率、软弱和必须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扩展教皇的影响。在位教皇英诺森八世乐于颁布教谕，包含国王想要的一切条款。亨利的一切理据，包括继承、婚姻、国会的选择，甚至征服，均罗列无遗。且宗教制裁得以补充——任何人在国王或其直系继承人封疆内作乱，都将予以逐出教门。罪人在以后的列朝都不得赦免，只有他临终时教皇本人及其特使才能开恩。谕旨本身就暴露了亨利王权资格的缺陷，由此诱使教皇进行干预；难以想象谕旨的权威能够在这些方面提供充分的补偿。

亨利撤销剥夺兰开斯特宗室党羽公权的法案，自然值得赞赏。但他不久就对约克宗室的支持者采取报复措施，就不能给予同样的评价。而国会在亨利的教唆下，通过法案剥夺约克党人的公权，包括：先王本人、诺福克伯爵、萨里伯爵、洛弗尔子爵、朱什和查特利的费瑞尔勋爵、沃尔特和詹姆斯·哈灵顿爵士、威廉·贝克莱爵士、汉弗莱·斯塔福德爵士、盖茨比和大约二十位绅士。

① Bacon, p. 581.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博斯沃斯战役中,他们都站在理查德一边。实难设想:支持在位君主、反对并无君权的里士满伯爵,何至于构成大逆罪?国会如此滥用正义,不外乎奴颜婢膝而已。普通国民极其屈辱地发现:国王立朝之初,就在贪婪或仇恨的驱使下,悍然践踏两党先前诚心诚意结成的同盟——他继位成功,靠的就是这个联盟。

国王在国会中已经收获良多,认为不便再索取财政补给。邦国已蒙太平之福、理查德党羽产业充公,索款似乎多此一举。然而,国会还是批准他终身享有磅税和吨税,一如先王前例。国会解散前还增加了其他不太重要的财政供应。国王一方对国民投桃报李,施恩赐惠。他颁布王家敕令,大赦所有曾经拿起武器反对他或试图反对他的臣民,只要他们在特定日期乞恩、照例宣誓忠贞不贰。敕令甫降,大批避难者离开圣地,举国人心大定。亨利刻意由自己颁布顺应民意的敕令,而不是策动国会通过法案(他一开始有此打算)。然而,萨里伯爵虽然已经投诚、自首,仍然被解往伦敦塔囚禁。

国会集议期间,国王对他青睐的某些人大施恩宠。白金汉公爵的长子爱德华·斯塔福德被前朝剥夺公权,但此时恢复了家族的荣誉和产业,富贵可观。亨利这样慷慨,并不常见,意在报答白金汉公爵合谋、首义、殒身而为王业驱除之功。布列塔尼的钱多斯封为巴斯伯爵,吉尔斯·多贝尼爵士封为多贝尼勋爵,罗伯特·威洛比爵士封为布洛克勋爵,这些贵族头衔都是国王在本届国会议程中授予的。^①

不过,亨利最为信任和宠爱的大臣并非来自贵族,甚至并非来自俗人,而是两位勤奋、警觉、干练的神职人员:约翰·默顿和理查德·福克斯。国王委以枢要、参以机密。他们过去分担亨利的一切危险和烦恼,亨利现在也留意让他们分享幸运。二人都召入枢密院。默顿复伊利主教之职,福克斯封为埃克

^① Polydore Virgil, p. 566.

塞特主教。不久，波切尔去世，默顿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福克斯掌管御玺，继而升为巴斯和威尔斯、达勒姆、温切斯特主教。正如培根勋爵所论，亨利喜欢任用、提拔教会长老，因为有富裕的主教辖区可以授予，国王不难酬报他们的效劳。亨利的不二法门是：缓慢地提升，从卑微的教区起步。^① 那时，贵族的封地和司法管辖权是王权的心腹大患。亨利可能预期：因为他们比贵族更依赖国王，进一步提拔的前景足以驱策他们更加勤劳王事、更加恭顺王命。

国会提供了磅税和吨税以后，急于维护合法而不可争议的王位继承权，以极大的热忱向亨利请愿，要求他迎娶伊丽莎白公主。但他们隐蔽了真实的理由，以忠实臣民维护直系继承人的义务为词。亨利现在开始认真考虑满足国民的特别关注。他在伦敦举行大婚典礼，举国欢悦，远远胜于他初次入城、举行加冕的场面。但亨利不快地注意到：一般民情偏爱约克宗室。猜忌由此而生，终亨利一朝，扰乱了他宁静的心境、诱使他嫌恶王后、毒化了一切家庭之乐。王后虽然无比善良、和蔼、顺从，却从来没有获得丈夫的适当回报，甚至没有起码的殷勤。在亨利阴郁的心中，恶毒的党派思想仍然居于压倒优势、凌驾于夫妇的柔情之上。

国王抵达英格兰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自以为他的幸运和权威无所不能。他现在决定乘胜北进。在北方，约克党羽乃至理查德的支持者人多势众。亨利希望，御驾临幸和交流可以消除不满分子的党派偏见。他驾临诺丁汉，获悉洛弗尔子爵、汉弗莱·斯塔福德爵士和他弟弟托马斯秘密逃出科尔切斯特的圣地庇护所。他把这个消息看得极重，竟至于中断行程、驾发约克。他在约克获悉：斯塔福德集结了一支军队进军伍斯特，围困该城。洛弗尔率领三四千人向约克逼近，意图犯驾。亨利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他勇敢积极、实力雄厚，立刻亡羊补牢。虽然北方诸郡心存二志、敌军四面环伺，他集结少量可

① Bacon, p. 582.

靠的军队交贝德福德公爵统率，自己和侍从一起出征。然而，他发现王师草率成军，以其士气旺盛、忠心耿耿而可畏，但军械、军资供应远为逊色。因此，他命令贝德福德不可接近敌军，只是仓促运用一切适当的应急手段解散他们。贝德福德向叛军颁布了普遍大赦的承诺，对叛党首脑产生的效果超过了对部众的效果。洛弗尔的勇气和能力不足以胜任大业，突然在恐惧中抛弃军队、只身逃走。他在兰开夏郡潜伏了一段时间，最后逃往佛兰德，求庇于勃艮第公爵夫人。他的军队向国王投降，祈求宽赦。其余叛军闻讯，从伍斯特解围四散。斯塔福德兄弟在阿宾顿附近的科尔汉姆村教堂避难，行踪暴露。这个教堂没有庇护叛军的特权，他们因此被捕。汉弗莱·斯塔福德爵士在泰伯恩刑场伏诛。托马斯·斯塔福德借口受兄长误导，获得赦免。^① 亨利欢庆胜利，不久得子，取名亚瑟，以纪念同名的不列颠国王——都铎家族自称亚瑟王的后裔。

亨利虽然能够平定理查德余党仓促举事的叛乱，但他的政府仍然普遍不得人心。公众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对约克宗室的偏见。约克宗室受到国民的爱戴，惟其如此，日益成为亨利仇恨和猜忌的目标。他对兰开斯特宗室的偏爱路人皆知，而敌党中的许多人蒙受苛刻的待遇、被剥夺公权法案、没收了财产。约克诸王赐予的一切恩赏同样撤销。不过，苛政以国用不足、不能维持王室体面为辞，而亨利六世末年也施行过同样的法律。但约克党人是这次撤销的主要受害者，因此认为国王的做法主要针对他们。沃里克伯爵年幼、清白，但受到严酷的压迫，因此颇受同情。他囚禁在伦敦塔里，就在爱德华的孩子被叔父谋害的同一个地方。因而公众逆料他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并将亨利与那位可憎的暴君相提并论。据称，王后受到不公的待遇。甚至王子出生以后，她仍然没有获得公开加冕的荣誉。那时，亨利的偏见已经根深蒂固，人们对他的厌恶也同样牢不可破。国王的威仪和辞令都无法消除敌视其政府的偏见。不

^① Polydore Virgil, p. 569.

过,他千方百计,无非培植了臣民的恐惧、至多是敬畏,而不是善意和爱戴。^①他的政策和气魄高屋建瓴,令贵族和豪杰俯首臣服;而一次非凡的偶然事件很快就暴露了他的政府不得人心。

理查德·西蒙神甫住在牛津,为人相当精明,但好胜和鲁莽的气质还是更加突出。此人乐于拥立觊觎者,从而扰乱亨利的政府。为此,他留意兰伯特·西蒙内尔。兰伯特是面包师傅的儿子,年方十五;但他天赋的理解力远超其年龄和地位,似乎适于扮演宗室亲王。流言不胫而走,称爱德华四世的二儿子约克公爵理查德秘密逃亡、未遭叔父毒手、藏身于英格兰。人们迫不及待地接受这个消息。西蒙发现公众如此爱戴约克公爵,就利用流言来指示弟子僭号。但他随后获悉,沃里克伯爵从伦敦塔越狱,国民同样普遍欢欣鼓舞,就翻然变计、让西蒙内尔冒充这位不幸的王子。^②虽然年轻人的天赋足以胜任他扮演的角色,但人们注意到:他熟悉朝廷故事、尤其是沃里克伯爵的奇遇,西蒙的身份似乎还不足以了解这些秘密。人们由此推测,更尊贵的约克党人参与了密谋。太后本人蒙受嫌疑。确实,人们普遍认为:无论多么难以置信,冒名顶替有她的秘密赞同。太后心怀怨望。她为亨利创业垂统贡献良多,非但功高不赏、反而落到完全无足轻重的地位。她的女儿受到苛待,所有的朋友都受到猜疑。她对亨利深恶痛绝,决心让他领教自己敌意的分量。她明白,冒名顶替者无论多么成功,都很容易排除。她希望,虽然目前尚难预料,冒名顶替的卑劣举动可望为她的复仇开辟道路。两害相权取其轻,尤胜于当前所受的压迫和轻蔑。^③

不过,西蒙无论怎样仔细教导弟子西蒙内尔,他明白冒名顶替经不起严密调查。因此,他决定在爱尔兰公开举事。沃里克伯爵的父亲克拉伦斯曾任爱

① Bacon, p. 583.

② Polydore Virgil, p. 569, 570.

③ Polydore Virgil, p. 570.

尔兰总督，遗爱犹在，因此该岛热忱拥戴约克宗室。亨利缺乏远虑，登基以来没有触动爱尔兰的原貌，前朝文武百官仍然留任。西蒙内尔投奔副总督基尔代尔伯爵托马斯·菲茨杰拉德，自称不幸的沃里克伯爵，请求庇护。这位轻信的贵族没有怀疑胆大妄为的骗子，并予以接待，而且就此非常事件咨询若干显要。他发现，这些人比自己更加乐观、热忱地相信冒名顶替者。消息在下层民众当中扩散，激起了更大的热情和轻信。都柏林万众一心，把西蒙内尔视为真正的金雀花后裔，向他宣誓效忠。他们自然的性情倾向于好奇求新，却忽视了爱德华四世的几个女儿在继承顺序上排在沃里克前面。他们拥立假王子为君主，把他送进了都柏林城堡，用童贞女像上取来的冠冕为他加冕，公开宣布他为国王，号爱德华六世。爱尔兰全岛效法首都，没有一把剑为亨利拔出。

国王闻讯，有点不知所措。他总是亲自面对敌人，但他现在怀疑阴谋起自英格兰、踌躇于离境。他知道，英格兰许多显要和一般民众都有意支持阴谋。他为了发现密谋的源头、采取措施打击公开的叛乱，频频咨询大臣和顾问，制订了积极保卫政权、镇压敌人的计划。

君臣多次讨论后作出的第一个决定使公众大惊失色。他们逮捕太后，没收她的土地和收益，将她严密扣押在博蒙德西女修道院。当局的做法几乎没有站得住脚的借口。他们指控太后虽然秘密同意把女儿嫁给亨利，却屈服于理查德的威逼利诱，把公主和她妹妹交给暴君。这个罪名现在早已过时、留下了种种缓冲余地，因此很可能不是她所受严厉处置的真正原因。人们相信：国王不愿指控王亲国戚密谋反对他，才用路人皆知的冒犯来掩盖他的报复或防范措施。^① 不幸的太后在耻辱中度过了几年时间，没有获得宽大，在贫困、孤独和监禁中了此一生。此后，人们更加相信这个怀疑。

国王的下一步举措不那么招人反感。他下令将沃里克从伦敦塔带来，参

^① Bacon, p. 583. Polydore Virgil, p. 571.

加前往圣保罗大教堂的游行队伍,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亨利甚至下令,让熟识王子本人的约克党显要人物接近他、跟他交流。国王相信:只要证实了西蒙内尔狂悖的冒名顶替,就能制止民众的轻信。然而,爱尔兰人民继续叛乱。他们针对国王的指责,热忱地反控国王造假、以冒牌的沃里克欺骗公众。

不久,亨利就有理由相信:反对他的计划并非建立在这样貌似荒谬的脆弱基础上。林肯伯爵约翰参与密谋,他的父亲是萨福克公爵约翰·德·拉·博尔、母亲是爱德华四世的长姐伊丽莎白。林肯伯爵有勇有才、雄心勃勃。众所周知:他的舅舅理查德有意在自己无嗣的情况下,立他为王位继承人。这自然鼓励了他的雄心。亨利国王对约克党的所有显要人物无不猜忌,首先苛待沃里克,进而使林肯疑惧不安,急欲自保于虎狼群臣之间。伯爵与兰开斯特党要人托马斯·布劳顿爵士商议后,逃往佛兰德。洛弗尔不久前已经逃往该地。勃艮第公爵夫人是伯爵的姑母,邀请他前往勃艮第宫廷。

勃艮第公爵查理的遗孀玛格丽特没有儿子,她将所有的感情寄托于女婿、奥地利公爵马克西米利安身上。女儿去世后,玛格丽特的感情就集中在外孙菲利普和外孙女玛格丽特身上,照顾他们的人身和教育。她品德高尚、行为端正,因此万众归心。她依靠已故公爵丰富的遗产,过着高贵而简朴的生活。她的仇恨跟友谊一样强烈。她擅长社交、生性乐观,这样的性情很难避免党派情绪。她廉正的品德值得敬佩,但炽热的党派情绪多多少少已经根深蒂固。她获悉亨利恶意猜忌她的家族、压迫其一切党徒,怒不可遏。亨利敌视她的许多朋友,既无理由、也无必要。她因此决心让他为此而后悔。她首先咨询林肯和洛弗尔,然后雇用了两千名德国老兵,由英勇善战的宿将马丁·斯瓦特统率,^①跟这两位贵族一起渡海,增援爱尔兰的西蒙内尔。爱尔兰人获得这样身居高位者的支持,又获得生力军增援,勇气大增,决定入犯英格兰。他们相信,

① Polyd. Virg. p. 572, 573.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英格兰的不满情绪跟爱尔兰一样普遍。另外，爱尔兰的贫困也使得他们不可能更长期地支持新宫廷和军队，因此刺激他们想往去英格兰寻找掳掠和晋升的机会。

亨利完全清楚敌人的意图，准备防御。他下令在王国各地征兵，由贝德福德公爵和牛津伯爵统率。他怀疑多塞特侯爵怨望他母亲（太后）受到伤害，就将他禁闭起来。他为了以虔诚的外表博取人民的欢心，前往以奇迹著称的沃尔辛海姆，朝拜圣母玛丽亚，祈祷王师大捷、敌患消弭。

亨利获悉西蒙内尔在兰开夏郡登陆，集合军队，在考文垂迎敌。叛军抱有希望：心怀不满的北方各郡起兵响应。但普通民众讨厌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相信兰伯特冒名顶替，敬畏国王常胜善战的威名，要么态度淡漠、要么援助王师。因此，统率叛军的林肯伯爵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一战功成上。国王天性英勇，加以什鲁斯伯里伯爵和斯特拉奇勋爵率领志愿者勤王，勇气大增，决意迎战。两军在诺丁汉郡斯托克相遇，血战爆发。虽然双方实力不对等，交锋却出乎意料的顽强。所有叛军首领都决定不成功便成仁，怀着类似的决心激励士卒。德国老兵身经百战，以致战局久而未决。甚至爱尔兰人虽然武备低劣，几乎没有自卫能力，但他们的表现并不缺乏斗志和勇气。王师惨胜，但大局由此底定。林肯、布洛顿、斯瓦特及其四千部众战死沙场。洛弗尔自此销声匿迹，由此普遍推测他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西蒙内尔及其导师西蒙被俘。西蒙身为牧师，不能处以极刑，只能严密禁闭。西蒙内尔位卑品劣，不足以引起亨利的恐惧与仇恨。他获得赦免，在国王的厨房打杂，后来晋升为养鹰人。^①

亨利腾出手来，报复敌人。他挥师北进，一路留下了严刑峻法的证据——帮助或同情叛军的人受到严厉的盘查。惩罚并不一定血腥。国王的复仇欲不如贪婪为甚。这些行为不检的人受到苛重的罚款。宫廷的举措乃至宫廷本身

^① Bacon, p. 586. Pol. Virg. p. 574.

无不武断。犯人不是被宫廷指定的委员会判处死刑，就是受到军事法庭的处罚。斯托克战役前夜，流言四起，称叛军大获全胜、将王师分割击破，国王临阵脱逃。亨利决定：相信或传播流言应该视为叛逆证据。他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滥用刑章。不过，那时王权所受节制极不完善，太平岁月尚且如此，振荡乃至危疑之际概莫能外。英国政制经常破坏一切法律约束、侵犯公共自由。

国王首先惩罚敌人、快意恩仇，然后决定在一个方面满足国民的愿望——这虽然不过是一个仪式，人民却对此抱有热切的期望。王后大婚已经两年，她的加冕礼至今尚未举行。这种装模作样的拖延引起公众极大的不满，是酿成叛乱的主因。现在国王受教于经验，完成了王后的加冕礼。他为了表示宽厚，释放了多塞特侯爵。至此，侯爵洗清了他蒙受的一切嫌疑。

第二十五章

亨利七世(二)

外交事务——苏格兰事务——西班牙事务——低地诸邦——法兰西事务——布列塔尼事务——法兰西入侵布列塔尼——法兰西遣使聘英——法兰西宫廷装聋作哑——北国之乱——绥靖——王师征布列塔尼——布列塔尼臣服法兰西——召开国会——对法兰西开战——入侵法兰西——对法和议——佩肯·瓦贝克——瓦贝克冒名施诈——勃艮第公爵夫人承认瓦贝克——英格兰众多公卿承认瓦贝克——斯坦利庭审与正法——召开国会

国王驰骋疆场、管理内政，无不有声有色，誉满全欧。但这时发生了一些事件，诱使他的注意力转向国外，为盟友出头。为了适当解释其外交政策，有必要先介绍邻邦的情况，从关系最密切的苏格兰开始。

一个文明的君主国，君主无须具备特殊才能，政府仅凭法律与制度的力量，就足以保障境内的秩序和稳定。苏格兰王国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此时，詹姆斯三世当国。这位君主既非勤勉，更乏才能。他理应委政于大臣，然而知人无明，用人不当，一再让自己和国民大失所望。他发现，如果委政于大贵族，后者就会光大其家门，令王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室芒刺在背、邦国群情怨谤。等他委政于寒门、自认为可以信托，举国贵胄就要愤激于幸臣崛起，继而以极端手段反对王室。亨利如果有征服者的野心，现在就是恰当的机会、可望夷苏格兰为藩属。但他大概明白：苏格兰民风剽悍，虽然困于内讧，若无常备军终难平定。而常备军为何物，英格兰当时还闻所未闻。因此他宁愿遣使赴詹姆斯宫廷，续订和平条约。但苏格兰人从来不想跟英格兰达成持久和平，寄邦国安危于武风长在，只同意签订七年休战协定。于是，结果就是这样。^①

过去三百年来，欧洲大陆各邦没有重大变化，那时却急于变法、组织更大的政治体系。基督教世界各主要强权无不如此。迄今为止，西班牙几乎完全局限于自身事务。随着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阿拉贡和卡斯提尔两王国联合在一起。斐迪南国王雄才大略，集两国之力、为联合君主国争取最大利益。随后，西班牙从摩尔人手中收回格拉纳达，复国大业功德圆满。西班牙人的军事天才在这一事业中复活了，荣誉、安全兼而有之。西班牙不再担心心腹大患，开始涉足全欧事务，在每一次战争和交涉中大显身手。

弗雷德里克皇帝之子、罗马人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与勃艮第女继承人联姻，获得了尼德兰的利益。虽然王后去世削弱了他和这个国家的联系，但他仍然以儿子菲利普监护人的身份执掌该国政务。布拉邦特、荷兰及其他几个省承认他的权威。但由于佛兰德、埃诺仍然拒绝承认他的监护权，甚至为菲利普另外指定了监护人。因此，马克西米利安忙向这些顽固的国民开战，但始终未能完全摧毁他们的斗志。他为了诱使法兰西不再反对他，与路易十一议和，将襁褓中的女儿玛格丽特许配给法王太子，割阿图瓦、弗朗什-孔泰、夏洛莱等地为嫁妆。但这个联盟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王太子继承法兰西王位，称查理八世。但马克西米利安仍然有风险——法兰西宫廷继续挑唆佛兰德叛乱。

^① Polyd. Virg. p. 575.

法兰西在过去两朝养精蓄锐、国势日增，同时欧洲其他各邦莫之与京，不可能株守于古老边界内。大诸侯如诺曼底、香槟、安茹、多菲内、吉耶纳、普罗旺斯、勃艮第皆为王室所吞。英国将历来征服所获土地丧失殆尽。法兰西君主的权威蒸蒸日上，足以维持法律和秩序。相当强大的军队随时枕戈待旦，财政足以养兵。确实，这些利益都在路易十一治下奠定，在他去世后留给儿子。新君冲幼、缺乏教育，不堪国事之重。但路易十一的女儿博热夫人安妮有安邦之志、经济之才，受命秉国。法兰西的力量继续增长，没有因主少国疑而中断、衰退。

相反，公主庙谟远大、终襄盛举，联姻布列塔尼，将最后且最为独立的诸侯收归王室版图。

布列塔尼公爵弗朗西斯二世自知无经济之才，遂委政于彼得·兰道斯玛。此人出身低贱、才胜于德。布列塔尼贵族不乐见幸臣蹿升，甚至进而衔恨君上。他们几经骚乱动荡，最终结盟，逮捕、审判并处决了这位不受欢迎的大臣。许多与谋的贵族害怕侵犯公爵威权、干主君之怒，皆避难于法兰西。其他贵族为自保计，秘密结盟、私通法兰西执政大臣。法国政府见布列塔尼人内讧方殷，认为入侵公国的良机已到，尤其是他们可以用维护内政安定为词，以掩饰自己的野心。

奥尔良公爵路易身为法兰西宗室之首、王位假定继承人，对博热夫人秉政素有微词。虽然他的觊觎为国务会议驳回，他仍然阴结众多要人、不断策划密谋，企图颠覆公主的权威。阴谋暴露后，路易举兵据守博让西城堡。但叛乱事出仓促，他的盟友来不及响应，他只得投降，接受法国政府乐于强加给他的城下之盟。不过，他在野心乃至恐惧驱使下，不久就逃离法兰西，投奔布列塔尼公爵避难。布列塔尼公爵乐于利用奥尔良公爵的友谊和信托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借以抵制博热夫人的图谋。奥尔良公爵也觉得他能够左右布列塔尼公爵，就将自己的许多党羽引荐到布列塔尼宫廷，策划迎娶这个富有公国的继承人。

安妮,从而加强自己的地位。

布列塔尼贵族看到奥尔良公爵及其随从独占主君恩宠,进一步投靠法兰西,甚至邀请法兰西国王入侵他们的国家。他们渴望保持独立,限制了法国援军的数量,规定法国国王不得占据布列塔尼要塞。叛乱的臣民防范如此压倒优势的力量,何其徒劳无功!入侵布列塔尼的法军三倍于法国人对布列塔尼贵族承诺的数目,长驱直入公国心脏,围攻普莱梅尔。布列塔尼公爵为了抵抗敌军,集结了人数众多但纪律很差的军队,交给奥尔良公爵、杜诺瓦伯爵和其他法国贵族统率。布列塔尼军队不满这样的委任且猜忌他们的盟军,不久就遭到解散。公爵只留下一支人数不多的部队迎战入侵者。他撤退到瓦纳,但法军穷追不舍,一举进据普莱梅尔。公爵撤退到南特。敌军首先占领了瓦纳、德南和其他地方,然后围攻南特。布列塔尼贵族发现国家有彻底臣服的危险,开始抛弃法军、与自己的主君议和。

然而,法兰西宫廷并没有因布列塔尼人的撤离而放弃他们青睐的计划:臣服布列塔尼。欧洲局势看起来有利于执行这个计划。马克西米利安确实与布列塔尼公爵结为紧密同盟,甚至公开签订了迎娶公爵小姐的条约。但他总是一贫如洗,那时正在操心弗拉芒臣民的叛乱,几乎不可能指望他的援助。斐迪南正在集中力量征服格拉纳达。人们也知道,只要法兰西将他觊觎的鲁西永和塞尔达西亚割让给西班牙,他随时都会同意抛弃布列塔尼的利益。只有英格兰既有力量又有利益支持布列塔尼独立。因此,博热夫人安妮预计最危险的敌人会来自英格兰。她为了掩饰真正的图谋,一听到亨利战胜西蒙内尔及其党羽,就派大使前往伦敦宫廷,向这位君主表示最大的信任。

大使首先向亨利祝贺他最近的胜利,然后像亲密朋友一样,以最热忱的方式转达法王对马克西米利安胜利的祝贺,顺便提及近来的布列塔尼事务。大使对亨利说:布列塔尼公爵庇护法兰西的逃亡者和叛逆者。法王虽然本来无意向布列塔尼开战,仍不得不发兵进入公国。法兰西王室荣誉攸关,不能容许

诸侯忘记对宗主的义务。为了保障政府的安全，也需要制止这种危险的蛮干。逃亡者并非等闲之辈，而且法兰西宗室之首奥尔良公爵也在其中。奥尔良公爵有不臣之心，在法兰西面临审判，因而亡命布列塔尼。他在布列塔尼仍然策划逆谋反对君上。战争由此而生，法兰西君主一方完全出于自卫。一旦布列塔尼公爵重新恪守臣节、消除战争的原因，战争就会马上停止。法兰西君主完全清楚布列塔尼公爵于亨利有扶危救困之恩，也清楚：在更加紧急的关头，公爵及其唯利是图的顾问抛弃了亨利，使他濒临绝境。在亨利走投无路的时候，只有法兰西宫廷庇护他。法兰西不仅保护他个人，还为他提供了人力和财力。他运用这些资助，凭借勇武、才略，卒成王业、君临英格兰。在这件事情上，法兰西出于对亨利的友谊，采取了从狭隘观点来看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做法。因为，法兰西赞助了推翻一位暴君的运动，促成神武英明的新君登上宝座。因此，法兰西有充分理由期待：亨利为公义和报恩计，都应该优先赞助法兰西一方。如果亨利忙于自己的事务，无法提供援助，至少应该在冲突双方之间保持中立。^①

法兰西使节巧舌如簧，目的在于说服亨利更加信任法兰西君主的意图，弃布列塔尼于不顾，出兵意大利、伸张他对那不勒斯王国的要求。他们知道，这个题目不会引起英格兰宫廷的不快。但国王目光如炬，这些花招对他完全徒劳。法兰西意在臣服布列塔尼，亨利心里有数。但他也推断：法兰西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他认为这些困难无法克服。布列塔尼公国地势险远，公认为易守难攻，无须外援就能抵御法兰西。亨利认为：法兰西民族的天性如此，很容易抛弃任何需要坚持不懈才能完成的事业。既然法兰西王位继承人与布列塔尼公爵联姻，法国大臣更不会积极执行反对布列塔尼的谋划、以免引起继承人愤怒不悦。众所周知，马克西米利安敌视法兰西，现在他已经向布列塔尼女继

① Bacon, p. 589.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承人求婚。他一旦排除国内障碍，就会出兵佛兰德，从另一方分散法兰西兵力。何况，法兰西不可能看不到：如果他发动这样野心勃勃的计划，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会无所作为。因此，保存布列塔尼的独立跟英格兰利害相关，英格兰的实力和地理位置都能够迅速而有效地驰援布列塔尼。一言以蔽之，亨利判断：法兰西宫廷绝不会期望英格兰坐视敌国这样增强实力。因此，他设法法国大臣能够看出他们的计划不切实际，最后转向和平立场，抛弃这个欧洲君侯一致厌恶的谋划。

亨利的理由非常充分，足以解释其迟缓、谨慎的举措。但他的做法可能还有其他动机，超出了正当的界限。他主要的志趣在于节俭、几乎夸张到贪婪的程度，因此厌恶一切战争和远征，便首先乞灵于谈判的权宜之计。他派赈济官乌尔斯维克调停双方。乌尔斯维克长于辞令、才堪干济。他认为：只要法兰西接受他的提议，有关各方都能安定下来。如果法兰西宫廷拒绝或回避调停，他至少可以借此判断对方坚持其野心的程度。乌尔斯维克发现：博热夫人，也就是现在的波旁公爵夫人忙于围困南特。法兰西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英格兰国王的提议，表现出许多诚信和节制的迹象。这位干练的公主得出结论：奥尔良公爵支配着布列塔尼宫廷。她能预见到一切调停都会以自己为牺牲品，将会竭尽全力抵制亨利的建议。这样就会给法兰西提供借口，陷布列塔尼人于顽梗不义。事态发展证实了她审慎的判断。英格兰使臣向布列塔尼公爵提出同样的建议。布列塔尼宫廷以公爵的名义答复：长期以来，在亨利年幼时和逆境中，公爵一直是他的保护者和监护人。现在公爵有难，指望英格兰有道之君提供有效的援助而非空洞的调停——调停不可能阻挡法兰西军队的进展。即使亨利的报恩之心不足以促使他提供援助，他身为英格兰国王的审慎也应该警惕法兰西臣服、兼并布列塔尼的恶果：英法世仇，代代相传。法兰西已经过于强大，一旦兼并得手，即如虎添翼，势必毁灭英格兰。布列塔尼地处要津，可以提供深入法兰西心腹之地的入口，英格兰有此盟邦利莫大焉。反之，布列塔尼

一旦并入法兰西王国，以其形胜之地，无论通过海军还是海盗，同样足以扰乱英格兰的贸易与和平。公爵饱经历练，深知战争会毁灭布列塔尼、自身实力远不如法兰西。他拒绝亨利的调停，既非天性好战亦非自信强大。恰恰相反，原因在于他目前急需英格兰国王的援助而非调停。

亨利国王收到答复，并未放弃原有计划。他只是得出结论：克服布列塔尼人的顽固、让他们通情达理，还需要更多时间。他获悉：布列塔尼人民担心公爵的安危，集结六万乌合之师，迫使法军解南特之围。这时，他更相信自己判断无误——法兰西宫廷面对越来越多的障碍和困难，早晚会知难而退、放弃臣服布列塔尼的图谋。因此，他继续推动调停计划，从而落入法国大臣的圈套。法国政府派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伯纳德·道比格尼勋爵访问伦敦，游说亨利不要放弃对布列塔尼宫廷的调停。亨利国王派出另一个使团，包括乌尔斯维克、阿宾顿修道院长、理查德·汤斯达尔爵士，建议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在此期间，不幸的布列塔尼人没有获得任何有效援助。太后的兄弟伍德维尔勋爵提议组织一支志愿军去布列塔尼，遭到国王拒绝。亨利国王宁愿保持严守中立的外表，但伍德维尔勋爵坚持己见。他是怀特岛总督，前往该岛，征集了四百人马。不出所料，亨利最终秘密准许他们渡海援救布列塔尼。这支援兵没有给不幸的布列塔尼公爵减轻多少压力，却给自己的首领带来了灭顶之灾。布列塔尼人轻率地在圣奥本迎战法国人，遭到惨败。伍德维尔勋爵和全体英军殒命沙场。法军一向敬畏英国人的战斗力，跟伍德维尔同行的一队布列塔尼人为了震慑敌军，穿上英国人的服装，跟英军一起战死。^① 奥尔良公爵、奥兰治亲王和众多贵族被俘。布列塔尼全军覆灭。布列塔尼公爵不久后去世，国事日益紊乱，似乎面临最终臣服的危险。

这些事件严重损害了英格兰的利益。国王虽然没有以足够的积极性和警

^① Argertré Hist. de Bretagne, liv. xii.

觉做好准备，总归不能视而不见。他虽然决定在形势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和平，但也明白臣民好战的性格、清楚他们对法国的敌意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现在，法兰西权力和荣耀大增的前景重新唤醒了他们的仇恨。因此，亨利决定利用这种倾向，以援助布列塔尼公爵为借口，向国民要求补助。他在威斯敏斯特召集国会，^①不久就说服议员提供了相当多的补助金。^② 然而，虽然这次的补助金已经由国会投票通过，却使国王卷入了极大的麻烦。达勒姆和约克两郡一直反感亨利的政府，最近镇压西蒙内尔叛乱后又受到压迫的刺激，因此极力抵抗征税的特派员。特派员见民变汹汹，大为震恐，连忙向诺森伯兰伯爵请教、求援。伯爵认为形势严重，便向国王告急。国王不愿意迁就变民的愿望，预见到这样的先例会造成恶果，再度下令严格征税。诺森伯兰召集法官和主要世袭地产保有人，传达圣旨，态度专横。伯爵认为这样可以慑服人民，结果只是激怒了人民，使他们相信圣旨出自伯爵的挑唆。^③ 他们拿起武器，在伯爵府攻击诺森伯兰，将他置于死地。他们犯下这样的重罪后，在桀骜不驯的性情驱使下公开向国王发难。在出身卑贱的煽动家约翰·阿克汉博的蛊惑下，他们推举约翰·埃格蒙特爵士为首领，准备积极应战。亨利并不担心这样仓促起事、准备不周的暴动，他立刻征集了一支军队，交给他刚刚释放、恩宠有加的萨里伯爵统率。国王的意图是先派这支军队阻遏叛军的推进，然后亲率大军跟进、确保全胜。但萨里自以为兵强马壮，足以孤军迎战未经训练、没有武装的变民。他一战功成，叛军四散逃走。约翰·阿克汉博被俘，后来和几位同党一起被处决。约翰·埃格蒙特爵士投奔勃艮第公爵夫人，获得她的庇护。大多数叛众遇赦。亨利可能期望：等他从国会获得这些补助金以后，就能通过谈判解决布列塔尼事务，而且征得的税款可以充实他的金库。但布列塔尼人的

① 9th November, 1487.

② Polydore Virgil, p. 579, 称这次征敛来自人头税。其他历史学家说，一镑征收两先令。

③ Bacon, p. 595.

处境江河日下、日日告急，亨利发现有必要采取更积极的举措支援他们。布列塔尼公爵去世后，法国人重新提出若干公国主权的过时要求。奥尔良公爵被俘后，过去的战争借口已经无法掩盖法国人的野心。因此，国王考虑自己的利益，参考国民的愿望，决定对抗法国势力的扩张，加入布列塔尼人一方作战。他不仅跟马克西米利安结盟，还跟远水不救近火的斐迪南结盟，征集六千军队，准备渡海前往布列塔尼。但他仍然担心军费问题，于是跟年轻的布列塔尼女公爵签订条约：她在完全偿付战争费用以前，将两座海港抵押给亨利为担保。^① 虽然他仅仅借兵十个月，但女公爵迫于形势，只得同意盟友强加的苛刻条件。英国盟友的利益就在于保护她。布洛克勋爵威洛比率领这支英军来援，让布列塔尼人几度占了上风。法国人退据要塞，希望英军师老兵疲、厌倦战事。这个计划恰到好处，大获成功。威洛比勋爵发现：布列塔尼政务紊乱，各种举措互不协调。因此，英军得不到粮秣、车马、火炮或军资等供应。布列塔尼宫廷朋党林立，任何一位大臣都无法控制局势。只要某一位大臣有所策划，另一位肯定会加以破坏。在每一次行动中，这些朝令夕改、内斗不休的大臣都弄得英国人不知所措。他们一到服务期满就赶紧回国，只在他们攻取的市镇中留下一座小城堡。因此，英军在布列塔尼只是增加了公国所受的蹂躏。他们一撤退，布列塔尼就完全落入敌手。在这个紧要关头，亨利给予盟友的援助就是如此微弱。布列塔尼再次陷于内乱外患之中，处境极度悲惨。

布列塔尼最严重的内乱源于女公爵的婚姻。大司马希厄受到亨利的青睐，支持率军来援的达尔布雷特勋爵。大法官蒙托邦注意到安妮女公爵讨厌这位求婚者，坚持主张：在目前的危急存亡之秋，达尔布雷特这样的小君侯不足以支撑她戡定国难。她建议寻找更强大的盟友，特别是罗马人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这一派最后取得胜利。马克西米利安和安妮的婚礼通过代理人举

^① Du Tillet, Recueil des Traites.

行，女公爵因此承袭了罗马人的王后头衔。但这次婚姻的收获仅限于这个华丽的头衔。马克西米利安无兵无钱，苦于弗拉芒人永无止境的叛乱，不能给他不幸的王后派来援兵。达尔布雷特勋爵因对手成功而愤怒，抛弃了安妮的事业，将南特献给法军。南特的富饶和强大在公国的城市中首屈一指。

法兰西宫廷现在开始改变臣服布列塔尼的计划。查理国王以前跟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玛格丽特订婚。玛格丽特年纪还小，不能成亲。这时，她享有法兰西王后的头衔，在巴黎受教育。玛格丽特不仅给查理国王带来丰厚的嫁妆，还是勃艮第家族所有领地的第二继承人，仅次于她年轻的哥哥菲利普。这门婚事在许多方面都是年轻国王的最佳选择。这些条件使马克西米利安和亨利不疑有他。他们从未怀疑法兰西宫廷的意图，也没有发现：法国人会侵犯如此有利而又如此严肃签订的婚约。但查理开始设想：违反布列塔尼人和所有欧洲列强的意愿而征服公国将会困难重重。他即使耗尽了公国的力量，占据了所有城堡，也不能长期保有。如果他跟女公爵联姻，布列塔尼就会完全并入王室领地。获得这块重要领地的利益近在咫尺、唾手可得，远胜于继承勃艮第家族领地的前景。这种前景越来越遥远而不确定。毕竟，对法兰西君主国的荣耀乃至安全而言，马克西米利安和安妮的婚姻显然有毁灭性的效果。这位君主一面掌握佛兰德，另一面掌握布列塔尼，由此可以两面夹击、深入法兰西的心脏。这两个婚约都已经成礼，但尚未圆房。由此，救弊之道唯有解除两个婚约，让布列塔尼女公爵嫁给法兰西国王。

欧洲各宫廷若能预料到这种权术，势必有充分理由反对。因此计划必须完全保密，直到木已成舟才能公布。法国大臣处置这种微妙事务，既明智又策略。他们一面以兵威劫持布列塔尼，一面秘密拉拢杜诺瓦伯爵。伯爵在布列塔尼极有权威。他们与女公爵的嫡亲堂兄奥兰治亲王约定，释放他返回布列塔尼。虽然还有许多预防措施，这些亲法党徒在其他法国间谍的支持下为他们策划推出的巨变大事宣传，向人们鼓吹布列塔尼与法兰西君主国联合的利

益。他们向布列塔尼贵族指出，他们的国家多年来干戈云扰、急需休养生息，而法兰西强权鹰眈虎视、莫之与京。布列塔尼只有跟法兰西实现牢靠而持久的和平，才能获得喘息机会。马克西米利安不能保护他们目前的安全。布列塔尼与法兰西荣耀的大敌紧密结盟，就会永远跟强大的君主国为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可以长驱直入。布列塔尼最好的结局就是完全臣服法兰西，放弃自古相传的自由，从而获得和平。邦国荣誉、效忠主君之类的考虑都不及干戈四起、陇亩荒残来得重要。这些建议对布列塔尼人起了一些作用，但最大的困难在于克服年轻女公爵本人的偏见。她从小在反法的氛围中长大，敌视法兰西，尤其敌视查理国王。查理是布列塔尼家族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她的感情已经固定在马克西米利安身上，视之为夫。她认为破坏最严肃的婚约、另嫁旁人，不可能不犯下大罪。查理为了克服她的顽固，释放女公爵过去的追求者奥尔良公爵。公爵现在同意迎合国王，动用他仍然掌握的布列塔尼势力。在奥尔良公爵的调解下，大司马希厄和大法官蒙托邦讲和。这些敌对的大臣现在跟奥兰治亲王、杜诺瓦伯爵意见一致，极力促成查理国王的求婚。查理根据他们的建议，统率大军，直奔女公爵当时驻跸的雷恩。女公爵四面受敌、无力自卫，只得打开城门，同意嫁给法兰西国王。她在都兰的朗格举行婚礼，前往圣丹尼斯加冕，然后驾发巴黎，在民众欢呼声中入城。巴黎民众认为这次联姻是法兰西君主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幸运。

查理的幸运与成功，对罗马人的国王就是最显著的屈辱。马克西米利安丧失了他觊觎的重要领地以及他迎娶的典雅公主。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已经享受了几年法兰西王后的尊荣，现在遣返给他，更使他深受侮辱。他有理由责备自己疏于防范，没有早点完婚——这对他不过举手之劳，就能使联姻无法解除。这些想法让他怒不可遏，以极不体面的方式发泄愤怒，威胁以奥地利、西班牙、英格兰的联军入侵法兰西。

英格兰国王也有理由责备自己在这样重要的事务上处置不周。虽然他无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从准确预见事情的结局,但他听任最有用的盟邦长期面临优势敌军的侵犯,不可能不反思谨小慎微、目光短浅的政策。亨利一向自负目光远大、深谋远虑,却败给了查理这样缺乏经验的生手。因此,当他一切补救措施付诸东流以后,自然恼羞成怒,急欲报复。但他随即就受到贪婪的驱使,在他身上,这个动机始终胜过骄傲和复仇的考虑。他甚至在目前的沮丧中,仍然致力于满足这种主导的感情。他借口对法战争,成立委员会,向国民征收供奉(Benevolence)。^① 理查德三世最近的法律已经废除了这种税。这种暴行(确实如此)主要落在从事贸易的国民身上,他们手头有现金。仅仅伦敦市就出资近一万镑。大臣默顿大主教指示特派员应用两刀论法——如果纳税人生活节俭,就说:他一定因此省下了不少钱;如果纳税人生活铺张好客,就说:从排场花费判断,此人一定有钱。有人把这种策略称为默顿大臣的叉子,另一些人则称之为默顿大臣的拐杖。

国王武断征敛,丝毫没有担心国会的反应。不久,他就在威斯敏斯特召集国会。他甚至指望:利用议员们的情绪和偏见再捞一笔。他知道,英国人对法国兼并布列塔尼非常不满。他向国会发言时,注意集中于这个题目。他对议员们说:法国人因最近的成功而得意忘形,甚至进而蔑视英格兰,拒绝支付路易十一向爱德华四世保证的津贴。英国人天性尚武,被这种侮辱激怒,不再把借口局限于反对目前的伤害。亨利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决定提出法兰西王位要求,以武力维护这个头衔。法兰西王位是他的正当权利,来自英勇的历代先王一脉相传。克雷西、普瓦蒂埃和阿金库尔战役足以证明英国人胜过他们的敌人,他毫不怀疑自己会在这个光荣的记录上添加新的名字。曾经有一位法兰西国王在伦敦做俘虏,一位英格兰国王在巴黎加冕。祖辈的光荣激励英国人再接再厉。英国之所以丧失海外领地,完全因为内乱。现在国内团结一致,

^① Rymer, vol. xii. p. 446. Bacon 称:征收福利税经过了国会的同意。这个记载有误。

一定能光复故土。青史流芳的荣耀乃是无价之宝，勇士绝不会为此吝惜区区财物。他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决定以战养战，希望入侵法兰西这样富饶的王国，会让国民更富裕而不是更贫困。^①

虽然国王夸夸其谈，但所有目光敏锐的人都可以看出，从他的个人性格，乃至从事务的性质推断，他根本无意将战争推向他所宣扬的极端。今天的法兰西跟以前英格兰列王入侵成功时的情况不同——大诸侯已经被王室兼并；宗室渴望天下太平；宿将健卒保卫邦国。法兰西形势足以威胁邻邦，邻邦却不能指望反对法兰西有利可图。马克西米利安徒有浮夸的头衔，轻率反复、华而不实，不但缺少军事实力的支持，更缺乏支持军事实力的财政资源。斐迪南有政治头脑，一面公开制造战争威胁的声势，一面暗中举行和平谈判，不采取任何冒险措施，接受了法兰西非常温和的让步。甚至英格兰也未能免于内乱。在苏格兰，亨利的朋友和盟友詹姆斯三世死于叛乱臣民之手，世子詹姆斯四世继位。新君倾向法国，英军任何进展肯定都会引起他的警觉。但所有这些明显的考虑没有影响国会。他们让征服法兰西、从掳掠中大发横财的想法冲昏了头脑，跳进了国王为他们量身定做的陷阱，投票通过国王要求的补助。国王获得十五分之二的税。为了便于封臣与贵族服从征税，国会通过法案，授权他们出售领地、不必支付任何转让费。

贵族普遍渴望军事荣誉，不假思索地咽下了国王的一切夸夸其谈。他们梦想把胜利的旗帜插上巴黎城头，把法兰西的王冕戴在自己君主的头上。许多贵族为了战场声势更加显赫、部众军容更加整齐，大笔举债、出售庄园。十月六日，国王渡海抵达加莱，将二万五千步卒、一千六百骑兵交给贝德福德公爵和牛津伯爵统率。有些人见他在这么晚的季节开始战争，就断定两国君主很快就会议和。亨利极力做出相反的表述：“我渡海而来，目的在于彻底征服

① Bacon, p. 601.

法兰西。这不是一个夏天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入侵从哪一个季节开始根本无关紧要。何况，我已经在加莱准备了冬季营房。”他似乎要认真地对待这项事业，立刻深入敌境，围攻布伊荣。然而，敌对行动只在表面上，和谈三个月前就开始了，负责谈判条款的使节已经任命。国王的大使从低地抵达大营，报告马克西米利安推迟其行，不能与英军会师，也不能提供任何援助，颇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接受意料之外的举措。不久，西班牙传来消息：西班牙已经跟法兰西达成和议。查理将鲁西永和塞尔达西亚两郡割让给斐迪南。国王仍然担心：做了夸张的承诺、唤起过高的期望以后，自己会受到责难。他谨慎地让和约条款在大营内散布开来。亨利为了更好地掩饰拟议中的举措，暗中指使多塞特侯爵和二十三位重臣请愿，要求与法兰西议和。借口是今年已到冬季，加莱军资不足，布伊荣围城困难重重，寄予厚望的盟邦已经变节。所有这些情况完全可以在大军出发前预料到。

经过这些准备后，埃克塞特主教和多贝尼勋爵奉命前往埃斯塔普尔，跟大司马德·孔代协商，对和约作最后润色。和约几天内就签订了。亨利的一切要求都在金钱方面。法兰西国王认为和平占有布列塔尼的价值超过任何金钱，又急欲远征意大利，便乐于接受亨利的提议。他答应付给亨利七十四万五千克朗（crown），相当于目前的四十万镑，部分补偿布列塔尼战费、部分归还拖欠的爱德华四世津贴。他保证每年付给亨利及其继承人二万五千克朗津贴。就这样，正如史家的评论：国王一方面从臣民身上发战争财，另一方面又从敌人身上发和平财。^① 最终国民也同意了，他实现了对国会的承诺：以战养战。亨利的条约将马克西米利安包含在内，只要他愿意加入。但他耻于受惠于他认为有理由抱怨的盟友，与法兰西单独议和，便收回了阿图瓦、弗朗什-孔泰和夏洛莱。当他女儿许配给法兰西国王时，这些领地是公主的嫁妆。

^① Bacon, p. 605. Pol. Virg. p. 586.

英法和平似乎很有可能持续下去。因为查理野心勃勃、充满年轻人的希望，全心全意投入意大利方面，不久就致力于征服那不勒斯。亨利对此更加漠不关心，因为那不勒斯跟他距离遥远，而且法兰西任何时代都没有在那里成功过。国王已经确立了国内的权威。迄今为止，每一次针对他的叛乱都只是挫败了他的敌人、巩固了他的权力和影响。他施政治国，声誉日增。每一次最不利的事件都增加了他的财富。他的婚姻及其后果切断了所有王位觊觎者的机会。国王万事遂顺，有理由因持久和平和安定的前景而志得意满。但是，他放肆地冒犯了根深蒂固、不屈不挠的敌人。后者不会让他长久安宁，常常让他身陷危难。

勃艮第公爵夫人衔恨于家族和党派的没落。过去的失败没有让她泄气，反而激怒了她。她发现亨利的政府难以颠覆，最后决定加以扰乱。她派出间谍，散布消息，说她侄子约克公爵理查德·金雀花没有跟他哥哥一起遇害，而是逃出了伦敦塔，仍然隐藏在某地。这种谣言虽然极不可信，但人民还是贪婪般地接受。随后，她着手寻找某个适合扮演不幸王子的年轻人。

奥斯贝克或瓦贝克是陶奈的犹太背教者。爱德华四世一朝，瓦贝克在伦敦做生意，生了一个儿子。他有幸见知于国王，获得恩宠。国王为人和蔼可亲，瓦贝克说服他做儿子的教父。他的儿子取名彼得，以弗拉芒方式讹为彼得金或佩肯。有些人相信：爱德华是情场老手，与瓦贝克的妻子有私情。从此，人们就以此解释年轻人佩肯和爱德华国王的酷似之处。^① 这孩子出生几年后，瓦贝克回到陶奈。他儿子佩肯没有在那里留多久，在偶然事件的驱使下浪迹各地。从此，他的生平事迹不为人知，连最勤勉的调查员也难以追踪。他天赋聪颖、多才多艺，在各式各样的冒险中颇有裨益。他似乎擅长扮演任何角色，假冒任何人物。由此，他得以觐见勃艮第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惊讶地发现瓦贝克各方面都符合自己的目的，便乐于接纳此人，且寄予厚望。她看到，瓦贝克的条件超过了她最乐观

① Bacon, p. 606.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的期望。他人品俊逸、气度高华、辞令典雅、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为了扮演约克公爵，瓦贝克必须接受教育。年轻人学得很快，但当时的形势对他的前途不利。玛格丽特为了更好地隐蔽他，送他去葡萄牙，由布兰普顿夫人照料。他留居葡萄牙一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随后，英法准备开始战争挑衅，似乎良机在望。由于爱尔兰仍然存心于约克宗室，因此首先在此地露面，最为适宜。^① 于是瓦贝克在科克登陆，即刻以爱德华·金雀花自居，在轻信的人民中树立党羽。他致信德斯蒙德伯爵和基尔代尔伯爵，邀请他们加入自己的党派。他四处散布消息，说他早已逃出暴君理查德的毒手。人们好奇求新、津津乐道，甚至对他颇为青睐。

消息传到法兰西。查理国王受勃艮第公爵夫人和一位弗里昂先生暗中唆使，邀请佩肯赴巴黎觐见。弗里昂先生本来是亨利的秘书，却抛弃了主君的托付。查理国王以待约克公爵之礼接见佩肯，拨给他相当可观的年金，为他配备卫队，任命康格雷塞勋爵为卫队长。既然法兰西国王认为接受佩肯的假托符合自己的利益，法国宫廷就轻易地予以接纳。佩肯的王室血统已经闻名海外，这种先入之见进一步支持了他的行为举止和个人资质。举国上下人人都在谈论金雀花小王子卓绝的天赋、罕见的厄运和历险。好奇心的本性就是随着距离而增加，敬佩和轻信从法兰西蔓延到英格兰。于是，乔治·内维尔爵士、约翰·泰勒爵士和一百多位绅士赶往巴黎，为他们心目中的约克公爵效命、同舟。现在，冒名者身边围绕着一个宫廷，开始抱有最后成功的希望。

英法两国在埃斯塔普尔议和后，亨利要求法国引渡佩肯。但这个年轻人无论出身如何，都是查理自己请到法国的。查理决定不能出卖佩肯，只同意打发他离开。冒名的理查德公爵投奔勃艮第公爵夫人，请求她给予保护和援助，便拿出了他以约克公爵自居的所有证据。公爵夫人假装不知道他冒名顶替，

① Polyd. Virg. p. 589.

甚至装出不信任的样子。公爵夫人说：她已经上过西蒙内尔冒名顶替的当，再也不会重蹈覆辙。她要求在众目睽睽之下核实他自称的身份，这一切做得似乎滴水不漏。公爵夫人提出许多细枝末节的问题，仿佛因他的答复大吃一惊，经过长期、严格的“审核”，最后欣喜地叹服他死里逃生，并拥抱、承认他确实是亲侄子爱德华、金雀花王室唯一嫡裔、英格兰王国合法继承人。她即刻为佩肯配备与其身份相符的车马仪仗和三十名持戟卫士，命令人对他毕恭毕敬，在任何场合都要称他为“英格兰白蔷薇”。^① 弗拉芒人对玛格丽特的高贵地位和个人品格深信不疑，轻易地接受了佩肯自称的王室血统，并为此欢欣鼓舞。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怀疑他的真实出身，主流观点几乎没有相反意见。由于英国人与低地国家交流甚广，因此随着交流的扩大，对冒名者的青睐与日俱增。

相信佩肯冒认的身份，不限于英格兰民众。由于亨利秉政，压制贵族士绅，引起他们的厌恶，贵族因而转向新出现的王位觊觎者。有些贵族甚至跟佩肯暗通款曲，比如菲茨沃尔特勋爵、西蒙·蒙特福德爵士、托马斯·斯维茨爵士表露了倾向于他的态度。内大臣威廉·斯坦利爵士当年极力拥戴亨利登基，而今不知出于盲目的轻信还是无尽的野心，也加入了这个有利于敌党的叛乱。^② 罗伯特·克利福德爵士和威廉·巴里的举措更为明确。他们前往佛兰德，经勃艮第公爵夫人引荐给佩肯，为他效命。克利福德爵士给英格兰国内回信，说他熟知约克公爵理查德，这个年轻人无疑就是公爵本人，他的经历没有丝毫破绽。有克利福德爵士的人品与地位为担保，足以解除许多人的疑虑，甚至引起了最漠不关心的人的瞩目与好奇。举国翘首以待，于是反对国王权威的密谋一再发生。佛兰德和英格兰国内的不满分子开始大肆互通款曲。

国王完全清楚一切情况。不过，依照他谨慎而果决的性格，他稳步推行对抗计划。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确定真约克公爵的死亡，证实这一事件的主流

① 即约克宗室。

② Bacon, p. 608.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观点的真假。理查德杀害侄子，有五人与谋，他们可以提供证据。詹姆斯·特里尔爵士为此受命管理伦敦塔，亲眼见过两位王子的尸体；斯莱特、狄格顿和弗雷斯特动手杀人；神甫埋葬尸体。据查，理查德下令将尸体从第一次埋葬的地方移走，现在已经无从求证。无论亨利多么希望排除一切疑云和争议，但他无法让事件水落石出。

约克公爵的生死疑云给大胆的冒名者可乘之机。国王的调查一开始困难重重，后来却变得成功——他在英格兰和佛兰德各地部署间谍；他指示许多人假装拥护佩肯一党，赢得了佩肯的朋友们的信任；他根据提供密谋者情报的多少，贿赂他们的家臣、仆役乃至忏悔师，由此追查他们的其他盟友。克利福德爵士希望获得酬劳和赦免，就把秘密泄露给亨利。国王越信任某位间谍，就越要公开表示痛恨他，以便让他更好地取信于敌人。由此，亨利终于完全掌握了整个阴谋和假约克公爵的出身、经历、生平和交际。随后这些事情的后半部分即刻公之于众，以释国人之疑。国王为密谋者采用了更缓慢、更确定的报复手段。

在此期间，亨利向菲利普大公提出抗议：在自己的领土上支持和保护如此声名狼藉的骗子，破坏了两位君侯签订的条约和两国臣民的长期亲善。玛格丽特的势力足以拒绝他的抗议，借口菲利普大公无权管辖公爵夫人的保留领地。国王受到伤害，一怒之下切断了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一切联系，驱逐英格兰的弗拉芒人，召回低地各省的英国人。菲利普大公以牙还牙、如法炮制。不过，亨利明白：弗拉芒民情轻躁好乱，不可能长期为君主的喜好而牺牲他们有利可图的对英贸易。

亨利有力量更有效地惩罚内敌。一旦时机成熟，敌人就会领教他的怒火。他差不多同时逮捕了菲茨沃尔特、西蒙·蒙特福德、托马斯·斯维茨及威廉·多贝尼、罗伯特·拉特克里夫、托马斯·克洛森诺和托马斯·阿斯特伍德。所有这些人都因为党附佩肯、许以支持，而受到大逆罪起诉、审判和定罪。蒙特福德、拉特克里夫、多贝尼当即处决。菲茨沃尔特解往加莱囚禁，但他诱惑看守、试

图越狱，败露后不久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其他人及圣保罗大教堂主持威廉·沃塞利获得赦免。另一些人也受到指控和审查，但没有付诸公开审判。^①

内大臣威廉·斯坦利爵士权倾全国、联姻王室，而且原有拥立之功，似乎足以保证他不受任何指控和惩罚。只是国王对他的审判需要更广泛、更严肃的准备工作。克利福德奉命只身返回英格兰，向主持枢密会议的国王叩陛乞赦，请求戴罪立功。而后，亨利告诉他：他能提供的最好的悔过证明和唯一贡献就是彻底坦白、交代同谋，且无论这些逆党是谁、地位多高。克利福德受到这样的鼓励，当场就指控斯坦利是主要教唆者，向枢密院提供了充分的罪证。斯坦利亲眼看到亨利不胜惊愕的状貌。国王断言：这种说法一定是无中生有；因为斯坦利戮力王事、效命忘身，带砺山河、与国同戚。更何况斯坦利的兄弟德比伯爵是国王的岳父，国王委以内大臣重任。斯坦利襄赞大政、沐恩深重，没有任何不满或担忧的理由，何至于图谋大逆？因此，他告诫克利福德：要认真权衡这个指控的分量。但克利福德坚持同样的指控，于是斯坦利遭到扣押，不久就在枢密院会议上接受审查。^② 他没有否认克利福德推卸给他的罪名，甚至没有试图减轻罪名。斯坦利也许认为认罪坦白可以赎罪；也许相信身居贵戚、历有功劳，可保赦罪全身。然而，功高易招君主疑忌。功臣贪得无厌、躁进无已，尤为可危。加上当时的民情普遍不满、有犯上作乱之心，似乎需要严刑重典以立威。斯坦利是王国最富裕的臣民之一，土地岁入不下三千镑，餐具和现金不下四千马克，其他财物不计其数。因此，亨利用极端手段对待斯坦利，贪图抄没其家产的动机起了不小的作用。国王为了表示怀疑和踟蹰，等待了六个星期，才将囚犯付诸审判、定罪，随即斩首。史家对他的罪名众说纷纭。一般的记载是，他私下对克利福德说：如果佛兰德露面的那位年轻人真是先王爱德华之子，他绝不会拿起武器反对王子。他的感情更偏爱约克宗室，而非兰

① Polydore Virgil, p. 592.

② Bacon, p. 611. Polyd. Virg. p. 593.

开斯特宗室，因此可能开罪于亨利。不过，即使在那时的武断之治下，这样的证据也不足以坐实斯坦利的大逆之罪。因此，另一些史家的论述可能性更大：斯坦利可能承诺支持佩肯，甚至给他提供了资金。

斯坦利明正典刑，举国震撼。佩肯党羽无不极度沮丧。克利福德变节，他们所有的秘密都已败露。看来斯坦利貌似深得国王信任之时，间谍早已环伺左右，随时报告和记录他的一举一动。于是，他们人人自危，甚至亲密朋友和熟人也不再彼此信任。国王雄猜苛察，加以知人有明、料事如神、盛名卓著，使得人人敬畏、蛊惑噤口、朋党失声。不过，敌视亨利及其政府的流言仍然不胫而走、无孔不入，说明国民的不满情绪相当根深蒂固，一有机会就会化暗为明。

然而，亨利一以贯之，宁可增加国民的恐惧而不愿争取他们的爱戴。日复一日，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贪婪随日甚一日。他为了从国民身上攫取罚款和供奉，不惜玩弄权术、歪曲法律和正义。伦敦市议员威廉·卡博尔爵士遭到二千七百四十三镑刑事罚款，和解后不得不偿付一千六百一十五镑。本案开辟了此类诉讼的先例，后来者层出不穷。这种手段——准确地说，是这种敲诈——构成国王施政的一大秘密。他一面压制贵族，一面提拔、褒奖、宠信律师。这样，他既能将权威建立在法律上，又能随意为自己的利益而歪曲法律。他厉行苛政，但负担并不甚重，原因在于：他伸张王权、压制贵族，自己事实上成了王国唯一的压迫者。

佩肯发现：国王在国民中的权威每天都在增加，他的觊觎变得越来越过时。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以维系党羽的希望和期待。由于亨利的警觉和严厉已经切断了他和贵族的所有联系，因此他集结了各国亡命徒、海盗、匪徒和穷人，为数达六百人，决心入犯英格兰，号召民众拿起武器。他获悉国王北狩，就在肯特海岸登陆，派部下沿岸动员乡民举事。肯特当地的士绅集结一支军队迎战，但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击退入侵，还想立下更大的功业。于是他们假意赞助佩肯的事业，邀请他亲自上岸统率民军。但这位机警的青年注意到民军

部署有方、不似拿起武器反对当局的乌合之师，便拒绝把自己托付给他们。肯特民军见用计不成，就向已经登陆的佩肯部众发动进攻，歼灭了一部分人，俘虏了一百五十人。国王决定无须对这些亡命之徒大发慈悲，便下令将他们付诸审判、定罪，全部明正典刑。^①

这一年，英格兰和爱尔兰各自召集国会，通过了一批值得称道的法案。其中英国国会颁布法案：任何人拿起武器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在位君主，以后的法律或国会法案不得为其忠君之举而剥夺其公权。有人可能会责难：该法案有利于篡位者。甚至在最动乱的时代，总会有最严格的规范可以确定真正的继承人，任何人不服从他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不过，当时君主的资格是重大争议问题，各派无不为自己的利益寻找借口；公共安宁在任何时候都有毋庸置疑的益处和重要性，似乎维护者理应享有安全保障。亨利意识到他的头衔有争议，便支持这项法案，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障他的党羽安全。但他自己已经对理查德的支持者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他有理由担心：在以后的政治动乱中，敌党可能再度革鼎，以遵循他的先例而非他的法律，施行暴政。他试图为将来的国会制定规则、约束立法机构本身，但这违背了最基本的政体原则。

国会还通过法案：授权国王通过法律程序向任何同意供奉的人征收任何数目的赋税。这项法案以间接方式使武断征敛合法化、正当化。

王权在爱尔兰同样无所不在、不受节制。爱德华·波伊宁爵士奉命镇抚该国，目的在于慑服约克党徒、绥靖土著居民。他的军力不足以充分支持这项事业。爱尔兰人遁入森林、沼地、群山，一度逃出波伊宁的势力范围。但波伊宁在都柏林召集的国会更为成功。他通过了著名的法案，确定了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的统治。这项法案至今仍然被称为波伊宁法案。法案规定：英格兰以前通过的法律在爱尔兰生效；未经英格兰枢密院裁可，爱尔兰国会不得通过任

① Polydore Virgil, p. 595.

何法案。后一款似乎专为保障英国人统治爱尔兰而设计，实际上却是为了保障爱尔兰民众的利益。其目的在于：防止爱尔兰贵族对民众施行暴政，特别是爱尔兰土生的总督或统治者压迫民众。^①

亨利就这样在全境建立了权威，举国上下普遍安定。这时，法兰西入侵意大利。查理国王轻率的行动缺少协调，却能迅速成功。欧洲大陆由此骚动不安。意大利人在连绵不绝的内战中武风颓败、日益文弱。他们看到一支敌军能够野战，不是华而不实的比武而是血流漂橹的实战，能够以自己的生命和敌人的生命为赌注，不胜惊愕。法军所向之处，文弱的意大利军队无不披靡，连他们最坚固的设防城市也开门迎降。诸王国和邦国刹那间摧枯拉朽。法军纵贯意大利，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似乎更像在本国境内宿营，而不像在征服敌人。这时，意大利人的箴言是：通过谈判维护邦国。他们在交涉中使用恶劣的权术，在战争中也沉溺于同样的恶习。诡诈、欺骗、反复无常的政治体系居于主流地位。欧洲其他君侯的枢密院还保存着一点点忠信，意大利人甚至对此大肆嘲弄，视之为愚昧和土气的证明。米兰公爵卢多维克邀请法军入侵那不勒斯，却既不希望他们成功，也没有料到他们会成功。他第一个对自己合作的成功前景感到恐怖，想纠集几位君主结盟，阻止查理的征服，保障他们的独立。联盟包括卢多维克公爵本人、罗马教皇、罗马人的国王马克西米利安、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和威尼斯共和国。亨利也加入这个联盟，但没有为结盟的目的付出任何努力或代价。法兰西国王为如此强大的联盟而惊恐，率领大部分军队撤回法国。他留在征服地的少量军队，部分由于本地人的暴动、部分由于西班牙入侵，不久就投降了。法军刚刚驱逐了那不勒斯国王阿尔方索，现在阿尔方索的儿子斐迪南又突然收回了王国。斐迪南不久后去世，把王位留给叔父弗雷德里克。

① Sir John Davis, p. 235.

第二十六章

亨利七世(三)

佩肯退返苏格兰——西陲之乱——布莱克希斯之役——与苏格兰休战——佩肯被俘——佩肯伏诛——沃里克伯爵伏诛——阿瑟王子迎娶阿拉贡的凯瑟琳——阿瑟王子之死——玛格丽特公主与苏格兰国王联姻——国民受到压迫——召开国会——卡斯提尔国王来访——萨福克伯爵密谋——国王有恙——国王驾崩——国王的性格——国王法律

佩肯从肯特海滨败退后，返回佛兰德。不过，他发现如果无所作为，他和他的部众就无法获得补给。于是，他不久就入侵爱尔兰，这个国家似乎一向乐于参加任何反对亨利权威的入侵。但现在波伊宁治理爱尔兰，并井有条；佩肯几乎毫无成就。他有一段时间在爱尔兰荒野中东躲西藏，继而厌倦了野蛮人的生活，并取道前往苏格兰，投奔在位君主詹姆斯四世。此前，法兰西国王厌恶亨利加入反对他的联盟，已经将佩肯引荐给这位君主。甚至马克西米利安身为联盟的一员，也不满国王禁止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贸易，并支持查理国王引荐佩肯。由于佩肯获得了这些君主的支持，苏格兰国王以优礼相待，保

证无论他到底是谁，绝不会因为投奔苏格兰而后悔。^① 年轻人自己精于逢迎、举止得体，甚至获得了一定的信用和权威。詹姆斯年纪尚轻，缺乏谨慎和猜疑的历练，经不住诱惑，相信了佩肯自诩的出身和经历。国王对佩肯如此深信不疑，甚至将凯瑟琳·戈登女士嫁给他。戈登女士是亨特利伯爵的女儿、国王本人的亲戚，德操出众、美貌过人。

那时，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国相互猜忌很深。由此，詹姆斯更容易接受任何能给敌人带来麻烦和困难的说法。他突然决定，率领一批边民入侵英格兰。他带佩肯一起出征，希望这位王位觊觎者露面能掀起北方各郡的叛乱。佩肯本人四处散发宣言，传播自己的故事，吁请四海臣民举义、驱逐篡位者。他说：这位僭主施行暴政和弊政，提拔寒贱、压制贵族，横征暴敛、苛索国民，理应臭名昭著、为众共弃。但佩肯觊觎王位、屡战屡败，他的宣言即使在民众眼中也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两国势成夙敌，因此苏格兰支持的君主不受英格兰国民的欢迎。何况边民习于纵暴侵凌，人人震骇。因此人民宁愿驱逐入侵者，而不愿意加入他们。佩肯本来可以假装深切同情不幸的臣民惨遭蹂躏，从而支持他假冒的王室身份；或以盟友资格，公开谴责苏格兰军队的暴行。^② 但詹姆斯告诉他：为敌人操心，保存永远不会属于他的东西，不见得有用。这时，苏格兰国王开始考虑劳师动众不会有结果。他获悉一支英军逼近，觉得最好是撤回本国。

亨利国王不急于为苏格兰的侵犯而报复或索赔。他主要关心如何从中谋利，以此为借口向本国臣民征税。他召集国会，向议员们诉苦：苏格兰人寇边作乱，无理支持冒名觊觎者，英格兰国王和王国因此蒙受多重侮辱。不出所料，国会对这番演讲作出回应：批准了十二万镑补助金，以及十五分之二的税。而国会在批准拨款后随即解散。

① Bacon, p. 615. Polydore Virgil, p. 596, 597.

② Polydore Virgil, p. 598.

亨利以其权威,促成国会批准拨款并不困难;但他发现,向国民征税并非易事。国民熟知他已经聚敛了大笔财富,难以忍受他一再因细故而重开征敛。众所周知,他的王位合法性存在瑕疵。他的统治特别容易面临暴动和叛乱,原因大概在此。他的补助金开始在康沃尔征收,当地居民人数众多、一贫如洗、强悍善战、勇敢无畏,对此怨声载道。北方各郡的力量通常足以击退苏格兰人突如其来的入侵,因此他们觉得自己非常安全。博德明兽医迈克尔·约瑟夫是著名的空想家,喜欢处处出头,便乘机蛊惑他们的不满而大声抱怨政府,在这些粗人当中赢得了权威。律师托马斯·弗拉默克素为左邻右舍钦服,也煽风点火。他告诉他们:征税虽然经由国会批准,但仍然完全不合法;北方贵族领有封地,有义务保卫国家、击退苏格兰人;如果他们对新税逆来顺受,就会助长亨利及其大臣的贪婪,国民不久就会承担不堪忍受的重负。他说:康沃尔人应该向国王武装请愿,借以加强声势;为了争取王国其他地区的赞同,他们应该注意维持纪律,表明他们的目的仅限于公共利益,以解除国民长期蒙受的一切压迫。

群众受到这些演说的鼓励,集合起来,拿起乡民常用的刀斧弓矢之类的武器,推选弗拉默克和约瑟夫为领袖。他们不久就率领康沃尔人,穿过德文郡,抵达萨默塞特郡。叛军在陶顿怒杀了好事的征税特派员,他们称之为佩林教务长。他们抵达威尔斯,跟奥德利勋爵会师。奥德利勋爵出身古老世家,行为举止深得人心,但为人虚荣、野心勃勃、躁进无厌。他一开始就跟叛乱煽动者暗通款曲,现在乐于接受他们的推戴而担任叛军首领。叛军因为获得这样一位显要贵族的支持而自豪,继续前进。他们向国王的大臣和宠臣发泄愤怒,特别是现任红衣主教默顿和最积极的压迫者雷金纳德·布雷爵士。他们虽然怨恨当局,但还是遵循首领的指示——沿途除非遭遇抵抗,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弗拉默克告诉叛军:肯特居民一向桀骜不驯,甚至诺曼底征服时都保持独立,因此肯定会拥护他们的党派、赞成公共利益和普遍自由的事业。但肯特居民最近以击退佩肯著称、蒙国王温语褒奖,因此跟政府间的关系相当融洽。因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此，在这一带权威素著的肯特伯爵、阿伯格芬尼勋爵、科巴姆勋爵不难维持地方靖安。康沃尔叛军虽然在伦敦门户埃尔特姆扎营，号召全体国民响应他们，但应者寥寥。虽然到处都有不满情绪，但没有人愿意参加仓促起事、缺乏协调的事业。何况，国王已经站稳脚跟，足以震慑最鲁莽、最勇敢的人。

亨利为了迎击苏格兰人，已经集结了一支军队，交给内大臣多贝尼勋爵指挥。他获悉康沃尔叛乱，就命令军队折回、南下平乱。他没有放弃苏格兰前线，而是委任萨里伯爵在北境集结军队、迎战敌军。这时，亨利同时面临君主国最致命的三种局势——外患、内乱、王位觊觎者。但他拥有巨大的军事和财政资源，而且性格英勇善战、无所畏惧。不过，他没有立刻发挥全部将才。在其他情况下，他总是当机立断，正如成语所言：灭此朝食。但康沃尔叛众秋毫无犯、乡野不惊；他们进军、宿营没有得到增援；仓促起事的民变随时可能因拖延而灭亡。因此，国王坐镇伦敦、勤勉筹备，以便确保胜利。

国王待全军集结完毕，将军队分为三支，出城迎战敌军。第一支部队由牛津伯爵统率，他麾下的埃塞克斯伯爵和萨福克伯爵奉命陈兵于叛军扎营的山后。第三支部队是主力，亨利交给多贝尼勋爵统率，命令他发动正面进攻、挑起战斗。第二支部队由国王亲自统率，充当预备队，驻扎在圣乔治场。此地拱卫京畿，一旦情况需要，可以随时扭转战局或结束战斗。他为了诱使敌人放松警惕，散布消息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内不会发起进攻。为了使叛军更加深信不疑，他快到傍晚时才开始进攻。多贝尼出兵德特福特桥，切断敌军。他在叛军主力恢复秩序之前，进据山坡，直逼敌阵。叛军多达一万五千之众，并不缺乏勇武；但他们阵容混乱、装备简陋，缺乏骑兵和大炮，无法跟王师匹敌。多贝尼恃勇轻敌，几乎以此丧命。他冲进敌阵当中被他们俘虏，但很快就被自己的军队救出。叛军稍作抵抗，就崩溃、逃走。^① 他们的首领奥德利勋爵、弗拉默克和

^① Polydore Virgil, p. 601.

约瑟夫被俘，三人都被处决。后者出于荒谬的野心，甚至死到临头还在欣喜若狂，相信他们可望青史留名。王师四面合围，几乎俘虏了全体叛军，随即将他们解散，没有进一步的惩罚。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也许，两千人已经殒命沙场，足以让亨利满意；也许，国王怜悯叛众的愚昧和天真；也许，他认为叛军秋毫无犯的行径值得称道；也许，叛众起兵时从来没有犯下他眼中的极恶大罪——质疑他的王权、或是有倾向于约克宗室的表现，这使他感到满意。

英格兰内乱期间，苏格兰国王并没有无所作为。他征集了相当强大的军队，屯兵诺森伯兰的诺汉姆城堡前。但他发现：达勒姆主教福克斯早有准备，土饱马腾、军资充足。围攻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他获悉萨里伯爵集结了一些军队向他逼近，就撤回本国，听任边界暴露在英军将领面前。英军围攻后占领了距离伯维克几英里的小城堡阿顿。这些边界两侧的小规模冲突预示着战争行将结束。亨利虽然比苏格兰国王更强大，但仍然比詹姆斯更渴望结束两国之间的分歧。不过，他为维护尊严起见，没有首先提议，而是借重彼得·希拉斯进行友好斡旋。希拉斯博学多才、娴于辞令，他是奉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之命出使英格兰，商议他们的公主凯瑟琳与威尔士亲王阿瑟的联姻事宜。^①

西班牙同时是交战双方的友邦。希拉斯取道北上，以西班牙大臣身份调停亨利和詹姆斯的纠纷。苏格兰很快就派出全权大使，举行和谈。英国方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引渡佩肯。詹姆斯回答：他无意裁断年轻人的王位资格，只把他视为求援者、许以保护。他下定决心，不会出卖一个信任他的善意和慷慨的人。英国方面的第二个要求并没有获得更满意的答复。他们要求赔偿苏格兰最近蹂躏英格兰边境所造成的损失。苏格兰全权大使回答：蹂躏就像泼在地上的水，不可能收回。因此亨利的臣民最好忍受损失，不要指望他们的主人会赔偿。亨利的全权大使接着提议：两国君主应该在纽卡斯尔会晤，以便调整

① Polydore Virgil, p. 603.

两国分歧。但詹姆斯回答：他有意接受和平，而不是乞求和平。为了不让会谈毫无结果地结束，他们签订了几个月的停战协定。詹姆斯明白：只要佩肯仍然留在苏格兰，他就永远不可能跟亨利达成可靠的和平，于是秘密要求他离开王国。

低地国家是佩肯平常失败时的退路，现在已经断绝了。弗拉芒商人感到英格兰贸易中断的惨重损失，向大公的枢密院施加压力。大公的全权大使前往伦敦，商议和解。弗拉芒宫廷同意将所有英国叛党逐出低地国家，禁令明确包含公爵夫人的领地。只要这个关键条款能够达成协议，所有其他条款就很容易调整。他们签订了有利于弗拉芒人的贸易协定，弗拉芒人长期称之为“伟大条约”。英国商人返回他们平时的安特卫普会馆，受到喜悦和欢庆的公开迎候。

佩肯虽然生在英格兰，按出身却是弗拉芒人。因此，两国签订的条约是否包括他，值得怀疑。但他如果留在低地国家，就必须解散所有的英国部众。在那些决意亲善英格兰宫廷的人民中，他肯定会受到冷淡，甚至恶劣的待遇。他考虑是不是最好在爱尔兰荒野和险要处隐藏一段时间。但他不耐烦悲惨而危险的撤退，便跟赫恩、斯凯尔顿、阿斯特里三位部下商议。他们都是破产的商人。佩肯根据他们的建议，决定尝试康沃尔人的支持。康沃尔人叛乱遭到镇压后，虽然受到国王的赦免，但仍然桀骜不驯。他刚刚在康沃尔的博德明露面，就有三千多民众聚集在他的旗帜下。佩肯陶醉于表面上的成功，第一次自称英格兰国王理查德四世。他不待追随者的期望枯萎，就进兵埃克塞特，许下大批美好的诺言，要求城市加入他一方。埃克塞特居民关闭城门，佩肯围攻城市。但他缺乏大炮、弹药和所有必需的攻城器械，围攻毫无进展。信使向国王报告叛乱消息。在此期间，埃克塞特市民决心竭尽全力，期望获得国王的救援——这位君主一向以警觉著称。

亨利获悉佩肯在英格兰登陆的消息，大喜过望，迅速准备迎战，希望最终能一劳永逸地了结他长期的困扰和焦虑。所有的廷臣都明白这一次出力最能见知于国王，便争先恐后、唯恐落于人后。多贝尼勋爵、布洛克勋爵和雷斯·阿

普·托马斯爵士迅速率偏师援救埃克塞特。德文郡伯爵和该郡大多数重要贵族一致拿起武器，赶去参加国王的大军。白金汉公爵身先士卒，率领年轻贵族和绅士志愿勤王，渴望有机会表现勇气和忠诚。国王本人率领大军随后。于是，英格兰仿佛团结一致，反对王位觊觎者。一开始，觊觎者曾经引起他们的注意并分裂了他们的忠诚。

佩肯得知王师势大，立刻解埃克塞特之围，退回陶顿。虽然他的支持者现在已经增加到将近七千人，似乎仍然足以维系他的事业，但他自己已经不抱成功的希望，便秘密退到新森林博利厄圣地避难。国王仍然愿意赦免投降的康沃尔叛军。只有极少数亡命之徒伏诛，有些人缴纳巨额罚款，大多数人不受惩罚地解散。佩肯的妻子凯瑟琳·戈登夫人落入胜利者手中，受到慷慨的对待。这种做法值得敬佩。亨利对她尊重备至，待以王后之礼，授予年金。她甚至在亨利的继承人一朝还在领取。

亨利筹划着如何捉获佩肯本人。有些人建议他为国家的理由而牺牲教堂的特权，暴力闯入圣地，给予他的胆大妄为以应有的严惩，由此结束了长期困扰政府的冒名觊觎，不让人民的轻信和不满分子的诡计有机会死灰复燃。但国王不同意以暴力解决如此重要的事务。他派人跟佩肯谈判，许以赦免，劝他向国王投降。^① 国王在模拟的凯旋式中领他前往伦敦。佩肯沿途经过伦敦街道时，各等级居民都聚集起来围观，民众大肆嘲笑他的没落。他们很乐意亲自以侮辱来报复自己先前上当受骗的耻辱。虽然国民已经普遍清楚佩肯的真实出身，亨利还是要求他坦白自己的生平和经历。国王随后下令散发全部记录，满足公众的好奇心。不过，他出于体面的考虑，没有公布勃艮第公爵夫人策划和操纵了冒名者的经过。人们知道她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角色，因此看不到这方面的说明，便倾向于怀疑记录的真实性。

① Polydore Virgil, p. 606.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佩肯虽然获得赦免的保证，但仍然受到严密监控，有专门看守人员监视。他不耐拘束，逃离看守，投奔薛尼圣地，依靠修道院长保护。院长以其圣洁的品格而受到广泛的信任。他劝说国王，再次赦免佩肯。但为了进一步羞辱佩肯，他被送往威斯敏斯特和奇普塞德市场，被迫在这两个地方大声朗读过去以他的名义出版的自白书。然后，他被关进伦敦塔。在伦敦塔，他仍然禀性难移，永无止境地策划阴谋。他潜移默化，跟伦敦塔卫生成长约翰·迪格比爵士的四位仆人称兄道弟。通过他们的关系，他得以跟同在伦敦塔内的沃里克伯爵联系。不幸的王子自幼与人交流隔绝，甚至最普通的生活常识都完全不了解，天真无知，很容易受到任何人的影响。伯爵一直担心亨利的暴政变本加厉，加以自然而然地渴望自由，因此同意了杀害卫生成长、越狱逃走的计划，佩肯筹划了整个计划，但密谋没有逃过国王的警觉。人们甚至普遍相信：这个计划就是国王的杰作，目的在于诱使佩肯和沃里克落入陷阱。但迪格比爵士的两位仆人后来因密谋而处决，似乎洗清了国王的嫌疑。亨利蒙受嫌疑，主要是因为他非凡的性格而非任何实际证据。

佩肯屡次犯下极恶大罪，这次重犯后，再也不可能获得赦免。他受审、定罪后不久，在泰伯恩刑场绞死，行刑时仍然反复宣讲他的自白书。^① 就在这时，

^① Stowe, Baker, Speed, Biondi, Hollingshed, Bacon. 一些晚近的作家，尤其是 Mr. Carte 怀疑佩肯可能并不是冒名顶替，甚至宣称他确实是真正的金雀花王子。我们只需要回顾以下几点，就能反驳这个论点：

I 虽然红白蔷薇战争的背景通常模糊不清，但理查德篡位，两王子遇弑期间的一切事迹证据确凿。托马斯·莫尔爵士留下了记载，他非凡的慷慨、廉直和公正使他提供的证据超乎一切异议之上！没有任何古今史家比他的分量更重。而且，他完全有理由视为两王子遇弑案的同时代人。虽然事件发生时他只有五岁，但他在理查德时代主要人物当中生活、求学。他的叙述经常极为详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从目击证人口中掌握了细节。因此，他的权威不可抗拒，足以压倒一百种疑问、顾虑和反对。事实上，他的叙述既没有遭遇可靠的反对意见，也没有发现任何错误。他确实说：护国公的党羽，特别是 Dr. Shaw 散布流言，称爱德华四世与伊丽莎白·露西结婚在先；而现在记录显示，国会后来借口爱德华与埃莉诺·塔尔伯特结婚在先，宣布国王的孩子为庶出。但必须注意：这些结婚记录无一得以证明。护国公的佞臣和党羽为什么时而用这一种流言，时而又用另一种流言呢？托马斯·莫尔爵士提到两种流言，理所当然地给予了同等轻蔑。理查德唆使 Dr. Shaw 公开诋毁自己的母亲、跟他关系良好的约克公爵夫人，Mr. Carte 也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果这些假设存在任何疑点，我们只需要设想 Dr. Shaw 一般布道时跟护国公及其大臣协商过，但他自己极其愚蠢地选择了这样的题目。确实，他后来似乎就是由于这个侮辱而失宠于护国公。（接下页）

(续上页) II 如果同时代人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分量还有争议余地,那么格洛斯特公爵身为监护人,其判断佩肯冒名顶替不可能有疑义。那时,公爵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核实、判断真伪。他肯定约克公爵已被叔父谋杀,明确表示佩肯是冒名顶替者。

III 另一位卓越人物仔细核查过这一段历史,他的天才可以公正地称为国之瑰宝,足以跻身于一切时代、一切邦国最杰出作家之列。我指的是培根勋爵。他极其详细地考证了佩肯·瓦贝克是冒名顶替者,没有留下丝毫疑点或漏洞。如果因为培根勋爵不是同时代人而拒绝采信,那么我们跟他一样,也是根据以前的材料形成判断的。必须注意;培根勋爵详尽而精确的史书参考了许多现在已经失传的记录和文件。因此,他总是作为原创史家受到引用。如果 Mr. Carte 的看法正确,培根勋爵精心考证所有文件,没有发现佩肯可能是金雀花王子的任何理由,未免难以置信。那时,殴打理查德三世已经没有利益可言。培根是非常公正的史家,绝不偏袒亨利。我们能了解这位君主的苛政,就靠他一人。从培根的性格看,只能认为;就他提到的事实而言,他的责备还没有达到应有的强度。我们顺便提一下:莫尔、培根、克拉林敦、惠特洛克四位伟人有大造于英国史学,他们在法学上已经占据了极为崇高的地位。

IV 但如果追查同时代的证据,本案的证人依据是全世界最强、最无可置疑的——太后,她的儿子,慎思明辨的多塞特侯爵,她的兄弟爱德华·伍德维尔爵士,国王的妹夫托马斯·圣雷哲爵士,约翰·波切爵士,罗伯特·威洛比爵士,吉尔斯·多贝尼爵士,托马斯·阿伦德尔爵士,考特尼,切尼,塔尔伯特,斯坦利;总而言之,他们全都是约克党人,这个国家最高贵的人。所有这些人都相信两位王子遇弑,才向约克党人和约克宗室的死敌里士满伯爵求援。他们将伯爵推上王位,如果两位王子还活着,这样做一定会彻底毁灭他们。他们保证将伊丽莎白公主嫁给里士满伯爵;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公主就是王位继承人。如果这些人写过回忆录,肯定会记录理查德弑侄。他们的行动比任何记录更能说明他们的真实感情。

V 但我们有另一位同时代的权威,就是理查德本人。就揭示真相而言,他甚至胜于任何伟人。理查德想跟侄女联姻,以便将她的王位资格跟自己连在一起,这种做法在英格兰非常少见。因此,他明白她的王位资格有效。宣布她为私生女,没有任何证据,甚至连捏造的证据也没有。国民总是蔑视这样的宣言,视为国会事务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国会自身臭名昭著,没有权威可言。亨利和伊丽莎白即位后,甚至国会也鄙视这样的宣言,不屑于予以推翻。

VI 我们掌握了当时国内外普遍的意见,也是同时代的证据。Philip de Comines 告诉我们:当时舆论认为理查德弑侄无可置疑,因此理查德向法兰西宫廷通报继位时,法兰西宫廷对他谋害二侄的恶毒弑亲罪大为震惊。我们从同一位作者那里得知:这种感情达到不寻常的高度,以至于法兰西宫廷不屑于作出答复。

VII 当时确定弑亲罪的理由现在仍然存在。对我们而言,应该是最无可置疑的证据。换句话说,王子突然从塔内消失,再也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人人都说:他们没有从叔父手中逃走,因为他没有搜寻他们。他没有送他们去别处,因为他这样宣布只是为了摆脱谋杀的恶名。如果他不能保证匿迹,就不会冒弑亲罪的恶名与风险。王子在他的监护下,对他们负有责任。根据一切常识的法则,如果他不能提供他们的情况,就肯定是他谋权害命,理应视为凶手。从他公然篡位,以及其他种种诡诈残暴行径来看,不能指望他会做出更好的事情。他不能效法该隐,说他不是侄子的监护人。这个理由从一开始就无法反驳,由于理查德的沉默,完全无人知晓王子们的下落。两年后,理查德的王朝就结束了。可以肯定,他挫败里士满伯爵的图谋、证明自己的人格,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侄子露面。

VIII 虽然证据已经彰明昭著,如果有必要,我还可以举出狄格顿和特里尔的谋杀记录。其他案件中,凶手的记录相当重要,可以确定案情的可信度。特里尔特别不可能冒认如此重大的罪行,这样似乎不会让他获得亨利的恩宠。

IX 约克公爵年仅九岁,没有大人帮助,不可能逃脱。他们为什么不立刻通知他母亲太后、姑母勃艮第公爵夫人和家族的其他朋友呢?公爵夫人保护了西蒙内尔,这个计划如果成功,就会以沃里克加冕、排除约克公爵为结局!这个证据以及其他许多证据都说明:她不知道王子逃脱,这件事不可能是真的。

X 协助约克公爵逃亡的人、他八岁以后隐藏的地方都无人知晓,就是冒名顶替的充分证明。

XI 佩肯自述的逃亡记录不可思议、荒谬无稽。他说:叔父雇用凶手杀害他们兄弟。他们杀害了哥哥,但出于同情让他逃走了。那时所有史家都保存了这个记录。

XII 佩肯至少三次彻底坦白了他是冒名顶替者。第一次是他投降时;第二次是他在威斯敏斯特和奇普塞德市场坦白;第三次是他在绞刑架下最确凿无疑的证据。坦白丝毫没有逼供的嫌疑。可以肯定,最后一次他也没有再害怕的理由了。

XIII 佩肯身为荒谬的冒名者,受到全国厌弃。如果亨利没有作出保证,绝不会让他在自己手里多活一小时,更不用说两次赦免他。无辜的沃里克伯爵事实上没有王位资格,受到的处置充分证明了这种推理。(接下页)

一位皮匠的儿子威尔福德受到其他冒名者惊人成功的鼓励，冒充沃里克伯爵。一位神甫甚至冒险在讲坛上向人民鼓吹他的事业，人民似乎仍然倾向于他。这一事件给亨利提供了严厉处置沃里克伯爵的借口。伯爵受到审判，没有指控他试图逃跑（因为他没有犯罪，热爱自由只能视为自然而清白的愿望），而是指控他策划扰乱政府、煽动人民的叛乱。沃里克承认起诉的罪名，被判有罪。判决执行。

这次暴行是亨利一朝的重大污点。他灭绝了金雀花王室的最后一位男性，引起国民极大的不满。他们看到这位不幸的王子长期丧失了高贵出身的所有特权，甚至被剥夺了自然的普遍福利，最后仅仅因为试图动摇他受到的压迫而连生命都无法保全。亨利试图让盟友斐迪南分担责任，然而徒劳无功。他说：如果约克宗室还有任何男性后裔，阿拉贡国王就不愿意将女儿凯瑟琳嫁给阿瑟王子。结果适得其反，人民更加愤怒。他们看到年轻王子不是因为法律和正义，而是因为两个狡诈暴君的猜忌而牺牲。

虽然不满情绪在人们心中积累，但在亨利警觉的政策和一贯的严厉遏制下，似乎不至于削弱政府。外国君主看到亨利的王位已经完全稳固，便给予他更大的重视和关注。菲利普大公爵特别希望跟他会面。亨利渡海前往加莱，同意在城市附近的圣保罗教会晤。大公爵匆匆赶来拜见国王，为亨利扶马

(续上页) XIV 我们确切地知道整个冒名阴谋的来源。也就是说，来自勃艮第公爵夫人的阴谋。她以前就承认和支持公开的冒名者兰伯特·西蒙内尔。值得注意：Mr. Carte 为了隐匿公爵夫人青睐佩肯的证据，完全略去了这方面的重要材料。这位作者有强烈的党派偏见，渴望抹黑亨利七世。亨利七世的王位继承资格是有问题的。

XV 当时，佩肯自称理查德·金雀花，但没有任何证据或证据的影子。理查德王子九岁失踪，佩肯出现时已经是成年人。人们怎么可能根据外貌来辨认他的身份？虽然他知道一些理查德童年和英格兰宫廷的故事，但九岁的孩子一定很容易接受勃艮第公爵夫人、亨利的秘书弗里昂或任何曾经在宫廷中生活的人暗示。确实，许多要人一开始上当受骗；但反对亨利政府的不满情绪、普遍热爱约克家族的情绪足以解释这种暂时的幻觉。佩肯死前很久，所有人就已经认清了他。

XVI 查理二世一朝发现的两具尸体肯定关系重大。尸体发现的地点正好吻合莫尔、培根和其他古代作家记载的年轻王子墓地。骨殖大小吻合王子们的年龄。葬地隐秘且不规则，没有葬在圣地，证明孩子们死于秘密谋杀。在伦敦塔内，只有非常接近王位的孩子才会暴死。我们如果对比一切已知条件，可以公正而有力地推理；这就是爱德华五世和他弟弟的尸体。尸体发现时，这样的推理就已经产生了。本书出版以来，沃尔普尔先生 (Mr. Walpole) 出版了他的《关于理查德三世的历史疑案》。这位绅士天资独绝、下笔有神，最好的证据莫过于：他能探索这一段遥远的英国历史、大众耳熟能详的话题。由于这个特点，前述事项得以更加详尽地叙述。

镫。如此屈尊，为君侯鲜见。菲利普称国王为“父亲、恩主、保护人”，一切举止都表现出他急欲博取英格兰的友谊。奥尔良公爵继承了法兰西王位，称路易十二。他进军意大利，征服了米兰公国。法兰西国王的实力增长，激起菲利普大公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嫉妒。因此，三位君主协商决定：菲利普应该竭尽全力争取亨利的亲善。他们认为，只有英格兰才能充当法兰西强大力量的主要平衡者。虽然两国君主在会晤中似乎已经协调一致，但他们没有达成具体计划。会议在普遍的亲善和尊重中度过。两位君主亲密的联盟至少设定了一个遥远的计划，约定他们当时还在襁褓中的儿女将来联姻。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也没有忽视跟这位誉满全欧的君主发展友谊。他派教廷大使前往英格兰，游说国王加入收复圣地的大联盟、亲自率军讨伐异教徒。在欧洲，狂热的十字军热忱已经消磨殆尽。不过，为了保持体面的外表，假装对虔诚的事业满怀热情，仍然公认为必要。亨利对教廷大使表示遗憾：他的王国形势偏远，不便他为基督教事业而亲征。不过，他承诺竭尽全力提供援助和捐赠。亨利甚至承诺：即使教皇为圣战而独自奋斗、得不到其他君侯的支持，他仍然会抛开其他一切考虑亲征圣地。他只提出必不可少的条件：基督教各邦的君侯应该协调过去的一切分歧；意大利若干港口市镇应该拨划给他做驻军营地和安全保障。不难得出结论，国王已经决定不再插手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但罗德岛骑士团当时是基督教世界的强大力量，其选择亨利为骑士团的保护人。这个伟大的名分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助益，但往往颇具声势。

不过，亨利最重视的盟国君主乃是阿拉贡国王斐迪南。斐迪南的政策活跃而稳健，一向马到成功。由此，他在许多方面都是欧洲最重要的君主。这两位君主的性格多有相似之处：精于权谋、诡计和策略。双方几乎没有利益冲突，否则性格相似并不能构成信任与亲善的坚固基础。亨利和斐迪南的国土互不接壤，不会相互猜忌。威尔士亲王阿瑟和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四公主凯瑟琳议婚七年，终于尘埃落定。国王对此感到满意。阿瑟年近十六，凯瑟琳十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八。但这次婚姻最终不谐。几个月后，年轻的阿瑟王子病故，举国哀悼备至。亨利国王渴望保存他跟西班牙的联盟，也不愿意归还凯瑟琳的二十万杜卡特（ducats）嫁妆，就封二儿子亨利为威尔士亲王，让他与凯瑟琳结婚。亨利王子年仅十二岁，便强烈反对，但国王坚持他的决定。婚约终于签订，双方取得了教皇的特许。这一事件后来引起了最重大的结果。

同年还举行了另一场婚礼，也对后来的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王长女玛格丽特嫁给了苏格兰国王詹姆斯。这次联姻协商了三年时间，其间几度因两国纠纷而中断。英格兰频繁遭受邻邦的侵扰，亨利国王希望：通过两国联姻，消除邻邦一切不睦的根源。英国枢密院商议这次联姻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由于这次联姻，英格兰可能落入苏格兰的统治之下。“不，”亨利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只会是苏格兰并入英格兰。”但在国王处处春风得意之际，家庭内部遭遇大患：王后难产而死，婴儿没有比她多活多久。亨利本应非常难过，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王后的为人无愧于举国敬爱。国民普遍认为国王粗暴地对待她，因此对她更加爱戴。

这时，国王在国内和国外的事务都一帆风顺。欧洲各君侯的所有举措都转向意大利一方，随后发生的种种事件使亨利的支持对各方举足轻重，但对亨利本人的利益却关系不大，不必为此操心或焦虑。他跟西班牙、苏格兰亲善，保障了本国的安宁；他凭借谨慎而积极的举措，击败一切内敌，彻底绥服国民。因此，亨利不必担心敌人反对和局势失控，充分发挥着他的自然偏好。贪婪始终是他主要的志趣，随着年龄而日益增长，并受到绝对权威的鼓励，不知廉耻、不顾公义。他任用的两位大臣——燕普逊和达德利——辅弼贪婪和暴政，掠夺无助的国民，无懈可击。这两位压迫的帮凶都是律师。第一位出身卑微、手段残暴、性格坚韧。第二位出身、教育、家庭较好，但同样不义、苛刻、坚韧。他们运用法律知识歪曲正义、欺压良善。国王以其可畏的权威支持他们的一切恶行。

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开始时表面遵守法律，控告他们打算压迫的人。这些

人入狱后，审判永远不会举行。最后，他们为了重获自由，只得缴纳沉重的罚款和赎金，称为减免和贡献。渐渐地，他们连表面上的法律也弃而不顾。两位大臣直接下令拘传，命令一些人觐见、另一些人在他们的私宅里受审。宫廷委员会不经法律或评审团，就在王室诉讼和私人诉讼中作出武断的判决。即使召集评审团，对被告也没有什么好处。评审团本身就处在压迫者的淫威之下，如果他们敢于作出不利于大臣的判决，就会面临罚款、监禁等惩罚。封建法的整个体系仍然广泛存在，但已经改造成压迫的工具。甚至国王监护的继承人成年后，只有支付了苛重的费用才能继承他们的土地。人们还苦于苛琐的骚扰，这些烦扰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借口。任何人都可能被剥夺法律的保护，只有缴纳巨款购买赦罪书。在这些案件中，如果他拒绝遵命缴纳贡献，那么没收动产的严苛法律就会启用。剥夺被法律保护的两年内，当事人的半数地产和地租就会没收，无需任何法律程序的掩饰。不过，这些大臣运用的主要压迫方式乃是刑事法案。刑事法案不考虑等级、德才、功绩，以严刑峻法迫害所有人。在王国全境，间谍、告密者、检察官都获得奖赏和鼓励。刑事法案的利弊、新旧、能否执行，都无关紧要。结局只有一种：国王及其大臣聚敛得手，他们治下的所有臣民遭受苛政。^①

当局惯于武断不义，英国人古老的特权受到严重损害。根据这些特权的保证，除非他们自己在国会中同意征税，而他们无须缴纳任何税款。国王已经掌握了随意普遍征税的权力，自然不会放弃这些压迫性的权宜之计。结果，私有财产完全丧失了保障，举国上下噤若寒蝉。人们寻求国会的保护，然而徒劳无益。亨利一朝频繁召集国会。国会如此恐惧王室淫威，以至于下议院在亨利的压迫最严重时，选举达德利为发言人（speaker）。达德利本人就是苛政的首要帮凶。众所周知，国王已经府库充盈，没有战争或任何劳费的事业可以作

^① Bacon, 629, 630. Hollingshead, p. 504. Polyd. Virg. p. 613, 615.

为聚敛的借口。然而，国王要求补助金，国会仍然批准。但国王的贪婪并未因此而满足，他第二年又开征新捐、重启武断压迫的征敛方式。他千方百计地聚敛，又在用度上极尽俭省。府库充实，据说现金多达一百八十万镑。如果我们将考虑到当时货币奇缺的境况，这个数目近乎不可思议。^①

亨利正在掠夺受到压迫的国民，聚敛财富。然而，这时海外发生的事端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甚至是关注和焦虑。这时，卡斯提尔女王伊莎贝拉去世了。可以预计，她丈夫斐迪南的幸运将会受到影响。亨利国王既要关心盟友的命运，又要保持警觉，以免这一重要事件影响整个欧洲体系。他还考虑到：自己的地位跟斐迪南非常相似，此事的处理可能构成他的先例。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女儿琼嫁给菲利普大公爵，根据母亲卡斯提尔女王的资格，似乎有权力跟目前据有卡斯提尔王国的斐迪南争夺。亨利明白：虽然他自居兰开斯特宗室传人，但大多数国民相信王后的继承权优于他。威尔士亲王天天都在长大，国王害怕他会禁不住野心的诱惑，立刻要求王位。亨利一贯的政策就是压制约克宗室的党羽，结果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为一党。约克党人长期受到压迫，更增加了他们挣脱枷锁的愿望。亨利的政府压迫成性，使反对他的敌人在各方面都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他不像斐迪南那样拥有自己独立的势力，他统治的王国更加骚乱难治，他自己的狭隘政策强化了党派偏见。因此，他担心自己的处境比斐迪南更危险。

一开始，西班牙事务跟国王的希望背道而驰。斐迪南跟亨利一样，非常不得人心。原因也非常相似：就是他以前的横征暴敛。卡斯提尔国会明显倾向于菲利普和琼。菲利普大公爵、现任卡斯提尔国王为了运用其有利地位，跟他的王后一起，在冬季前往西班牙。但他在海峡遭遇大风暴，不得不在韦茅斯港口避风。

^① Silver 称本朝一镑相当于三十七先令六便士，因此亨利的财富相当于现在的近三百万镑。此外，由于欧洲金银大增，许多商品价格上涨了三倍。环境更加重要，当时所有其他各邦跟现在相比非常贫困。这些环境使亨利的财富显得非常庞大，促使我们设想他的政府压迫成性。

约翰·特伦查德爵士在多塞特郡很有权威，获悉舰队靠岸，便集结了一批人马。约翰·卡里爵士也率领一支部队，跟特伦查德爵士会师。特伦查德爵士来到韦茅斯，发现菲利普苦于疾病和劳顿，已经登岸休息。他邀请菲利普光临自己的宅第，便立刻遣使向宫廷报告了这一重要事件。国王火速派阿伦德尔伯爵去欢迎菲利普造访英格兰，通报亨利有意亲自迎接、以得体的礼仪在王国领土上接待贵客。菲利普知道，他现在只有征得亨利的同意才能离开英格兰。因此，他为了方便辞行，抢先拜访温莎。亨利以尽可能盛大的排场和表面的热情迎接他，但仍然决心从王室贵客并非自愿的访问中抓住机会，为自己谋取一些利益。

萨福克伯爵埃德蒙·德·拉·博尔是爱德华四世的侄子、林肯伯爵的兄弟。林肯伯爵已经在斯托克战役中阵亡。几年前，萨福克伯爵一时冲动杀了人，不得不向国王请求赦免。国王答应了他的请求，但不肯给约克宗室的亲戚稍加宽纵，命令他公开到宫廷来申请赦免。萨福克对这种侮辱的痛恨超过了他对国王恩典的感激，于是逃往佛兰德，依靠姑母勃艮第公爵夫人的庇护。但国王许诺宽恕他，他又返回英格兰，再次接受赦免。然而，萨福克伯爵天性躁进，在阿瑟王子的婚礼上靡费过甚、负债累累，再度潜逃到佛兰德。亨利非常清楚自己的政府普遍不得人心，因此没有对这一事件潜在的重要性掉以轻心。国王照例以诡计回避敌人的举措。他指示哈默斯城堡总督罗伯特·柯森抛弃职守，投奔萨福克伯爵，争取伯爵的信任。国王根据柯森秘密提供的情报，逮捕了威廉·考特尼爵士、威廉·德·拉·博尔、詹姆斯·特里尔爵士、詹姆斯·温德汉姆爵士和其他一些次要人物。考特尼爵士是德文郡伯爵的长子，跟王后的妹妹凯瑟琳夫人结婚。威廉·德·拉·博尔是萨福克伯爵的弟弟。国王将他们监禁起来。阿伯格芬尼勋爵和托马斯·格林爵士也被逮捕，但不久就被释放。威廉·德·拉·博尔在狱中待了很久。考特尼爵士被剥夺公权，虽然没有处决，但在亨利有生之年一直没有恢复自由。但亨利对詹姆斯·特里尔爵士和詹姆斯·温德汉姆爵士最为严厉，他们都受审、定罪、被处决。特里尔

爵士参与谋害爱德华四世的幼子一案，他的下场大快人心。虽然这些人已经暴露、处决，柯森仍然受到萨福克伯爵的信任。亨利为了消除一切怀疑，根据他伪装的叛乱罪，将他和萨福克本人一起逐出教会。但这位间谍完成一切委托给他的任务后，突然抛弃伯爵返回英格兰。国王待以殊礼，大施恩宠。萨福克伯爵对他的背信弃义大为震惊，又发现甚至连勃艮第公爵夫人都厌倦了徒劳无益的尝试、不再热衷于他的事业，便秘密逃往法兰西，随后去德国，最后返回低地国家。那时，菲利普大公爵已经跟亨利国王结为亲密同盟，虽然保护他，但并不支持他。

亨利没有错过目前的机会，他抱怨客人在自己的领土上接纳萨福克伯爵。“我确实觉得，”卡斯提尔国王回答道，“陛下如此伟大、如此幸运，根本无须为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操心。但为了让您满意，我会将他驱逐出境。”“我期望您额外赏脸，”亨利国王说道，“把萨福克交给我，以便确保他会忠君事上。”“这种做法，”菲利普说道，“有损于我们俩的荣誉。人们会误会您把我扣押了。”“那不就解决问题了，”亨利国王回答说，“因为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您的荣誉白璧无瑕。”^①卡斯提尔国王发现自己别无选择，但他首先要求亨利承诺饶萨福克一命。菲利普邀请萨福克伯爵回国，假装亨利国王在朋友和同盟的斡旋下，已经同意赦免他。萨福克一到，就被投入伦敦塔。卡斯提尔国王不仅作出了这一项让步，还签订了英格兰和卡斯提尔的贸易条约，条件对前者有利。^②亨利因此完全满意，最后同意菲利普滞留三个月后离开。菲利普在西班牙登陆，受到卡斯提尔人盛情接待，登基继位。他不久后去世，寡后琼悲恸欲绝。斐迪南重新掌握了整个西班牙的王权，直到他去世。

这次事件两年后，亨利国王去世。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王朝只有一项重要事务：亨利的二女儿玛丽公主与卡斯提尔国王菲利普的儿子查理大公爵订婚。

^① Bacon, p. 633.

^② Rymer, vol. xiii. p. 142.

亨利国王自己也有意联姻。他第一个议婚对象是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的寡后，第二个议婚对象是守寡的萨伏伊公爵夫人。这位公爵夫人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菲利普的妹妹。但亨利的身体状况恶化，终结了所有这些计划。他开始把目光转向筹划未来。他的王朝严酷而不义，因此前景非常暗淡。他为了缓解自己造成的恐怖，开始捐赠慈善事业、建立宗教机构，以便补赎自己的罪恶。他想牺牲一部分不义之财，跟他所冒犯的造物主和解。亨利偶尔甚至懊悔不该让燕普逊和达德利滥用他的权威，但懊悔并不足以使他制止这些压迫者的贪婪掠夺。威廉·卡博尔爵士再次因细故而遭到两千镑罚款。他胆敢怨望这种不义的判决，就被关进伦敦塔。伦敦市议员哈里斯受到控告，尚未开庭就死于忧虑。前任伦敦市长劳伦斯·埃尔默爵士和他的两位治安官遭到苛重的罚款，都被关进伦敦塔直到罚款付清。所有这些苛政都获得了国王的支持。死期越来越近，国王变得更加恐怖不安。他后来下令在遗嘱的一般性条款中规定：他伤害过的所有人都应该获得赔偿。亨利国王在他喜爱的里士满行宫死于结核病，享国二十三年零八个月，卒年五十二岁。^①

大体上，亨利七世当国，内能靖乱安民、外能光大邦国。他结束了长期折磨邦国的内战，维持国内和平与秩序，压制贵族过去享有的过分权力，赢得若干外邦君主的友谊，获得所有人的重视和尊重。他热爱和平，不畏战争。他虽然始终猜忌侍从和大臣，但无论施政还是兴师，绝无畏怯。他虽然严刑峻法，但主要出于政策需要而非报复情绪。他造福国民，主要为一己之私而非顾念公益。他在没有考虑私利的地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动机是恶毒的党派偏见，还是卑鄙的贪婪本能。他不为感情的冲动或逸乐的诱惑所动，友谊或慷慨的善意考虑尤其不起作用。他原本才能卓越，但多少由于心胸狭窄而受到限制。他擅长讽喻和陈词，但除非在重大利害关头从不运用这些才能。他疏于

^① Dugd. baronage, II. p. 237.

怀柔民情，仅仅依靠国民的恐惧和尊敬建立权威，经常感到岌岌可危。他处理事务极其认真，但并没有洞烛先机的远见。他更擅长亡羊补牢而非曲突徙薪。大体而言，贪婪是他主要的志趣。^① 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实例——龙飞九五之尊、腹负经济之才，居然会任贪婪凌驾于雄心之上。即使寻常布衣之流，贪婪也不过是各种野心之一，尊重、荣誉、地位和财富都是主要的动机。

英格兰列王多多少少都行使过不法或任意的权力，但以往列朝极少武断如亨利一朝。至少，大宪章确立以来一向如此。亨利不仅获益于个性，他一切经营，无不积极、勤勉、一丝不苟、深思熟虑，辅以谨慎、助以好运，卒成王业。长期而血腥的内战毁灭了所有大贵族，只有他们才有力量抵抗王权的侵蚀。在此以后，亨利登上王位。国民厌倦了内乱和动荡，宁愿屈服于篡夺乃至伤害，也不愿意重新投入内战的汤火。举兵反抗总是徒劳无功，通常反而加强了亨利的权威。他依靠党派统治，这个党派比较弱小。亨利任用的所有官员都明白他们完全依靠国王的保护，因此宁愿以牺牲正义和国民特权为代价来支持他的权力。当时王室特权大幅度扩张，本朝开辟了英国宪制的新纪元，主要原因似乎在此。

虽然这位君主置王室特权于法律之上，但他的政府为臣民制定了许多良法，颇受他的史官称颂。确实，本朝立法制定的几项规章有利于王国的治安和贸易。但立法者考虑前者比考虑后者更为周到。考虑到国内的司法行政，维护秩序和公正的简明概念足以引导立法者考虑到方方面面。但贸易的原理复杂得多，任何邦国都需要长期的经验和深刻的反思才能充分理解。立法或执法的真正后果经常跟法律给人的第一印象恰好相反，难怪乎亨利七世一朝的贸易立法经常失误。可以肯定，甚至到了培根勋爵的时代，这方面的观念仍然

^① 培根告诉我们，亨利不放过最细微的利益。他在 Epsom 保存的账目记录中发现了证据。账目几乎每一页都有国王的亲笔签署。其他条款后面有“细目，收到五马克赦罪赎金。如果赦罪没有通过；赎金应该归还，或给予其他补偿。”记录对面，国王亲笔写道：“其他补偿。”Bacon, p. 630.

极不完善，谬误百出。

亨利一朝早期，星室法庭的权威凌驾于普通法和古老惯例之上。在某些情况下，星室法庭的判决还获得了国会法案的确认。^① 培根勋爵称颂星室法庭的效用，但甚至这位史家的同时代人都开始感到：如此武断的司法机构与自由无法相容。国民越能发扬独立的精神，就越是憎恶星室法庭。最后，在查理一世一朝、内战爆发前夜，国会通过法案彻底废除了星室法庭。

根据国王的指示，本朝通过法律：谋杀案诉讼应该在一年零一天内举行。^② 以前的诉讼通常在此之后才会开始。在此期间，被害者的朋友经常会多次犯罪而不受惩罚。穷人可以根据所谓的“穷人程序”诉讼。也就是说：当事人无须为令状付钱，也无须向枢密院缴纳任何费用。^③ 这样的法律在任何时代都值得称道，在那个国民受到沉重压迫的时代尤其如此。但法律难以付诸施行。比如，一条法律禁止对妇女施暴；^④ 神职人员的圣俸遭到削减；^⑤ 初犯的罪人在一只手上烙一个字母，标志他的罪行，如果重犯，就处以死刑。从此，郡长必须首先传唤被告到法庭受审，然后才能处以罚金。^⑥ 这样的惯例应该早已盛行，因此颇为费解。超过四十镑的案件不再由陪审团审理。^⑦ 一条法律貌似公正，但后来发现极为不便。比如，不得以诡计或共谋手段逃避公共诉讼。如果国王的任何臣仆图谋杀害王室内廷总管、司库、审计长，即使没有公然作

① Rot. Parl. 3 H. VII. n. 17. 这是值得注意的先兆，显示了邦国当时的情形。“国王、我们的君主明白：由于我们的不法馈赠，本国的政策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王国臣民以契约、承诺、誓言和其他笼络手段侍养侍从，给他们提供号衣、徽章和标志。郡长行为不端，降低身份，操纵陪审团。陪审团接受贿赂，给予不正当的回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必须承认：邦国形势如此，君主确实需要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同样的，政府准则能够适用于社会更高级阶段，未必能够适用于这样不开化的国民。在亨利七世一朝，建立星室法庭、扩大其权力，可能是明智的。在查理一世一朝，废除星室法庭也是同样明智的。

② 3 H. 7. cap. 1.

③ 11 H. 7. cap. 12.

④ 3 H. 7. cap. 2.

⑤ 4 H. 7. cap. 13.

⑥ 11 H. 7. cap. 15.

⑦ Ibid. cap. 24. 19 H. 7. cap. 3.

案，也能轻易课以重罪。^① 颁布这条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默顿大主教的安全，因为大主教干犯众怒、仇家众多。

本朝几乎每一届国会都要通过法案，禁止侍养家臣、配备号衣和徽章。^② 这是大贵族的一贯做法。家臣随时待命，协助他们作战、叛乱、暴动、施暴，甚至为他们出庭作证。^③ 这种混乱局面在许多朝代盛行，当时的法律无法保护王国臣民。而后，这种惯例在英格兰根深蒂固。亨利必须竭尽其警觉和苛察，才能予以根除。有一个故事说到他严察了这种弊政。虽然一般引用这个故事，目的在于说明亨利的贪婪和掠夺，但他坚决革除弊政，似乎值得称道。牛津伯爵是国王宠信的将领，屡任要职，不负重托，在赫林汉姆城堡享受荣华富贵。他急欲向王室贵宾夸示排场，命令全体家臣配备号衣和徽章、排成两列，以便营造更为华丽壮观的声势。“爵爷，”国王说，“朕夙闻卿有好客之名，然传闻尚不及真相之万一。这些衣冠楚楚的绅士和侍从列队于朕之左右，想必即为卿府侍役。”伯爵微笑着，坦承了他的财产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排场。他补充说：“他们大多数是我的家臣，得知陛下光临寒舍特来助微臣略尽洒扫之劳。”国王旋即色难，说道：“说真的，爵爷，朕承卿美意，不胜欣慰。然朕岂能坐视王法不行。卿须自赴检察长那儿去陈词。”据说，牛津伯爵至少为这次冒犯付出了五千镑贡献。

技艺进步比严刑峻法更有效地结束了这种危险的惯例。贵族彼此竞争，不再依靠家臣的人数和勇猛，渐渐走上更文明的途径，在车马、宅第和餐桌的显赫和精美上互争雄长。平民不再游手好闲，依靠贵族的供养为生。他们不得不学习一些有用的职业或手艺，对自己、对旁人都有益。必须说明：无论人们如何慷慨陈词，均反对精湛的技艺，自鸣得意地称之为奢侈品；勤勉的商人

① 3 H. 7. cap. 13.

② 3 H. 7. cap. 1. & 12. 11 H. 7. cap. 3. 19 H. 7. cap. 14.

③ 3 H. 7. cap. 12. 11 H. 7. cap. 25.

跟以前仰食巨室的懒惰家臣相比，既是更好的人，又是更好的公民。现代贵族的生活跟古代男爵相比，也是这样。^①

① 诺森伯兰公爵最近出版了一本家庭纪事，记录一位古代老伯爵的家政。作者观察细致，保存了许多有趣的细节，标志着那个不开化，甚至可以说野蛮时代的生活方式和商品价格。我摘取的若干片段显示了古代习俗的真实画面，是英国古文物为我们提供的最独特纪念。我们由此确定：虽然记载粗略，但没有任何贵族家庭比他们更高贵、更显赫。他们的家族中，主仆共计一百六十六人。每天估计有五十七位食客。总计二百二十三人。每天的肉、酒、柴火开销估计两个半便士，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四便士银币。假定那时的食品价格比现在便宜三四倍，就相当于十四便士。就贵族的家政而言，不是一个大数目。尤其是考虑到当时主要家庭开支是肉和酒。伯爵全年开支为一千一百一十八镑十七先令八便士；肉、酒、柴火开销为七百九十六镑十一先令两便士，超过总开销三分之二。在现代家庭里，这些开销不会超过三分之一。p. 157, 158, 159.

伯爵家庭总开销安排得非常精确严格。如果我们不为古代风俗留余地，它就会接近极端。就此而言，每一份饭菜必须取自牛肉、羊肉、猪肉、小牛肉、新鲜鳕鱼和鲑鱼，事先固定。不同的书记员专门为此记录和计算。如果有一个人仆人当天不在，他的伙食就被取消。如果他外出给主人办事，就会领到膳宿费：冬季每天八便士，夏季每天五便士。他在任何地方逗留时，每天可以开销两便士，养马费不计。一整年每个月大约开销小麦一科特（quarter）多，一科特小麦估计价值五先令八便士；开销麦酒二百五十科特，一科特麦酒价值四先令，包含两大桶；大约每人每天一又三分之一瓶啤酒，酒性不烈。p. 4.

从阿尔哈罗-泰德购进一百零九头肥牛，一头价值十三先令四便士。从圣海伦购进二十四头瘦牛，一头价值八先令。这些牛都送往牧场饲养，从夏至到米迦勒节（9月29日）食用。由此可见，一家人只有这段时间才有新鲜牛肉吃。一年其余时间，他们都以腌牛肉为生。p. 5.

一年消费一百六十加仑芥末，腌制牛肉似乎确实需要这些佐料。p. 18.

六百四十七头羊，一头价值二十便士。只有收获节（8月1日）到米迦勒节有新鲜羊肉吃，其余时间都吃腌羊肉。p. 5.

二十五头猪，一头价值两先令。二十八头小牛，一头价值二十便士。四十头羊，一头价值十便士或一先令。p. 7.

这些食物似乎是为领主或高等仆役准备的，称为骑士的餐桌。其他仆役几乎一年到头吃腌肉，不吃或很少吃蔬菜。这样的饮食极其恶劣，有害健康。因此，把“古老英格兰的烤牛肉”想象得多么美好，实在是大错特错。我们一定不宜高估当时的清洁程度。这样一个大家庭每年只用七十厄尔亚麻布，一厄尔价值八便士。不用被单。这些亚麻布制成桌布，八块铺在领主的桌上，一块给骑士们。p. 16.

我估计，最多一个月只洗一次。一整年洗衣费只有四十先令。似乎大部分亚麻布是给小教堂准备的。不过，酒还可以忍受。也就是说，十桶加两大桶加斯科涅葡萄酒，一桶价值四镑十三先令四便士。p. 6.

全年只用了九十一打蜡烛。p. 14.

一家人早六点起床，十点进餐，下午四点吃晚饭。大门九点关闭，禁止出入。p. 314, 318.

领主和夫人早上七点吃早饭，喝一夸脱啤酒和同样多的葡萄酒，吃两条腌鱼、六条红鲱鱼、四条白鲱鱼或一盘小鲱鱼。换口味的时候，就吃半块煮羊肉或一块煮牛肉。p. 73, 75.

下人在六点起床，秩序井然。家庭纪事说：领主的仆人都早起。p. 170.

除了厨房和餐厅以外，只有二十四个火炉，大多数一天只准烧一佩克（peck）炭。p. 99.

天使报喜节（3月25日）以后，只有领主、夫人、佩尔西勋爵的房间和育儿室生半火，其他房间里不准生火。p. 101.

值得注意，领主在约克郡安家，天使报喜节后的天气肯定很冷，一柴尔德（chalder）炭价值两便士。八十柴尔德炭开销四先令，足以供一年用。家庭纪事说：因为没有森林就无法烧炭，所以需要六十四堆原木，一堆价值十二便士。p. 22.

这证明当时还没有使用壁炉。这里有一段纪事，计划从此以后不买阉鸡，除非为领主的餐桌准备。纪事说：应该以两便士一只的价格购买瘦阉鸡，放在家禽当中喂养；如果有食客在座，总管和管事应该跟他们一起吃阉鸡。p. 102. (接下页)

不过,根据结果判断,亨利一朝最重要的法律是:准许贵族和绅士破坏古代的限定继承法,转让自己的领地。^①在英格兰,由于这项法律,以及奢靡和风雅时代的开始,贵族的巨大财产慢慢消散,平民的财富日益增加。亨利很可能预知结果,而且乐观其成,因为他一贯的政策是压制大贵族,提拔更加依附于他的教士、律师与新贵。

国王的贪婪也促使他鼓励贸易,以便增加关税收益。不过,如果我们可以根据亨利一朝颁布的大部分法律来判断,它们的照顾和关怀与其说促进了工

(续上页)三便士或四便士可以买到一头猪。鹅价与猪价相同。半便士可以买到一只小鸡。两便士可以买到一只母鸡,只为前述的餐桌。这里还有另一段纪事,认为除圣诞节和重大节庆、为领主及其餐桌以外,任何季节都不要购买千鸟。一只千鸟价值一便士或最多一个半便士。p. 103.

山鹅价格相同。鹧鸪价值两便士。p. 104, 105.

山鸡价值一先令。孔雀价格相同。p. 106.

领主的马厩只有二十七匹马。他的高等仆役可以自己养马。p. 126.

这些马有:六匹良马,全年吃干草和肉干;四匹驯马;三匹小马和老马;三匹驮马。这些仆人的六匹马中,给领主装备一匹;另两匹做驮马;三匹做磨坊马。磨坊马中,两匹运输谷物,一匹磨面。那时,水磨或风磨还不存在,至少是非常罕见。此外还有七匹辕马拉二轮马车或四轮马车。重要的马匹每天可以吃一佩克燕麦和大量扁豆。一科特燕麦价值二十便士,一科特扁豆价值两先令。一堆干草价值两先令八便士。领主出行时,带着三十六位马夫、床铺和其他膳宿用品。p. 157.

似乎旅店提供不了可以忍受的膳宿条件。领主每年巡行约克郡三处田庄:维塞尔、莱肯菲尔德和托佩莱夫,但他只有一套家具。他巡行时携带所有家具:床、桌子、椅子、厨房用具和其他一切用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家具非常粗笨,才能经得起马车载运而不致损坏。不过,他总共有十七辆二轮马车和一辆四轮马车。p. 391.

一辆二轮马车就足够装载他所有厨房用具、床铺和其他种种用具。p. 388.

值得注意:他的宅第有十一位神甫,还有十七位小教堂人员、唱诗班、音乐家。但他只有两位厨师为一家二百二十三人做饭。p. 325.

*

他们的膳食肯定跟船上的膳食同样马虎。观察这位蛮族首领浮夸乃至帝王式的做派,颇有趣味。他没有任何章法,哪怕仅仅为了正确地制作芥末。但这仅仅是开头,似乎对我们和我们的枢密院已经足够好了。我们如果考虑到:当时威尼斯和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绅士的生活条件多么华丽而优雅,意大利人在文学和美术方面的进步,我们就不会惊讶他们视山外各邦为蛮族。弗拉芒人也远远超过英国人,甚至法国人。不过,伯爵往往不乏慷慨。他每年为沃尔辛海姆夫人在天之灵付出四便士银币,给赫尔斯圣血付出同样的数目。p. 337.

没有提到餐具制作,只提到租用锡器。仆人似乎都用自己的工资购买衣服。另一处提到四位厨师的组成。p. 388.

但我想,已经提到两名仆人。p. 325.

一个是食品橱男仆,一个是洗碗处侍童。p. 388.

厨师的数目把他们算进去了。

^① 4 H. 7. cap. 24. 根据爱德华四世一朝以来的成例,破坏了限定继承应受罚款、领地限制的规定。但严格地说,亨利七世的法案颁布前,这不是法律。他通过纠正有关的滥用成例行径,间接地予以认可。

商业，毋宁说损害了工商业。严厉的法律禁止借贷取息，当时称之为高利贷。^①当时的迷信狂热地要求取缔高利贷，甚至交易兑换的利益也因为有利于高利贷而遭到禁止。^②所有曲线借贷取息的契约也被仔细地一一取缔。^③不言而喻，这些法律既不合理也不公正，难以执行，执行起来就会损害贸易。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国王往往因促进贸易而为人称道。他贷款给商人，不收利息。他知道，商人不足以支持他们拟议的事业。^④

具体来说，国王立法禁止金银原料、货币、餐具出口。^⑤这种预防措施的唯一目的就是鼓励出口。但就当时而言，这种条例谋求的效果是：向王国输入货物的外商有义务用他们赚到的所有金钱购买英国货物，以防他们暗中转移资产。^⑥

法律禁止马匹出口，但好像没有考虑到：马匹出口会鼓励国内的马匹繁育，因此供给更加充足。^⑦为了提高箭术，弓价不应当超过六先令四便士，^⑧价格降低到我们目前的水准。这种条例唯一的后果是：人们只能得到坏弓，或是根本得不到弓。羊毛衣服^⑨、无檐帽和有檐帽^⑩的价格也予以固定。法律规定了劳工的薪酬。^⑪这些事情显然应该听其自然，由商业和贸易的正常进程来调节。但有些规制令人惊讶：一码红布限价为今天的二十六先令，一码花布十八先令。这些价格比今天贵。商人、石匠、泥水匠、看守人的报酬规定为每天近十便士，并不比今天英格兰某些地方的工资低多少。西印度群岛发现后，劳

① 3 H. 7. cap. 5.

② Ibid. cap. 6.

③ 7 H. 7. cap. 8.

④ Polyd. Virg.

⑤ 4 H. 7. cap. 23.

⑥ 3 H. 7. cap. 8.

⑦ 11 H. 7. cap. 13.

⑧ 3 H. 7. cap. 12.

⑨ 4 H. 7. cap. 8.

⑩ Ibid. cap. 9.

⑪ 11 H. 7. cap. 22.

动力和商品价格肯定升高了，但不见得像通常的想象那样，每一个细节都是这样。目前工业兴盛，商人和工人数量大增，因此可以抵消金银增加，保持了差不多的平均工资水平。技术进步、机器精良，甚至使某些商品价格比原先的跌落。不用说，商贾满足于比原先更低的收益、向消费者提供更便宜的货物。本朝法案称：^①商人以十六便士买进货物，往往以三先令售出。肉、禽、鱼（特别是后者）这些商品不可能因工业和技术进步而大量增加供应，因此以涨价为主。那时，教会充满底层人士，大多数职位由他们占有、受他们青睐。法案中还有一条款规定：所有大学文员和学生未经校长允许，不得行乞。^②

此时工业简陋，主因在于管制。国会、或者不如说国王（因为他是一切事务的原动力）稍微减轻了若干限制，但远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亨利四世一朝已经通过法案：^③只有土地岁入二十先令以上的人才能送儿女去做学徒。亨利七世因诺维奇人抱怨工业衰败、必需品不足，便特许该市不受这项法律约束。^④此后，诺福克全郡获得某种羊毛工业的类似豁免权。^⑤

这些荒谬的限制意在劝农，其实最有效的劝农之道莫过于工业增长。颁布反对圈地的法案、保障农家田宅，也是出于类似原因。^⑥对此，培根勋爵大加赞赏，其实难副。如果农夫精通耕种、产品流通无阻，我们就无须担心农业人口减少。供养大量人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土地的主人有利可图。除此之外的一切方法都是既粗暴又无效。此后一个半世纪，阻止人口减少的法令、敕书不断颁布。我们由此推断，它们从未执行。最后，进步的自然进程提供了补救之道。

建立垄断公司，是英格兰工业的一大障碍，那时尚未完全纠正。颁布的法

① 4 H. 7. cap. 9.

② 11 H. 7. cap. 22.

③ 7 H. 7. cap. 17.

④ 11 H. 7. cap. 11.

⑤ 12 H. 7. cap. 1.

⑥ 4 H. 7. cap. 19.

律规定：未经三位重臣核准，不得通过垄断公司章程。^① 各地不得自行征收通行费。^② 格洛斯特和温切斯特市镇甚至征收塞文河通行费，后来予以废止。^③

本朝一项法案^④的序文说明：伦敦冒险商自行组织垄断公司，王国中的其他商人必须每人向他们缴纳近七十镑费用才能染指低地国家的贸易。奇怪的是：这个章程（如果它能算是章程的话）居然付诸实施。国会的权威本来应该对此予以废除才是。

本朝 1492 年 8 月 2 日黄昏前不久，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西班牙起航，开始了发现美洲大陆的著名航程。几年后，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越过好望角，开辟了东印度新航路。这些大事给欧洲各邦带来了重要后果，即使没有即刻参与海上冒险的邦国也不例外。贸易和海运增长，到处都促进了工业和技术的进步。贵族散尽家资，用于奢侈享受。低等级得以分享土地产权，还自己创造了新型财货：股票、期货、工艺、信贷、规费之类。在某些邦国，平民的特权和财产都有所增长。在大多数邦国，贵族不再忍受过去粗野的生活方式。国王掌握了贵族放弃的武备，压制了本国的自由。不过，各地人民摆脱了以前小暴君的压迫，处境大为改善。他们虽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至少已经获得相当重大的利益。于是，普遍的趋势倾向于压制贵族、提升人民。亨利七世也就是奉行这一套政策，才获得了名过其实的赞誉。实事求是地说，他的典章制度并没有任何深刻的智慧，配不上如此称道。

航海大发现是当代的最大特点。亨利没有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仅仅出于偶然。哥伦布多次遭到西班牙、葡萄牙宫廷拒绝后，即派兄弟巴托罗缪赶赴伦敦陈情，要求亨利保障他的事业实现。国王邀请哥伦布去英格兰，但巴托罗缪路遇海盗，遭到扣押。在此期间，哥伦布已经获得伊莎贝拉女王的支持，配

① 19 H. 7. cap. 7.

② Ibid. cap. 8.

③ Ib. cap. 18.

④ 12 H. 7. cap. 6.

备了一支小舰队，欣然起程。亨利并没有因此挫折而失望。他将威尼斯人塞巴斯蒂安·卡博特安置在布里斯托尔，1498年派卡博特西行寻找新邦。卡博特在北纬六十度上发现了美洲大陆。他沿着海岸线向南，发现了纽芬兰和其他土地。但他返回了英格兰，既没有征服外邦，也没有建立殖民地。1502年，艾略特和其他布里斯托尔商人做了类似的尝试。^① 国王耗资一万四千镑，建造了“亨利大帝”号。^② 严格说来，它是英国海军的第一艘战舰。在此之前，国王如果需要海军，只有雇用或征发商船。

虽然航海术进步、东西印度被发现，在这个时代或任何时代都堪称最重要的事件，但这个时代还有其他重大事件。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希腊人避难于意大利，他们有些人仍然保存着蛮族践踏之余的古代学术。意大利输入古典著作，以及古典诗歌、雄辩术的高雅品位、学术色彩和美妙绝伦的古典语言。与此同时，纯正的拉丁语开始复兴，研究古代遗物蔚为风尚，慕文之风流行全欧各邦。那时发明的印刷术极大地促进了这些进步。火药的发明彻底改变了战争艺术。不久，强大的宗教改革不仅影响了接受改革的各邦，甚至影响了坚持古代信仰崇拜的各邦。于是，世界这一部分的人类事务发生了全面变革。人们过去坚持的贸易、技艺、学术、政体、治安和教养渐渐面目一新。因此，有益的贸易肯定要在更愉快的现代史册中占据一席之地，重要事件甚至大部分日常记载中都有其作用。印刷术保存了大量记录，因此作者在叙述时有了选择和修饰的权力。每一件事都关系到我们现在的习俗和处境，每一段叙述都有教益。任何人急于打开以后的篇章，不一定以理解公共事务的知识、文治政府的技艺为目的，只要有真心实意、值得赞美的开阔心胸和好奇心就够了。

^① Rymer, vol. xiii, p. 37.

^② Stowe, p. 484.

第二十七章

亨利八世(一)

新君颇孚众望——国之重臣——燕普逊、达德利之狱——大婚——外务——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康布雷同盟——对法战争——远征封塔拉比亚——斐迪南施行权谋——返回英国——教皇利奥十世——召开国会——对苏格兰开战——大臣沃尔西——沃尔西的性格——入侵法兰西——基内格特之役——弗洛登之役——对法和议

亨利七世驾崩，民心大悦、形于颜色，达到礼仪所允许的最高限度。太子亨利八世继位加冕，四海臣工无不公开表示真诚的喜悦。先王猜忍贪酷，老而弥甚，嗜恶日深，不直于众口。新君即位时年仅十八岁，虽有识之士亦不免寄厚望于来日。国民凡遇少年新主、宗室嫡裔，照例狂欢沉醉，更不待言。新君俊美秀拔、精力过人，各种男子汉的运动，无不敏捷娴熟。何况他年方少壮、肌肤润泽，一切精神、举止无不生气勃勃。^① 先王不愿意让他了解公共事务的知识，迄今只让他沉溺文献、精通笔墨。新

① T. Mori. *Lucubr.* p. 182.

君无论才德，都看不出以后的恶兆。^①甚至他暴怒、焦灼、急躁的天性也被解释成少年失教的偶然后果，等年纪大了自然会变得温和、成熟。后来，就是这种性格诱导他施行暴政。由于约克、兰开斯特两家宗室的血脉最终集于新君一身，人们有充分理由期待：他能超越可憎的竞争，不偏不倚地施政。很久以来，英格兰不曾有过不偏不倚的统治。

亨利最初的举措没有辜负公众寄托的厚望。他的祖母、里士满和德比伯爵夫人还在世，以审慎和美德著称。国王简选新任枢密大臣，明智地征求她的意见。入阁重臣有：坎特伯雷大主教沃汉姆任大法官；索尔兹伯里伯爵任总管；赫伯特勋爵任内大臣；托马斯·洛弗尔爵士任伦敦塔卫戍长执金吾，兼署镇守使；爱德华·波因斯爵士任审计长；后来又御封了亨利·马尼爵士、托马斯·达西爵士、法学博士托马斯·诺瑟尔爵士、亨利·怀亚特爵士。^②他们都是先朝老臣，娴熟政务。先王任用的大臣通常不得人心，但他们是声誉最好的一批。

但新君更乐意将恩宠和权威赋予另一批大臣：萨里伯爵任大司库；温切斯特主教任国务秘书和掌玺大臣。这位教会长老在前朝深受王室信任，养成了谨慎节俭的习惯，很难一下子抛开。亨利年轻、冲动，喜好奢靡，主教仍然进谏反对。但萨里伯爵更精通廷臣的机敏。萨里赞助先王的节俭政策厥功至伟，但他懂得随机应变，适应新主人的脾气。在年轻君主的治下，慷慨、欢愉、豪华之风开始盛行，伯爵推波助澜之功无人能及。^③他以此道迎合亨利；主君奢侈浪费，他和别的廷臣都会有利可图。萨里伯爵引导君主沉溺于游宴和怠惰，使他荒疏政务、乐于完全将政府委托给大臣。先王积累了巨额财富，在亨利的挥霍下渐渐散尽。欢宴盛会一场接一场。刺击、比武和酒筵极尽当时的富丽堂

① Father Paul, lib. 1.

② Herbert, Stowe, p. 486. Hollingshed, p. 799.

③ Lord Herbert,

皇。此时海内承平，因此宫廷得以沉溺于种种逸乐，很少留心严肃的政务。国王即使在游乐之余，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他喜爱的音乐与文学上。他的天赋特别适合这些爱好。亨利精通音乐，甚至自己创作了一些教堂音乐在自己的小教堂演奏。^① 他带头研究古代的精深学术。不幸的是，那时盛行乏味的经院论争。亨利虽然对托马斯·阿奎那情有独钟，还有余力探讨更有益、更有趣的知识。国王的性情天真坦诚、无忧无虑，促使他挥霍父王积攒的财富，疏于保护君主榨取钱财的帮凶。他颁布上谕，鼓励国民申冤陈情。告密者长期横行邦国、不受任何约束，国民积怨一发而不可收。^② 他们落入监狱、枷刑示众，大部分死于民众的暴行。燕普逊和达德利最受公众痛恨，即刻受到枢密院传唤，为他们的施政举措辩护。他们之所以受到千夫所指，就是因为这些举措。燕普逊为自己和同伙作了精明的辩护。他对枢密院说：他的敌人气势汹汹地控告他过去的举措，其实那些举措非但不应受到责难，反而应该受到奖励和赞许。他和达德利被控的罪行就是严格执法。法律是根据普遍同意确定的；宪法将执法权授予国王，他们不过是服从国王而已。他们只是最高主权者的工具，没有资格判断法律是刚刚生效还是久已废弃、有利还是有害。只要立法机构没有撤销这些法律，它们就同样有效。当局严格执法、刁民怨声载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所有明智的邦国都以赏罚分明为其荣耀之本。守法执法有赏，违法作乱受罚。如果罪犯裁判法官、臣民裁判君上，那么一切政府都将迅速土崩瓦解。^③

燕普逊和达德利虽然有这样得力的辩护，但还是被投入伦敦塔，不久就受到审判。法庭不可能因严格执法而给他们定罪，即使他们执行的法律已经废弃。由于他们武断施政是依据父王的密令，国王很可能不愿意让他们受到太

① Ibid.

② Herbert, Stowe, p. 486. Hollingshed, p. 799. Polyd. Virg. lib. 27.

③ Herbert, Hollingshed, p. 804.

严厉的制裁。因此,为了缓和国民对这些臭名昭著大臣的怨愤,只得使他们受到指控;但罪名要么完全不可能成立,要么成立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被控阴谋反对君主,图谋乘先王驾崩的机会攫取政府大权。到那时为止,陪审团既受大众偏见驱动,又受宫廷左右,判决他们有罪。国会随后通过了剥夺公权法案。^①国王在民众的热切要求下,批准行刑。由此可见,在这些武断统治的时代,国王无论是贪图权力与财富,还是想要收买民心,同样都会践踏正义。

亨利继位后,惩治了前朝暴政的帮凶;但还是立刻根据先王的安排,迎娶西班牙公主凯瑟琳。先王在世时,他们就已经订婚。凯瑟琳本来是亨利兄长的妻子,婚姻的主要障碍是两人年龄相去悬殊。但另一方面,公主的品德、谦逊、温柔众所周知,有利于保持婚约。何况,国王对她产生了感情;她视为太子妃,拥有大笔嫁妆;英格兰和西班牙的联盟需要加强;英格兰需要盟国,以平衡法兰西的势力;先王议婚自有种种考虑。枢密院权衡轻重,不顾教会长老的反对,建议亨利举行婚礼。里士满伯爵夫人赞同枢密院的意见,在孙子大婚后不久去世。

亨利的政府深得人心,他的王位继承权无可置疑,权威强大,府库充盈,臣民太平。因此,本朝内政易举,前景光明。国外局势同样值得欣慰。意大利在前朝是欧洲所有君侯战争、和谈的中心,现在一直太平无事。所有各方都争取亨利的支持。同时,他加入任何一方,都没有直接的利益和必要。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征服米兰后,是唯一据有意大利领地的强大君主。他本来可以太平无事地保存战利品,因利乘便;向所有意大利君侯和共和国发号施令、维持各邦势力均衡。但他跟前任一样有资格觊觎那不勒斯王位,有意得寸进尺,征服这个王国。西班牙国王斐迪南跟那不勒斯国王弗雷德里克有条约和姻亲之

^① 本届国会于 1510 年 1 月 21 日召集,通过一项法案,意在防范前朝盛行的滥权行径。刑法抄没期限减少到三年。豁免告密者强加于被告的费用和损害。颁布法律,更加严厉地惩罚伪证罪。燕普逊和达德利操纵的虚假审判予以撤销。1515 年 1 月 1 日,法案获准入册;清偿时间延长。1 H. 8. c. 8, 10, 11, 12.

谊。路易预期斐迪南会反对，许以他百听不厌的利益，引诱他缔结相反的联盟。法兰西国王提议瓜分那不勒斯王国，驱逐弗雷德里克。当时的政治家认为：在这个计划中，法兰西的鲁莽轻率和西班牙的轻诺寡信都已经登峰造极。弗雷德里克只有自己的臣民可以依靠。那不勒斯人要么对他的政府心怀不满，要么对他的前途漠不关心。因此，他无法抵抗如此强大的敌人，丧失了那不勒斯王国的土地。但他满意地看到：他的敌人立刻因为争夺那不勒斯而失和。斐迪南密令西班牙人誉为“大将”的冈萨尔沃攻击法军，独占了那不勒斯全部领土。冈萨尔沃所向无敌，在两场激战中打败法军，确保他的君主据有整个王国。路易不能以武力弥补损失，只得徒劳无益地跟斐迪南谈判，要求西班牙归还他的份额。在此期间，所有意大利人在两雄之间犹疑不决。

欧洲势力均衡如此巩固，为其他时期所鲜见，似乎无须诸王刻意维持，自身就能保持平衡。几个强大的君主国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其他邦国已经没有争强斗胜的基础，甚至不再有嫉妒的借口。英格兰国内统一安定，无虞外国入侵。在斐迪南积极而高超的技巧、权术、谋略统治下，联合的各邦形成了强大的西班牙君主国。路易十二勇敢慷慨，迎娶先王的寡后安妮·德·布列塔尼，维持法兰西王国与布列塔尼公国的联合。法兰西的安全有赖于此。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不仅据有奥地利家族的祖传领地，而且君临神圣罗马帝国。他虽然性格轻浮多变，至少在帝国防御计划上仍然能够让德国各诸侯团结一致。卡斯提尔国王查理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孙子、斐迪南的外孙，已经继承了勃艮第家族的富庶领地。他年纪还小，由姑母玛格丽特摄政。玛格丽特以出众的审慎和美德著称。几大强国内力充实，势均力敌。如果不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野心勃勃，率先挑起各国的战火和纷争，欧洲本来可望长期维持和平。在他的操纵下，一个联盟在康布雷形成，^①由教皇本人、马克西米利安、路易和斐迪南

① In 1508.

组成。大联盟的目的是联合各国军队，推翻威尼斯共和国的势力。亨利无论从利害上还是从感情上考虑，都没有理由加入联盟。这个强大而不义的联盟大获成功，压倒了威尼斯共和国。

这时，几大君主国实力雄厚、形势稳固，阻止了它们谋求兼并的野心。不过，这种形势不能保障普遍和平、平息人性固有的纷争；只会诱使当时的君主更容易随心所欲、反复无常地毁弃承诺、更换盟友，而不去追求自然和耐久的利益。尤利乌斯刚刚打击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气焰，立刻就燃起更高贵的雄心：将所有外邦人逐出意大利；或者，按照意大利当时的修辞：把这个国家从野蛮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① 他决心首先向路易发难。为了替这个伟大事业铺平道路，教皇立刻跟法国国王争执，谋求其他君主的友谊。尤利乌斯向路易的盟友费拉拉公爵宣战。他请求英格兰支持，送来一朵神圣的蔷薇，上面洒有麝香和圣油。^② 他极力笼络亨利驻罗马大使、约克大主教班布里奇，不久就封他为红衣主教。他拉拢斐迪南加入他一方，不过后者一开始不肯明确表态。他主要的希望寄托于跟瑞士诸州签订条约。路易的怠慢和轻蔑的措辞激怒了瑞士人，他们解除了跟法兰西的盟约，伺机报复该国。

法兰西国王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觉得有必要对教皇本人下手，剥夺他主要的力量之源——神圣的人格。他跟几位憎恶尤利乌斯暴行的红衣主教约定，跟教皇决裂。马克西米利安仍然是路易的盟友。他决定：借重这些红衣主教的权威，辅以马克西米利安的协助，召集一次宗教会议，借以改革教会，遏制教皇的过当权威。宗教会议在比萨召集，但开局不利，预示支持者的成功希望渺茫。只有几位法国主教服从国王，半心半意地参加会议。其他主教都不肯参加，认为会议是派系、阴谋、世俗政治的产物。他们甚至认为：会议地点比萨的居民对他们有侮辱的表示。东道主答应，会议转移到法兰西君主国统治的米兰举行。他

① Guicciard. lib. 8.

② Spelman, Concil. vol. ii. p. 725.

们虽然获得了这种优惠,米兰居民还是没有更加尊重他们。他们只得再次变更会议地点,转移到里昂。^① 路易自己的举措加强了有利于教皇权威的极端偏见。即使他掌握了贬低教皇的最诱人机会,仍然会发现尊重、顺从、效忠教皇的种种迹象。众所周知,王后对路易影响很大,对国王和圣父的纠纷非常不安。所有人都预见到:尤利乌斯最终会赢得这场并不势均力敌的斗争。

教皇雄心勃勃,知道自己的优势,以极其鲁莽傲慢的方式加以利用。他不顾神职人员的身份,围攻米兰多拉,亲临堑壕,看到自己的几位侍从战死,像年轻战士一样、冒着严冬酷寒、兴奋地追逐着军事荣耀。^② 就是这样,他还是指控最温和的对手不敬神明、亵渎神圣。他在拉特兰召开宗教会议,对比萨和举行分裂派会议的所有地方发布禁令。他将参加分裂派会议的所有红衣主教和教会长老逐出教门。他甚至向支持分裂派会议的君侯发出精神雷霆,解除他们的臣民所有效忠誓言,将他们的领土交给任何有能力占据的人。

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号称“天主教君主”,以捍卫教皇和宗教为词,掩饰他的野心和自私的政策。亨利由于天性诚实而乐观,更加以年轻而缺乏经验,衷心期望教皇免受压迫。他相信,路易野心勃勃的政策已经对教皇构成威胁。迄今为止,法兰西国王一直号称“笃信基督的国王”,认为这个称号是王冠最宝贵的饰品。尤利乌斯让亨利抱有希望:这个称号可能转移给英格兰,酬劳他的贡献。^③ 他急欲在欧洲赢得与其实力和财富相当的荣誉,不能在欧洲混战中长期保持中立。亨利受到英国人对法国人的天然仇恨和古老的王位要求驱使,与教皇、西班牙、威尼斯结盟反对法兰西君主。他派传令官去巴黎,告诫路易不要亵渎神明、向教宗开战。传令官无功而返。他随即派出第二个传令官,要求祖传领地(安茹、马恩、吉耶纳和诺曼底)遵守他的命令。法国人视这个要求

① Guicciardini, lib. 10.

② Guicciardini, lib. 9.

③ Guicciard. lib. 11. P. Daniel, vol. ii. p. 1893. Herbert. Hollingshed, p. 831.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为宣战。亨利召集国会，国会毫无困难地同意拨款、支持英国国民极其喜爱的目的。^① 教皇在伦敦的代理人博拉维索受到法国宫廷收买，早已向路易泄露了亨利策划反对他的一切举措。但这次背叛跟盟友的翻云覆雨相比，造成的损害实在微不足道。亨利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岳父斐迪南身上，而他却为了自私的目的而背信弃义。斐迪南长期玩弄权谋，甚至因欺诈和诡计而自豪，吹嘘自己可耻的成功。路易的性格跟他完全不同。有一天，斐迪南听说路易抱怨他一度使诈，叫道：“那个醉汉在撒谎！我至少骗过他二十次。”对西班牙国王而言，亲密关系的意义在于：他可以更好地利用亨利缺乏经验的弱点，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斐迪南建议亨利：不要取道加莱入侵法兰西。因为在那里，西班牙没有力量支援英国。他劝亨利发兵封塔拉比亚，从这里可以轻易地征服吉耶纳。人们想象，这个省份还有一些英国支持者。他许诺西班牙军队会支援英国的征服。他似乎很想促进女婿的利益，甚至派舰队前往英格兰、转运亨利为此征集的军队。这支部队为数一万人，大部分是步兵，由多塞特侯爵指挥。萨里伯爵之子霍华德勋爵、布洛克勋爵、费瑞尔勋爵和许多其他年轻的贵族绅士随军出征。他们全都热衷于赢得军事荣誉，博取君上的重视。没有任何人怀疑：斐迪南史无前例的慷慨可能别有用心。

纳瓦拉是一个位于法兰西和西班牙边界的小王国，国王约翰·达尔布雷特跟法兰西亲善、与路易结盟。这时，英军与西班牙军队会师、比萨会议所有的支持者都被逐出教门，斐迪南似乎把握了占据这些领土的有利时机。因此，多塞特刚刚在吉普斯夸登陆，西班牙君主就宣布他愿意率领本国军队与英军会师，合兵入侵法兰西、围攻巴荣纳、打通吉耶纳的门户。^② 但他提醒英军将领：如果把法兰西的亲密盟友纳瓦拉留在联军后面，形势会有多么危险。纳瓦拉人很容易引入敌军，切断联军与西班牙之间的一切联系。为了防范这种危

① Herbert. Hollingshed, p. 811.

② Herbert. Hollingshed, p. 813.

险,斐迪南要求约翰国王保证:纳瓦拉王国在目前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约翰国王表示同意签署任何中立约定,斐迪南又要求:为了严格执行协定,应该提供安全抵押品。约翰国王也同意了。斐迪南提出:纳瓦拉国王应该交出王国六处要地和长子作为抵押。然而独立的主权君主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款的。西班牙国王就是在期待对方拒绝,他立刻派将领阿维拉公爵入侵纳瓦拉,臣服了这个王国。阿维拉很快就攻陷了纳瓦拉所有次要市镇,准备围攻王国首都潘普洛纳。公爵要求多塞特侯爵和英军协同作战。

多塞特开始怀疑:所有这些举措几乎没有顾及英国国王的利益。他没有获得入侵纳瓦拉王国或向法兰西以外任何邦国开战的命令,拒绝参战。因此,他在封塔拉比亚营地按兵不动。然而斐迪南技高一筹,英军按兵不动和协同作战一样有利于他的目的。有英军在,就足以威慑法军,牵制他们无法援救纳瓦拉王国。因此,阿维拉公爵可以从容围城,攻陷潘普洛纳,迫使约翰国王出奔法兰西避难。西班牙将军再次建议多塞特共议反对路易的所谓“神圣联盟”事宜。但他仍然拒绝围攻巴荣纳,坚持入侵贝亚恩领地。贝亚恩是纳瓦拉国王的领地,位于比利牛斯山的法兰西一侧。多塞特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的意图,表示除非英国国王下达新命令,他不会同意这样的举措。斐迪南为了取得这样的命令,派马丁·德·安布罗斯出使伦敦,说服亨利相信:最好的战机由于英国将军的顽固拘泥而贻误。西班牙将领最了解当地情况和一切举措的理由,英国将军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配合西班牙将领才对。但相应的命令还没有到达西班牙,多塞特侯爵已经极其不耐烦了。他发现:继续滞留无助于实现主要目的;军队由于匮乏和疾疫,每天都在减员。他要求斐迪南提供船只,返回英格兰。条约规定:无论英国人什么时候提出要求,西班牙都有义务供应船只。最后,斐迪南几经拖延,满足了多塞特的需求。多塞特率军登船,准备出发。正在这时,信使传来亨利的命令:军队应该留在西班牙。但将士不满他们受到的待遇,鼓噪哗变,强迫指挥官出海返回英格兰。师出无功,亨利非常不

悦。多塞特费了很大力气解释斐迪南的诡计，才最后平息了国王的不满。

这年夏天的海战也没有给英国带来更加决定性的胜利。骑兵统领托马斯·莱维特奉命率领四十五艘战舰前往布列塔尼海岸。舰队上有查尔斯·布兰登、约翰·卡维和许多年轻的廷臣，这些人都渴望有机会表现勇武。英军舰队沿岸掳掠，普雷玛格特率领三十九艘法国战舰从布雷斯特出海拦截。普雷玛格特的座舰中弹，他发现战舰已经无法挽救，便冲向英国海军统帅的旗舰，打算跟他同归于尽。旁观者看到两艘战舰相撞，命运暂时悬而未决。所有人都心惊胆战地看到火焰吞噬了两艘战舰，听到不幸的将士发出愤怒和绝望的喊叫声。最后，法国战舰爆炸，同时摧毁了英国战舰。^① 剩下的法国战舰各自逃往不同的港口。

英格兰向法兰西开战，前者没有获得明显的利益，后者却受到巨大的损害。路易的军队不得不撤回来保护本土，以致丧失了法国一开始在意大利据有的极大优势。他的侄子、年轻的加斯顿·德·富瓦受命统率法军，几个月内屡建奇勋，有勇有谋，不亚于最老练的指挥官。里窝那大战，富瓦功成名就。^② 他经过最顽强的苦战，击破西班牙和教皇的军队。他就在大功告成之际去世，法兰西军队在意大利的幸运跟他同归于尽。瑞士步兵团能征善战，极受忌惮。为数众多的瑞士人入侵米兰，唤起反复无常的当地居民反叛法国统治。热那亚随即效法米兰公国。于是，路易在几星期内就完全丧失了他在意大利征服的土地，只有几座要塞例外。卢多维克公爵的儿子马克西米利安·斯福查在米兰复辟。

尤利乌斯因法军溃败而狂喜。尤其是依靠瑞士步兵团的支持，他希望能够一直主导和控制宗教会议。这次胜利后不久，教皇就去世了。约翰·德·美第奇当选为新任教皇，号称利奥十世。事实证明，他是教宗法座上最杰出的君主

^① Polydore Virgil, lib. 27. Stowe, p. 490. Lanquet's Epitome of chronicles, fol. 273.

^② Guicciard. lib. 10.

之一。他人道、仁慈、慷慨、和蔼，是所有艺术的恩主，一切美德的朋友。^① 利奥十世的雄才大略不亚于前任，但付诸实施的手段更加温和、灵活、巧妙。确实，他的人格只有一点美中不足：太喜欢玩弄权术和诡计。考虑到他既是神职人员，又是意大利人，这样的缺点很难避免。利奥通过谈判，说服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脱离法兰西的利益。亨利虽然在上次战役中大失所望，但仍然受到鼓励去推行反对路易的战争措施。

亨利已经召集了一届新国会，^② 为他的大业争取到充分的补助。补助包括一种人头税（poll-tax），金额因纳税人的地位和财富而异。公爵付十马克；伯爵付五磅；男爵付四磅；骑士付四马克；每一个拥有八百磅动产的人付四马克。国会还批准了十五分之二至十分之四税。^③ 他依靠这些补助，再加上先王遗留、尚未挥霍殆尽的府库，能够征集一支强大的军队，足以震慑敌人。据说，一艘船舶悬挂教皇旗帜驶入泰晤士河，英国人大受鼓励。船上载有赠给国王和显要廷臣的葡萄酒和火腿。当时罗马教廷如此深得人心，以至于这些微不足道的礼物到处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和庆祝。

亨利用兵大陆时，苏格兰边境可能多事。为了防患于未然，温莎教务长韦斯特博士奉命出使苏格兰。苏格兰国王詹姆斯是亨利的姐夫。韦斯特博士受命弥合两国所有分歧，探听苏格兰宫廷的意图。^④ 双方都有若干不满。苏格兰人巴顿受到葡萄牙人的伤害，得不到赔偿。他谋取针对该国的私掠许可证，但一出海就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大掠英国船舶。^⑤ 海军上将霍华德勋爵、爱德华·霍华德爵士和萨里伯爵诸子出海追捕，海盗在激战中丧命。他们将私掠船带进泰晤士河。亨利断然拒绝赔偿这一义举。某

① Father Paul, lib. 1.

② 4th November, 1512.

③ Stowe.

④ Polydore Virgil, lib. 27.

⑤ Stowe, p. 489. Hollingshed, p. 811.

些苏格兰边境居民正需要掳掠的借口，于是在边区长官休谟勋爵的统率下侵入英格兰、大肆蹂躏。双方虽然有诸如此类的不满，本来仍然不难达成谅解。但亨利拟议入侵法兰西，引起了苏格兰国民的猜忌。^① 法兰西与苏格兰的古老联盟仍然存在，被视为最强大的纽带。苏格兰人普遍相信：如果没有这个外邦盟友，他们面对邻邦英格兰的优势力量不可能长期保持独立。法兰西王后安妮进而诱使詹姆斯加入冲突。在一次比武赛会上，詹姆斯自荐为安妮的骑士。安妮根据当时盛行的浪漫殷勤观念，召詹姆斯在沙场上为她代战，从而证明自己是她忠诚勇武的卫士。苏格兰王后和最明智的大臣规劝他不要沉迷于军事荣誉，然而徒劳无益。他首先派出一支舰队支援法兰西，似乎这是苏格兰有史以来仅有的舰队。虽然他仍然宣称保持中立，但英格兰大使不能预见：战争最终将无法避免。他向英格兰国王发出警告，国王派萨里伯爵守边备战，防备敌人预料之中的进攻。

亨利全心全意地追求军事荣誉，几乎没有因北方的边患而沮丧。更有甚者，他得意扬扬，因为欧洲几乎所有重要君主都支持他入侵法兰西。教皇继续威胁将路易和所有分裂派宗教会议支持者逐出教门。瑞士步兵团公然表示他们激烈地敌视法兰西。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和亨利的大使签订了反对法兰西的盟约，预先规定三国入侵法兰西的时间和地点。虽然斐迪南抵赖西班牙大使的签字，甚至跟共同的敌人签订了为期一年的休战协定；但亨利还没有充分认清他自私、阴险的意图，仍然希望西班牙在休战期满后参战。他现在任命的大臣事事遵照他的意愿，在所有谋划中逢迎他乐观、冲动的性情。

林肯教务长、王室施赈官托马斯·沃尔西独受君恩，凌驾于其他大臣之上。他很快就平步青云，后来位极人臣、莫之与京。此人是伊普斯维奇屠夫之子，但受过博雅教育，天赋卓绝。他获准进入多塞特侯爵府，为侯爵的几位公

^① Buchanan, lib. 13. Drummond in the life of James IV.

子担任家庭教师，不久就赢得了恩主的友谊和支持。^① 他受到举荐，出任亨利七世的宫廷教士。亨利七世派他办理秘密谈判，跟马克西米利安的女儿，萨伏伊的玛格丽特联姻。他不辱使命，以勤勉和机敏博得了国王的赞誉。^② 国王派他出使那时驻节布鲁塞尔的马克西米利安宫廷，三天后惊讶地发现沃尔西出现在他面前。亨利以为他推迟其行，开始责备他怠慢王命。沃尔西回禀：他已经从布鲁塞尔返回，完成了陛下嘱托的一切使命。“可我经过重新考虑，”国王说，“觉得给你的命令有忽略的地方，因此派一位信使给你带去了完整的命令。”沃尔西回答说：“我返回时遇上了这位信使。但我已经注意到忽略的地方，便斗胆加以执行。我知道，陛下的意图必然是这样。”这次事件后不久，亨利就去世了，无法继续获益于沃尔西的才干。沃尔西的升迁因此而推迟。不过，此后他在宫廷中被视为前途无量的人。温切斯特主教福克斯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沃尔西可能对自己有用，便对他加以青睐。^③ 这位教会长老发现：萨里伯爵独占君恩，使主教黯然失色。福克斯决定将沃尔西引荐给年轻国王，希望他巧于逢迎、跟萨里伯爵争宠，在内阁中满足于主教的辅助地位。他依靠福克斯本人才得以升迁。为时未久，沃尔西就赢得君心、将萨里的恩宠和福克斯的信托一起排挤掉。他跻身亨利的狐朋狗友之列，带头寻欢作乐，促成一切适合年轻君主年龄和口味的娱乐和交际。他年近四十，身为教士，却毫无节制，不肯以无用的诫律规劝君主。亨利纵情酒色，殊少忌惮，无忧无虑，虚度光阴。沃尔西在娱乐的间隙引进正事，巧妙地诱导君上根据他希望的准则施政。他引导国王，将国务交给父王留下的老臣处置。他确实提拔了有才智、有经验的人，由此而获益；但人们并不感谢国王的提拔之恩，很少会觉得行使权威应该对他负责。朋党、阴谋、嫉妒长期在廷臣中盛行。他们得知施恩行赏者的年龄

① Stowe, p. 997.

② Cavendish, Fiddes's life of Wolsey. Stowe.

③ Antiq. Brit. Eccles. p. 309. Polydore Virgil, lib. 27.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和历练以后，就更多地阻碍而非促进他的事务。国王的打算是：既想充分利用青春年华和王室地位来消磨时光，又想以绝对权威来挥舞王杖。这样一来，他最好的施政制度就是：把大权委托给某位没有个人意见、只会遵奉王命的臣僚。如果这位大臣寻欢作乐、引经据典的口味都跟他相同，每隔一段时间就向他报告全部政务，渐渐引导君上掌握公共事务的知识。于是，国王无须借助乏味的清规戒律或程序规则，就能初步了解政治学。^①

亨利对沃尔西了如指掌，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能胜任庙算、施政。沃尔西不久就从玩伴升为阁臣，从阁臣升为大权独揽的首辅大臣。沃尔西平步青云、位极人臣，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性格和才华。他贪得无厌，还是满足不了更奢侈的开支；才华盖世，还是支持不了更宏大的事业；雄心勃勃，还是实现不了更伟大的荣耀。他时而曲意逢迎，施展魅力，巧言游说；时而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威风凛凛。他待同僚傲慢，待部属体贴；压迫国民，博施友人；慷慨大度，不求回报；不惧伤害，必报侮辱。他只要跟人交流，总会占上风；但只有嫉妒时才会卖弄优势，使人回想起他出身寒微或贫贱。

亨利将政务委托给沃尔西，自己主要致力于军事方面。他天性倾向于勇敢豪侠，而且年龄正当少壮，自然适于讲武。他发现路易在海陆两路做好了充分的应战准备，便同样一丝不苟地征集了强大的军队、装备了可观的舰队，准备入侵法兰西。舰队由爱德华·霍华德爵士指挥。他用了一段时间扫清海峡，然后陈兵布雷斯特。当时，法国海军停泊在这个港口。他向法军舰队挑战。法国海军上将期待普雷杰特·德·毕铎统率地中海舰队的弩炮战舰前来增援，便留在海港内。他们耐心观望着英国人焚毁、蹂躏附近乡村。最后，普雷杰特率领六艘弩炮战舰驶入布雷斯特几里外的康科港口，在两侧悬崖上筑堡自卫。霍华德决定向他发动进攻。由于英军只有两艘弩炮战舰，霍华德便

^① Cavendish, p. 12. Stowe, p. 499.

自己指挥一艘，将另一艘交给费瑞尔勋爵。托马斯·切尼爵士、威廉·西德尼爵士和其他重要军官率领划桨驳船和帆船队尾随其后。霍华德随即紧追普雷杰特的战舰，跳上法国战舰的甲板，西班牙骑士卡洛兹和十七名英国骑士追随霍华德。这时，英国战舰扣住敌舰的缆绳被人砍断，海军上将留在法国人当中孤军奋战。他仍然以惊人的勇气继续战斗，被敌人的长矛刺中，落入水中。^① 费瑞尔勋爵见海军上将的大船败退，便率领其他小船跟着撤退。统帅阵亡，全军丧胆，开始从布雷斯特撤退。^② 法国海军出港，进而冒险入侵苏塞克斯海岸。法军被击退，统帅普雷杰特也中箭。已故海军上将的弟弟霍华德勋爵继任英国海军统帅。这年夏天没有发生什么重要事件。

整个冬天，英国人全力筹备取道加莱入侵法兰西；但拟议的准备尚未一切就绪，夏天已经快要过去了。王国长期和平，英国人多多少少已经不适应军事远征了。近代军事艺术推陈出新，英国人更难掌握新式战争器械。瑞士人，而后西班牙人已经显示了固定步兵团阵列的优势。步兵团以长矛和宝剑作战，甚至能击退以前最强大的兵种——重甲骑兵——的进攻。火器现在已经普遍使用。不过，目前的火绳枪应用不便，弱点甚多，不足以彻底取代弓箭。英国人在弓箭方面胜过所有欧洲各邦，弓箭手构成亨利征集的法兰西远征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切准备就绪后，大军先锋八千人由什鲁斯伯里伯爵率领，渡海赶赴加莱，德比伯爵、菲茨沃尔特勋爵、黑斯廷斯勋爵、科巴姆勋爵、轻骑兵统领雷斯·阿普·托马斯爵士随行。另一支六千人的部队随后出动，由内大臣赫伯特勋爵指挥，诺森伯兰和肯特伯爵、奥德利和德拉瓦勋爵、卡维、卡尔森和其他绅士随行。

国王亲率主力和殿后部队，委任王后在他离境时监国。他为了保证王后

^① 霍华德的座右铭是：海军上将理应勇敢到疯狂的地步，海战不像陆战那样需要运筹、谋略和能力。这个座右铭表面上颇有道理，不过霍华德自己的命运证明：即使在海上，勇气也需要辅以周全的考虑。

^② Stowe, p. 491. Herbert, Hollingshed, p. 816.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监国期间不会有任何麻烦,下令将前朝囚禁在伦敦塔里的萨福克伯爵埃德蒙·德·拉·博尔斩首。据说,亨利之所以犯下这种暴行,原因在于父王临终时的警告:只要萨福克伯爵这样脾气暴躁的人仍然在世,他永远不会安全。萨福克伯爵的弟弟理查德·德·拉·博尔为法国效力,愚蠢地指望约克党人死灰复燃、煽动他们举事反对政府。这样一来,其效果大概是促使国王突然向这位不幸的贵族报复。

最后,亨利率领白金汉公爵和其他众卿抵达加莱,发动法兰西远征。他天真地指望从战争中获得光荣和成就。^① 他寄以希望的所有盟友中,只有瑞士人充分履行约定。他们收到亨利的巨额资助,在意大利的胜利、法兰西的积怨鼓舞下,准备以两万五千人的兵力入侵法兰西王国。没有旗鼓相当的力量能够抵御他们。马克西米利安接受了亨利的十二万克朗,承诺以八千兵力支援瑞士人,却没有履行诺言。他为了补偿亨利国王,亲率一些德国和弗拉芒军队来到低地国家与英军会师。马克西米利安的部队训练有素,可以为亨利新征的军队做表率。他发现英国君主的目的主要是荣誉而非实利,就投身于圣乔治的十字架麾下,以亨利部属和队官的身份每天领取一百克朗军饷。他身为日耳曼的皇帝,却甘做英格兰国王的部属,这样的场面极其罕见。不过,亨利对他礼敬备至,实际上让他支配英军的一切调度。

亨利和马克西米利安还没有抵达大营,什鲁斯伯里伯爵和赫伯特勋爵已经在围攻皮卡迪的边境市镇特鲁安。他们开始积极进攻。特里格尼和克雷科守城,卫戍部队不超过两千人。然而,守军顽强抵抗,围城超过一个月。守军苦于弹尽粮绝,甚于敌军围攻。法兰西国王路易已经率军向亚眠挺进,接到守军告急,下令驰援。方特雷尔率领八百骑兵,每人携带一包火药和两块腌肉出击。他统率偏师,出其不意,冲进英军营垒,所向披靡,直入城塞。所有骑兵放

^① Polydore Virgil, lib. 27. Belarius, lib. 14.

下他们带来的补给品，即刻飞驰返回，再一次幸运地闯过英军营垒，没有、或是几乎没有受到损失。^①

不过，英国人很快就报复了这一次侮辱。亨利获悉法军骑兵队正在逼近，准备抵御方特雷尔的另一次袭击。他便派遣一批部队穿过里斯，预备应战。虽然大部分法军骑兵都是绅士，但在意大利多次冒险犯难、英勇卓著；然而，这次一见敌军却陷于莫名其妙的恐慌之中，立刻在英军追逐下逃之夭夭了。法军统帅朗格维尔公爵、博西·德·安布罗瓦、克莱蒙特、安博科特、贝雅德骑士和许多重要军官被俘。^② 这次战役，或者不如说溃败，根据发生的地点，常常称为基内格特战役；但更经常称为“马刺之役”，因为法国人那天主要使用马刺逃命，而不是使用宝剑和其他武器战斗。

英军获此大捷后，国王统率全军五万人，原本可以直入巴黎门户，四处蹂躏。但他们没有扩大战果、乘胜进攻惊愕沮丧的法军，而是屯兵于特鲁安这样无足轻重的边境市镇。特鲁安守将不久就投降了。亨利发现所获甚微，而所付的代价不仅是鲜血，而且是当前无价的时间，于是立刻下令平毁要塞。法国人再度焦虑地关注英军动向。强大的瑞士军团同时进军勃艮第，围攻无法防守的第戎。斐迪南虽然跟路易签订了休战协定，但似乎很乐意利用所有送上门来的机会。法兰西君主国所有边境都受到强大的敌军入侵，处境从来不曾如此危险。甚至许多巴黎居民相信自己已经面临敌人的掠夺和蹂躏而开始逃难，但又不知道哪里更安全。

但路易由于敌人接二连三的错误而摆脱了困境。瑞士人跟勃艮第总督特雷莫尔议和，并没有询问这位绅士有没有议和的权力，就接受了他提出的条款。特雷莫尔明知国王会否认他签订的条约，因此无论瑞士人提什么条件都

① Hist. de Chev. Bayard, chap. 57. Memoires de Bellai.

② Memoires de Bellai, liv. 1. Polydore Virgil, liv. 27. Hollingshed, p. 822. Herbert.

乐于接受。他愉快地想：只要付一笔钱，开几张空头支票，就能打发掉这个可怕的敌人。^①

亨利的举措说明他不懂战争的艺术，正如瑞士人不懂谈判的艺术。陶奈是一座富饶的大城市，虽然地处佛兰德边境，却属于法兰西，为王国开辟了进入佛兰德心脏的通道。马克西米利安希望替孙子解除这个可怕的威胁，便建议亨利围攻此地。英国国王没有考虑占领此地丝毫无益于征服法兰西的事业，但却轻率地听从别有用心的顾问的建议。陶奈市镇依据古代的宪章，豁免了建筑要塞的负担。陶奈市民不顾君主的规劝，极力坚持这项危险的特权。他们约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抗击敌人。^② 然而事到临头，他们丧失了勇气。几天围攻后，陶奈市民向英军开城投降。陶奈主教不久前去世，教会选出的新主教还没有就任。亨利国王将这个教区授予宠臣沃尔西，让他立刻掌握了相当可观的岁入。^③ 国王获悉瑞士人撤退，加以季候已迟，觉得最好返回英格兰。他带走了大部分军队。他所向披靡，年轻的心灵因表面上的成功而欢欣鼓舞。不过，只要比较一下他进军的有利形势和他开疆拓土所付出的代价，一切有判断力的人都会肯定：事实上，这次大肆炫耀的战役对他既不体面，又有破坏性。^④

这年夏天，英军在北方的胜利显得更有决定性意义。苏格兰国王集结倾国之力，所有穿花呢服装的勇士为数不下五万，组成一支喧嚣的大军。他蹂躏临河的诺森伯兰郡各地，攻陷诺汉姆、埃特尔、维克、福德城堡和其他各处次要的地方。福德夫人在自己的城堡中被俘，解送给詹姆斯。詹姆斯国王大为倾倒，以至于只顾行乐，耽误了敌国空虚的关键战机，没有及时扩大战果。苏格兰军队散布在贫瘠的乡野，很快就耗尽了粮草，开始蒙受饥饿之苦。当时王权微弱、军纪松弛，许多人偷偷逃离军营回家。在此期间，萨里伯爵已经集结了

① *Memoires du mareschal de Fleuranges, Bellarius, lib. 14.*

② *Memoires de Fleuranges.*

③ *Strype's Memorials, vol. i. p. 5, 6.*

④ *Guicciardini.*

两万六千人，亨利国王从法国派来五千援军。英军向边境前进，逼近苏格兰军队。苏格兰人驻军彻维奥特山附近的高地，两军夹蒂尔河相对，因而没有接战。因此，萨里伯爵派一位传令官去苏格兰大营挑战，要求敌军下山，到面对南方的米尔菲尔德平原交战。他没有收到答复，就向伯维克佯动，仿佛准备进军苏格兰，蹂躏边境地区，切断敌军补给线路。苏格兰军队为了阻止敌军的行动，只得焚烧营帐，准备下山。浓烟吹向英军，萨里得以掩饰部队调动，让炮兵和前锋经特维塞尔桥渡过蒂尔河，其余部队从上游浅滩处渡河。

会战现在已经不可避免，双方都镇静有序地备战。^① 英军分为两路：霍华德勋爵率领第一路主力军，埃德蒙·霍华德爵士指挥右翼、马默杜克·康斯坦布尔爵士指挥左翼。萨里伯爵亲自率领第二路主力军，达克斯勋爵指挥右翼、爱德华·斯坦利爵士指挥左翼。苏格兰人分三队迎战：国王自将中军；亨特利伯爵在休漠勋爵的协助下指挥右翼；伦诺克斯和阿盖尔伯爵指挥左翼。博斯威尔伯爵统率第四支预备队。亨特利伯爵首先投入战斗；激战后，英军左翼溃逃，被苏格兰人逐出战场。但他返回战场后，发现苏格兰全军陷于极度混乱中。原来伦诺克斯和阿盖尔的部队陶醉于胜利，打乱了阵形。虽然法国大使拉·莫特规劝、恳求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但苏格兰人还是鲁莽地冲向敌人。埃德蒙·霍华德爵士身先士卒、奋勇迎战，达克斯指挥的第二路军队掉头攻击苏格兰后队、如入无人之境。詹姆斯和博斯威尔身先士卒，向英军冲锋。他们的部众在首领的勇敢鼓舞下，投入战斗中。战斗因此延长，直到夜幕降临交战仍然在进行。胜利似乎仍然悬而未决，双方损失人数几乎相同：都超过五千人。但第二天早上，孰胜孰负已经显而易见了。英军只损失了一些次要人物，而苏格兰贵族的精华已经凋零在战场上。詹姆斯国王失踪，竭尽全力搜寻也不见踪影。英国人清扫战场时，发现了一具酷似国王的尸体，披挂着他常用的铠

^① Buchanan, lib. 13. Drummond. Herbert. Polydore Virgil, lib. 27. Stowe, p. 493. Paulus Jovius.

甲。他们将尸体放进铅棺，送往伦敦。尸体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埋葬，因为詹姆斯跟法兰西结盟，反对神圣教会，战死时仍然被逐出教门。^①但亨利提出申请，假称苏格兰国王临终前片刻已有悔悟迹象，他才获得告解，安葬尸体。不过，苏格兰人仍然宣称：战场上发现的尸体不是詹姆斯，而是一位埃尔芬斯顿人。他之所以披挂国王的铠甲，是为了分散英国人的注意力，分担君上的危难。据信，有人看到詹姆斯身穿着凯尔索花呢衣服。有人相信：休漠勋爵犯下了滔天大罪，唆使部属杀害了国王。但民众喜爱的传说是：詹姆斯仍然活着，已经秘密前往圣地朝拜，有朝一日还会回来执掌王权。这种惬意的幻想在苏格兰人当中长期流传。

这次战役称为弗洛登之役，苏格兰国王和大部分重要贵族殒命沙场。亨利获得强加城下之盟、甚至臣服苏格兰的良机。但他这一次表现出真正伟大而慷慨的心灵。苏格兰王后玛格丽特为年幼的儿子监国，向英格兰求和。亨利同情妹妹和侄子的孤弱无助，毫无困难地接受了和议。萨里伯爵立此殊勋，恢复了诺福克公爵的爵位。他的父亲因为支持理查德三世，丧失了爵位。霍华德勋爵受封萨里伯爵。国王的宠臣查尔斯·布兰登以前受封莱尔子爵，现在晋升为萨福克公爵。沃尔西既是宠臣又是大臣，封为林肯主教。赫伯特勋爵封为伍斯特伯爵。爱德华·斯坦利爵士封为蒙特古勋爵。

亨利与苏格兰议和，保证了北境安宁，可以全力以赴反对法兰西。就在这时，发生的另一些偶然事件抵消了和议的好处，使他意识到征服事业的鲁莽轻率——他由于年轻和幸运，才会投入这样的事业。

路易完全清楚：在上一次战争中，法兰西王国的处境极其危险。他决心竭尽全力防止类似的危险重现，计划拆散敌人的联盟。如果法国同意不再占据米兰，教皇丝毫无意跟法兰西结成死敌，他的利益毋宁是保持敌对双方的平

^① Buchanan, lib. 13. Herbert.

衡。因此,教皇同意:只要路易放弃里昂宗教会议,他就撤销前任教皇和他自己谴责法兰西国王和王国的逐出教门敕令。近年来,斐迪南年老力衰,除了他运用武力和策略臣服的纳瓦拉,不再有其他野心。他毫无困难地接受了路易的建议,延长休战协定一年。他甚至有意跟法兰西发展更亲密的关系。路易提议将二女儿勒内嫁给西班牙王子查理或是他哥哥斐迪南,他们两人都是西班牙国王的孙子。他宣布决定:米兰公国的继承权是公主嫁妆的一部分。斐迪南国王不仅欣然同意这个提议,还邀请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加入条约。皇帝的态度与西班牙国王相同,欢迎这个条约给他们共同的孙子提供了诱人的前途。

亨利得知斐迪南延长休战协定,勃然大怒。他大声抱怨:岳父首先大肆许愿、陈情,诱使他反对法兰西;而后没有预先通知,就为了自私的利益而牺牲他,把战争的危险和费用都留给他一个人。他以前对斐迪南是多么轻信和倚重。他威胁要报复这种欺人太甚的背信弃义。^①但他获悉马克西米利安也受到诱惑,背弃联盟,接受了西班牙王子和法兰西公主的婚约,实在忍无可忍。先王在世时,西班牙王子查理一直跟亨利的妹妹玛丽订婚。王子现在快要长大成人,亨利期望他们立刻完婚,为他怜爱的妹妹安排好体面的归宿。由于这种节外生枝,国王怒不可遏,急欲向这些君侯表示不满。他们利用了亨利的年轻和缺乏经验,滥用了他过分的轻信。

朗格维尔公爵在基内格特之役被俘,仍然扣留在英格兰。他准备利用亨利眼下的处境,谋求英法和平,甚至联盟。他知道,这是法兰西国王迫切需要的,于是他向亨利国王提议:法兰西王后安妮最近去世;借此机会联姻,对英法两国都有利,可以体面地结束两国所有分歧。安妮没有儿子,而路易非常渴望男性继承人;英格兰公主年轻貌美,可望生育个男孩。因此她与法兰西国王联姻,是最合适不过的。虽然公主十六岁、国王五十三岁,似乎并不般配,但联姻

^① Petrus de Angleria Epist. 545, 546.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结盟的利益足以补偿年龄悬殊的不利。亨利跟西班牙结盟从未获得丝毫利益，不如解约。而路易为人正直高尚、终生不渝，因此亨利不如跟法兰西结成亲密同盟。

亨利似乎乐于倾听这个提议，因此朗格维尔告知君上：英法纠葛可望圆满收场。法兰西国王授予他谈判条约的全权。两位君主协商条款，并不困难。路易同意陶奈应该留在英国人手中；理查德·德·拉·博尔流放梅茨，由路易提供年金；根据先王和亨利本人的条约，亨利应该收到一百万克朗拖欠款；玛丽公主应该带来四十万克朗嫁妆，享受历任法兰西王后同样的授产，即使前任王后是布列塔尼女继承人。两位君主同意：只要任何一位君主受到敌人攻击，另一位都要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①

条约签订后，玛丽公主在壮丽的仪仗护卫下前往法兰西。路易在阿布维尔迎接銮驾，举行婚礼。公主的美丽、优雅和多才多艺迷住了路易国王。他虽然年事已高，但血液尚未冷却。寻欢作乐、笙歌度日，对他每况愈下的健康颇不相宜。^② 婚后不过三个月，路易就去世了。法兰西举国哀悼备至。由于他关心国民福利，获得了“国民之父”的口碑。

路易的大女婿昂古莱姆公爵弗朗西斯现年二十一岁，继承了法兰西王位。他活跃、勇武、慷慨的性格预示着一个幸福而光荣的朝代的来临。英国公主的魅力打动了年轻的国王。甚至先王还在世时，弗朗西斯就乐此不疲地向她大献殷勤，以至于他的朋友们都担心他有意跟王后发生风流韵事。他接受了警告，不再继续这种可能丧失王位继承权的殷勤，甚至非常仔细地监护新寡的王后。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当时正在法兰西宫廷。公爵外貌俊秀，为一时翘楚。当时认为适合廷臣和军人身份的各项活动，他无不精通。萨福克是亨利的主要宠臣，亨利国王一度有意把妹妹许配给他，便纵容他们两人互通情

① Du Tillet.

② Brantome Eloge de Louis XII.

愫。王后问萨福克，他现在有没有勇气毫不踟蹰地娶她。她告诉公爵：亨利王兄更容易原谅他没有预先请旨，而不容易原谅他有旨不遵。萨福克没有拒绝如此诱人的建议，他们在巴黎秘密举行婚礼。弗朗西斯国王对他们的做法很满意，因为这样可以防止亨利借妹妹的婚姻结交强大的盟友。^① 法兰西国王的斡旋平息了亨利的怒气。萨福克满足于分享国王的恩宠，无意干预公共政务。甚至沃尔西也不嫉妒他，而是积极调解国王和公爵夫妇，说服亨利允许妹妹和妹夫返回英格兰。

① Petrus de Angleria, Epist. 544.

第二十八章

亨利八世(二)

沃尔西当国——苏格兰事务——法王弗朗西斯一世的进展——亨利的嫉妒——陶奈交还法兰西——沃尔西就任教皇特使——沃尔西秉政之道——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之死——西班牙王查理当选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弗朗西斯在加莱会晤——查理皇帝拜访英格兰——亨利的调停——白金汉公爵受审定罪

沃尔西很快赢得了国王的信任，平步青云。他心高志大、举止傲慢，以更快的速度给自己树立了许多敌人。亨利朝纲独断，不顾国民非议、贵族怨望，坚持自己的选择。这位教会长老也很清楚国王专横的性情，没有暴露自己获得的绝对影响力。他一面秘密掌控所有的政务会议，一面假装完全屈从于君上的意志和权威。他迎合上意，得君固宠；代君秉政，便君逸乐。他事君柔顺、秉政干练，因此虽然贪墨无厌、挥霍无度、理应招忌，仍能不受猜忌之害。班布里奇去世后，约克大主教教区空缺。沃尔西辞去林肯主教职位，继任约克大主教。他不仅享有陶奈的教区收入，还从巴斯、伍斯特、赫里福德教区的岁入中分成。这几个教区的主教是意大利人，获准常驻国外，

因此都乐于作此妥协交出相当一部分收入。他代理圣奥尔班斯修道院和其他许多教职，掌管黜涉。他甚至获准：首先将达勒姆教区，然后将温切斯特教区并入约克教区。他的兼并似乎并不到此为止。他的教职进一步提升，构成了攫取更多岁入的借口。教皇注意到他对国王有很大影响力，便渴望跟他建立利益纽带，封他为红衣主教。他在教职的尊严身份掩饰下，从事政治家的活动、谋取邦国的利益，任何教士无人能及。他的扈从多达八百人，许多都是骑士和绅士。许多贵族甚至将孩子送到他家受教，忍受仆从的地位，期望获得保护人的恩宠。任何人只要具备艺术或学术的造诣，向红衣主教谋求赞助，绝不会失望。他慷慨地保护当时仍在襁褓之中的文学；通过公共机构和私人捐赠，鼓励学术的每一个分支。^① 他的慷慨赢得了睿智之士的赞许。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向民众炫耀壮丽的车马和陈设、身穿昂贵绣品的侍从和他华丽的服饰。他是英格兰第一位披金穿绸的教士，不仅自己平常穿戴，还用在马鞍和马饰上。^② 他的红衣主教首冠载满表示尊位的饰品，在国王的小教堂内获准放在祭坛上。他特意选择一位最高大英俊的教士，在自己面前举起支撑十字架的银柱。但他认为这样的排场还配不上红衣主教的身份；甚至在坎特伯雷教区内，让另一位高大英俊的教士举起约克十字架，伴驾而行。这种排场完全不符合自古以来的教规，也没有经过资格相等的各教区同意。^③ 民众嘲笑红衣主教的虚荣，说他的罪孽和过错太多，只用一个十字架是不够补赎的。

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大臣沃汉姆性格温和，厌恶一切争执，宁愿远离公职。跟傲慢的红衣主教争强斗胜，是他力所不及的事情。沃汉姆辞去大臣职务，御玺立刻交给沃尔西。如果说新任显要带来了更多敌人，也发扬了他的个人品格，证明了他的能力。他在任期间，执法公正严明；没有任何大臣的裁断比他

① Erasm. Epist. lib. 2. epist. 1. lib. 16. epist. 3

② Polydore Virgil, lib. 27. Stowe, p. 501. Holingshed, p. 847.

③ Polydore Virgil, lib. 27.

更不偏不倚，判断更深刻准确，法律和正义的知识更为广博。^①

诺福克公爵发现：国王的事业和娱乐已经耗尽了府库，靡费仍然有增无已，很乐意辞去大司库职务，从宫廷引退。他的政敌温切斯特主教福克斯没有因他的退出而获益，部分由于年老多病、部分由于厌恶沃尔西大权在握，便专心照管自己的教区事务。红衣主教说服国王，拒绝偿还萨福克公爵在法国欠下的一笔债务。公爵也大为恼怒，从此退隐。这些事件的结果是：沃尔西大权独揽、独享王恩，各方面的权威都掌握在他的手里。福克斯引退前警告国王：“不要让仆人比主人更强大。”亨利回答：“他非常清楚怎样让臣民服从。”但他以后仍然事事听从红衣主教的指引和建议。

在红衣主教的治理下，英格兰国内彻底稳定，人民全面服从，法律普遍执行。^② 大局奠定，没有任何内乱足以扰乱国王和大臣的安宁。如果人们有可能享受绝对的平静，放弃任何无结果和不必要的计划和事业，他们甚至无须认真留意对外事务。

苏格兰已故国王的遗嘱规定由寡后监国。国会投票批准王命，同时表示王后只有在没有改嫁的条件下才能享有摄政权。^③ 但詹姆斯去世才几个月，王后就嫁给了昂古斯伯爵道格拉斯。年轻的伯爵家世显贵，前途无量。现在有些贵族提议选昂古斯伯爵为摄政，这样最有利于跟英格兰议和。但名门甲第嫉妒道格拉斯家族，恐惧他们的势力崛起，开始反对这种举措。王国最强大的首领休谟勋爵尤其反对，坚持召回奥尔巴尼公爵。公爵是詹姆斯国王的侄子，流放到了法兰西。奥尔巴尼已经结婚，有子，他的儿子是王位第二继承人、幼主最近的亲属。奥尔巴尼虽然是宗室亲王之首，但常居海外，完全不熟悉国民的风俗和民情，不会讲本国语言。不过，公爵依靠盟友法兰西的鼎力支持和

① Sir Thomas More. Stowe, p. 504.

② Erasm. lib. 2. epist. 1. Cavendish, Hall.

③ Buchanan, lib. 14. Drummond, Herbert.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休谟勋爵的巨大权威,应邀回国执掌大政。弗朗西斯国王并不在乎冒犯英格兰国王,他将奥尔巴尼公爵在法兰西扣留了一段时间。但他最终意识到保持苏格兰和法兰西的利益纽带有多么重要,就准许公爵回国摄政。他甚至更新了两国的古老盟约。不过,古老盟约暗示苏格兰和法兰西关系密切,可能有碍于英法联盟。

摄政返回苏格兰,开始质询国情民德。到当时为止,奥尔巴尼公爵仍然非常不熟悉他所见所闻的苏格兰景象。喧嚣健斗的苏格兰王国与其说是一个法度井然的文明国家,不如说是个由众多小君侯亲密结合形成的邦联。即使国王的权威都极其模糊含混、朝不保夕,摄政就更不用说了。武力普遍高于法律;最受尊重和珍视的品质不是公正,而是勇敢。贵族掌握了一切权力,他们有的世代结亲,有的世代为敌。除非动用武装部队,否则就不可能惩罚罪大恶极,保护无辜良善。一个人掳掠、残害敌对部族,不会在自己的部族中声名狼藉,反而会赢得同族人的尊重和赞许。他可以因此受部族首领重用,位列同辈之上。虽然同宗同族唇齿相依、关系紧密,但这些未开化民族中压倒一切的激情是复仇的精神。他们称之为报复“世仇”。

奥尔巴尼公爵下车伊始,第一批打听情况的对象恰好是休谟勋爵的夙敌。^① 他们把这位有钱有势的贵族说成扰乱公共秩序的主要原因、执法行政的主要障碍。他们说:为了树立法官的权威,必须首先杀一儆百。只有惩办无法无天的魁首,其他为非作歹的小首领才会吸取教训、尊重王权。奥尔巴尼公爵受到这些说辞的诱惑,忘记了休谟勋爵过去为他争取摄政权的大功。摄政不再青睐休谟,而休谟却认为这是他应得的回报。休谟勋爵发现摄政改变了立场,既担心自身安全,又急欲复仇,便采取了反对摄政的举措。他向太后和昂古斯伯爵报告:奥尔巴尼公爵有不轨之心,身为王位第二继承人而轻举全国

^① Buchanan, lib. 14. Drummond.

大权，他们两人和襁褓中的幼主都会岌岌可危。玛格丽特王后听信他的说辞，计划带幼主投奔英格兰王兄避难。密谋败露，太后在休谟勋爵和昂古斯伯爵护送下逃往英格兰。不久，玛格丽特在英格兰生下一个女儿。

亨利国王为了抵制奥尔巴尼和亲法派的势力，便鼓励这些不满分子，保证英格兰会支持他们。随后，休谟和摄政达成协议，返回苏格兰，但两人仍然相互疑忌。休谟勋爵由妹夫艾伦伯爵监护，一度扣押在伯爵的城堡中。但休谟说服艾伦与他合谋，放他逃出城堡。于是，他公开发动反对摄政的战争。两人再度达成协议，但并不比先前的协议更有诚意。休谟兄弟轻率地自投摄政的罗网。他们立刻遭到逮捕、扣押、审判、定罪、处决。没有正当的罪名可以指控他们兄弟，只能宣称：他们在弗洛登战役中，没有尽勤王的义务。因为休谟兄弟过去的行迹毫无懦弱的嫌疑，只因他们推迟其行就受到更加险恶动机的指控。不过，不利于他们的犯罪证据远非坚实可靠。他们在世，受到国民的憎恨；他们伏诛，又引起国民很大的不满。

如此横暴的补救措施，往往可以获致一段时间的虚假安宁。但这样的举措毁灭了双方的信任，产生了最根深蒂固的夙怨，对公共利益和始作俑者都有致命的恶果。摄政虽然获益于眼下的安宁，但受到法兰西国王的邀请，前往法国，在那里逗留了若干年。当时，法兰西国王有意安抚亨利。摄政离境期间，苏格兰国内一片混乱。各大家族相互仇视、掳掠、残害，王国长期动荡不安，既不能征伐敌国，又不能援助友邦。我们记述苏格兰历史，已经超前于当前时段若干年。由于这个国家跟全欧体系没有多少联系，我们不必过多地打断其他王国重要事件的叙述。

可以预料，弗朗西斯这样年轻、活跃的君主天性尚武，不久就会运用先王临终前遗留的准备工作，征服米兰。他曾经吟诗作赋，感叹加斯顿·德·富瓦的功业，甚至慨然泪下。追念古人的泪水，预示他即将耀武沙场。他更新了路易与亨利的和约，保证后方安全，发兵法国南部，诡称唯一的目的在于防备瑞

士人的入侵。这些可畏的国民仍然敌视法兰西，已经跟马克西米利安互通款曲，将米兰公爵置于他们的保护下。事实上，米兰已经完全依附于他们。他们决定：从荣誉和利益考虑，都要保护米兰公爵免遭入侵。^① 他们在阿尔卑斯山隘口设防，认为这些地方是法国人必经之处。弗朗西斯极为隐秘、勤勉、坚毅，间道闖入皮埃蒙特。这时，他们并不沮丧，撤出山地，退守平原。他们虽然没有骑兵支援，仍然出兵阻挡前进的法军。在米兰附近的马里格南，两军激战，互有胜负，惨烈超过了以后的战史。国王以全副英雄气概激励大军，奋勇迎战这些孤注一掷的山民。傍晚时分，两军血战；夜幕降临，战事稍歇。但第二天早晨，瑞士人毫不懈怠，再度奋勇进攻。最后，他们最勇敢的部队损失殆尽，只得接受劝说，退出战斗。

双方在战场上牺牲了两万人。大司马特雷维佐身经十八场激战，宣称：跟马里格南战役相比，他以前经历的每一场战斗都不过是儿童游戏而已。马里格南战役是英雄的角逐。^② 法军大捷，米兰门户洞开。弗朗西斯征服公国，不费吹灰之力。

法兰西国王的胜利和荣耀激起了亨利的嫉妒。法军长驱直入，虽然远在异国，英国大臣仍然深感忧虑。那时，意大利是宗教、文艺、贸易的中心。后来由欧洲各邦分享的荣光，当时仍然由意大利独占。全欧各邦瞩目于意大利。在这里兼并任何一块土地，都会牵动欧洲全局，分量远比仅仅计算土地本身的价值更重。亨利还觉得：他有理由抱怨弗朗西斯送奥尔巴尼公爵返回苏格兰，暗中破坏他妹妹、苏格兰太后的权威和声望。^③ 法国人修复特鲁安城堡，英国方面也视之为破坏条约的行动。但英格兰宫廷疏远法国的最主要因素是：沃尔西跟法兰西君主启衅。

① *Memoires du Bellai*, lib. 1. *Guicciardini*, lib. 12.

② *Histoire de la Ligue de Cambrey*.

③ *Pere Daniel*, vol. iii. p. 31.

亨利征服陶奈后，不允许当选主教路易·盖拉特执掌民政，因为这位教会长老拒绝宣誓效忠新君主。如前所述，沃尔西受命执掌教区。红衣主教希望自由自在、平安无事地享用教区岁入，就向弗朗西斯陈情，希望国王给盖拉特安排一个同等价值的法国教区，让他辞去陶奈的教职。弗朗西斯仍然有意收复陶奈，担心沃尔西完全掌握教区会妨碍他的目的，迄今一直对傲慢的红衣主教置之不理。陶奈主教向罗马教廷申诉，教皇法旨将教区归还给他。沃尔西周旋于霸君之间，习于有求必应、礼敬备至，怨恨弗朗西斯的怠慢。于是，他推动君上跟法兰西国王争执。^①

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随时准备响应任何新事业的动议。如果能获得金钱资助，尤愿如此。他极其贪婪，极其挥霍，极其贫困。班布里奇红衣主教的前任秘书、现任国务秘书理查德·佩斯奉命出使维也纳宫廷，给马克西米利安送去相当大的款项。^② 他从那里前往瑞士，如法炮制地资助几个州出兵支援皇帝。皇帝率领相当强大的军队入侵意大利，但在米兰城前败退，撤回德国。马克西米利安跟法兰西和威尼斯议和，把维罗纳割让给威尼斯共和国换取一笔金钱。这样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关闭了自己以后插手意大利事务的途径。亨利发现：他为了满足自己和沃尔西红衣主教的脾气，靡费了五六十万杜卡特（ducat），但没有削弱弗朗西斯的实力，仅仅削弱了英法两国的友谊。

国王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不能进一步跟法国为敌。他在欧洲大陆没有盟友可以指望。亨利的岳父斐迪南经常欺骗他，现在年老多病，每况愈下。一位伟大君主漫长而昌盛的统治不久就要来临。西班牙王子查理统治低地国家，渴望跟弗朗西斯保持和平。法兰西国王实力雄厚，如果发起挑衅，就会妨碍查理平安继承富饶的低地领地。法兰西的强大、法兰西与威尼斯的紧密联

① Polydore Virgil, lib. 27.

② Petrus de Angleria, epist. 568.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盟慑服了教皇。^①因此,亨利在一段时间内不得不保持平静,仿佛并不关心欧洲大陆的事务。马克西米利安徒然引诱亨利:由他提供一笔钱,皇帝将帝国皇冠放弃给他。这种诡计过于露骨,甚至连亨利这样缺乏政治头脑的君主都不会上当。亨利的全权大使佩斯对皇帝的动机和性格了如指掌,他警告国王:马克西米利安唯一的考虑就是利用亨利的慷慨,从他手中弄钱。

欧洲各地普遍和平。这时,期待已久的大事终于发生。天主教君主斐迪南去世,他的孙子查理继承了广阔的领地,引起了许多重大后果。查理的力量和权威越大,弗朗西斯就越觉得需要亨利的友谊。他最终采取了唯一可行的成功之道:以礼物和奉承讨好傲慢的红衣主教。法兰西海军上将博尼维特奉命出使伦敦。大使获得指示:运用他高超的技巧和辞令,谋求红衣主教的青睐。大使如愿以偿后,不失时机地表达法王的遗憾:由于阴差阳错和彼此误解,丧失了陛下极为珍视的友谊。沃尔西对如此伟大君主的殷切致意并非无动于衷。从此以后,他在一切场合都表示赞成英法亲善。弗朗西斯为了进一步建立利益纽带,对红衣主教推心置腹,甚至在最秘密的事务中征询他的意见。在一切难以决断的突发事件中,法兰西国王都求助于沃尔西睿智而深邃的政治神谕。红衣主教并不向亨利国王隐瞒他跟弗朗西斯国王的私人联系。亨利对大臣的经济之才怀有莫大的信心,他甚至宣称:他完全相信红衣主教能执掌弗朗西斯的事务,就像执掌他自己的事务一样。^②

万事俱备,博尼维特开始向红衣主教披露,他的君主希望收回陶奈。沃尔西毫不犹豫,立刻为此效力。他抓住机会向国王和枢密院提议:陶奈远离加莱。战争时期,保持两地的联系极其困难,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陶奈位于法兰西和尼德兰边界,暴露在两国的攻击面前。无论利用武力还是饥荒,这座城市都禁不住第一阵攻击。甚至在和平时期,保存陶奈也必须建立强大的

① Guicciardini, lib. 12.

② Polydore Virgil, lib. 27.

要塞，弹压人数众多、桀骜不驯、一向不满英国统治的居民。由此可见，占据陶奈徒然承担危险和靡费，全无裨益，任何情况下都发挥不了或几乎发挥不了骚扰查理或弗朗西斯领地的作用。

这些理由本身完全站得住脚，出自红衣主教之口，肯定不会有人反对。割让陶奈的条约就此签字。为了让这一举措看上去更加光彩，双方同意：法兰西王太子和玛丽公主订婚，陶奈应该视为公主的嫁妆。此时，王太子和公主都在襁褓之中。当时，君侯之间经常达成这种协定。不过，双方的利益和看法很少会持续不变。因此，拟议的婚姻多半实现不了。不过，亨利建筑陶奈城堡，耗资巨大。弗朗西斯同意补偿他六十万克朗，十二年分期付款，交出八位世家子为人质，以保证协议执行。^① 弗朗西斯不想让红衣主教觉得协议忽略了他，承诺给他提供一万二千里弗年金，相当于他执掌陶奈教区的岁入。

法兰西国王在这次谈判中已经如愿以偿，开始扩大视野，希望利用宠臣的虚荣自负来博取更大的利益。弗朗西斯变本加厉地吹捧红衣主教，更经常地请教他各种疑难事务，每一封信都称他为“父亲”、“导师”、“监护人”，对他的观点和建议表现出无限的顺从。所有这些安抚手段都是预备措施，目的是举行谈判：用一笔金钱为报酬而收回加莱。如果我们相信波利多尔·维吉尔的记载，红衣主教是欣然同意了这个不寻常的提议。不过，波利多尔·维吉尔对沃尔西怀有特殊的恶意，因为他在这位大臣治下被罢官、入狱。无论如何，他敢于把这项事务提交枢密院。其他大臣私下的看法是：他乐于在谈论中暗示，他似乎认为加莱是王国无用的负担。^② 但他发现所有人都坚定地予以反对，认为走得太远是危险的举措。不久以后，他跟西班牙国王产生了新的友谊，跟弗朗西斯的深情厚谊开始慢慢淡薄下来。

沃尔西的权势与地位大增，进一步增加了他的骄傲。教皇特使红衣主教

① Memoires du Bellay, lib. i.

② Polydore Virgil, lib. 27.

坎佩吉奥奉命前往英格兰，收取教士的什一税，用于教皇抗击土耳其人推进的事业。这时，土耳其人的危险已经确凿无疑，对整个基督教世界形成了可怕的威胁。但罗马教廷的许多政策都建立在有利可图的基础上，对人们的心灵不再有影响力。教士拒绝遵奉利奥教皇的要求。坎佩吉奥被召回。沃尔西已经接受了这方面的委任，国王要求教皇把以下所有的权力授予他一人：教皇特使的权力以及莅临检察教士和修道院的权力，甚至悬置教会法一年的权力。沃尔西一获得新的尊位，就着手炫耀他乐此不疲的新地位和排场。在严肃的节日庆典上，他必须用教皇本人的礼仪做弥撒才能满意。他不仅有主教和修道院长服侍，还让最高级贵族为他端水、捧毛巾。他摆出的等级高于英格兰有史以来任何神职人员的架子。沃汉姆大主教给他写信，署名“你亲爱的兄弟”。沃尔西抱怨大主教放肆无礼，竟敢以平辈自居。沃汉姆得知他冒犯了红衣主教，淡然说道：“你不明白，此人已经让太多的成功灌醉了。”

不过，沃尔西的逾越已经不限于虚荣的排场和炫耀。他建立官署，称之为“教皇特使法庭”。因为他现在获得了教皇委任，深得国王宠信，集教俗大权于一身，没有人知道他这个新法庭的管辖范围。他甚至授予这个法庭质询和监察俗人的某种权力，指示法庭调查所有关于良心的事务；管理所有引起丑闻的事务；审理所有虽然不违法，但可能与良善道德准则相抵触的行为。这种授权的制裁范围确实毫无限制。国民目睹沃尔西排场盛大、气焰熏天，却严厉压制其他人最轻微的放肆，于是对他更加厌恶。不过，沃尔西的新法庭臭名昭著，主要原因在于他任命约翰·艾伦为法官。艾伦生平行迹不知检点。^① 据说，他跟大臣一样，犯有伪证罪，因此受罚。此人滥用职权，要么随心所欲，陷入入罪，勒索罚款；要么接受贿赂，免予起诉。人们根据相当合理的外观推论：他跟红衣主教分享贪赃枉法所得的不义之财。教士，尤其是修道士，十分苦于他这

^① Strype's Memorials, vol. i. p. 125.

种暴政。因为他们生活放荡，很容易授人以柄，不得不出大价钱贿赂教皇特使或他的法官，借以购买安全保障。沃尔西凭借他的委任，获得这样的权威，还不满足。他进而僭越所有主教法庭的管辖权，尤其是遗嘱遗赠（Wills and Testaments）案件的审判权。他审理这些重要案件，公认为极其武断。他仿佛以为自己是教皇，而且教皇有绝对权力处置一切教会晋升事务，仅凭一己之意授予小修道院和圣俸，完全不顾修道士选举和贵族绅士恩主的权利。^①

没有人敢向国王抱怨沃尔西的擅权。直到最后，沃汉姆才冒险向国王陈述国民的不满。亨利声称，他对此一无所知。他说：“一个人最盲目的地方莫过于自己家中。不过，你这就去找沃尔西，”他对大主教说：“告诉他，如果任何事务出了问题，叫他自己纠正。”这种谴责不大可能有效，只会增加沃尔西对沃汉姆的敌意。但一位伦敦人已经向法庭控告教皇特使的法官艾伦，法庭判决他腐败渎职、徇私枉法，喧嚣终于上达天听。亨利对红衣主教表示不悦，要他以后施政多加小心。

亨利沉溺于寻欢作乐，将王国政务委托给专横的大臣。这时，一起偶然事件唤起了他的注意——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去世了。他本人确实无足轻重，但他去世就使基督教世界君侯之首的位置出缺。因此，群情汹涌，开辟了全欧体系的新纪元。法兰西和西班牙立刻宣布他们有意角逐帝国的皇冠，用尽了一切金钱和阴谋手段，谋求他们野心的重大目标。亨利也为此次欢欣鼓舞，准备觊觎帝位。但他的大臣佩斯奉命出使推选皇帝的公侯处所，发现他的游说活动已经迟了一步，所有这些君侯的选票早已预约给某一方面了。

弗朗西斯和查理一开始就公开宣布竞争帝位，但不怀敌意。弗朗西斯特别宣称：他跟查理是兄弟，如同在公开、公平地追求同一位情妇。他还补充说：

① Polydore Virgil, lib. 27. 这位作者在此处的记载，所有史家都全盘引用。然而，许多地方颇有疑点。一方面，这位史家明显有偏见；另一方面，国会后来审查沃尔西的施政，没有发现任何重要罪证。

幸运者双宿双飞，另一位一定会坦然接受。^①但所有人都担心：无论如何通情达理，这样极度的节制可能无法持久，肯定会发生种种偶然事件，让候选人性度激化，彼此为敌。查理最终胜出，法兰西国王对此极为反感。弗朗西斯直到最后一刻还相信：大多数推选皇帝的王侯已经约定支持他。他比对手年长几岁；马里格南大捷、征服米兰后，他的声誉也高于查理。因此，他无法抑制愤怒。他在全世界面前，经过长期而热切的期待，却丧失了如此重要的尊位。两位雄主这一次竞选帝位，唤起了敌对的利害关系。整个时代随之风起云涌，双方龙争虎斗、精彩非凡。两位君侯同样天赋卓绝、才能出众、英勇善战、志向远大、老于戎事，受到臣仆和臣民的爱戴、敌人的恐惧和全世界的尊敬。弗朗西斯为人开朗、坦诚、慷慨、宽厚，但过分地发扬这些品格，以至于损害了他的事业。查理为人精明、亲密、策略、节俭，更有利于赢得战争和谈判，特别是赢得谈判。一个是更和蔼可亲的人，另一个是更伟大的君王。弗朗西斯国王由于疏忽和轻率，自然遭遇不幸；但由于心灵的高尚和恢弘，光荣地从不幸中解脱出来。查理皇帝为人精于谋略和权衡，恰好能造就他最伟大的成功，但引起盟友的嫉妒和敌视，每次战胜一个敌人就会树立更多敌人。于是，这些君侯的个人品格难分伯仲，他们的国土优劣利弊同样如此。如果没有审慎和勇敢的配合，仅仅依靠幸运，查理皇帝绝不可能突然获得如此巨大的势力。他继承了卡斯提尔、阿拉贡、奥地利和尼德兰的君位；承袭了征服那不勒斯和格拉纳达的遗产；当选为皇帝。在他的时代，甚至地球的界限也有所扩大。他原本可以完全占有新世界的财富，没有任何竞争对手。这些有利事件同时发生，缔造了他的帝国。自罗马以来，欧洲从未有过更伟大、更辽阔的帝国。法兰西王国单独、紧密、紧凑、统一、富饶、繁庶，恰好位于帝国所有领土的中心，能够积极有效地遏制帝国扩张，不断与皇帝争斗。

^① Belcaria, lib. 16. Guicciardin, lib. 13.

亨利凭借王国的自然力量和地势、得天独厚，可以维系两强的平衡。如果他能改进策略和审慎，事实上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形势获得无法估量的非凡利益，比这两位竞逐欧洲霸权的雄主更有权有势。但亨利国王的性格漫不经心、轻率随性、反复无常、缺乏策略；受激情或喜好的驱使；虚荣、专横、傲慢；有时候为外国君主的友谊，更经常为憎恨，却很少为自己真正的利益所驱动。于是，欧洲形势赋予他举足轻重的优势地位，他为此扬扬得意，却从来没有借此为自己或王国谋取必要或长远的利益。

弗朗西斯非常了解亨利的为人，试图顺应他的性格加以引导。他提议两国君主在加莱附近会晤，希望借助亲密的交谈赢得亨利的友谊和信任。沃尔西热忱地支持这个提议，希望在两国宫廷面前炫耀自己的富裕、显赫以及左右两国君主的影响力。^① 亨利自己也喜欢炫耀和排场，乐于亲自结识弗朗西斯以满足好奇心。因此，他兴致勃勃地调整会晤的一切准备工作。两国贵族在排场和靡费方面争奇斗胜。许多人为几天的荣华而负债累累，终生穷困以弥补亏空。白金汉公爵虽然非常富有，但多多少少吝啬成性，他发现准备典礼靡费无度，即对红衣主教颇有微词。他相信，沃尔西是这一切举措的始作俑者。^② 大臣从来没有忘记公爵这次轻率的举动。

亨利正准备去加莱，听说皇帝已到多佛。他急忙协同王后赶往那里，以便得体地接待皇室贵宾。这位伟大的君侯虽然年轻，仍然工于心计。查理获悉弗朗西斯和亨利拟议的会晤，担心结果不利于自己，决定抓住机会从西班牙赶往低地国家，到亨利的领土来拜访国王以表示更高的敬意。他不仅向亨利表示尊重和亲善，还用尽千方百计，借助恭维、断言、承诺和馈赠，来打动红衣主教的虚荣、贪婪和野心，博取他的友谊。他向野心勃勃的大主教灌输荣升教皇法座的希望。因为红衣主教现在就已经位极人臣，只有此道才能更上一层楼；

① Polydore Virgil, lib. 27.

② Polydore Virgil, lib. xxvii. Herbert. Hollingshed. p. 855.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这样就能保证他焕发同样的激情，好像目前的财富永远满足不了他。红衣主教确信皇帝会协助他荣升教皇后，就秘密效忠于皇帝的利益。或许，查理更容易慷慨许诺，因为利奥教皇年纪很轻。在许多年内，他不大可能有必要兑现承诺。亨利很容易发现皇帝在向他的大臣献殷勤，但他非但没有不快，反而因此得意。他相信：沃尔西唯一的基础就是他的宠信，如此强大的君主尊敬他的臣仆，就等于是对他的伟大致敬。

查理告辞那天，亨利偕王后和整个宫廷渡海前往加莱。他们从加莱前往边境附近的小镇圭斯奈。弗朗西斯以类似方式，前往几里外的阿德尔。两位君主在田野中举行第一次会晤，位置在两座城镇的中点，但仍然属于英国领土范围。因为弗朗西斯有意讨好亨利，考虑到他渡海而来，自己亲自迎接。沃尔西受到两位君主的信任，规划了这次盛会。他铺陈装点，务求荣耀君上。法兰西和英格兰贵族在此展示了壮丽的排场，争奇斗胜、靡费无度，以至于会晤地点获得了“黄金锦绣场”的雅号。

两位君主以最热忱的方式相互致敬，然后进入专门为此次准备的帐篷里休息。他们秘密协商。亨利在此有意修改上一次结盟的条款，他开始朗读条约的第一句话“我，亨利国王”，在这里停顿片刻，只附加了“英格兰的国王”，没有按照英国君主的惯例自称“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国王”。^①弗朗西斯注意到微妙的修改，报以赞许的微笑。

弗朗西斯很快就得到机会，来逢迎亨利爱好恭维的习性。这位君主气概恢弘、自尊自爱，不知猜疑为何物。他惊讶地发现：无论他在什么时候跟英国君主会晤，规划者都会采取一切严密的预防措施。大批卫队和侍从仔细地部署在两侧。每一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和调整。如果两位君主有意拜访王后，两个队列就会同时分开，举起火枪鸣枪敬礼。两位君主彼此穿过中场，亨利前往阿德

^① Memoires de Fleuranges.

尔、弗朗西斯入驻英国人掌握的圭斯奈。这些繁文缛节蕴含着许多不体面的含意。有一天，弗朗西斯为了打破这一套程式，带着两位绅士和一位侍童，骑马直接进入圭斯奈。他向士兵大叫：“你们都是我的俘虏，带我去见你们的君上。”士兵们惊愕不已。亨利看到弗朗西斯出现，同样惊愕不已，只好张开双臂拥抱他。“我的兄弟，”他说，“你开了一个世界上最愉快的玩笑，说明我可以完全信任你。我投降，从现在起就是你的俘虏了。”他从脖子上摘下一串珍珠项圈，价值一万五千安琪(angel)，^①挂在弗朗西斯脖子上，恳请他给俘虏一个面子戴上项圈。弗朗西斯同意了，条件是亨利戴上他赠送的项链。这份礼物比亨利的项圈贵两倍。^② 国王第二天前往阿德尔，没有带任何卫士和随从。两位君主已经建立了充分的互信，在以后的比武和庆祝活动中一直保持着。

两位君主彼此向对方的宫廷发出挑战，消息很快传遍欧洲各大城市：亨利和弗朗西斯及其十四名助手将在皮卡迪平原的绳障、赛场和栅栏中举行比武大会，回应一切与会绅士的各种挑战。两位君主为了应战，骑马入场。亨利由弗朗西斯的卫队簇拥着，弗朗西斯也由亨利的卫队簇拥着。他们披挂盛装华饰。两人都是当代最英俊的美男子，也是最出色的武术高手。在这些粗野而危险的消遣中，他们拿走了所有项目的奖品。他们精力充沛、敏捷过人，打翻了几位骑士和战马。女士们裁判骑士的勋绩，在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宣告比武结束。亨利用木材和帆布建起一座巨宅，框架在伦敦已经建成，计划在这里宴请法兰西国王。他在建筑物上绘制了一幅英国弓箭手的图案，下面铭刻着箴言：“蒙朕青睐者胜。”^③ 亨利借此表示：他的地位举足轻重，掌握了欧洲各君侯的力量平衡。两位君主没有处理多少严肃的事务，主要在这些消遣中打发时光，直到分手。

① An angel was then estimated at seven shillings, or near twelve of our present money.

② Memoires de Fleuranges.

③ Mezeray.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亨利随后前往格拉沃利讷，拜访皇帝和萨伏伊的玛格丽特，约定他们一同去加莱，在那里的城堡盘桓数日。在这里，精明于策略的查理皇帝完全实现了他影响国王及其宠臣的目的，抹去了坦诚慷慨的弗朗西斯培植的友谊。由于奥地利家族的势力开始明显凌驾于法兰西君主国之上，英格兰的利益要求稍稍支持后者。最重要的是，不能让任何一方获得压倒对方的决定性优势。但英国人对法国的猜忌始终妨碍着两国真诚结盟。查理意识到这种世代相传的敌意，急欲进一步逢迎亨利的虚荣心，向他提议（后来弗朗西斯不得不赞同）：亨利应该在各国君侯的争执或纠纷中享有完全的仲裁权。不过，查理政治手腕的杰作莫过于：借助非常重要的服务和更高的承诺，确保沃尔西支持皇帝的利益。他重新保证支持沃尔西问鼎教皇法座。他当即将卡斯提尔的巴达霍斯和巴伦西亚教区的岁入交给沃尔西。现在，沃尔西的聚敛已经无法无天，再加上亨利允许他接受外国津贴，使得他的岁入几乎相当于王室岁入的一半。他挥金如土，或者不如说卖弄虚荣，引起了国民普遍的愤怒，甚至降低了所有外邦对他的君主的尊重。^①

皇帝与法兰西国王之间，既有个人的争强斗胜，又有政治的猜忌。敌对行动很快就爆发了。不过这些野心勃勃、能征惯战的君主一面在全欧洲所有地方彼此争斗，一面还在表达最热切的和平愿望。两人都不断向他们的仲裁人亨利抱怨。亨利国王假装不偏不倚，约定双方都派大使到加莱接受沃尔西和教廷使节的和平斡旋。皇帝很清楚这些调解人的倾向性，于是在会谈中提出过分的要求，清楚地说明他意识到了这种优势。他要求归还勃艮第，这个省份在多年前就已经通过条约割让给法兰西了。如果他占有勃艮第，就掌握了深入法兰西心脏地区的门户。他的祖先一直为领有佛兰德和阿图瓦而宣誓效忠于法兰西王室，他本人在《努瓦荣条约》中同样加以重申，他现在要求解除这种义务。由于弗朗西斯拒绝这些条件，加莱会议破裂。不久后，沃尔西起程前往

^① Polydore Virgil. Hall.

布鲁日、会晤皇帝。他受到同样富丽堂皇、毕恭毕敬的接待，仿佛他就是英格兰国王本人。沃尔西以君上的名义，跟教皇和皇帝结成针对法兰西的攻击性同盟。他签约保证：明年夏天，英格兰应该以四万大军入侵法兰西王国。他将玛丽公主许配给国王。公主是国王唯一的女儿，现在颇有继承王位的希望。这次奢靡的联姻有害于王国的利益，事实证明还可能对王国的自由和独立造成致命的伤害。造成这种恶果的原因是：国王的任性和偏见，红衣主教的私利和私心。

国民每天都会看到新的实例，证明这位大臣已经享有无法节制的权威。白金汉公爵出任英格兰卫成长，家世和财富都位居王国贵族之首，但他鲁莽地冒犯了红衣主教。沃尔西没有用多长时间，就让公爵有理由懊悔自己的轻率。白金汉似乎性情轻浮多变，行事不计后果。他迷恋占星术，宠信一位加尔默西会修士霍普金斯。霍普金斯鼓励公爵相信：他有朝一日可以登上英格兰王位。白金汉在母系方面是爱德华三世的幼子、格洛斯特公爵的后裔。公爵这方面的王室血统非常疏远，但他居然如此粗心大意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如果国王无嗣而卒，他就有资格继承王位。他甚至忍不住图谋危害国王的生命，私养武装人员，以待有利时机。最终，白金汉受到审判。为了主持这次严肃的审判，诺福克公爵受命出任王室事务长，他的儿子萨里伯爵娶了白金汉的女儿。陪审团包括一位公爵、一位侯爵、七位伯爵、十二位男爵。他们裁决白金汉有罪，不久后明正典刑。没有理由认为审判不公正，^①但白金汉的罪行似乎主要是轻率失检，而非蓄意作恶。因此，国民喜爱他，期望国王赦免他。但国民大失所望，便迁怒于红衣主教，一心想报复他。国王自己的王位继承权无可置疑，但他仍然猜忌任何宗室血亲。终亨利八世一朝，这一点非常显著，仅此就足以促使他坚定不移地反对白金汉。公爵从赫里福德伯爵博亨那里继承的卫成长职位自此撤销，再也没有在英格兰重现。

^① Herbert. Hall. Stowe, 513. Holingshed, p. 862.

第二十九章

亨利八世(三)

宗教事务杂谈——宗教改革的根源——马丁·路德——亨利接受信仰保护者头衔——宗教改革进展的原因——对法兰西开战——入侵法兰西——对苏格兰开战——召开国会——再次入侵法兰西——意大利战争——法兰西国王入侵意大利——帕维亚之役和弗朗西斯被俘——弗朗西斯获释——掠劫罗马——与法兰西联盟

宗教论争引起欧洲各邦的骚动,由来已久。这些论争产生了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宗教改革。不过,英格兰国王直到当时还没有卷入纠纷,本书也就没有必要记载宗教改革的产生和进展。现在,我们有必要解释这些神学争议,或者更重要的是:追溯这些历史的来龙去脉。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改革教会或教阶体系的需要已经极其迫切,甚至绝对必要。我们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最好深入研究:为什么所有文明都必须有教阶体系和公共宗教机构。我希望,此时的重要事件足以提供本书暂时离题的充分理由。

大多数技艺和职业的自然状况是:既能增进社会的利益,又能对某些个体有用或有益。既然如此,世俗当局

治理的通则就是：听任同业自治，以从业人员获利为激励。或许，只有新技术第一次引进时例外，比如手艺人发现顺应顾客需要就能获利，于是便尽可能改进技术、勤勉工作。除非受到不明智的干预，商品生产总是跟需求相称。

不过，还有另一些呼声认为：有些行业既有用又必须，却不能给个人带来利益或娱乐，主权者应该改变对相关从业人员的放任政策，应该以公共激励维持他们的存在，且一定要预防他们容易犯下的疏失，办法是：建立长期的等级制度和严格的依附关系，或是运用权宜之计，从而授予这些行业特殊的荣誉。财政、军队、舰队、法院的从业人员就是这种等级制度的实例。

初看起来，人们自然会认为教会属于第一类。神职人员的激励跟律师、医生一样，可以安全地信托给个人的慷慨捐助。这些捐助人信服他们的教义，从他们的精神指导和帮助中获得裨益或安慰。无疑，这种附加的激励会促进他们的勤勉和警醒。随着不断的练习、研究和关注，神职人员的职业技巧以及他们指导人心的辞令每天都会改进。

不过，如果我们的思路更加缜密，就会发现：所有明智的立法者都会致力于防范教士这种基于利益的勤勉。原因在于：除了真正的宗教以外，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极其有害。异教的自然倾向就是灌输迷信、愚妄、错觉的混合物，以便颠覆真正的宗教。每一位候补教士为了在追随者心目中树立更宝贵、更神圣的形象，将会极力激发信徒对其他门派产生最狂暴的痛恨，且不断追求新奇以刺激倦怠的听众。他们的谆谆教诲将不再考虑真理、道德和体面，一切准则都要最大限度地适应人类躯壳中变幻莫测的情绪。教士将以新的勤勉和巧辩来操控民众的激情与轻信，诱使信徒参加每一次秘密集会。最后，民政当局会发现：表面的节省，其代价很昂贵。确定的教会机构其实是最有益、最体面的建制。借此，他可以给这些精神导师支付固定薪水；贿赂他们，使其闲散懒惰；使他们没有必要过分积极，只要能防止羊群迷路、寻找新牧场就够了。通过这种方式，虽然一开始的教会机构只从宗教思想出发，最后却有利于社会的政治利益。

但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没有哪一个确定的教会机构建立在比罗马教会更糟的基础上，或是伴随着更有害于人类和平与幸福的环境。

教士享有巨大的岁入、特权、豁免权和权威，对世俗当局构成了可怕的威胁，辅以教阶制度的广泛权威。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从事侵蚀和篡夺，从来不需要任何貌似合理的借口。确实，教会中的高阶职位为绅士和贵族服务。但修道院机构使得许多出身卑贱的人不再从事有用的技艺，而藏身于愚昧和怠惰之所。罗马教会的最高首脑是外国统治者，他的利益总是与共同体截然不同，有时完全相反。为了保证信条、仪式、典礼的统一，教阶体系必不可少。一切思想自由都成了伤风败俗的证明，须斩草除根。到处盛行残暴的迫害，或是愚昧而卑劣的轻信，后者更加糟糕。

罗马教会的邪恶不限于此。教会虽然已经拥有巨额岁入，但仍然不知餍足，其保留了进一步利用人类愚昧的权力。教会甚至授权每个教士利用信徒的自愿捐献自肥，使他有勤于圣业的迫切动机。于是，教会的靡费和负担多有不便。完全依靠技巧和创收自养的教士团体自然如此。

罗马教阶制度有一点好处，可以弥补其不便——在野蛮时代，教会特权可以遏制国王的专制。整个西方教会团结在罗马教皇至高无上的统治下，使得各邦的交流更加便利，有利于将欧洲各部分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教会富于资财、礼拜壮丽堂皇，在某些方面鼓励了美术的发展，使高雅品位与宗教结合，得以普遍传播。

不难设想，虽然邪恶的平衡盛行于罗马教会，但引起宗教改革的原因并不在此。大变革的原因在于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同时发生。

利奥十世性情慷慨、雄心勃勃。他的金库损耗过甚，急需启用每一种筹款的发明，以支持他的事业、消遣和慷慨赏赐。他收到建议：向基督教世界销售赎罪券，让虔诚的人们乐于为罗马教廷的煊赫和富裕捐输。这种筹款的权宜之计以前就使用过。根据假定，教会圣人众多，圣德充裕，超过自己的救赎所

需,甚至可以借助基督本人无穷无尽的圣德。教皇可以利用这个取之不尽的宝库,零售圣德。这样获得的资金应该用于抗击异教徒、镇压分裂派的虔诚目的之上。但金钱落入圣库后,通常大部分用到了其他目的上。^①

人们普遍相信:利奥天赋洞察力,精通古代典籍,完全明白这些教条的荒谬和虚伪。他身为教皇,自身利益要求他弘扬这些教条。因此,没有多少疑问:他利用这些虔诚的骗局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的前任教皇们一贯在貌似可信的借口下,为自私的目的而利用大多数人的愚昧和轻信。他发行普通赎罪券,^②他的靡费不仅耗尽了常规岁入,而且预支了可望从这种权宜之计中获得的资金。因此,几种收益的征税权早已公开出让给特定的个人。尤其是萨克森和波罗的海沿岸各邦的收益分派给他的妹妹抹大拉,她嫁给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私生子茨博。抹大拉为了增加收益,把岁入承包给热那亚人阿克博尔蒂。阿克博尔蒂一度经商,现在担任主教,仍然保有原来的生意经。^③ 在萨克森推销赎罪券的任务既有利润又有绩效,通常交给奥古斯丁会修道士。但阿克博尔蒂担心:这种操作可能教会他们怎样中饱私囊,^④寻常的聚敛方法得不到超常的收益,于是把这个任务又交给了多明我会修道士。这些修道士为了证明他们配得上这种破格任用,以最夸张的颂词为赎罪券鼓吹。虽然以前的教条已经荒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但现在的吹嘘还要变本加厉。信徒们听到这些闻所未闻的说辞,大为骇异。^⑤ 据说,赎罪券推销者的生活极其放荡,把收

① Father Paul and Sleidan.

② In 1517.

③ Father Paul, Sleidan.

④ Father Paul, lib. 1.

⑤ 新教徒作者想象:一个人买了一张令赎罪券,就可以赦免各种各样、闻所未闻的罪行。罗马教会所作所为的结果是道德彻底解体、社会随之瓦解。他们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赎罪券发行后,世俗法庭的惩罚(还有地狱之火)、声名狼藉的耻辱、良心的隐秘谴责仍然存在,构成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西塞罗的哲学允许极乐世界,却排除了所有的地狱,比阿克博尔蒂或泰策尔的鼓吹更全面放纵;但没有人怀疑西塞罗有意提倡不道德行为。因此,销售赎罪券似乎并不比罗马或其他教会的任何其他欺诈行为更加有罪。宗教改革者完全取消了炼狱。事实上,教皇的赎罪券只是局部的放纵。取消炼狱则为所有罪行和过错提供了全面、免费、性质相似的放纵。灵魂一旦落入地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永远没有救赎的机会。受罚的灵魂得救,只有一个例子,就是维吉尔的特殊调解。参见帕斯卡的《外省人书简》(Provincial Letters)。赎罪券只能将买主从炼狱中救出。

到的钱花在酒店、赌场和更加声名狼藉的场所。虔诚的人从日常开销中省下这些钱,为的是免除罪孽。因此,丑闻变得更加可耻。^①

所有这些做法都会引起反感;但如果没有一个有资格从中获益的人,也不会产生什么重要后果。马丁·路德是奥古斯丁会修士、威丁堡大学教授,怨恨他的团体受到侮辱,便开始鼓吹反对销售赎罪券的滥权行径。路德天性急躁,被反对者激怒后,甚至进一步责难赎罪券本身。由此,他在论争的激动中,开始质疑教皇的权威。他的论敌反驳他,主要就以教皇的权威为词。^②他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阅读了更多的材料,发现了罗马教会滥权和谬误的更多记录。他发现人们贪婪地倾听这些论点,就通过著述、演讲、布道、讨论来传播他的理论。他的门徒每天都在增加。为时未久,这位大胆的革新者就将他的声音传遍了全萨克森、全德国、全欧洲。人们从长期的麻木昏沉中惊醒,开始质疑最为古老、最受公认的观点。萨克森选帝侯(即有权推送欧洲皇帝的王公贵族)赞成路德的教义,保护他免遭教皇的审判。苏黎世共和国根据新模式改革了自己的教会。帝国的许多君侯以及帝国议会本身都倾向于支持他的教义。路德天性顽强、激烈、固执己见。无论是提拔他的承诺还是严惩的威胁,都不能使他放弃自己奠基的教派。他因此获得了创立宗教改革大多数信条和教旨的荣誉,居于所有其他人之上。

这些变革的流言不久就传到英格兰。王国仍然有大批残存的罗拉德派信徒,他们的教义跟路德派非常相似。新教义在各等级的俗人和各教团的教士中秘密地赢得了许多信徒。但亨利受到严格遵奉罗马教会的教育,托马斯·阿奎那是国王最喜爱的作者。路德对阿奎那出语轻蔑,因此国王对他格外反感。亨利享有广泛而近乎绝对的王权,都用于反对路德教义的传播。他跟路德派作斗争,甚至使用了那个时代的君主,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少壮派君主很少使用

① Father Paul, lib. 1.

② Father Paul, Sleidan.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的手段。他写了一本拉丁文著作，驳斥路德的教义。如果考虑到题材和时代的因素，这部书没有辱没亨利的才华。他把副本送给利奥教皇，这种卓越的礼物充分体现了极大的尊重。教皇收到礼物，授予亨利“信仰保护者”的头衔。英格兰国王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头衔。路德正处在论战的狂热中，不顾反对者的尊贵身份，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他，论辩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长期以来，路德一向习惯于这样的论辩风格。国王受到这样恶劣的对待，对新教义更加没有好感，但公众自然青睐比较弱小的一方，倾向于将论战的胜利归诸路德。^① 由于亨利加入论战，宗教改革的知名度大大增加了，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路德的教义每天都在欧洲各地赢得新的皈依者。

这个大胆的教派迅速取得惊人的进展，可能部分归功于新近发明的印刷术和文艺复兴。这些因素使人们睁开了眼睛，认识到罗马教廷的欺诈。在那以后很久，文学和哲学的所有分支仍然没能明显地超越当时的成就。欧洲到处笼罩在迷信的阴影下，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人们不可能从谬论的重负中解放出来。更不用说，路德派教义的成功并不依靠说理和反思。事实证明，他们的迅速进展和暴力手段已经足够有效。印刷术和文艺复兴还以另一种方式有利于路德派的进展。路德及其门徒的著作充满激情、雄辩和粗率的修辞，可以依靠这种新技术更加迅速、更加大量地传播。许多世纪以来的沉睡多多少少削弱了人们的心智。他们乐于接受所有的新奇事物，更不惮于涉足面前并不寻常的道路。《圣经》和大批古代基督教典籍付印后广泛流传，人们领会了公元一世纪以后引入的创新。虽然论据和推理不足以确定结论，但有根有据的历史事实就足以给他们的理解力留下深刻印象。确实，罗马教廷有许多权力号称古已有之，先于大多数欧洲政府的建立。但神职人员不可能将他们的特权视为民事权利，依靠源远流长而巩固，而是继续诉诸神圣的起源。人们受到诱

^① Father Paul, lib. 1.

惑，开始探究教会的原始授权书。他们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发现：这些授权书根本谈不上真实可靠。

路德及其追随者为了赋予这个问题更大的影响，并不满足于反对罗马教会虚构的神性、揭露教会机构给世俗社会造成的不便。他们走得更远，认为祖辈的宗教可憎可恶，应该诅咒；认为宗教经典早已预言过：这种宗教是一切邪恶和污染的根源。他们指罗马教皇为基督的敌人，称罗马教会为淫妇，呼罗马城为巴比伦。无论如何，《圣经》里就有这些称谓，比大多数有根有据的论点更能打动群众。许多改革者一方面受到论战和迫害的刺激，另一方面受到成功和欢呼的鼓励，将反对罗马教会的举措推向极端。罗马教会是众多迷信的载体，他们为了反对这两者，陷于狂热的虔诚，拒绝接受任何仪式、典礼或教仪，将一切美德寄托于神秘信仰、内在洞察力、狂喜与出神。新教派突然产生了这种精神，不知疲倦地传播着他们的教义，蔑视罗马教会企图用来压倒他们的破门和诅咒。

无论如何，世俗当局可以保护路德派免遭教会法庭的迫害。在某些方面，路德派的教义有利于加强世俗君主的权威。时人普遍不满罗马教廷滥用职权，改革者对此激烈抨击。改革者劝诫各位君侯收回原有的权力。长期以来，这些权力受到教会，尤其是教宗的逐步侵蚀，已经不在世俗君主之手。改革者谴责独身和隐修誓言，修道院的门户由此打开。有些修士厌倦了顺从和贞洁，或是不满他们迄今仰仗的特许状，可以就此离开。改革者谴责教士过分豪富、懒惰、放荡，指其财富和岁入为第一个闯入者的合法战利品。迄今为止，神职人员面对的听众若非心甘情愿，就是麻木愚蠢。因此，这些教士完全不熟悉论战，更不用说各种真正文学。罗马教会的对手运用权威、引文和流行的话题，赢得了所有的争执和论战，罗马教士完全没有应对之力。改革者占了上风，开始攻击罗马教阶制度；他们取得迅速而惊人的成功，原因在此。

利奥十世疏懒、怠惰、昧于民情，致使路德派兴起；但他有良好的判断力、

刚柔相济和性情温和，足以阻止新教派蔓延。利奥收到亨利国王驳斥路德派的著作后不久，英年早逝。弗拉芒人阿德里安继任教皇，他曾是查理皇帝的导师。阿德里安教皇为人异常正直、坦白、淳朴，适于以其品性争取改革者。然而，改革者敌视罗马教会的态度极其决绝。阿德里安发挥这些品格缺乏谨慎，反而损害了罗马教会的事业。他坦白承认：罗马教廷内部盛行许多可憎可恶的做法。这样坦诚的公开声明给路德派提供了很多可乘之机。教宗徒有美意，颇乏洞察力，受人诱导加入亨利和查理反对法兰西的联盟。^① 以前的历任教皇一再为了政治目的运用精神武器，由此损害了教会的声誉。阿德里安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雪上加霜。

皇帝知道：阿德里安当选教皇，沃尔西大失所望。他担心傲慢的大臣因此反目为仇，热心谋求修复他们的友谊。他再度拜访英格兰，不仅逢迎国王和红衣主教的虚荣心，还重申了所有的承诺，保证下一次支持沃尔西登上法座。沃尔西知道阿德里安年高体弱，随时可能出缺。他掩饰憎怒，寄希望于下次教皇选举万事大吉。皇帝更新了布鲁日条约，增加了几项条款。他同意赔偿亨利和沃尔西因背弃法兰西和约而损失的岁入。查理还想迎合英国国民，委任英格兰海军上将萨里为自己国土的海军上将；查理自己在伦敦接受嘉德勋位。皇帝在英格兰逗留六星期后，在南安普敦登船，十天内返回西班牙。查理离境期间，国内发生骚乱，但他很快予以平定。^②

国王向法兰西宣战。这一举措几乎找不出像样的争执理由，只有借口弗朗西斯拒绝他的仲裁、送奥尔巴尼公爵回苏格兰。法兰西国王一直到确信亨利决心攻击他，才采取这一最后步骤。萨里率军在诺曼底的瑟堡登陆，蹂躏乡野后，上船驶向富裕的布列塔尼市镇莫尔莱。他攻陷莫尔莱，大肆掠劫。英国商人在莫尔莱拥有大量财产，跟法国人的财产一样惨遭士卒掳掠。

^① Guicciardini, lib. 14.

^② Petrus de Angleria, epist. 765.

随后，萨里将海军舰队交给副将指挥；他自己驶向加莱，在那里就任入侵法兰西的英军统帅。这支军队与德·巴伦伯爵统率的低地军队会师，总数达一万八千人。

自查理五世一朝，法国人对英作战几乎全部遵循一条准则：除非万不得已，绝不行险浪战。旺多姆公爵眼下统率法军，也遵循着这一明智的政策。他为处境最危险的市镇构筑坚固的要塞，准备充裕的供给。布洛涅、蒙特勒伊、特鲁安、赫定尤其如此。他自己率领一些法国和瑞士步兵团、一支骑兵队，坐镇阿布维尔。吉斯公爵率领六千人马，在蒙特勒伊城下扎营。两支部队互为犄角，占据有利地势，可以随时向受到威胁的市镇补充给养。英军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他们的骚扰。萨里弹药不足，首先分兵，以便补给；但他发现英军宿营地不断受到法军打击，便重新集结军队围攻赫定。但他的围城没有成功。要塞法军猛烈突袭英军，外围法军夹攻，暴雨降临。士卒劳累、天气恶劣，痢疾随之流行。萨里不得不解围，在十月底撤回冬营。英军后卫在阿图瓦的帕斯遇袭，五六百人阵亡。萨里未能占据法国境内任何地方。

英国的盟军在意大利更加成功。劳特雷克统率的法军在米兰附近的比克卡大战中败北，不得不率领余部撤退。灾祸原因在于弗朗西斯疏于向劳特雷克提供资金。^① 随后，热那亚失守。法国人在意大利只剩下克雷莫纳一座要塞。

在欧洲目前的形势下，各种联盟和利益纽带盘根错节。只要一处燃起战火，几乎肯定会蔓延到全欧洲。诸王国的联盟当中，法兰西与苏格兰的古老盟约最为紧密。英国只要对法开战，北境势必烽烟四起。奥尔巴尼公爵一到苏格兰，立刻发动对英战争。他在罗斯林原野召集全国军队，从这里挥师南下，进军安楠岱尔，且准备越过索尔维-福斯边界。但许多贵族不满摄政当国，注

^① Guicciardini, lib. 14.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意到他跟苏格兰的纽带极其薄弱，无法跟法兰西相比。他们窃窃私语：为了外国利益，时刻扰乱和平；国君尚在冲龄，就大肆侵凌更强更富的邻邦。戈登尤其不满，拒绝进一步前进。奥尔巴尼公爵注意到普遍的不满，只得跟英国西部边境巡抚达克斯勋爵签订休战协定。不久后，摄政前往法兰西。他为了防范敌对党派在他离境时聚集力量，事先就将太后的丈夫昂古斯伯爵送到那里去。

第二年，亨利抓住摄政不在国内的机会，派萨里率军进犯苏格兰，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蹂躏梅斯和特维奥特戴尔，焚烧杰德堡市镇。苏格兰既没有国王，也没有摄政，群龙无首。休谟兄弟已经伏诛，昂古斯伯爵流放海外，国内没有强大或活跃的贵族足以主持政务。英国君主了解苏格兰局势岌岌可危，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希望利用苏格兰目前的软弱地位，迫使他们放弃跟法兰西结盟，转而跟英格兰亲善。^① 亨利甚至让苏格兰人抱有希望：英格兰女继承人玛丽可能会嫁给苏格兰幼主。这样一来，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王国就会永远联合在一起。^② 另外，太后及其全部党羽到处鼓吹跟英格兰联姻结盟的益处。他们说：苏格兰为法兰西的利益牺牲自己，为时已经太久。法国人只要一有困难就会立刻要求盟友协助，但他们只要一发现跟英格兰议和有利可图，就会抛弃苏格兰。小邦跟大国结成紧密联盟，双方力量悬殊，结果只能是这样；而且，王国目前所处的特殊环境使之无法避免。法兰西距离遥远、大海相隔，无论如何，也很难及时援助苏格兰，保护他们免遭邻邦的蹂躏。在某种意义上，大自然在不列颠岛的两个邦国之间建立了纽带，将他们置于同一个岛内，赋予他们同样的风俗、语言、法律和政体，这是为两国的紧密联盟做好了一切准备。只要彻底抛弃民族之间的恶感，两个王国很快就会享受和平之福——两国在大海和国内武力的保护下，可以蔑视一切外敌的威胁、永保安全。

^① Buchanan, lib. 14. Herbert.

^② Le Grand, vol. iii. p. 39.

无忧。

另一方面，亲法派说：英格兰是苏格兰的邻邦，力量远远超过苏格兰。这些支持英苏联盟的理由恰好证明两个敌对的邦国永远不可能形成真诚而持久的联盟。邻邦经常会发生争执，强者肯定会抓住每一个细微的借口欺凌弱者，压迫后者臣服。英格兰和法兰西正因为邻近，才点燃了几乎永无止境的战争。苏格兰人若欲保存独立，就应该坚持跟法兰西结盟，制衡英格兰的势力。法兰西是苏格兰有益的老盟友，苏格兰能见重于欧洲主要就依靠这个联盟。如果苏格兰人抛弃这个联盟，他们的夙敌在利益与激情的刺激下，不久就会以优势力量入侵，夺走他们的一切自由。或者，如果他们推迟进攻，但这种阴险的和平将会使苏格兰人丧失武风，只会为更确定、更无法挽回的受奴役做好准备。^①

亲法派的论据获得了国民自然而偏见的支持，似乎占了上风。摄政因为英军舰队拦截的危险，迟迟没有按期回国。最后，他本人终于出现在国民当中，决定了亲法派的胜利。他奉国会的权威，征集了一支军队，准备报复英军在战争初期的蹂躏。他率军南下，向边境进发。但他们经过特威德河上的梅尔罗斯桥时，英军从对岸截击，奥尔巴尼觉得最好是撤退。他一直沿着特威德河左岸向下游进军，在萨里最近修复的维克城堡对面扎营。他派出一些军队围攻城堡，打开了一个缺口，破坏了一些外围工事。但摄政得知英军正在逼近，由于季节已晚而气馁，觉得最好解散军队返回爱丁堡。不久后，他返回法兰西，再也没有回到苏格兰。苏格兰国内党争激烈，几年内无力再给英格兰制造麻烦。因此，亨利可以完全腾出手来，执行他的大陆计划。

英格兰对法战争进展缓慢，原因在于资金不足。亨利七世的所有财富很久以前就已经散尽，国王靡费的习惯仍然如故。他的岁入不足以维持政府的

① Buchanan, lib. 14.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日常运作，遑论用兵。他去年普查了王国的人口、年龄、职业、门第、岁入，结果^①发现邦国如此富庶，非常满意。随后，他向大多数有钱人下诏，要求巨额贷款。如此行使权力，多多少少属于违法和暴政，但以前的英格兰列王施行过，而国民现在已经习惯。但亨利今年更加过分地行使权力——他颁布法令，向臣民普遍征税，他仍然称之为借贷。他向教士每镑征收五先令，向俗人每镑征收两先令。这种假借贷貌似更规范，其实对国民的自由权利更危险，构成国王不经国会同意就征税的先例。

亨利不久后就召集国会和教士会议，发现二者都无意抱怨他们的特权受到侵犯。他们唯一的态度是：应该对国王慷慨到什么程度。沃尔西负责安排一切事务，在教士会议开幕时希望他们以身作则、鼓励国会慷慨捐输。他要求教会五年岁入的一半，或当时的一镑征收两先令。他面对反对意见，不过在严词谴责倔强的代表后最终如愿以偿。随后，红衣主教带领几位贵族和教会长老莅临下议院，向议员们发表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长篇讲演，论证公共事务的需要、苏格兰入侵的危险、法兰西的挑衅、国王与教皇和皇帝结成的联盟。他要求八十万镑拨款，分四年支付。这个数目是根据上次普查制定的，相当于一年岁入每镑征收四先令，或四年期间每镑征收一先令。^② 下议院批准如此巨额的拨款极不寻常。虽然发言人(speaker)托马斯·莫尔爵士支持红衣主教的要求，另有几名议员附和宫廷；但下议院不可能接受游说，批准拨款。^③ 他们仅仅投票通过：所有岁入二十镑或二十镑以上的人，每磅征收两先令；所有岁入二十镑到四十先令的人，每磅征收一先令；其他十六岁以上臣民，每人征收四便士。最后一个税额分两年支付；前面的税额分四年支付。因此，最高的税额也不超过一镑六便士。下议院的拨款只相当于王室要求的半数，红衣主教因此

① Herbert. Stowe, p. 514.

② 这个估计值很容易遭到怀疑，因为确定的税率过高。除非这个数目包含所有类别的岁入：工业、土地和货币。

③ Herbert, Stowe, 518. Parliamentary History. Strype, vol. i. p. 49.

恼羞成怒。他回到议院，责问议员为何拒绝满足国王的要求。他得到的答复是：循例，下议院只在内部讨论，从不对外人说明理由。因此，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不过，下议院还是稍微增加了原先的拨款。他们投票通过：岁入五十镑或五十镑以上的人，每磅征收三先令。^① 这一次下议院会议显然体现了时代精神。他们非常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钱，拒绝王室不合理的要求。虽然国王未经审议而征敛，其直接倾向就是完全颠覆国民自由，但他们听任国民特权受到侵蚀。国王对下议院精打细算的拨款极其不满，虽然以前七年没有召集国会，他还是直到七年之后才召集了下一届国会。亨利借口急需，便在一年之内向岁入超过四十镑的人征收了国会批准分四年缴纳的税款。^② 这种行径再次侵犯了国民的特权。人们普遍将这些违法举措归咎于红衣主教的教唆。沃尔西依仗神职人员身份为护符，更加肆无忌惮地侵蚀英格兰国民的公民权利。

今年，野心勃勃的教会长老在飞黄腾达的期望上又一次受到挫折。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去世；美第奇家族的克莱蒙特七世在皇帝党的支持下，当选为继任教皇。沃尔西现在发觉了皇帝的欺诈，断定查理绝不会支持他谋取教皇法座。他痛恨查理背信弃义，从此疏远了帝国宫廷，为君上与法兰西国王结盟做准备。在此期间，他不动声色、隐藏仇恨；祝贺新教皇荣登法座后，要求继续两位前任教皇授予他的教皇特使的职位。克莱蒙特知道赢得沃尔西友谊的重要性，便任命他为终生教皇特使。教皇授予他这种不寻常的特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将罗马教廷在英格兰的所有权威都委托给他。沃尔西在某些方面充分运用了这一大权。他建立了两座学院，一座在牛津，另一座在他的老家伊普斯维

① 据说，亨利获悉下议院不乐意批准要求的补助，怒不可遏，召唤爱德华·蒙塔古。蒙塔古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议员。他觐见国王，屈辱地听到这些话：“嘿！伙计！他们不肯为我付账吗？”那时，蒙塔古跪在国王面前，国王将手放在他头上。“让他们明天通过我的账单，否则明天就砍你的头。”这就是亨利继承的骑士风度。第二天，议案通过了。Collins's British Peerage. Grove's life of Wolsey.

我们从 Hall, fol. 38. 得知：沃尔西红衣主教极力恐吓伦敦市民提供巨额贷款，确切时间是在 1525 年。他告诉市民：宁可受穷，也不要让国王匮乏。因此，这一次既没有警觉和抵抗，也没有愤怒，因为有些人可能因此人头落地。国王及其大臣就是用这种方式筹款的。

② Speed. Hall. Herbert.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奇。他征求全欧洲的饱学之士,在这两座学院任教。沃尔西为了给他的学院谋取捐赠,压制一些小修道院,把修道士分散到其他修道院。他推行这个计划没有多少困难,因为罗马教会开始意识到:教会中有太多的修道士。为了应对改革者追根问底、好辩好争的性情,他需要供养一批学者。

战事开始时,反对法兰西的联盟似乎比以往更强大。^① 阿德里安去世前,重新更新了教皇与亨利和查理的盟约。威尼斯人受到诱惑,抛弃了他们跟法兰西的联盟,转而跟弗朗西斯·斯福查结盟。弗朗西斯·斯福查是马克西米利安的兄弟,占据了米兰。佛罗伦萨人、费拉拉公爵、曼图亚公爵和意大利的所有列强都采取了同样的举措。皇帝威胁御驾亲征,从吉耶纳一侧入侵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兴师威胁皮卡迪。德国大军人数众多,准备入侵勃艮第。不过,所有这些外患远不如萧墙之祸可危。法兰西国内的阴谋现在已经酝酿成熟,威胁到法兰西国王本人。

法兰西卫成长、波旁公爵查理天赋卓绝,非但精通军事诸艺,重臣勋贵应有的种种功业靡不昭昭在人耳目。公爵少年英俊,更为天赋、勋业生色不少。弗朗西斯国王的母亲、萨伏伊的路易斯为之倾倒,不顾两人年龄悬殊,向查理求婚。公爵拒绝后,她坚持不懈地策划报复。路易斯为人虚伪、狡诈、歹毒、报复心重。然而,对法兰西而言,不幸的是:她颇有才干,能全面支配儿子。弗朗西斯国王在母亲的煽惑下,多次轻侮卫成长。以公爵的英雄气概,实难忍辱负重。最后,国王允许路易斯控告查理。公爵因为微不足道的理由丧失了丰厚的产业,面临不可避免的毁灭。

这些侮辱激怒了波旁公爵,他认为这些伤害足以构成背叛君主和国家的正当理由,于是跟皇帝和英格兰国王秘密结盟。^② 弗朗西斯执著于收复米兰的目标,有意亲征意大利。波旁公爵托病不起,以便有借口留在后面;计划一俟国

^① Guicciardini, lib. 14.

^② Memoires du Bellay, liv. 2.

王越过阿尔卑斯山，就率领众多极其爱戴他的家臣叛乱，引外敌进入王国的心脏地带。弗朗西斯国王发现了他的计划，但行动不够迅速，未能控制如此危险的敌人。卫成长逃之夭夭，^①投奔皇帝，以其雄心壮志和卓绝天赋向祖国开战。

英格兰国王希望弗朗西斯远征意大利，不想在这一年公开威胁入侵皮卡迪；可惜为时已晚，萨福克公爵率领的英军已经渡海抵达加莱。蒙塔卡特勋爵、赫伯特、费瑞尔、莫奈、桑戴、贝克莱、鲍尔斯和许多其他贵族绅士随军出征。^② 英军补充了加莱要塞的增援部队，为数达一万二千人。德·巴伦伯爵率领人数相当的弗拉芒军队与他们会师。联军准备入侵法兰西。他们首先围攻布洛涅，但久攻不克，觉得最好把坚城留在后面。皮卡迪边境兵微将寡；法军唯一的防御是积极骚扰前进的联军，并且极其迅速地给联军威胁下的所有市镇派驻卫戍部队。英国和弗拉芒联军沿着索姆河挺进，经过赫定、蒙特勒伊、多伦，陈兵布雷城前。为数不多的布雷驻军控制了索姆河桥。联军决定由此渡河，如果可能一举拿下法军冬营。但克雷柯已经亲自入城，似乎决意死守。联军猛攻得手，甚至不容法军从容撤退，而是在桥上冲击法军队伍使之完全崩溃。他们随即进军蒙特蒂德尔，市镇在围攻后投降。联军渡过瓦兹河，没有受到阻截，距离巴黎只有十一里格（league）。巴黎大为震骇，直到旺多姆公爵迅速率军来援才缓解。联军担心被围，加以季候已晚、兵员折损甚重，认为最好是撤退。他们放弃了蒙特蒂德尔。英国人和弗拉芒人没有取得任何收获，各自回国。

法兰西应对其他几路入侵，同样轻易、同样幸运。福斯坦堡伯爵率领一万二千雇佣兵入侵勃艮第。吉斯公爵守边，除了民兵和大约九百名重骑兵，没有任何武装力量。他命令民兵进驻设防市镇，亲率骑兵野战。德军疲惫厌战，乐于撤回洛林。他们渡过默兹河时，吉斯公爵发动进攻。德军阵形大乱，后卫损失惨重。

① Belcarius, lib. 17.

② Herbert.

皇帝在纳瓦拉边境厉兵秣马，虽然天险难逾，但现在强大的敌军似乎可以犯境。查理围攻几年前落入弗朗西斯手中的封塔拉比亚。他将劳特累克率领的法军吸引到城下，然后突然解围，直取巴荣纳。劳特累克明白他的战略，急行军进驻巴荣纳，积极勇敢地抵抗。西班牙人不得不解围撤退。皇帝如果没有回军封塔拉比亚，就会在这条战线上满盘皆输。他不顾所有将领返回冬营的建议，屯兵于深沟高垒的封塔拉比亚市镇前。若非总督的怯懦与失职，他很可能再度蒙受无功而返的耻辱。这座市镇几天内就投降了。皇帝大功告成，收兵返回冬营。

弗朗西斯执著于远征意大利，不顾王国四境受敌，决心亲率强大的军队征服米兰。波旁密谋败露，逃亡国外，国王因此在里昂暂停。弗朗西斯担心公爵有权有势、深得人心，王国可能因他的阴谋而发生内乱，决定自己留在法国，以防万一，派大将博尼维特率军挺进。米兰公国有意保持某种不设防状态，诱使弗朗西斯进攻，以便促成波旁举事。博尼维特一渡过特芬河，联军就陷于极度恐慌之中，甚至审慎的联军统帅普雷斯佩·科隆纳也是如此。一般人都同意：如果博尼维特立刻直取全公国所倚重的大城市米兰，米兰肯定会不战而降。但他在琐事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使得科隆纳有机会加强城防，准备应战。博尼维特现在只能以封锁和饥荒来迫使米兰投降。他占领了米兰所有道路的要冲，但联军在此期间并没有无所作为。他们封锁、骚扰法军营地，似乎围攻部队比米兰城市更有可能饿死。法军苦于疾病、疲惫、匮乏，几乎准备解围撤退。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法王麾下的瑞士大军来援，天天期待他们。但这些山民刚刚进入法军大营视线内，任性和愤怒就突然发作——不但没有增援博尼维特，反而下令那时在法军大营中的瑞士同乡立刻起程，一起回家。^① 博尼维特被瑞士人抛弃后，别无选择，只有尽快撤回法国。

^① Guicciardini, lib. 15. Memoires du Bellai, liv. 2.

就这样,法国人被逐出意大利。教皇、威尼斯、佛罗伦萨满足于现有的利益,决定见好就收。所有列强,尤其是克莱蒙特教皇,都强烈地猜忌查理皇帝的野心。他们看到:皇帝早已承认弗朗西斯·斯福查的爵位,保卫他的领地;现在却拒绝将帝国采邑米兰封授给他,如今这种怀疑就更为增加了。^① 他们都断定:查理决定自己占据这个重要的公国,把意大利降为臣属。克莱蒙特教皇在猜忌的驱使下,敌视皇帝尤甚,以至于派遣教廷大使前往伦敦,为英格兰和法兰西调解。但改弦易辙的条件尚未充分成熟。沃尔西对皇帝反感,但仍然迷恋虚荣,决定将促成大变革的盛名保留给自己。他促使国王拒绝教皇的调解。亨利和查理甚至签订了入侵法兰西的新条约。查理有义务给波旁公爵提供一支强大的军队,准备入侵普罗旺斯和达菲内。亨利同意第一个月付给他十万克朗,以后可以自由选择:或者每月支付同样的费用,或者以一支强大的军队入侵皮卡迪。波旁承认亨利为法兰西国王,自己以国王封臣的身份占据这些省份。勃艮第公国归查理,王国其余部分归亨利。

这份荒诞不经的瓜分条约当时就无法执行,原因在于波旁拒绝承认亨利为法兰西国王。不过,入侵普罗旺斯还是发生了。波旁公爵和佩斯卡拉侯爵率领人数众多的帝国大军入侵该地。他们围攻几乎没有设防的马赛,希望很快就会攻陷。但马赛市民英勇顽强地抵抗。波旁和佩斯卡拉获悉法兰西国王率领人数众多的军队来援,发现只能解围撤退。他们率领削弱、惶惑、沮丧的军队,进驻意大利。

弗朗西斯现在击退了迄今所有入侵王国的敌人,本可以从容享受荣誉。但他获悉:英格兰国王由于以前的入侵徒劳无功、对皇帝不满,不再准备入侵皮卡迪。他征服米兰的原有雄心又开始燃烧。虽然季候已晚,但他不顾最明智顾问的忠告,立刻决定进军意大利。

① Guicciardini, lib. 15.

他在塞尼峰越过阿尔卑斯山，一进入皮埃蒙特，米兰全境就陷于慌乱。皇帝和斯福查的军队撤退到洛迪。弗朗西斯幸运地乘胜追击，他们放弃了洛迪，全军溃散。^①但他不幸地决定围攻帕维亚。这座市镇有相当强大的驻军和完善的防御工事，由最勇敢的西班牙军官之一西雷瓦镇守。法兰西国王为了夺取这一要地，屡次进攻，但都毫无结果。他猛烈攻击城墙，打开了几处缺口。但西雷瓦保持警觉，立刻在缺口后面紧缩防御。国王试图让市镇的侧翼屏障特辛河改道，但一夜洪水毁坏了所有的堤坝。士兵用很长时间，以无穷的辛劳才筑成这些堤坝。此时季候恶劣（已是晚冬），法军疲惫不堪。在此期间，帝国将领并没有无所作为。佩斯卡拉和那不勒斯副王拉努瓦从各地集结军队。波旁典押珠宝，前往德国；以一己之力，征集了一万二千雇佣兵，与帝国军队会合。这支大军赶来解帕维亚之围，法军每天都面临着更紧急的危险。

当时，除了意大利和低地国家，欧洲各地缺乏工商业，各大君主国的国民仍然享有广泛的特权。由于这两个原因，各国君主的岁入微薄，以节俭为准则，甚至手中的军队也不能按时发饷。波旁、佩斯卡拉和拉努瓦统率的帝国军队不超过两万人，他们是皇帝仅有的军队（因为他无力征集军队，从佛兰德或西班牙边境入侵法兰西）。这位雄主如此窘困，付不起这支军队的饷金。他们保持阵形、继续前进的原因是希望分享法军大营的战利品。如果弗朗西斯在他们抵达以前解围，退回米兰，那么这支军队势必立刻解体，他可以兵不血刃，安享全胜。但这位君主性格顽强，跟他遭遇的困难旗鼓相当。他曾经说过：要么拿下帕维亚，要么死在城前。他宁可忍受极大的困难，也不愿意改变这个决定。

帝国将领首先炮轰法军大营数日，最后发起总攻，攻破堑壕。西雷瓦从城内发动突击，更增加了围攻部队的混乱。瑞士步兵团一反常态，卑怯地抛弃了

^① Guicciardini, lib. 15. Du Bellay, lib. 2.

他们的岗位。弗朗西斯的军队溃散；他本人被敌人包围，以英雄气概勇敢地战斗，亲手格杀七人，最后被俘。全军大部分贵族和英勇的军官要么殒命锋镝，要么溺毙洪流。侥幸逃生的极少数人落入敌人手中。

彭纳洛萨获得被俘国王颁发的安全通行证，穿过法国，向皇帝报信。查理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了温和与节制（如果出于至诚，会为他赢得荣誉）。他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同情弗朗西斯的噩运，对最伟大君主遭遇的不幸感同身受。^① 查理不允许马德里市镇举行任何公共凯旋仪式，宣称他把一切狂欢保留到战胜异教徒的时候。他命令前线驻军不要对法兰西采取敌对行动。他主张立刻以合理条件达成和平协议。但所有这些表面的温和只是伪装，因为隐蔽而更加危险。他已经设计好通盘计划——如何从这件大事中谋取最大利益，满足主导他以往一切所作所为的过度野心。

彭纳洛萨途径法国，也把弗朗西斯的信带给他母亲。后者留任监国，当时驻跸里昂。信中只有一段话：“夫人，一切都完了，除了荣誉。”监国得知大祸，震惊不已。她看到王国没有君主、没有军队、没有将领、没有资金，受到不可调和的得胜之敌的四面包围。在当前的困境中，她主要寄希望于英格兰国王的和议，甚至援助。

如果亨利加入对法战争，则须有任何通盘政治考虑。显然帕维亚胜利、弗朗西斯被俘是他从天而降的幸运。只有这样，他的计划才能实现。以前，战争有气无力地进行着，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亨利占领任何边境市镇或者寸土，都不能不付出超过其本身价值的代价才能守住。现在法兰西遭遇大祸，全军覆没，他可望获得某些重要省份，甚至肢解掉伟大的君主国。这个大国极其热爱自己的政府和君主。不过，亨利大概迄今从未考虑得这么远。这件大事使他震惊不已，他意识到：由于查理不再有势均力敌的对手，他自己乃至全欧

① Vera, Hist. de Carl. V.

洲都岌岌可危。因此,他非但没有利用弗朗西斯的困境谋利,反而决定在这场大祸中支持他。扶助落难敌手的豪侠气概跟他的政治利益正好吻合,因此他毫无困难地决定采取新政策。

查理和亨利以前颇有不和,查理和沃尔西现在仍然不和。权臣只等机会合适,就会报复他所遭遇的失望。查理在帕维亚胜利以后的所作所为立刻给他提供了机会,重新唤起国王的猜忌与怀疑。查理一开始假装温和节制,但演技欠佳,他就此改变了给亨利写信的一贯风格。以前,他亲笔写信,署名“你挚爱的孩子和表亲”。现在,他自己口授,秘书代笔,署名仅仅是“查理”。^① 沃尔西也感受到:皇帝以前给他的来信充满了逢迎和表白,现在大打折扣。查理因胜利而得意忘形,做出了最后这一项轻率举动,却给他的利益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亨利虽然当即决定采取新政策,仍然小心谨慎地掩饰着。他到处庆祝帕维亚大捷和弗朗西斯被俘。以前虽然战争爆发,法国大使仍然获准驻跸伦敦;现在他公开予以驱逐。^② 但法兰西监国软语相求,亨利再度跟她交流。国王不仅保证提供友谊和保护,还承诺绝不会逼迫她为赎回儿子而割让任何省份。不过,他在皇帝面前装出积极进取的样子。他为了寻找决裂的借口,派伦敦主教汤斯塔尔赴马德里,提议大举入侵法兰西。他要求查理立刻率领大军入侵吉耶纳,把该省交给他。他要求皇帝偿还上次访问伦敦时借贷的巨款。他知道皇帝无力满足任何一个条件,也丝毫不希望英国在西班牙边境占据要地。

汤斯塔尔抵达马德里后,也向君上报告查理对英格兰的若干怨言。亨利去年既没有依约继续每月资助波旁,又没有入侵皮卡迪,皇帝对此最为不满。汤斯塔尔还补充说:皇帝无意迎娶即将成年的玛丽公主,却有意跟他的侄女、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议婚。查理跟弗朗西斯单独谈判,似乎准备独享胜利

① Guicciardini, lib. 16.

② Du Bellay, liv. iii. Stowe, p. 221. Baker, p. 273.

果实。

国王受到所有这些动机的影响，在摩尔作出决定：跟法兰西监国结盟，约定以合理条件赎回她儿子。^① 监国在另一项条约中承诺付给亨利国王一百八十万克朗，每隔半年支付五万。此后，亨利可以终身享有十万年金。这时，沃尔西以斡旋之功也获得十万礼金，但表面上是用以补偿他放弃陶奈年金的损失。

在此期间，亨利预见英法联盟会使他卷入跟皇帝的战争，也决定向臣民征敛。国会对他的索求犹豫不决。据信，他接受沃尔西的建议，自行征敛。他诏谕全英格兰诸郡：教士每镑征四先令，俗人每镑征三先令四便士。亨利这一次武断征敛，毫无节制地滥用了威权，甚至没有像以前那样勉强伪装成借贷。不过，他很快发现臣民并不像他设想的那样顺从。国民不满征敛超过当时的常规水准，更反感不合法的征敛方式，物议鼎沸，怨声载道，集矢于征税特派员。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情可能引发一场叛乱。亨利悬崖勒马，没有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亨利致信全国各郡：宣称无意强征新税，所求于臣民的不外乎捐助。他一厢情愿地以为：国民会满足于他屈尊下顾的伪装；没有人敢于拒绝这种方式的索求，因而冒犯王室尊严。然而，敌对情绪一旦唤起，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消弭。一位市镇律师引用理查德三世永远废除捐助的法案予以质询，宫廷的答复是：理查德是篡位者，他的国会是党派会议，他的法案不能约束合法和绝对的君主。后者根据继承权即位，无须讨好放肆的民众。^② 法官们甚至如此明确断言：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地征敛任何数目的税。枢密院心甘情愿地支持这个判决，它废除了国民最宝贵的特权，使所有其他特权岌岌可危。沃尔西凭借王室特权和法律托词的强大权威，传唤伦敦市长，问他愿不愿意满足国王陛下的需要。市长似乎打算首先咨询市议会再作决定，但红衣主教要求：

① Du Tillet, Recueil des Traites de Leonard, tom. 2. Herbert.

② Herbert. Hall.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市长和各位市议员应该分别跟他协商捐助事宜。他以这种方式使得反对意见无法形成。不过，乡村事务没有这么顺利。有些地方开始暴动，但人民没有任何重要人物领导；萨福克公爵和萨里伯爵、现任诺福克公爵恩威并施，诱使暴动首领放下武器投降。国王虽然性情狂暴、专横，但发现惩罚如此深得人心的罪犯是危险之举，便决定大赦他们。亨利审慎地断定：他们犯上作乱，不是因为缺乏忠诚和爱戴，而是因为贫穷。罪犯们被带到星室法庭面前，受到反对国王枢密院的严厉指控。然后，红衣主教说：“虽然他们罪大恶极，但国王陛下还是考虑到他们的境况，慷慨地施与恩赦。条件是他们找到保人，保证以后行为良好。”但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保人。红衣主教首先、诺福克公爵随后表示：他们愿意为被告们作保。这些人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被释放了。^①

人们虽然没有什么依据，但还是把这些武断征敛归咎于红衣主教的唆使，增加了他蒙受的普遍憎恶；却把赦免宽大归功于国王，认为这是他对不法举措的补偿。但沃尔西有王室和教皇权威的双重支持，继续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教会特权。那时，教会特权比市民特权更神圣。一旦他压制某些修道院得手，其余的修道院就噤若寒蝉，屈从于他的武断权力。沃尔西身为教皇特使，有权调查和改革修道院，惩罚其不法举措。他任用平常的代理人艾伦行使这方面的权威。宗教修道院不得不为他们真实和虚造的罪孽付出代价，以巨款贿赂红衣主教及其副手。他们的横征暴敛毫无节制，最后终于传到国王耳中。国王一般不会听取不利于宠臣的怨言，这次却破例了。沃尔西已经在汉普顿宫建起一座豪宅，原先可能打算把这座巨宅和威斯敏斯特的约克府邸一起留归己用；但他害怕府邸的富丽会增加人们的嫉妒，又希望安抚国王，就把这座巨宅献给国王，声称一开始就是为了御用而建。

国王对大臣和国民享有绝对权威，因而处理内政迅速而容易。只有对外

^① Herbert. Hall. Stowe, p. 525. Holingshed, p. 891.

事务需要费心费力。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一步：英格兰完全保持中立已经不再安全。因此，皇帝伪装温和节制，为时未晚。不久，全世界就发现：他的广袤领地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野心，只能算是扩张帝国疆域的一种手段。他向俘虏提出的条款势必摧毁法兰西强权，破坏欧洲均势。帕维亚战役不久后，扣留在皮兹彻通的弗朗西斯收到这些条款。直到那时，他多多少少地相信皇帝的慷慨，现在大失所望、义愤填膺。他说：宁可囚禁到死，也绝不会同意肢解他的王国。即使他卑鄙地接受了这样的条款，他的臣民也绝不会执行。

弗朗西斯得知亨利转而支持他，意大利列强因他兵败被俘而恐慌，精神大振，坚持制定更温和的条款。不过，他对皇帝远在天边感到不安，要求迁往马德里跟查理面谈（这个要求被接受了）。皇帝如果不受大臣影响，又有弗朗西斯那种高贵的坦诚性格，直接会谈就会对他有利。但他不久就发现自己判断错误了。部分由于缺乏运动，部分由于目前的悲惨处境，他大病一场，日益衰弱。查理担心俘虏一死，他打算从中谋取的种种利益都会化为乌有。于是他拜访马德里城堡，走近弗朗西斯的病床。生病的国王向他打招呼：“先生，你看望俘虏来了？”皇帝回答：“不，我来看望很快就会获得自由的兄弟和朋友。”查理用许多类似的话安慰着他的痛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国王天天好转，^①此后就亲自跟皇帝的大臣谈判和约条款。

最后，皇帝害怕各国结成反对他的大联盟，同意缓和苛刻的条款。他们签订了马德里条约，希望能最终结束各大君主国的分歧。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弗朗西斯获释，派最年长的两个儿子给皇帝作人质，作为割让勃艮第的担保。如果以后法兰西或勃艮第国会反对执行最后一条，弗朗西斯保证在六个星期内返回囚禁中，直到条约完全执行。这个著名的协定还有许多其他条款，都对被俘的国王极其严厉。查理的意图显而易见，就是削弱意大利和法兰西，使之臣服和依附帝国。

① Herbert, De Vera, Sandoval.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查理的许多大臣预见到：无论弗朗西斯多么信守被迫发出的誓言、承诺和声明，但绝不可能执行这样的条约。马德里条约对他自己、他的后裔和国家极其不利，甚至可以说具有毁灭性的后果——勃艮第割让给皇帝，强敌就此深入王国心腹之地；牺牲意大利盟友，法王就此丧失了外援；以富饶的法兰西全部军队和财富支援他的压迫者，皇帝就会获得无法抗拒的绝对优势。除了这些重大的利害关系，激情和愤怒的动机也同样强大。弗朗西斯天性慷慨，自尊心受到刺激，会回想起他被俘时受到的严厉对待，以及因恢复自由而被迫同意的苛刻条款。同样可以预见：两国君主长期竞争、敌对，他很难屈从于对手的优势。弗朗西斯落入这个敌人手中，不外乎是后者的幸运而已。而查理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显示自己多么配不上这种幸运。他的大臣、朋友、臣民、盟友都会众口一词地劝导他：人君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国民。对私人而言，荣誉的法则理应至高无上，先于一切利害关系；对人君而言，荣誉就要从属于保证国家安全的重大责任。不可想象，弗朗西斯的信念会如此浪漫，他听不进去这些论辩。虽然这些理由本身就很有说服力，能驱动君主和人们的一切激情去大力支持它们。

弗朗西斯进入本国境内时，派两个儿子去西班牙做人质。他登上一匹土耳其骏马，立刻策马飞奔。他挥挥手，几度高呼：“我又是国王了。”他很快抵达巴荣纳，受到监国和全体宫廷人员的欢迎。他立刻致信亨利；他将获释完全归功于亨利的斡旋，声明有关皇帝的事务唯亨利马首是瞻。西班牙大使要求他批准马德里条约。他既然已经恢复自由，便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借口必须首先召集法兰西和勃艮第国会，以征求他们的同意。勃艮第国会很快就召集起来，拒绝了约定割让本省的条款。他们表示不惜付诸武力，反对如此不公正和毁灭性的条款。皇帝的大臣随后就要求他返回马德里的囚禁所。弗朗西斯非但没有服从，还公布了他不久前在科涅克秘密签订的盟约，反对皇帝野心勃勃的谋划和篡夺。^①

① Guicciardini, lib. 17.

教皇、威尼斯和意大利各邦深深卷入了这些事件，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弗朗西斯重获自由后的决定。克莱蒙特教皇怀疑国王永远不会执行严重损害其利益，甚至摧毁其独立的条约，便直截了当地建议豁免他的一切誓言和约定。弗朗西斯毫不犹豫，立刻加入教皇提议的联盟。盟约包括国王、教皇、威尼斯、瑞士、佛罗伦萨和米兰公爵。他们在盟约的其他条款中规定：应该迫使皇帝接受一笔合理的款项，释放两位法兰西王子；应该将米兰归还给斯福查，且不能有任何附加条款或负担。他们邀请英格兰国王加入盟约，不是作为缔约方，而是作为所谓“神圣同盟”的保护人。各方同意：如果同盟从皇帝手中征服那不勒斯，各方同意亨利应该在这个王国内享有岁入三万杜卡特(ducat)的封地。鉴于红衣主教沃尔西对基督教世界的贡献，他在这种情况下也获得岁入一万杜卡特的封地为酬劳。

弗朗西斯希望：公开大联盟会使查理多多少少放松马德里条约最苛刻的条款。他沉溺于这种希望，疏于战争准备，没有及时增援意大利盟友。波旁公爵占领了米兰全境，皇帝准备将公国封授给他。他在德国征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意大利所有统治者都闻风丧胆。查理一如既往地缺钱，不能给军队发饷。兵变随时可能爆发。迄今为止，完全由于将军深受军队爱戴，才勉强没有哗变。公爵为了避免兵变，率领他们向罗马前进，许诺让他们抢劫这座富裕的城市，大发横财。公爵以云梯攻城时阵亡；但士兵非但没有因此气馁，反而因此愤怒，奋力登城。他们入城后，手持刀剑，犯下了一切可以想象的暴行，有些由抵抗激起，有些在没有抵抗时由傲慢的态度激起。罗马仅仅凭借盛名，多次面对危难，甚至连经常发生的蛮族征服也没有今天的浩劫恐怖。毫无约束的屠杀和掠夺持续了几天，不幸的罗马人遭受了最恶劣的待遇。^①一切宗教谦卑或圣洁似乎只会激起士兵更大的侮辱。处女在父母手中和避难的祭坛上遭

① Guicciardini, lib. 18. Bellay, Stowe, p. 527.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到强暴。高龄长老首先受到种种侮辱和折磨，然后投入地牢。他们在最残酷的死亡威胁下，被迫交代秘藏的财宝、或是以高价赎买自由。克莱蒙特教皇本人信任神圣身份的保护，没有及时逃走，但发现他的高贵地位得不到西班牙人的尊重，只引来了德国人的粗野嘲弄。德国人大多支持路德派教义，乐于羞辱教皇，从而满足他们的敌意。

这一重大事件的消息传到皇帝耳中。年轻君主习惯于伪善，对帝国军队的胜利表示最深刻的懊悔，甚至他本人和宫廷举行哀悼，停止了儿子菲利普出生的庆典。他知道：一切诡计无论多么显而易见，只要获得权威的支持，就能欺骗人民。几个月内，他命令祷告者在教堂里为教皇的自由祈祷。所有人都明白：只要他下一道命令，教皇立刻就会自由。

亨利和弗朗西斯更加真诚地关心盟友的灾祸。洗劫罗马前几天，两位君主在威斯敏斯特签订条约。^① 他们除了重申原有的盟约外，还同意派大使要求查理接受二百万克朗、作为法兰西国王的赎金，这笔钱从亨利的借款中支付。大使受命：如果皇帝拒绝，同行的传令官就向他宣战。双方同意：这场战争在低地国家进行。联军由三万步兵和一千五百重骑兵组成，三分之二由弗朗西斯提供，其余由亨利提供。为了加强两位君主的联盟，条约规定：弗朗西斯或他的儿子奥尔良公爵以后应该同意迎娶亨利的女儿玛丽公主。两位君主一得到波旁的消息，立刻改变计划。他们签订了一份新条约，把拟议的战场从尼德兰移往意大利。他们获悉教皇被俘便更受刺激，准备全力发动战争，恢复他的自由。沃尔西亲自渡海，跟弗朗西斯会晤，协调为此采取的措施。沃尔西一路排场盛大、声势煊赫，他对此如痴如醉，扈从的骑兵多达一千人。洛林红衣主教和阿拉贡大臣在布洛涅跟他会晤。弗朗西斯不仅授权傲慢的红衣主教所过之处赦免所有囚犯，还御驾亲临亚眠，甚至出城几英里迎接他。他们签订

① 4月30日。

的条约规定：奥尔良公爵应该迎娶玛丽公主。皇帝似乎采取了一些步骤，召开公民会议。两位君主同意拒绝参加公民会议，而且在教皇被俘期间掌管本国教会。沃尔西试图将教皇特使的权力延伸到法兰西，甚至延伸到日耳曼；但他发现努力徒劳无功，极不情愿地放弃了这些野心勃勃的项目。^①

一段时间后，为了稳定两位君主的联盟，新条约在伦敦签字。亨利最终同意放弃一切法兰西王位要求。确实，现在这个要求纯属妄想，但还是经常用于刺激疏忽大意的英国人对法开战。弗朗西斯为了回报这个让步，同意自己和继承人每年向亨利及其继承人支付五万克朗。可能是为了使条约更加严肃，双方同意两国国会和大贵族应该认可条约。大司马蒙莫朗西偕众多要人鲜衣怒马，前往伦敦确认条约。他们在伦敦受到这种严肃场合中一切应有排场的接待。对皇帝的强大恐惧，熄灭了两国间古老的仇恨。在一百多年内，西班牙虽然距离更远，但却变成了英国人主要的猜忌对象。

英格兰和法兰西诚心结盟，虽然使两国派往皇帝处的共同使节更有影响力，但并不能使查理完全屈从联盟坚持的条件。他确实放弃了以勃艮第为法兰西王子赎金的要求，但要求弗朗西斯首先撤出热那亚和他在意大利占据的所有要塞，然后才释放王子。他宣称将审判斯福查，根据虚构的叛逆罪没收米兰公国。因此，英法传令官依据约定向他宣战，发出挑战。查理温和地回答英国传令官，却向法国传令官谴责他的主人背信弃义，并重温了他们在马德里分手前的私人谈话，提出以个人决斗来解决他的不忠诚。弗朗西斯反唇相讥，指责查理撒谎，要求保证一片场地，以个人决斗证明自己的理由。他们之间频繁往返通信；虽然两位君主的勇敢都毋庸置疑，但拟议的决斗始终没有举行。当时的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热衷于争论哪一位君主应该承担失约责任，但所有温和的人都慨叹命运的力量：由于不幸的意外事件，更坦率、更慷慨、更诚实的君

① Burnet, book 3. coll. 12, 13.

主陷于这种处境，只有破坏条约才能保护人民。他不能做出得体的答复，以致荣誉和品德都不如他的敌人还要指责他的背誓。

查理和弗朗西斯的挑战虽然没有对这些君主造成直接后果，却极大地改变了时代风气。挑战决斗的惯例是古代蛮族司法的一部分，在非常严肃的场合中仍然保存了下来，且往往受到世俗法庭的支持。由此，挑战决斗的风俗开始盛行于最无足轻重的小事。人们只要自以为受到侮辱或伤害，甚至为了博取荣誉、报复敌人，都会通过个人决斗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二百年来，这些虽然慷慨但仍然荒谬的准则使基督教世界最高贵的鲜血大量流淌。虽然有严厉的法律和理性的权威，但习俗的力量仍然强大，还远远没有完全被破除。

第三十章

亨利八世(四)

关于国王婚姻的顾虑——国王顾虑重重——安妮·博林——亨利向教皇申请离婚——教皇有意促成——皇帝胁迫教皇——教皇首鼠两端——跟罗马争议的原因——沃尔西倒台——英格兰宗教改革发轫——外务——沃尔西之死——召开国会——宗教改革进展——召开国会——国王最终跟罗马决裂——召开国会

宗教改革前,虽然教皇的权威受到恭顺的遵奉,但亨利和兄长遗孀、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还是几经踟蹰和困难,才得以通过。国民的偏见,使其普遍反对这样近距离的亲属通婚。先王虽然决定为年仅十二岁的王子订婚,但明显有意等待以后的有利机会再废除婚约。^①他命令年轻的王子一到法定年龄,就宣言反对这次婚姻。^②亨利七世在临终病床上遗命王子不要完婚。这次婚姻太反常,面临无法克服的反对声。国王继位后,枢密院的某些成员,特别是沃汉姆大主教公开反对完婚。虽然亨利年

① Morison's Apomaxis, p. 13.

② Morison, p. 13. Heylin's Queen Mary, p. 2.

轻、挥霍，有一段时间没有考虑他采取的举措，但一起偶然事件充分唤醒了他的注意力，提醒他认识到臣民普遍的感情。卡斯提尔国会反对查理皇帝迎娶亨利的女儿玛丽；除了其他理由外，他们还坚持年轻的公主是私生女。^① 后来，亨利跟法兰西谈判，提议将玛丽许配给弗朗西斯和奥尔良公爵；法国大使塔贝主教重提同样的反对意见。^② 这些事件自然唤起了亨利心中的疑虑，再加上同时产生的其他理由，他越来越懊悔，良心更加受触动。

王后至少比国王大六岁。她的美貌已经褪色，再加上身体虚弱多病，虽然人品、举止无可挑剔，但国王仍然无法接受她。她为亨利生了几个孩子，但大多数死于襁褓，只剩下一个女儿。亨利更多地受到这个不幸的打击，因为摩西律诅咒娶兄长遗孀的人断子绝孙是颇有威胁性的。只要亨利婚姻的合法性成问题，人人都会考虑到王位继承权的问题。人们担心：由于玛丽的合法性有争议，再加上性别的弱点；第二继承人苏格兰国王可能觊觎王位，将王国投入混乱之中。最近的内战和动乱之祸源于继承权争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国民普遍渴望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这样的灾难。由此，国王为私人感情和公共利益考虑，想要摆脱噩运。也就是说，摆脱凯瑟琳不合法的婚姻。

亨利后来断言：他的顾虑完全来自于个人反思。他请教忏悔师林肯主教，发现这位长老怀有同样的疑虑和困惑。国王自己就是伟大的决疑者和神学家，随后就运用自己的学识来更加仔细地检查这个问题。他诉诸托马斯·阿奎那的权威。这位著名的博士在教会中享有巨大的权威，国王对他绝对遵奉。在这种案例中，托马斯·阿奎那明确地反对这种婚姻的合法性。^③ 托马斯说：《利未记》和其他经文中包含有不得娶兄长遗孀的禁令，这是永恒的道德教谕，以神的制裁为基础。虽然教皇有权豁免教会法规，但更低级的权威不可能撤

① Lord Herbert, Fiddes's life of Wolsey.

② Rymer, vol. xiv. 192, 203. Heylin, p. 3.

③ Burnet, Fiddes.

销神的律法。国王接下来询问坎特伯雷大主教，要求大主教咨询其同僚。英格兰所有的高级教会长老一致签名盖章，宣布国王的婚姻不合法，只有罗切斯特主教费希尔例外。^① 沃尔西也强化了国王的疑虑，^②部分为了促成亨利跟凯瑟琳的侄子查理皇帝彻底决裂，部分为了促成亨利跟弗朗西斯的妹妹阿伦贡公爵夫人联姻，使两国联盟更加紧密；或许也多多少少因为王后不顾他的品格地位，直言不讳地责难他，因此厌恶她本人。^③ 虽然有权有势的宠臣一开始不过是做此暗示，但亨利在更强有力的动机驱使下，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安妮·博林最近才跻身宫廷，有幸出任王后的女侍，经常有机会跟亨利见面、交谈，完全支配了他的感情。这位年轻女士以其荣显和噩运而闻名。她父亲托马斯·博林爵士几度为国王效力，跟王国所有大贵族都有亲戚关系。安妮的母亲博林夫人是诺福克公爵的女儿。托马斯·博林爵士本人的母亲是奥蒙德伯爵的女儿，祖父是伦敦市长戈弗雷·博林爵士。戈弗雷·博林爵士的妻子是黑斯廷斯勋爵的女儿和共同继承人。^④ 国王的妹妹嫁给了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虽然安妮当时还小，但仍然随公主前往巴黎。路易十二去世后，寡后返回英格兰。少女安妮多才多艺，广受称道，留下来侍奉弗朗西斯国王的王后克洛德。王后去世后，安妮转到德操出众的阿伦贡公爵夫人家中。如果亨利后来的自述可信，她返回英格兰的确切时间却不为人知，但迟于国王开始怀疑他跟凯瑟琳婚姻合法性的时候。亨利出于疑虑，已经中断了他跟王后的一切夫妻关系；但他仍然维持礼仪和友谊，经常登门拜访王后。在拜访中，他注意到安妮年轻、美丽、迷人。亨利发现她多才多艺，慧质绝不逊于美貌，甚至策划让她登上王后的位置。国王发现安妮的品德和谦逊使他不可能以其他途径满足欲望，就更加坚定了这个决心。于是，国王的一切动机、倾向和政策都要求他跟凯瑟琳离婚。

① Burnet, vol. i. p. 38. Stowe, p. 548.

② Le Grand, vol. iii, p. 46, 166, 168. Saunders. Heylin, p. 4.

③ Burnet, vol. i. p. 38. Strype, vol. i. p. 88.

④ Camden's preface to the life of Elizabeth Burnet, vol. i. p. 44.

他预期成功在望，便派秘书奈特出使罗马，向克莱蒙特教皇申请离婚。

亨利无意动摇教宗狂妄的僭越，不打算对教皇特许近亲通婚的权力提出任何一般性的质疑，仅仅坚持撤销尤利乌斯教皇特许亨利和凯瑟琳通婚的法旨。罗马教廷的准则是：如果教皇做出措手不及的让步，或是根据虚假的建议滥予特许，他的法旨可能在以后撤销。教皇经常以此为借口，撤销前任教皇的法旨。而尤利乌斯教皇的法旨一经检查，就发现充满了这些问题。任何有利于亨利的裁决都不愁缺少似是而非的借口，因此可以满足他的离婚申请。法旨一开头就说：教宗根据亨利的恳请下旨。然而众所周知，亨利当时还不到十二岁。法旨还确定了另一个动机：为了保证两王国和平，联姻必不可少。然而可以肯定，当时两王国没有任何争执的理由或争执的迹象。由于尤利乌斯法旨的前提不实，克莱蒙特有充分理由或借口予以撤销，便准许亨利第二次结婚。^①

虽然滥予特许的借口不太有说服力，但教皇的处境要求他竭尽全力讨好英格兰君主。他当时被皇帝俘虏，没有任何希望以合理条件恢复自由。他唯一的机会在于亨利、弗朗西斯和意大利各邦反对查理野心的联盟。因此，英国国王的秘书私下提出请求时，教皇作出了有利的答复，承诺立刻解除国王的婚姻。^② 不久后，劳特累克统率法军进入意大利，迫使皇帝一派恢复教皇的自由。教皇退往奥维莱托，秘书奈特和驻罗马使节格里高利·卡法里重新向他提出申请。他们发现教皇对国王仍然充满友谊、感激和依恋，但并没有马上让他们如愿以偿。皇帝已经获悉亨利的申请，取得教皇的承诺：教皇跟帝国大臣磋商前，不采取进一步举措。这个承诺让克莱蒙特左右为难，他畏惧皇帝在意大利的强大力量，似乎有意拖延亨利的要求。然而，英国大臣再三提出要求。克莱蒙特终于委任教皇特使沃尔西，协同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其他英国教会长老，着手核查国王婚姻和尤利乌斯豁免的可靠性。^③ 他也临时豁免了国王跟其他人

^① Collier, Eccles. Hist. vol. ii. p. 25. from the Cott. Lib. Vitel. p. 9.

^② Burnet, vol. i. p. 47.

^③ Rymer, vol. xiv. 237.

的婚姻，承诺下达教谕撤销国王跟凯瑟琳的婚姻。不过，克莱蒙特告诉英国大臣：如果皇帝获悉这些让步，他随后就会面临危险的后果。他要求英国大臣发誓：在他的自由的独立获得充分保证前，不得公开这些文件，或是进一步利用它们。他秘密建议：只要公开的时机一到，他们应该排除一切反对即刻制造既成事实，宣布亨利跟凯瑟琳的婚姻无效，立刻跟其他人结婚。否则，他以前已经同意国王的婚姻，且以教皇权威确认婚姻有效，这样就很难批准这些议程。^①

亨利的大使给他带回教皇的委托和豁免，说明了教皇的建议。国王向大臣开诚布公，询问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如此微妙的形势。英国顾问考虑到当前事项的危险性——如果教皇拒绝批准契约，就有充分的理由称之为措手不及的让步和不合乎正当程序，否认自己私下提供的建议。于是，国王的第二次婚姻就完全无效；第二次婚姻可能带来的子嗣就会宣布为私生子；他跟凯瑟琳的婚姻可能比以往更加坚固。^② 亨利考虑到教皇的为人和处境，更担心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甚至事所必至。

克莱蒙特极其怯懦，这妨碍他充分发挥天赋和洞察力，否则他的判断力就会极其卓越。^③ 他结盟反对查理，导致了被俘和其他不幸。此后，他再也没有积极推行任何公共举措。如果皇帝的利益或倾向与之对立，则尤其如此。当时，意大利驻有强大的帝国军队，随时可能回师攻击罗马。罗马仍然毫无防备，同样的灾难完全可能重演。除了这些危险以外，克莱蒙特想象着自己的人身和尊严仍然面临着直接威胁。

查理了解圣父的怯懦性格，便不断威胁召开公民会议。他表示有必要改革教会，纠正广泛存在的弊端。由于罗马教廷的野心和贪婪，教会所有机构无不百弊丛生。他说：有必要限制教皇本人的权力。他带头大声疾呼，要求改

① Collier, from Cott. Lib. Vitel. B. 10.

② Burnet, vol. I. p. 51.

③ Father Paul, lib. i. Guicciardini.

良，甚至连他自己的帝位也有质疑的充分理由。人们一直认为克莱蒙特教皇是朱利安·德·美第奇的私生子，美第奇是统治佛罗伦萨的家族。虽然他的亲戚利奥教皇根据伪造的婚约，宣称克莱蒙特是他父母合法婚姻的儿子；但这个宣言没有正当依据或权威，没有多少人相信。^① 确实，私生子荣升教皇尊位，使得教规形同虚设。但人们抱有强烈的先入之见：出身有污点的人不应担任圣职。另一方面，教规明文规定：犯下买卖圣职罪的人不得担任圣职。尤利乌斯二世严旨宣布：即使红衣主教事后同意，贿选圣职永远不能合法化，从而增加了新的制裁。不幸的克莱蒙特向科隆纳红衣主教行贿，包括承诺：他一旦在科隆纳红衣主教的支持下当选教皇，就以提拔为回报。科隆纳现在完全依附于皇帝，因此时刻威胁要公之于众。^②

查理一面用这些手段恐吓教皇，一面用希望诱惑他。在他的感情中，希望占据的分量并不比恐惧小。皇帝的军队洗劫罗马、俘虏教皇时，佛罗伦萨人热爱古老的自由，利用他的噩运，发动了反对美第奇家族的叛乱。他们彻底推翻了这个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重建了民主。佛罗伦萨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由，跟法兰西、英格兰、威尼斯结成同盟，反对皇帝。克莱蒙特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发现他的盟友已经负有义务，不能帮助他复辟美第奇家族；而他对家族复辟事务最为热衷，远远超过其他事务。他知道：只有皇帝才能实现他的目的。因此，无论他如何表白对盟友的忠诚，只要瞥见丝毫跟皇帝能真正和解的希望，他就会接受任何提议。^③

英格兰方面完全清楚教皇的想法和利益。他们预见到：查理皇帝为姑母凯瑟琳的荣誉和利益考虑、为扰乱敌人考虑，都会反对亨利离婚。克莱蒙特为人一向口是心非，目前几乎处于身不由己的境地。在后果如此严重的大事中，

① Father Paul, lib. i.

② Ibid.

③ Father Paul.

他们不能冒险指望教皇以后的支持。最安全的举措似乎是：尽可能地坚持推进原有的盟约，使教皇无法回头；利用他目前暧昧不清的处境，谋取尽可能多的让步。为此，红衣主教的秘书斯蒂芬·加德纳、国王的施赈官理查德·福克斯奉命前往罗马，请求教皇的委任；无论委任人员的裁决是什么，都要求教皇予以确认；无论如何不让他撤回委任，诉诸罗马教廷的理由。^①

不过，国王如此渴望得到这项让步的原因，恰好就是教皇决定拒绝这项让步的原因。他仍然决定随时跟皇帝达成协议，为此毫不犹豫地牺牲了所有其他考虑。他认为：为他自己的安全、为他的伟大家族着想，跟皇帝谈判最为重要、最为必要。因此，教皇新委任康培吉奥红衣主教，协助沃尔西裁决亨利的婚姻问题。然而，英国大使不可能说服他插入他们希望的条款。他虽然交给加德纳一封信，保证不会撤销当前的委任，但审视这个承诺，就会发现措辞如此模棱两可，以至于教皇仍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撤销原议。^②

康培吉奥欠了国王不少人情，但他更多地依赖教皇。因此，他完全遵奉教皇的意旨。他虽然四月份就接到委任，却找到许多借口迟迟其行，以至于十月份还没有抵达英格兰。他的第一步举措就是劝诱国王放弃离婚，他发现这个建议冒犯了国王，就宣称他的意图也是劝诱王后发愿出家、然后友好地解决一切分歧。^③ 他主要是为了安抚国王和沃尔西红衣主教，表示教谕解除了亨利和凯瑟琳以前的婚姻。但无论如何劝说，他都不肯让国王的其他枢密大臣参与机密。^④ 他多多少少为了补赎顽固的态度，向国王和沃尔西红衣主教表示：教皇非常乐于满足他们的一切合理要求。他尤其表示：圣父已经同意他们解散更多的修道院，改为大教堂和主教教区。^⑤

^① Lord Herbert. Burnet, vol. i. p. 29. in the collect. Le Grand, vol. iii. p. 28. Strype, vol. i. p. 93. with App. No 23, 24, &c.

^② Lord Herbert, p. 221. Burnet, p. 59.

^③ Herbert, p. 225.

^④ Burnet, p. 58.

^⑤ Rymer, vol. xiv. p. 270. Strype, vol. i. p. 110, 111. Append. No. 28.

由于教皇及其使节的举措模棱两可，英格兰宫廷因此举棋不定，决定让国王耐心等待这个迟疑不决的委员会作出决定。在此期间，他似乎交上好运，可望更加确定、更加便利地摆脱当前的困境。克莱蒙特教皇突患急症，各位红衣主教为争取继任而钩心斗角。沃尔西受到英法两国支持，有望登上圣彼得的法座。^① 看起来，只要教皇出缺，沃尔西就大有机会实现最大的野心。教皇的病情虽然几度反复，但还是痊愈了。迄今为止，他一直以虚伪和欺诈的手段来对付英格兰宫廷，现在又开始如法炮制。他继续向亨利表示出最热忱的依恋，承诺迅速而有力地解决他的问题。他继续跟查理秘密谈判，一如既往地为了光大自己的家族，甘愿牺牲一切承诺，以及罗马教会的一切利益。康培吉奥充分领会他的意图和看法，便施展最巧妙的拖延手段，给克莱蒙特充分的时间跟皇帝协商条约的所有条款。

皇帝明白国王对此事非常认真，便下定决心：亨利只能向他请求，以抛弃弗朗西斯为条件，才能离婚成功。迄今为止，亨利仍然支持风雨飘摇的法兰西君主国，反对西班牙的优势力量。因此，查理乐于倾听姑母凯瑟琳的诉求，承诺尽一切力量保护她，劝告她不要向敌人的恶意和迫害屈服。王后天性刚毅果决，自认为蒙受不公、具备一切不断抗争的动机。人们非难她跟亨利的婚姻是近亲通奸，使她怒不可遏。她有最正当的关注理由：她的女儿似乎必然因此沦为私生女。她有极其自然的理由，因此很难听任情敌抢占国王的感情。王后出于所有这些考虑，不断向侄子求助，诚挚地向罗马申诉。她认为，只有罗马才能还她公道。皇帝跟教皇交涉后，都坚持以下基本条款：撤销康培吉奥和沃尔西在英格兰的委任。^②

在此期间，两位特使在伦敦开庭，传国王和王后出庭。国王回应了他受到的询问；但王后没有回答法官，而是起身跪倒在国王脚下凄然陈情。她的美

^① Burnet, vol. i. p. 63.

^② Herbert, p. 225. Burnet, vol. i. p. 69.

德、高贵地位和不幸遭遇使陈情变得更加动人。王后对国王说：她是他领土上的异乡人，遭遇敌人施加的种种不义而无人保护、无人咨询、无人援手。她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国王及其家庭就是她唯一的亲人。她在一切不幸中都指望、依靠他们的保护，从未想过还会受到他们的欺凌与迫害。她嫁给国王二十年，千依百顺、体贴备至，理应受到更好的对待，不应多年以后受到他如此严重的侮辱。她知道——国王本人可以作证——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她的贞操仍然白璧无瑕；她跟他哥哥的婚姻仅仅限于仪式。时人公认他们两人的父母、西班牙国王和英格兰国王是当时最明智的君主。他们议婚时一定咨询过最好的顾问，而现在这次婚姻却被视为违反自然的罪行。因此这个法庭明显受她的敌人的操纵；她仅仅是默许他们的审判，而不会将自己的理据委托给他们裁决，甚至丝毫不会指望他们会作出公正无偏的裁决。^① 王后说完这一席话，起身向国王深鞠一躬，再也没有在法庭上露面。

王后走后，国王承认：她确实一直严守妇道、有情有义，一举一动无不复合正直和荣誉的最严格法则。他仅仅坚持自己对婚姻合法性的怀疑。他解释这些怀疑如何产生、发展和确定，使他长期遭受强烈的困扰。他声明：沃尔西红衣主教从来没有鼓励过他的疑虑。因此他请求法庭作出支持他的判决。

特使们再次传唤王后。他们宣布：虽然她向罗马申诉，但仍然犯有抗拒法庭罪。然后，他们继续审判。他们首先核查阿瑟王子跟凯瑟琳完婚的证据。必须承认：时隔多年以后，不大可能指望能增加更强有力的证据。王子年过十五，身强力壮；夫妇同居日久，多次有那方面的表示。一切环境证据都非常有利于国王的要求。^② 兄长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亨利没有获得威尔士亲王封号，因为凯瑟琳可能会怀孕。西班牙大使为了更好地保障她的寡妇遗产，给西班牙送去了完婚的证据。^③ 尤利乌斯教皇的法旨推定：阿瑟王子或许已经跟凯瑟琳

① Burnet, vol. i. p. 73. Hall. Stowe, p. 543.

② Herbert.

③ Burnet, vol. ii. p. 35.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圆房。在亨利缔结婚约的条约中，双方都认为阿瑟王子的上一次婚姻已经圆房。^① 法庭面对所有这些细节，以及讨论教皇权威范围的许多理论，还有反对教皇有权豁免近亲通婚的种种理论。康培吉奥很不耐烦地听取这些学说，他虽然决定拖延审判，但是当国王的枢密院坚持这些不愉快话题时，还是忍不住经常打断他们，要求他们闭嘴。审判勉强拖到 7 月 23 日，康培吉奥是主要的审判者。沃尔西虽然担任红衣主教的资格更老，但还是听任他主持审判，因为人们认为：审判由意大利红衣主教主持，比国王自己的大臣和宠臣主持更具有公正无偏的外表。这时，事情似乎就要告一段落；国王每天都在期待对他有利的判决。康培吉奥毫无预兆，因为微不足道的借口而^②突然宣布休庭到十月。国王因此大吃一惊。几天后，罗马下令召回特使，国王长期热切的期待至此完全落空。^③

教皇特使在伦敦开庭期间，皇帝派大臣严肃地敦促克莱蒙特教皇下达召回令，对教皇的野心和怯懦恩威并施。另一方面，英法两国大使齐心协力，同样热忱地敦促教皇特使尽快判决。他们虽然同样恩威并施，却没有掌握皇帝近在咫尺、迫在眉睫的手段。^④ 克莱蒙特关心个人安危，渴望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甚于担心丧失英格兰，从而大大加强路德派的实力。因此，他一旦跟皇帝谈妥了所有条件，就抓住法庭必需的借口，宣布：鉴于王后的申诉，暂停特使的委任，推迟审判，由他在罗马亲自主持。此前，坎帕拉已经秘密传旨给康培吉奥，烧毁了委任特使的教谕。

沃尔西早已预见到：这样的举措是他身败名裂的先声。虽然他一开始就希望国王娶一位法国公主，而不要娶安妮·博林，但他仍然尽心竭力，争取圆满的结局。^⑤ 失败的原因是克莱蒙特的偏袒，他不应该为此负责。但他充分了

① Rymer, vol. xiii. p. 81.

② Burnet, vol. i. p. 76, 77.

③ Herbert, p. 254.

④ Burnet, vol. i. p. 75.

⑤ Collier, vol. ii. p. 45. Burnet, vol. i. p. 53.

解亨利火热、狂躁的性格。国王容不得任何障碍，会责成大臣为他们经手的事务负责，而且既不调查也不分情况。安妮·博林同样对他有偏见，把希望破灭归咎于他。她为了维持体面的缘故，在教皇特使开庭期间回避宫廷；现在她重新回到宫廷，对亨利的影响自然更大。安妮·博林大力加深国王对红衣主教的偏见。^① 甚至王后及其党羽根据沃尔西公开的作为来判断他，也对他极为敌视。现在，最敌对的党派似乎在齐心协力毁灭傲慢的大臣。亨利以前对红衣主教的能力评价甚高，但这加速了他的垮台。他认为大臣没有成功，不是因为厄运或错误，而是因为他心怀恶意、背信弃义。不过，打击并没有立刻落到他头上。国王大概是找不到正当理由来疏远旧日的宠臣，似乎仍然犹豫了一段时间。他对待沃尔西，即使没有过去的无限宠爱，至少还有表面上的信任和尊重。

然而，普遍的经验表明：最高的信任与宠爱一旦削弱，就会沦为完全的冷漠，甚至极端的仇恨，鲜有例外。国王现在决心毁灭红衣主教，就像以前决心提拔他一样突然。诺福克公爵和萨福克公爵奉命索还御玺。沃尔西没有获得更明确的旨意，十分踟蹰，不肯交出御玺。^② 亨利让托马斯·莫尔爵士送信给他，他才屈服。托马斯·莫尔不仅文采绝世，还具有第一流的美德、正直和能力。

沃尔西奉命离开他在伦敦建起的约克宅第。虽然宅第其实属于约克教区，亨利却将它据为己有。以后，宅第变成了英格兰国王的行宫，号称白厅。沃尔西所有的家具和餐具也被没收，这些富丽堂皇的陈设更适合王室而非私人。宅第墙壁覆盖金银织锦。他有一柜子贵重的金质餐具。他的家里发现了几千匹上等亚麻布。其余的财富与陈设与此相仿。沃尔西之所以受到激烈迫害，他的财富可能是不小的诱因。

红衣主教奉命退隐到汉普顿宫附近的埃塞尔乡村宅第。世人在他飞黄腾达时卑躬屈膝地逢迎他，在他时乖命蹇之际却完全抛弃了他。他自己因时运

① Cavendish, p. 40.

② Cavendish, p. 41.

英國史 III
都鐸王朝早期

的转变而灰心丧气、心境大变，过去热衷于虚荣的炫耀、逆境则表现为双倍的严苛。^① 重新得宠的最细微表现都会使他欣喜若狂、不顾体面。有一段时间，国王似乎有意放松使他措手不及的打击——他施与保护，把约克和威斯敏斯特教区留给沃尔西；他甚至送去亲切的口信，附带一枚戒指作为友善的证物。口信送到时，沃尔西正在马上。他立刻飞身下马，跪倒在泥泞中，毕恭毕敬地接受君主亲切的信物。^②

但他的敌人害怕他重返宫廷，不断向国王报告他的几次小过失。安妮·博林的舅父诺福克公爵尤其竭尽全力，剥夺了他官复原职的一切希望。因此，他解雇了大批仆从。因为他是个慷慨慈悲的主人，主仆双方分手时都热泪盈眶。^③ 国王几次产生一念之仁，现在似乎已经对旧日的宠臣完全硬下了心肠。他将沃尔西交付星室法庭受审、定罪。国王意犹未尽，又将沃尔西抛弃给国会处置。这时，国会经长期中断后再度召集。上议院指控沃尔西，罪名长达四十款，同时请求国王剥夺其所有职位，严加制裁。上议院的指控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反对。任何部分的罪名都不需要多少证据，因为指控主要是一般性罪名，几乎不可能没有。^④ 弹劾提交给下议院，托马斯·克伦威尔为不幸的恩主辩护。他以前是红衣主教的仆人，受知于寒微之中。克伦威尔慷慨、勇敢的精神

① Strype, vol. i. p. 114, 115. App. No 31, &c.

② Stowe, p. 547.

③ Cavendish. Stowe, p. 549.

④ 针对红衣主教的第一款指控是：他牟取教皇特使(legantine)的权力。然而，这肯定经过国王的同意和许可，殊难视为罪行。其他许多条款也只能视为这种权力的行使。有些条款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对任何像他一样位极人臣、威权无限的大员都是自然而难以避免的。比如，所有外国大臣的来信首先交给他过目，所有外国大臣的访问由他接待，所有政务经过他才能施行。他还受到一项指控：胆敢将自己的名字跟国王并列（“国王和我”），仿佛他有资格跟国王平起平坐似的。据称，他有时候甚至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国王前面（“不臣与国王陛下”）。但这种措辞符合拉丁文的习惯用法。值得注意的是，他受到一项指控：明知自己患有性病，还要对国王耳语。许多指控都是一般性罪名，无法证明。赫伯特勋爵甚至大胆断言：身居高位的人倒台，从来没有像红衣主教这样证据寥寥无几的。他的看法可能过分偏袒红衣主教。不过，克伦威尔逐条反驳了这些指控。虽然在这个武断之治的朝代，下议院仍然驳回指控。这些差不多证明了沃尔西的清白。亨利无疑全力促成了红衣主教的毁灭。在国会弹劾失败后，他启用临时条例(the statute of provisors)打击沃尔西，不给大臣丝毫公正。这次紧随国会弹劾以后的起诉载于卡文迪什(Cavendish)的《沃尔西传》，Stowe, p. 551)，而且获得了弹劾具体条例的确认。参见《国会史》(Parliamentary History vol. iii. p. 42. article 7) 和 Coke's Inst. pt. 4. fol. 89. 839。

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国王日后的恩宠肇基于此。

沃尔西的敌人发现：红衣主教的清白或谨慎使他们的控告缺乏坚实的基础。他们只能乞灵于非常措施。通称的《临时条例》(the statute of provisors)指控他违背了理查德二世的法案，谋求罗马教廷的法旨，特别是教皇特使的广泛权力。沃尔西承认确有其事，申诉他不知道这个法案，恳请国王开恩。起诉或许于法有据，但法案久已废用。多年来，红衣主教的做法有国王的认可和嘉许、有国会和王国的默许，却竟然引为罪名，可见苛酷莫此为甚。沃尔西一直宣称：他获得了最正式的王室特许状。^① 我们对此没有多少怀疑。如果他不是明知本案牵涉亨利且无法纪的敌意，本来可能要求在法官面前自我辩护。然而，判决是彻头彻尾地对他不利：“剥夺国王的保护；没收土地和动产；人身准予监禁。”不过，沃尔西的指控到此为止。亨利甚至赦免了他所有的罪名，发还部分餐具和家具，时时施恩垂怜。

英格兰人不满教会的滥权，古已有之。大多数欧洲邦国同样如此。这种主张现已充斥欧洲全境，为路德派教义所驱除，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畏惧异端和革新的观念。下议院对此颇有赞成之意，通过了几项法案来限制神职人员的征敛。一项法案规范葬礼法事；另一项禁止在查验遗嘱时征税的陋规；^② 第三项法案禁止神职人员不在教区或领有多个教区，禁止神职人员占有农地。但教会面临的主要威胁显然是：下议院恣意抨击神职人员的放荡生活、野心、贪婪和他们对信徒永无止境的苛索。赫伯特勋爵^③手中保存了一位格雷院绅士的讲演，提供了难得的史料，我们几乎没有料到这个时代会有这样的论证。议员强调：不同邦国、不同时代的主流神学观点千差万别；各教派争议纠葛，永无止境；从来没有，更不用说民众能理解，更不用说能验证所有

① Cavendish, p. 72.

② 这些陋规纯属武断，数额惊人。一位议员说：他为此付出了一千马克。Hall, fol. 188, Strype, vol. i. p. 73.

③ P. 293.

教派的教义和教条；无知不可避免，理应搁置所有这些争论对象。总而言之，他推断：人类唯一的宗教义务就是信仰至高无上的存在，自然的创造者；为了赢得它的青睐和保护，必须遵奉良好的道德。即使在我们的时代，在公共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表达这种态度，也不会受到欢迎，因此接受范围一定非常有限。虽然最初的宗教纠纷会促使天性爱好学术的少数人倾向怀疑主义，但民众不久就委身于几个教派，并在很长时间内排除了所有这种可憎的自由。

规范神职人员的法案在上议院遇到了一些反对意见。费舍尔主教尤其将下议院的这些举措归因于缺乏信仰，异端和路德教义有计划地掠夺了教会的祖传遗产，颠覆了国民的宗教信仰。诺福克公爵责难这位教会长老，疾言厉色，甚至大放厥词。他对主教说：最伟大的录事不见得总是最明智的人。但费舍尔回答：据他记忆，在他的时代，没有任何傻瓜能成为最伟大的录事。罗切斯特主教的开脱之词不限于此。下议院通过发言人托马斯·奥德利爵士向国王抱怨他们受到的非难。主教只得改善他的措辞。^①

亨利并非不乐意让罗马教廷和神职人员认清形势：他们完全依赖于国王和他的国会。只要国王支持国会的倾向，教会的权力和特权就会灰飞烟灭。下议院在另一个关键时刻满足了国王的希望：免除了他自本朝初年以来的所有债务。他们虽然怨声载道，但还是批准了这项法案，借口国王忧劳国事无微不至，一切贷款都用于了公共事务。国王的大部分债主是红衣主教的朋友，在恩主的敦促下为满足亨利的需要而捐输；目前的廷臣很乐意勒索他们。^② 这种不合法、不经国会通过的征敛方法早已信用扫地，若干廷臣还希望这种权宜之计一直沿用下去。

目前，国王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英格兰国内事务，对外事务无非从属于内政。他已经向皇帝宣战，但英格兰和尼德兰通商对双方都有利，因此他规定对

^① Parliamentary History, vol. iii. p. 59. Burnet, vol. ii. p. 82.

^② Burnet, vol. ii. p. 83.

这些省份保持中立。他只向意大利战争供应资金，此外没有对皇帝的领土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这一年夏天，欧洲各邦全面议和。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和萨伏伊在康布雷会晤，拟定了法兰西国王和皇帝之间的和平条款。查理接受以两百万克朗代替勃艮第，交还扣留为人质的两位法兰西王子。这一次，亨利对朋友和同盟弗朗西斯非常慷慨，免除了他六十万克朗的欠款。弗朗西斯的意大利盟友对国王的康布雷议和极不满意。他们被抛弃给皇帝任意处置，除了查理的公正节制之外，似乎别无所恃。佛罗伦萨经过英勇的抵抗，被皇帝的军队征服，最后交给美第奇家族统治。威尼斯人获得了较好的待遇，只放弃了他们在那不勒斯海岸获得的一些领土。甚至弗朗西斯·斯福查也开府米兰，赦免以往的一切冒犯。皇帝亲征意大利，仪容壮盛；教皇在博洛纳亲自为他加冕。他年仅二十九岁，但凭借勇武和才干，已经无往而不胜，俘虏了欧洲最伟大的一僧一俗两位统治者。皇帝万众瞩目，帝国蒸蒸日上，唤起了众多预言。

查理似乎在各方面都前途无量：他一向缺钱，但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在德国的处境维艰。他向意大利各方提供了温和的条件，原因主要在此。苏里曼苏丹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成功的君主，已经几乎完全征服了匈牙利，围攻维也纳。土耳其这次进攻虽然失败，但奥地利王室的祖传领地仍然时时有沦陷之虞。帝国的路德派君侯得不到良心自由，缔结了斯马尔卡登同盟。他们抗议帝国会议通过的教例，因此得名为清教徒（抗议者）。查理借口保卫宗教的纯洁性，着手制伏他们；他策划了光大哈布斯堡家族，将其统治扩大到整个德国。

查理要保证他野心勃勃的事业成功，亨利的友谊就是必不可少但并不具备的条件。国王完全清楚，皇帝的赞同会排除他离婚的一切障碍。长期以来，离婚是他最殷切的目的。然而，非但王国利益要求英法联盟，亨利骄傲的性情也不容许他屈从于强加的友谊。他一向习惯于接受雄主名王的殷勤、迁就和恳求，岂能仰面求人，为了不愉快的事务而进一步自贬身价？他心急如焚、焦

躁不安，经常按捺不住，想跟罗马教廷彻底决裂。他虽然受教于敬畏教皇的迷信，但切身体会了克莱蒙特教皇两面三刀、自私自利的政策，在这方面已经相当清醒。他发现本国才是自己特权的坚实基础。他注意到：大多数国民相当厌恶神职人员的滥权，有意削减教会的权力和特权。他知道国民在离婚案中诚恳地支持他，非常反感罗马教廷对他的忠诚效劳的忘恩负义。安妮·博林也竭尽全力、皮里阳秋，唆使他对教皇彻底决裂。二者都是她母仪天下的捷径。她受教于阿伦贡公爵夫人府邸；公爵夫人倾向于改革派，已经诱使她信仰新教义。然而，亨利虽然受到这些强有力诱惑，但仍然希望跟教皇达成体面的协议。他畏惧异端的污名；对教皇的主要敌人路德派深恶痛绝。他已经为罗马教会辩护，大受赞誉，耻于收回原先的观点。他受到这些相互矛盾的动机折磨。正在这时，有人提出一种权宜之计，可望解决一切困难。亨利怀着最大的喜悦和满足，予以接受。

托马斯·克兰默博士是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学者，在校内颇负学术众望，为人坦诚廉正，声誉尤著。一天晚上，他偶遇现任国务秘书加德纳和国王的施赈官福克斯。他们谈到离婚案，克兰默注意到：最方便的办法莫过于就争议问题咨询欧洲各大学，这样既能安抚亨利的良心，又能索取教皇的许可。如果他们都同意国王和凯瑟琳的婚姻，亨利自然不再懊悔。如果他们都谴责这次婚姻，那么国王如此强大，又有基督教世界所有学者的支持，教皇就很难从中作梗。^① 国王闻讯大悦。他脱口发誓，颇有捷才，有欠精密——克兰默的耳朵播下了嘉禾良种。亨利召来神学家，跟他商议。国王高度评价他的品德和才学，约他为离婚案撰写辩护词，并立刻执行他提出的方案，遣使赴欧洲各大学咨询。

只要能排除迷信、从健全的哲学出发，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问题似乎并不

^① Fox, p. 1860, 2d edit. Burnet, vol. i. p. 79. Speed, p. 769. Heylin, p. 5.

难以解决。某种婚姻受到各邦民法的禁止和道德感情的责难，自然的原因在于人们珍惜纯洁的风尚。他们顾虑：如果近亲联姻合法化，就会产生普遍的放荡和堕落；少年时的联姻近亲尤其如此。但各国的习俗千变万化，不同家庭之间或同一家庭内部多多少少地有着通婚的限制。因此，我们发现：全世界的不同时代、不同邦国各有不同的规范，道德观千差万别，并无不便。希腊人精细入微：除非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异性不得通婚。即使在继母的房间里，她的女儿几乎完全不允许丈夫的儿子拜访，更不用说远亲或陌生人。因此，在那个国家，男人不仅可以合法地娶他的侄女，还可以娶他父亲的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姐妹。罗马人和其他国家对这种自由闻所未闻，但在认可两性关系方面却更开放。由此推断，显而易见：雄主名王以互通婚姻为常例，礼仪湛然，见证众多，诸王娶寡婶并无恶果。何况首席神职人员事先核准了联姻，因此不受常例所限，前例可循，习见昭然。另外，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宁，经常构成需要联姻外国王室的强有力动机，因此要求他们严格全面地遵循私人婚姻准则，更不合理。^①

不过，对方收集的论据可能更多。亨利有习俗和前例的支持。人们遵奉的原则几乎总是取决于他们的行动和观点。娶寡婶极其不自然，基督教各邦的历史和记录中没有其他前例。虽然教皇习于豁免更必要的道德规范，甚至允许其他违禁婚姻，例如叔父娶侄女，但人们的想象力还没有接受他在这方面行使权威。因此，几所欧洲大学没有受到利益或报酬影响，^②就毫不犹豫地裁断国王有理。法兰西国王是亨利的盟友，法国各大学：巴黎、奥尔良、布尔日、

① 甚至根据《圣经》对这个问题（随时援引）的裁决，国王的理由也明显不够充分、不够完善。亨利和凯瑟琳的这种婚姻，确实受到《利未记》的禁止；但自然可以解释成犹太教礼俗或民法的一部分。虽然《利未记》章末称：外邦人不守血亲戒律，干犯神怒；但我们完全肯定：逐字逐句理解《圣经》、把该戒律扩大到一切案例，先圣注疏亦不以为然。第一代人子同父，不得不在极近血亲之间联姻。先祖与此相类似。在某些情况下，摩西律法非但许可，甚至要求迎娶寡婶。称这种诫命只是规则的例外，仅限于犹太民族，实属徒劳。仍然可以公正地推论：这种婚姻并无自然或道德上的邪恶；否则一切洁净无不出自上帝，上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此指示。

② Herbert, Burnet.

图卢兹、昂热可能受到国王的影响；但意大利各大学：威尼斯、费拉拉、帕多瓦，乃至于克莱蒙特教皇直辖的博洛纳也如出一辙。只有牛津^①和剑桥^②有些困难；这些大学对路德派的进展感到震惊，深恐脱离神圣教会，顾虑如此裁断将会给古老宗教带来致命的打击。不过，他们最终得出的观点跟欧洲各大学毫无二致。国王为了增加所有这些权威的分量，安排他的贵族致信教皇，向圣父陈述理由，以践踏正义的危险后果来威胁他。^③ 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也召集宗教会议，宣告国王的婚姻无效、不合法，违背上帝的戒律，人世的任何权力都无权左右上帝的戒律。^④ 但克莱蒙特仍然处在皇帝的影响下，继续传唤国王或他的代理人到罗马出庭。国王知道他在那里不可能受到公正的审判，便拒绝屈从于这样的条件，甚至根本不承认任何传唤依据，视之为侵犯王室特权的严重侮辱。安妮·博林的父亲受封为威尔特郡伯爵，把国王的理由带给教皇；但没有国王代理人身份，也拒绝行圣父为此仁慈地提议的吻足礼。这是英格兰第一次表示大不敬。^⑤

自然，当亨利越来越激烈地反对教皇和教会，就越来越不满沃尔西红衣主教。亨利重新开始迫害昔日的宠臣，原因最有可能是预计他会反对。沃尔西在埃塞尔留了一段时间后，获准迁居里士满。亨利送给他那里的一所宅第，交换他的汉普顿宅第。但廷臣们厌恶他仍然跟国王近在咫尺，便谋求到一道命令：让他迁居约克教区。红衣主教明白抗拒是徒劳的，便移驻约克郡考伍德。他在那里殷勤好客，大受左近乡里的欢迎。^⑥ 但他没能不受干扰地隐居很久。诺森伯兰伯爵奉命逮捕沃尔西，不顾其神职人员身份，坐以大逆罪，解往伦敦受审。红衣主教部分由于旅途劳顿，部分由于忧心忡忡，患病继而下血。他勉

① Wood, hist. and an. Ox. lib. i. p. 225.

② Burnet, vol. i. p. 6.

③ Rymer, vol. xiv. 405. Burnet, vol. i. p. 95.

④ Rymer, vol. xiv. p. 454, 472.

⑤ Burnet, vol. i. p. 94.

⑥ Cavendish, Stowe, p. 554.

强抵达莱斯特修道院，迎驾的方丈、僧侣对他相当尊重敬畏。这时，红衣主教告诉他们：他将葬身此地。他随即卧床，再也没能起身。红衣主教在弥留之际对押送他的伦敦塔卫生长威廉·金斯顿说：“我衷心请求您转告国王陛下，替我恳求国王回顾君臣遇合的始终，尤其是有关王后的事宜。然后，国王的良心会告诉他：微臣何曾冒犯天颜。”

“君威无上，君心无极。国王宁可危害半个王国，也绝不愿自己的意志受到丝毫挫折。”卫生长回答。

“我向您保证：我经常跪在国王面前，往往长达三小时，试图改变他的心意和愿望，但从未成功。如果我侍奉上帝有侍奉国王的一半勤奋，它绝不会践踏我的垂暮之年。但我鞠躬尽瘁、孜孜不倦，只知侍奉君主，不知侍奉上帝，自当有此果报。因此，容我忠告足下：大人千里之才，何难位列枢机，君心难测，进言宜慎，上意既生，磐石难移。”^①

著名的红衣主教就这样去世了。他的性格和命运同样千变万化、不同凡响。宠臣的某些举措必须归咎于国王的顽固和骄横，不应独任其责。鉴于亨利一朝后期的暴政尤甚于沃尔西秉国时期，我们倾向于怀疑那些把暴政归咎于大臣的史家缺乏公正。沃尔西在对外事务中影响了国王，往往自诩效命君主，其实只为私人动机。我们一定记得：他觊觎法座，只要如愿以偿就能适当回报亨利的一切恩宠。安布罗瓦红衣主教在法兰西名垂青史，总是以此为自己的举措辩解。他的所作所为跟沃尔西相当类似。我们有理由相信：亨利熟知大臣的心意，乐于促成，引以为荣。国王得知沃尔西去世颇为遗憾，总是善意地回忆他，证明他最后受到的大逆指控毫无依据、不值一嗤。

新国会和教务会议一起举行，国王有力地证明了他巨大的权威和压制神职人员的意图。国王已经利用几乎废弃的古代法律来毁灭沃尔西——他行使

① Cavendish.

教廷使节权力,虽然经过国王同意,仍然成为非法。国王现在如法炮制,利用同样的法律反对教会。教会僭称:教皇特使法庭对所有人都有管辖权。这就是说:整个教会已经违反了补充条例。总检察长据此对他们全体提出了起诉。^① 教务会议知道:反对国王武断意志的推论或裁决;申诉他们不服从沃尔西委任的法庭肯定大祸临头;教皇特使法庭经过亨利的同意,受到国王权威的支持;都是徒劳无益。因此,他们选择恳求君主大发慈悲。他们同意缴纳十一万八千八百四十镑,请求开恩。^② 通过类似的勒逼,他们也承认:“**国王是英格兰教会和神职人员的保护者和最高首脑**。”不过,有些教士机智地插入了一项附加条件:“**只要基督的律法许可**。”

下议院发现教士获得宽恕,开始担心自己。他们为了以后不致因为屈从教皇特使法庭而招致麻烦,并以类似方式献金来换取宽恕。因此,他们向国王请愿:要求豁免信徒臣民。但国王予以拒绝。国王告诉下议院:他如果选择宽恕,只能出于自己的善意,而不能出于他们的要求,以免有胁迫之嫌。过了一段时间,在下议院对国王的让步已经不抱希望时,国王才乐于宣布宽恕信徒臣民。下议院对国王的大慈大悲感激涕零。^③

由于厉行补充条例,罗马教廷丧失了可观的利益和更多的权力。在相当程度上,教皇和英格兰神职人员的联系已经瓦解。在新召开的会议上,国王和国会立场一致。他们通过法案:禁止征收年贡或初费(first fruits)。^④ 初费是所有空缺主教辖区的一年租金,为数可观。新任教会长老向罗马教廷缴纳年贡,才能获得教皇法旨。自亨利七世即位第二年以来,罗马教廷年贡岁入不下十六万镑。由此,国会将年贡削减到主教辖区所有收益的百分之五。国王获得授权:调整这些费用,凭一己之意予以认可或否决,这更令教皇恐慌。国会

① Antiq. Brit. Eccles. p. 325. Burnet, vol. i. p. 106.

② Hollingshed, p. 923.

③ Hall's chronicle. Hollingshed, p. 923. Baker, p. 208.

④ Burnet, vol. i. Collect. No 41. Strype, vol. i. p. 144.

还投票通过：罗马教廷就此发布的一切谴责完全无效。弥撒照常举行，圣事照常管理，如同这些谴责从未颁布。

本届下议院向国王提出了针对教会法庭滥权和压迫的一长串怨诉。他们着手制定法律，矫正这些弊端。这时，国会意见分歧，直到本届会议结束还没有完成一切事务。当时的习俗是：遗嘱处置土地之类的安排或信托，都会受到勒索。国王乃至一切领主在监护、婚姻、继承费等事务中无不如此。根据同样的条例，国王丧失了最初继承份额和扈从的收益，绝非纤介之数。亨利的法案没有一举纠正弊端，只是略加节制。他满足于人人有权以此方式来随意处置半数地产。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国会：“如果他们不接受提出的通情达理的条件，我就会找出极端的法律；然后再也不会提出这样合理的条款了。”上议院很乐意接受他的条款，但下议院拒绝批准法案。从这次不寻常的事例中，亨利可能会发现：他的权力和权威虽然广大，但仍然并非毫无限制。然而，下议院有理由懊悔自己的胜利。国王兑现了他的威胁。他召集法官和最有能力的律师，讨论争议问题。结果决定：立遗嘱人不得损害继承人利益，不得随意处置土地的任何部分。^①

国会短暂休会后，再次召集。国王提出双重誓言问题：主教在就职仪式上向教皇和国王宣誓效忠。教会长老对两位主君的平行效忠似乎引起了疑问。^②国会表明他们有意废除对教皇的效忠。程序正在启动，因威斯敏斯特突然暴发瘟疫而临时休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姆塞先生提出：国会应该劝谏国王回到王后身边，停止离婚诉讼。国王因此召来发言人奥德利，向他解释长期以来的良心负担。国王说：他的青春热情早已不再，离婚绝不是为了放纵声色；全欧洲学术团体无不抱有同感。他补充说：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男子跟两姐妹联姻。但他相信，他不幸成了第一

① Burnet, vol. i. p. 116. Hall. Parliamentary history.

② Burnet, vol. i. p. 123, 124.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个娶了寡妇的基督徒。^①

休会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爵士预见到：国王和国会的一切举措都将导向跟罗马教廷决裂和宗教改革。他的原则无法与宗教改革同流，因此请辞掌玺大臣之职。释禄身轻，无爵意愉，尤甚于华袞加身之日。此君操守严正、品格端方，但并未侵蚀，乃至减损和顺的天性和欢愉嬉乐的自然倾向。他历经荣显、处之泰然，身居枢要、谦恭下士，贫而不伤、退而无怨，心清意定、不亢不卑。其家人习于荣华富贵，凄恻形于颜色。他带头苦中作乐，使他们耻于为此区区不幸，错失片刻欢愉。国王素来看重他的盛德，勉强接受辞呈。不久后，他委派托马斯·奥德利爵士继任掌玺大臣。

英格兰忙于侵夺教皇和教会的权威。在此期间，罗马教廷并非没有担心。教廷有充分的理由害怕丧失她在英格兰的一切权威。列邦之中，英格兰王国事圣座最忠、供奉最厚。帝国的红衣主教敦促克莱蒙特教皇断然反对国王。与此同时，更温和公正的顾问指出他举措无礼。堂堂名君以笔以剑捍卫教廷，却得不到依据如此充分的照顾。以往跟他地位尊荣相当的君侯很少受到这种待遇。虽然有这些谏言，罗马教廷仍然接受王后的申诉，传唤国王出庭。宗教法庭几次开庭，审核他们婚姻的可靠性。亨利心意已决，不派任何代理人出庭申辩。他只派爱德华·卡恩爵士担任所谓的辩护人，陈述他的理由，不服从教皇的权威。他说：如果允许王国内的申诉，就一定会牺牲他的王室特权。良心问题并非权力或利益，没有任何代理人能够设身处地地充分表达只有他冷暖自知的心声。他为了以此支持自己、进一步保障他脱离罗马的意图，提议在布洛涅和加莱会晤弗朗西斯，重申政治联盟和个人友谊，协调一切共同防务措施。亨利甚至劝说弗朗西斯效法他不再屈从罗马教皇，自己管理教会事务。他自己决心已定，同样决定承受一切后果，并私下与安妮·博林举行婚礼。他

^① Herbert. Hall, fol. 205.

事先已经封安妮为彭布洛克女侯爵。不久后出任考文垂主教的洛兰·李主持婚礼。国舅诺福克公爵、安妮的父母、兄弟和克兰默博士都出席了婚礼。^① 安妮婚后不久就怀孕了。国王大为满意，国民也认为这是王后以往庄重、端正的有力证明。

国会再度召集。亨利与国民大议事会携手，稳步渐进地解除了罗马教廷的纽带，开始约束罗马教皇的滥权。一项法案剥夺了罗马受理一切婚姻、离婚、遗嘱和其他教会法庭诉讼的权力；声称向外国法庭申诉，有失王国的体面，且断定这些诉讼不可避免的靡费和拖延令人难以忍受。^② 王后怀孕以来，亨利进一步表现出对教皇的蔑视，公开承认他的婚姻。国王为了消除这次婚姻的一切疑义，准备采取措施，通过正式判决宣布：他跟凯瑟琳的婚姻不合法。自然，他应该首先颁布这个判决，而后迎娶安妮。^③

国王即使在顾虑、懊悔第一次婚姻的情况下，仍然对凯瑟琳礼敬有加。他竭尽软化游说的手段，想诱使凯瑟琳不要向罗马申诉而反对离婚。亨利发现凯瑟琳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理由，就完全取消了一切拜访和交流，要求她随意选择他任何一处宫室为驻所。她在邓斯泰布尔附近的安普希尔驻留了一段时间。国王指定在此地开庭，以核查他婚姻的可靠性。^④ 选择附近的地点，目的是为了排除凯瑟琳一切不知情的借口。她没有回应传唤，既没有亲自出庭，也没有派代理人出庭。她被宣判为抗拒法庭；教会长老继续审核。阿瑟王子确

① Herbert, p. 340, 341.

② 24 Hen. VIII. c. 12.

③ Collier, vol. ii. p. 31, and Records, No 8.

④ 伯内特主教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克兰默就职必需的谕旨。第一份谕旨递交给国王用玺，提名克兰默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第二份谕旨颁发给克兰默本人，同样委任他为大主教。第三份谕旨豁免他的一切责难。第四份谕旨颁发给诸位副主教，命他们接受、承认他的大主教职位。第五份谕旨颁发给教务长和会吏，内容相同。第六份谕旨颁发给坎特伯雷的神职人员。第七份谕旨颁发给教区所有信徒。第八份谕旨颁发给所有土地持有人。第九份谕旨指示他身披主教衣冠献祭、宣誓。第十份谕旨授予他道袍。第十一份谕旨命约克大主教、伦敦主教为他披上道袍。执掌教区的众多仪文是教皇设定的，意在敛财。值得注意，克兰默向教皇宣誓前声明：他对上帝、国王和国家的责任不会因此受到约束，他弃绝一切与这些责任相抵触的事物。这是一批决疑者的发明，颇有碍于克兰默声明的最严格的诚实和一丝不苟的良心。Collier, vol. ii. in Coll. No 22. Burnet, vol. i. p. 128, 129.

已圆房的证据再度提出；各大学意见以及两年前坎特伯雷和约克教士会议的判决予以宣读。经过这些预备性步骤后，克兰默进而宣判：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不合法、无效，予以撤销。他随后判决，承认亨利和安妮·博林的婚姻。不久后，安妮·博林就公开加冕为王后，典礼极尽壮丽庄严之能事。^① 复杂纠结的离婚案终于了结，安妮平安分娩，更让亨利心满意足。她生下的女儿伊丽莎白日后威震四海，安享盛誉福运。这孩子的出生让亨利如此高兴，以至于他不久就封伊丽莎白为威尔士公主。^② 这一举措多少不尽合法，因为公主并非王位的当然继承人，只是假定继承人。但国王在上一次婚姻中，已经认为应该将这一尊荣授予女儿玛丽。他下定决心，授予当前婚姻后裔同样的荣衔，剥夺长公主一切继位的希望。结婚后，他对新王后的尊重有增无减。所有人都预测：由于亨利一向兼有严厉和放纵的倔犟性情，当前这一位王后论出生虽然远离王位却完全支配了高居王座的人。国王为了抹去第一次婚姻的所有痕迹，派蒙特乔伊拜见不幸的废后，通知她：从此以后，她只能享受威尔士亲王遗孀的待遇。为了诱使凯瑟琳默许这个决定，一切手段都已用尽。但她依旧顽强地坚持她的婚姻有效。她拒绝接见任何不以王后旧礼相待的人。亨利待她一向宽宏大量，现在按捺不住了，他恐吓服从她这项命令的仆人，但始终无法让她放弃坚持王后的荣衔和派头。^③

这些举措对法座的权威和声望极其有害。情报传到罗马，红衣主教团勃然大怒。皇帝党红衣主教敦促教皇颁布决定性的判决，向亨利投下精神雷霆。但克莱蒙特仅仅宣布克兰默的判决和亨利的第二次婚姻无效，威胁他如果不在 11 月 1 日前将一切恢复原状就要施加绝罚。^④ 教皇期待他们的争执能更友好地收场，因为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无法对国王采取极端行动。

① Heylin, p. 6.

② Burnet, vol. i. p. 134.

③ Herbert, p. 326. Burnet, vol. i. p. 132.

④ Le Grand, vol. iii. p. 566.

教皇主张费拉拉公爵对勒佐和摩德纳享有主权,^①将他的要求提交给皇帝仲裁。他惊讶地发现判决对他不利,因失望而愤怒,从而乐于倾听弗朗西斯亲善的提议。法兰西国王为次子奥尔良公爵向教皇的侄女凯瑟琳·德·美第奇求亲。克莱蒙特对这次光大家门的联姻非常满意。教皇和法兰西国王约定在马赛会晤。弗朗西斯同时是亨利和克莱蒙特的朋友,便出面斡旋,在新盟友和英格兰国王之间调解。

如果弗朗西斯早几年跟教皇联姻,不难调解教廷和亨利的争执。因为国王的要求司空见惯,教皇也有充分的权力,能特许亨利和凯瑟琳结婚就能撤销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然而,随着争执不断发展,双方的情况都已经大为改观。亨利早年濡染敬畏公教会的感情,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他发现所有等级的臣民都站在他一边,愿意支持他切断对外依赖。他尝到了教会当家做主的滋味,不大可能考虑重新臣服教皇。另一方面,教皇同意国王的要求,就有自毁权威的明显风险;因为宣判离婚不再仅限于撤销尤利乌斯的法旨,而是承认了教皇权力的僭越性。可想而知,以后路德派会视之为重大胜利,更加顽固地坚持他们现在的教义。不过,虽然有这些障碍,弗朗西斯仍然没有放弃和解的希望。他注意到:亨利仍然有青睐天主教会的残余偏见,担心引发过于激烈的变革。他明白:克莱蒙特能保持英格兰的臣服,利莫大焉。这个王国堪称教皇冠冕上最璀璨的珠宝。他希望:双方有这些动机,应该易于和解。他便继续推动斡旋。

一开始,弗朗西斯说服教皇:如果国王派代理人去罗马,以此遵奉法座的仲裁,教皇就应该派特使去康布雷,启动程序。然后,教皇应该立刻接受要求,宣判离婚。接下来,巴黎主教贝莱前往伦敦,获得国王的承诺:只要排除皇帝党红衣主教,他就同意遵奉罗马宗教法庭的裁判。教会长老携带这个口头承

^① Burnet, vol. ii. p. 133. Guicciardini.

诺前往罗马。教皇同意：如果国王书面同意同样的目的，国王的要求应该充分予以满足。全欧洲都会看到：英格兰和罗马教会的断然决裂以亲善收场。^① 然而，最重大的事务常常受到最琐细因素的左右。使节携带国王的书面承诺，途中耽误了约定的日期。罗马获悉：英格兰出版了诽谤罗马教廷的材料，而且在国王面前上演丑化教皇和红衣主教的滑稽戏。^② 教皇和红衣主教怒火中烧，召开宗教法庭，突然宣判：亨利和凯瑟琳的婚姻有效；如果亨利拒绝信守婚姻，就将他逐出教门。两天后，使节抵达。这时，一向谨慎的克莱蒙特已经草率行事。他虽然衷心懊悔鲁莽的举措，然而覆水难收，原先的基础已经不可能复原了。

教皇以往的举措一向温和节制。如果始终如此，在亨利有生之年恢复对英格兰的若干权威和影响未必无望。国王的性情既冲动又倔犟，已经一举挣脱了教皇的枷锁，不可能驯服地重新俯首帖耳。他甚至跟罗马谈判期间，要么对成功不抱多大希望，要么对谈判漠不关心，照样召开国会，颁布了彻底摧毁教皇权威的法律。国民已经逐渐为这一重大变革做好了准备。每开一次会议，就要多多少少地削减罗马教皇的权力和收益。几年来，国民受到谨慎的教导：大议事会的权威远远高于教皇。但现在一位主教每个星期天都会在圣保罗的十字架前谆谆宣讲：教皇的权威不会超出自己教区的边界。^③ 国会议事记录显示：他们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有理由相信：国王若能首先从罗马获得有利的判决，排除第二次婚姻和继承问题的一切疑义，确实可能对罗马教皇以礼相待，但他认定的王室特权绝不会有分毫让步。早在罗马采取激烈措施的消息传到之前，本届国会就已经通过了最重要的法律，足以佐证这种观点。

缴纳给罗马教廷的一切费用和罗马教廷颁布的一切条例、法旨、豁免权皆

① Father Paul, lib. 1.

② Father Paul, lib. 1.

③ Burnet, vol. i. p. 144.

予以废除。修道院仅仅服从国王的视察和管理。惩罚异端的法律放宽。仅仅根据怀疑,没有两名以上合法证人,不得拘押或起诉任何人。宣布反对教皇权威不属于异端。主教通过王室核准的选举团会议产生;万一教务长或会吏弃权,就通过特许状产生。无须罗马的道袍、法旨或条例。康佩吉奥和吉赫拉西两位意大利人迄今享有索尔兹伯里和伍斯特的主教辖区,予以褫夺。^① 以前的法律就已经反对征收年贡或初税,但授权国王决定暂缓执行还是强制执行,这时最终确立。神职人员其实两年前已经屈服且处境维艰,但在这次会议上遭到了国会制裁。^② 神职人员在这一次屈服中承认:只有国王有权召开教务会议。他们承诺:未经国王同意,不得颁布新教规。他们同意:国王应指定三十二位特派员审核旧教规、删除损害王室特权的条款。^③ 主教法庭的判决,也可以通过大法官法庭(chancery)向国王申诉。

但本届国会通过的最重要法律乃是规范王位继承的法律。国王和凯瑟琳的婚姻宣布为不合法、无效、无果;国会批准了主教法庭撤销这次婚姻的判决;国王和安妮王后的婚姻予以确认和肯定;王位继承限定于这次婚姻的后裔,万世一系;四海臣工奉命宣誓效忠于这一世系,违者随国王心意处以监禁、没收全部动产;诽谤中伤国王、王后及其后裔者皆坐大逆罪。国会如此表现忠顺后休会。这些法案对教皇极尽轻侮,对教皇的权威极尽破坏性。正当克莱蒙特教皇宣布对国王不利的草率判决时,国会通过了这些法案。亨利怨恨凯瑟琳王后的顽固,因此剥夺了她女儿继承王位的一切希望。

国王发现:他的教士臣民和平常臣民同样恭顺。教务会议通过决议:禁止向罗马上诉,以及国王可以向大议事会申诉教皇的法案应该张贴在王国境内所有教堂门口。他们投票通过决议:根据上帝的律法,罗马主教跟其他外国主

① Le Neve's Fasti Eccles. Angl.

② 25 H. 8. c. 19.

③ Collier, vol. ii. p. 69, 70.

教一样，在英格兰王国没有司法管辖权。教皇及其前任在英格兰王国实际行使的权力仅仅源于僭越和英国列王的忍让。四人在下议院投票反对，一人弃权。上议院全体一致通过。主教们如此恭顺，甚至向王室主动奉献新的权力，承认他们的一切精神权威和教区权威都最终源于世俗当局，完全依赖国王陛下的善意。^①

四海臣工宣誓效忠继位世系。在知名人士当中，只有罗切斯特主教费舍尔和托马斯·莫尔有点踌躇，不愿承认其合法性。费舍尔主教由于某些做法而不快，似乎主要暴露了他的轻信而非恶意。但莫尔以美德和廉正在王国境内最负盛誉。据信，他的威望已经影响了其他人的看法。为了说服他相信宣誓的合法性，费了很大力气。他宣称毫不怀疑继承世系，认为国会完全有权力确定继承序列。他本人宣誓效忠于指定继承人，但拒绝通过法律来规定誓词；因为誓词的前言声明国王与安妮的婚姻合法，因此暗示他以前跟凯瑟琳的婚姻不合法、无效。大主教克兰默和现任国务秘书克伦威尔非常热爱、尊重莫尔，恳求他搁置顾虑。对莫尔而言，他们出自友谊的勉强似乎比拒绝宣誓带来的一切惩罚分量更重。^② 莫尔态度虽然温和，但决心已经下定。国王被他和费舍尔激怒，下令依例起诉，将他们投入伦敦塔。

国会再度召集，将英格兰教会唯一最高首脑的头衔授予国王，因为他们早已将属于教会首脑的实质权力交付给他了。在这项值得纪念的法案中，国会授予他以下权力，或承认他拥有以下固有权力：“核查、约束、矫正、改革、命令、调整、镇压、修正精神权威或司法管辖权蒙受的一切谬误、异端、滥权、犯罪、冒渎、暴行。”^③ 他们还宣布：针对国王、王后及其继承人的恶意图谋、想象、言辞以及剥夺其尊位荣衔的企图皆为大逆。他们授予国王征收年贡和圣俸什一税

① Collier's Eccles. Hist. vol. ii.

② Burnet, vol. i. p. 156.

③ 26 H. 8. c. i.

的一切权力,这些收益以前都缴纳给罗马教皇。他们拨给国王补助金和十五分之一税。他们以大不敬罪剥夺了莫尔和费舍尔的公权。他们规定英格兰法律完全适用于威尔士领地,从而完成了二者的联合。

就这样,教皇的权威像所有过分的权力一样,由于贪得无厌、滥施僭越超过了任何人类理念或偏见所能支持的程度而毁灭。前代的赎罪券使教廷的富足登峰造极,但如此公然滥权在德国激起了第一批骚乱和反对。欧洲各君侯、门第之所以尽忠罗马,教廷授予的豁免特权居功不小。但由于不幸的因缘巧合,英格兰脱离罗马教会肇基于此。承认国王的至高权力,将精神权力归并于世俗权力,从而简化了政府结构,阻止了教俗司法管辖权的边界之争。二者的确切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经过这样的准备,迷信的淫威受到遏制、枷锁得以挣脱。长期以来,人类的一切理性、谋略、勤勉都在它们的束缚之下。可想而知:君主兼任王国教、俗两界首脑,往往會以宗教为政府工具,没有像罗马教皇那样有滥用教权的利益动机。危险仅限于国王的偏见和固执,这些都有其固有限度,不至于滥权。总而言之,这次变革产生了许多有益的后果。不过,主要的当事人大概既没有这样的意图,也没有预见到这样的结果。

在此期间,亨利改革国教,井井有条,境内宴安。正当他在英格兰的权威似乎已经根深蒂固时,却卷入了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动荡中。

基尔代尔伯爵任爱尔兰副总督,是国王私生子、爱尔兰总督里士满公爵的部下。基尔代尔被控暴力侵害世仇奥索雷家,受到传唤,以便解释其所作所为。他把权力交给儿子;后者一听说父亲入狱,生命有虞,立刻举兵造反,跟奥尼尔、奥康内尔和其他爱尔兰贵族会师。他纵兵肆虐,杀害了都柏林大主教艾伦,围攻都柏林。在此期间,基尔代尔死在狱中。他儿子继续叛乱,向皇帝求援。皇帝答应提供援助。国王只得向爱尔兰派出一些军队。爱尔兰倦于叛乱,虽然皇帝履行诺言,但这位年轻贵族仍然不得不向新任总督、多塞特侯爵的弟弟伦纳德·格雷勋爵投降。他和五位叔父都被送往英格兰,审判定罪后

明正典刑。只有两位叔父为了挽救家族，假装加入国王一党。

昂古斯伯爵业已完全主宰苏格兰，控制了当时年幼的国王。他因利乘便，以宗族之力占据政府要职。但他的配偶寡后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她由于嫉妒和厌恶离开了伯爵，谋求离婚，另嫁一位名叫斯图亚特的世家子。她联合所有心怀不满的贵族，反对昂古斯伯爵的权威。詹姆斯自己不满任人摆布的处境，先后秘密联络沃尔特·司各特和雷诺克斯伯爵。他们策划以武力从昂古斯手中解救国王，但两次都遭到失败。詹姆斯不耐约束，最后寻路逃往他母亲驻跸的斯特林城堡，召集所有贵族勤王，推翻了道格拉斯家族的统治。昂古斯兄弟被迫逃往英格兰，寻求亨利庇护。苏格兰国王现在已经成年亲政、勇武有为，压制诸侯的掠劫和混乱。这些虽然扰乱了公共和平，却有利于苏格兰的尚武精神，由此维护了邦国的独立。他乐于再续苏格兰和法兰西的古老联盟，但他发现弗朗西斯与英格兰紧密联盟，对他的提议相当冷淡。因此，他更青睐皇帝的提议。皇帝希望，这样的联盟可以扰乱英格兰。皇帝向苏格兰国王推荐三位公主，都是查理的近亲，都叫玛丽：他妹妹，匈牙利寡后；他侄女，葡萄牙公主；他表亲亨利的女儿（他假装不知道她的父亲）。詹姆斯最倾向于后者，但考虑后发现行不通。他对法兰西的自然偏好最终压倒了其他一切考虑。跟弗朗西斯联盟，势必跟英格兰维持和平。虽然舅舅亨利邀请他到纽卡斯尔会晤，讨论两国镇压教会，挣脱罗马枷锁的共同措施；但詹姆斯绝不会接受劝诱，让自己落入亨利的掌控之中。他为了给拒绝会晤寻找借口，便向教皇请示。教皇颁布了一道简短的禁令，不许他跟神圣教会的敌人见面。亨利根据这些举措，不难断定外甥的友谊难以信任。但这些事件还要过一段时间才会发生。

第三十一章

亨利八世(五)

国民的教旨——国王的教旨——公卿的教旨——宗教改革日有进展——托马斯·莫尔爵士——肯特郡女子——罗切斯特主教费舍尔受审受刑——托马斯·莫尔爵士受审受刑——国王被逐出教门——废后凯瑟琳之死——取缔小修道院——召开国会——教务会议——翻译《圣经》——安妮王后蒙羞——安妮受审——处决——召开国会——教务会议——民情不悦——叛乱——王子爱德华出生和废后简去世——取缔大修道院——红衣主教波尔

自古至今，英格兰教俗之间、本土教士与罗马教廷之间，利益有别，一向对立。邦国弃绝教皇，早有充分准备。民气已开，足以看穿教会集团滥权的目的不外乎谋求世俗利益。如今，教士大祸临头。这些臣民似乎具备相应的人类理解力，甚至人民都感受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能够领会罗马教皇为贪利而引入宗教的无数发明到底有什么意图。但是，当改革者由此陷入圣礼的本质、恩典的发布、接受神性的条件等种种争论时，人们惊慌失措，相当一段时间不知道应该选择哪一个党派。以前的教士和信徒都极度蒙昧无知，因而免于神学争执，真诚但懒惰地接

受一般认可的观点。群众拥护他们，既不是由于论证的力量，也不是由于对他们的论敌抱有反感和偏见，永远是些更自然、更有力的影响因素。因此，新观点一旦提出，获得权威的支持，由此引起群众的注意，他们就会感到完全不适用于专题探讨。群众永远在斗争的党派之间摇摆。因此，人民受到蛊惑，就会迅速投身于暴力活动，哪怕是在截然相反的方向上。因此，人民显然喜欢滥用力量、为当前的权力牺牲最神圣的原则。因此，新教义经过一段时间的迅速进展后，不久就会完全停滞不前。人们一旦加入了特定教派，便会习惯性地憎恶他们所称的异端，从而给自己树立了坚固的堡垒，就会更顽固地坚持所学到的教义。两种宗教的边界就此固定，无法改变。

改革者最初的进展主要归因于他们提出：一切教义服从个人判断，号召人人审核以前强加给他们的教义。群众虽然完全不能胜任这种任务，但仍然心满意足。他们反对古代权威的偏见时，自以为正在运用自己的判断，其实不过是接受了另一种更强有力的偏见。创新自身即成为教义；在论辩中获得想象的快乐；改革派布道者的热忱、耐心，甚至乐于面对迫害、死亡、折磨；厌恶古老宗教的约束；反对教会暴政和唯利是图的义愤——人民普遍受到这些动机影响。这个时代的人们大体上在这些因素诱导下，抛弃了祖辈的宗教。

然而，正如宗教服从个人判断的理论对人民来说易于接受；相应的，在某些方面，这种理论对统治者的权力相当危险。绝对服从是世俗政权的主要基础，似乎将会因此而毁灭。罗马教阶体制如此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一旦动摇就会构成先例，为其他的革新开辟道路；这种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共和主义的精神在改革者当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更增加了这种疑惧。闵采尔和其他再洗礼派教徒在德国煽动民众、暴乱肆虐，^①为责难改革提供了新借口。我们不能得出结论：因为我们时代的新教徒和其他教派同样是本分良民，所有这些担心

① Sleidan, lib. 4. & 5.

就毫无依据。虽然改革的原则是个人判断的自由，事实上却无法施行。人们通常满足于将这些无论多么新颖的建构潜移默化地纳入到早年所受的教育中。

亨利享有的绝对权威，非欧洲任何君侯所能及。即使教皇身居罗马、权兼政教，同样瞠乎其后。^① 任何教旨素有煽惑叛乱之名，绝难指望他的青睐或赞同。除了政治猜疑，还有另一个因素促使专横的君主敌视改革派。他早已公开宣布反对路德，已经名列学术争论的一方，因此获得了廷臣和神学家无限的赞美。他因想象的成功而陶醉、因天性傲慢固执而盲目，为自己的博学多才而自鸣得意。只要不快他的心意，他就会报以不耐烦和轻蔑。路德也失之鲁莽，待王家论敌轻慢无礼。虽然他后来最谦卑地向亨利屈服，为过去的激烈表现道歉，但国王对他本人和教义的仇恨永远无法抹去。异端理念在国王心目中明显仍然可憎可畏。他对罗马教廷的怨恨纠正了相当一部分早年的偏见，坚持剩下的偏见就成了荣誉攸关的执著。国王虽然跟天主教会及其首脑罗马教皇决裂，仍然自命信守天主教义，用火与剑来维护他心目中教义的想象出来的纯洁性。

亨利的大臣和廷臣的性格和做法千差万别。终亨利一朝，他们似乎都在新旧宗教之间摇摆不定。王后就利益和偏好而言，都跟改革派结下不解之缘。克伦威尔就任国务秘书，国王的宠信与日俱增；他的观点跟王后相同。他为人谨慎干练，能够以非常有效但隐蔽的方式为新近的改革出力。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秘密接受了改革派的教旨，因正直诚实赢得了亨利的友谊。在那个党派纷争、暴君凌虐的时代所允许的范围内，他的品德堪称出类拔萃。另一方面，诺福克公爵坚守古老的信仰。他位尊才美，无论战争还是和平，在国王的枢密院中都享有很大的权威。日后任温切斯特主教的加德纳已经自居为同一

① 国王的大臣向教皇自陈，(拉丁)原文如下：An non, inquam, sanctitas vestra plerosque habet quibuscum arcanum aliquid crediderit, putet id non minus celatum esse quam si uno tantum pectore contineretur; quod multo magis serenissimo Angliae Regi evenire debet, cui singuli in suo regno sunt subjecti, neque etiam velint, possunt Regi non esse fidelissimi. Vae namque illis, si vel parvo momento ab illius voluntate recederent. Le Grand, tom. iii. p. 113.

国王有一次当着枢密众卿说：任何人妄议国王或朝政，都绝无意义。他会让他们明白，他才是主人。(拉丁)原文如下：Et qu'il n'y auroit si belle tete qu'il ne fit voler. Id. p. 218.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个党派。他性格柔媚、手腕圆滑，因此作用很大。

党派形同水火。这些大臣都不得不掩饰个人意见，假装完全跟君上一心一德。克伦威尔和克兰默外表上仍然遵奉旧教宗旨，但他们巧妙地利用亨利的愤怒，扩大他和罗马教廷之间的裂痕。诺福克和加德纳假装赞同国王的至高权力和脱离罗马；但他们鼓励亨利忠爱天主教信仰，挑唆他惩罚那些敢于反对他的神学原则的异端分子。双方都希望：依靠他们无限的恭顺，把国王拉到自己这一党。在此期间，国王在党派之间保持平衡，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向他献殷勤。由此，他享有无限的权威。虽然他的一切举措其实都源于为所欲为的性情，但他却碰巧顺风顺水，大大增加了武断的权力，效果远远超过任何老谋深算的政策。双方都依靠谋略、矫饰、伪善自卫，学会了服从君主，并有所保留，他们从来不能指望完全赢得君心。但众所周知：亨利的性情坦率、诚实、直爽，脾气急躁；双方都害怕因为最小的冒犯而失去君心，于是欺骗自己相信：以盲目的恭顺逢迎上意，就能真正彻底地将他拉到自己一方。

国王的举措暧昧不清，虽然保障了廷臣的敬畏，但在人民中，大体上鼓励了新教的发展，加强了当时普遍的革新精神。革新势不可当，唯有当局完全一致，持续稳定的镇压才能压制下去。一些英国人，丁达尔、乔伊、康斯坦丁和其他人，担心王权的迫害，逃往安特卫普。^① 有时，低地各省享有巨大的特权，为他们提供了保护。这些人用英文著书，反对罗马教会的腐败，反对圣像、圣骨和朝圣。他们激发了大家的好奇心，讨论最重要的神学问题：接受至高存在。他们的意见跟路德派和其他新教徒一致，宣称信仰是救赎的唯一源泉，依赖善功是绝对可靠的毁灭之路。^② 根据他们的理解，道德责任跟祭拜仪式、修道隐

① Burnet, vol. i. p. 159.

② (拉丁)原文如下：Sacrilegium est et impietas velle placere Deo per opera et non per solam fidem. Luther aduersus regem. Ita vides quam dives sit homo christianus sive baptizatus, qui etiam volens non potest perdere salutem suam quantiscunque peccatis. Nulla enim peccata possunt eum damnare nisi incredulitas. Id. de captivitate Babylonica.

遁毫无区别。另一方面，古老宗教的辩护者坚持**善功**有益；但他们虽然不排除这种所谓的社会美德，但仍然主要推崇和推荐教会唯利是图的迷信。这些流亡者的著作已经偷运到英国境内，开始在各地产生皈依者；但公认丁达尔翻译的《圣经》对既存教会最危险。此书第一版错误百出，很容易引起相当的反对。丁达尔很穷，负担不起大量的修正版，希望有机会校正他意识到的错误。汤斯达尔当时任伦敦主教，不久后任达勒姆主教。他为人极其稳健，希望以最温和的方式阻止这些革新。他秘密下令购买能够在安特卫普找到的一切版本，在奇普塞德街当众焚毁。他资助丁达尔印刷正确的新版。由此，人民怨谤大作，说他把上帝的真言付之一炬。^①

沃尔西秉政时期，新教门徒几乎没有受到严重迫害。他虽然出身神职人员，但并不尊重教会，不会为了他们而施行暴政。他甚至受到一项弹劾：^②纵容异端坐大，保护而且释放了某些臭名昭著的罪犯。托马斯·莫尔爵士继沃尔西出任大法官，立刻变成了我们同情的对象。此君天赋典雅，谙熟古典的高贵精神，心胸极为宽大。他早年观念开明，甚至目前也偏于过度放任。他被诡辩激怒，以至于迷信古老宗教，极力迫害异端，为历来审判官所鲜见。他虽然有礼貌周到、廉正无私的外表，却仇恨异端、登峰造极。例如，坦普尔绅士詹姆斯·拜汉姆就受到他严酷的对待。拜汉姆被控倾向于新教，押往莫尔府上受审。他拒绝交代同犯，大法官当场下令鞭打，随后将他投入伦敦塔拷问。不幸的绅士熬刑不过，发誓弃教。但他随后因变节而极度自责，公开回到原来的教义，甚至追求殉道者的荣耀。他被判为顽固、反复的异端分子，在史密斯菲尔德接受火刑。^③

许多人在主教法庭受审，皆由细故，但其中颇能流露出党派精神。有些人

① Hall, fol. 186. Fox, vol. i. p.138. Burnet, vol. i. p.159.

② Articles of impeachment in Herbert. Burnet.

③ Fox. Burnet, vol. i. p.165.

教孩子用英文祷告上帝。另一些人用英文读《新约》，或是声言反对朝圣。庇护遭受迫害的传教士、忽视教会的斋戒、抨击神职人员的恶行，都是重罪。教士托马斯·比尔耐接受了新教义，后在威胁下放弃，但他深受悔恨的折磨，朋友们担心他陷于绝望的致命影响。最后，他的心灵似乎恢复了相当的平静，但这种外表的平静仅仅源于他的决心：公开承认真理、为真理殉道，从而赎清以往的变节之罪。他走遍诺福克，唤醒人民警惕偶像崇拜，不要相信救赎有赖于朝圣、圣弗朗西斯的斗篷、圣徒祈祷、圣像之类。他很快被捕，在主教法庭受审，判为异端反复，下令处以火刑。他在火刑柱上表现出卓越的忍耐、刚毅、虔诚，观众对他的受刑深感恐怖。一些在场的托钵修道士害怕他殉道的罪责落到自己头上，从而使他们丧失人民的捐赠，并请求他公开说明他们没有插手他的死刑。^① 他欣然同意，这样的温顺赢得了群众更大的同情。另一个人因为否认真在论被带到火刑柱上；他更有英雄气概，几乎欣喜若狂。他温柔地拥抱行刑的柴捆，视为获得永久安息的途径。简而言之，潮流已经转向新教义。如果人们有另一种心态，那么严刑峻法本来可以有效地压制革新，但现在只会帮助新教义在民众中扩散，以恐怖来刺激他们反对残酷的迫害者。

亨利虽然认为新教教义是异端，惩罚他们从不懈怠，但他知道，古老宗教的狂热信徒才是最可怕的敌人。这些人主要是修道士，他们直接依赖罗马教皇，担心废除教皇在英格兰的权威而会导致自己的毁灭。化缘修道士佩托在国王面前祈祷，向他保证：“许多撒谎的先知在欺骗他。但真正的圣人警告他，当心亚哈布的下场，狗会舔他的血。”^② 国王不以侮辱为意，让传道者平安离去。下一个星期天，国王让克林博士在他面前祈祷。克林博士为国王的举措辩护，称佩托为叛徒、诽谤者、狗和奸贼。同门修道士埃尔斯顿打断讲道，说克林只是一个撒谎的先知，企图将通奸的后裔插入继承世系，但他自己将会证实

① Burnet, vol. i. p. 164.

② Strype, vol. i. p. 167.

佩托所说的一切。亨利命狂躁的修道士闭嘴，但没有表现出其他的愤怒迹象。他只传唤佩托和埃尔斯顿到枢密院，申斥他们的不敬。^① 他甚至在枢密院仍然耐心忍受着两位修道士顽固傲慢的新表现。枢密大臣埃塞克斯伯爵告诉他们：他们犯上不敬，理应投入泰晤士河。埃尔斯顿回答：无论水路还是陆路，离天堂都一样近。^②

但若干修道士的密谋败露，可能危及国王，与谋者遭遇了更致命的后果。伊丽莎白·巴顿是肯特郡奥尔丁顿人，通常称为“肯特圣女”。她患有歇斯底里症，身体异常抽搐；导致精神同样失常，奇谈怪论脱口而出。整个过程中，她通常失去知觉，事后很快忘光。乡邻愚民大为所动，以为是超自然的表现。教区牧师理查德·马斯特斯心怀叵测，借此大做文章，企图名利双收。他拜见当时还在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沃汉姆，提交伊丽莎白的天启记录。他巧妙地引诱谨慎但迷信的大主教下令监护、观察伊丽莎白，仔细记录她以后的言辞。她获得如此显要人物的重视，不久就引起乡邻更多的关注。马斯特斯很容易说服他们和女子本人：她的谵妄是圣灵的感应。一如既往，幻觉之后就是欺诈。她学会了伪装恍惚；然后用异常的口音说话，仿佛有精神指导者在口授。马斯特斯跟坎特伯雷教士博肯博士有来往。他们策划在马斯特斯的教堂前树立圣处女像，吸引朝圣者（著名的圣像或圣骨一般都是这样操作的）。计划正在进行，伊丽莎白假装启示来临，要她求圣处女像治病。在大批群众面前，她被带到圣处女像面前，重新倒地抽搐；在最紧张的时刻，她的四肢和面容都扭曲起来；然后，她假装圣处女显灵、完全康复。^③ 奇迹很快蜚声海外。两位教士发现欺诈的成功超乎他们的预期，便开始得寸进尺，着手准备更重要的事业。他们教她抨击新教义，称之为异端；反对神权政治的革新；反对亨利跟凯瑟琳离婚。

① Collier, vol. ii. p. 86. Burnet, vol. i. p. 151.

② Stowe, p. 562.

③ Stowe, p. 570. Blanquet's Epitome of Chronicles.

的打算。她甚至宣称：如果国王执行计划，离婚再娶，一个月以后就不再是国王了。他不应该再享有片刻上帝给予的恩惠，而应该作为歹徒恶贯满盈。全英格兰有许多修道士幻觉发作，原因在于愚蠢、恶意或派性。修道士蒂林的著作记载了伊丽莎白的启示和预言。^① 天天都有新奇迹，人们的惊愕与日俱增；新女先知的圣洁和启示在各地讲道坛上回荡。她向凯瑟琳王后传信，规劝王后坚持反对离婚。教皇使节鼓励着民众的轻信。甚至罗切斯特主教费舍尔虽然既明智又博学，但还是禁不住这个如此有利于他所拥戴党派的观点蛊惑。^② 国王最后开始认为此事值得注意，下令逮捕伊丽莎白及其同党，交给星室法庭审理。在那里，他们未经用刑就直承其罪。当年年初召开的国会针对这起谋反欺诈案的某些参与者，通过了剥夺公权法案。^③ 伊丽莎白本人、马斯特斯、博肯、蒂林、里奇、里斯贝、戈尔德伏法。罗切斯特主教、阿贝尔、艾迪生、劳伦斯和其他一些人听过伊丽莎白的言辞，却未能察知其罪，^④ 坐大逆知情不举罪下狱。为了更好地防止群众受骗，女先知的许多奇迹骗局受到调查，甚至下流淫贱也公之于众。伊丽莎白及其同谋在异性相互吸引之下，自然亲昵无间。她卧室里发现了一道门，通向小教堂，方便她经常跟天庭交流；结果，博肯和马斯特斯把这条通道用在不那么纯正的目的上。

骗局败露，还伴随着许多可憎的丑闻。由此，教会尤其是修道士的信用大受损害，同时刺激国王报复他们。他取缔了三家方济各会修道院，发现如此弄权几乎没有激起反对的喧闹。他因此受到鼓励，把贪婪的手伸向剩下的修道院。在此期间，他惩罚了冒犯龙颜的人。国会将不敬君威、御衔列为大逆罪。国会后来又给国王增加了教会最高首脑的荣衔。否认国王的至高权力构成大逆罪，许多传道士和神职人员坐此新罪而丧命。将仅仅表达政治观点，没有实

① Strype, vol. i. p. 181.

② Collier, vol. ii. p. 87.

③ 25 Hen. VIII. c. 12. Burnet, vol. i. p. 149. Hall, fol. 220.

④ Godwin's Annals, p. 53.

际举措，尤其是那些并不影响国王世俗权力的人科以重罪，堪称暴政之尤。国会通过这项法律，就践踏了统治更自由的文明国民的一切准则。但整个政制已经剧变；多年来所称的异端，蒙大逆之罪，多多少少有些诡异。甚至冷酷严厉的亨利一开始也为这些血腥的举措而震惊；他竟然更衣改装，假装为他不得不采取的极端措施而悲哀。但他在狂暴的性情驱动下，仍然渴望将恐怖带给整个国家。在费舍尔和莫尔的案子上，他继续开辟暴政无法无天的范例。

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学识渊博、品格端方，远远超过其教会长老地位所需。长期以来，国王一向对他恩宠有加。他拒绝宣誓效忠继承世系，对伊丽莎白·巴顿的大不敬言论知情不报，因而入狱。他所有的收益乃至袍服都被剥夺，虽在风烛残年，只有破衣烂衫，几乎衣不蔽体。^① 他在这样的条件下，在狱中度过了一年多。这时，教皇有意补偿如此忠心耿耿的追随者，封他为红衣主教。但费舍尔淡泊荣华，宣称即使紫袍放在脚下，他也不会屈身拾取。这样提拔一个人，仅仅为了他反对王权，国王因此勃然大怒。他决定向无辜者发泄愤怒。费舍尔受到“否认国王至高权力”的指控，受审，定罪，斩首。

处决这位教会长老，意在警告莫尔。鉴于莫尔在海内外威高望重，学问品德享有盛誉，国王渴望他能屈服。君主还对莫尔怀有个人的尊重和喜爱，因为他专横、冲动的性情很容易受到特别反对他狂暴倾向的人吸引。但“国王至高权力”跟莫尔的原则截然抵触，从来没有说什么可以说服他承认这种原则。亨利虽然索求举国服从，但还没有用法律强制任何人为此宣誓。检察长里奇奉命刺探莫尔口风；莫尔那时已经入狱，对“国王至高权力”问题保持谨慎的沉默。从他口中仅仅套出一段话：关于确定特权的法律，任何问题都是双刃剑。一种回答会迷失灵魂，另一种会毁灭肉体。可以指控犯人大逆不道的证据完全没有。他的沉默被称为敌意，构成罪行的一部分。他随口说出的只言片语，被解

① Fuller's Church Hist. book 5. p. 203.

释为否认国王至高权力。^① 本朝审判无非形式而已。法庭宣判莫尔有罪；莫尔早已料到，无须为死亡的恐怖加强准备。他的坚定，甚至愉快，乃至平素的诙谐风趣依然如故。他为节操牺牲生命，举重若轻，视死如归。他登上断头台时，对人说：“朋友，帮我上去。我下来时就全靠自己了。”刽子手向他请求宽恕，他欣然同意，又说：“我的脖子这么短，砍断了也增加不了你的声望啊。”然后他把头伏在砧板上，命刽子手等他撇开胡须再行刑。“因为，”他说，“它从来没犯过大逆罪。”他的末日无比光荣，只可惜没有免于软弱和迷信。但他遵循原则和责任感，无论如何误导，我们对他正直和坚定的景仰都不会减少。他死于断头台，卒年五十三岁。

费舍尔和莫尔问斩的消息传到罗马，尤其是身为红衣主教的费舍尔殉道，致使罗马人人都对国王怒不可遏。意大利的智者和演说家钹鼓齐鸣，大肆诽谤国王，拟之于卡里古拉、尼禄、图密善和所有古代最残酷的暴君。克莱蒙特七世作出反对国王的判决后六个月去世；法尔内斯继任教皇，法号保罗三世。新任教皇在红衣主教任内一直偏向亨利，希望个人之间的敌意随前任教皇一起埋葬，因此并非不可能跟英格兰达成协议。国王本人极其渴望和解，此前不久就跟弗朗西斯协商，希望他在英格兰和罗马教廷之间斡旋。但亨利习惯于规定条款，而非接受条款。他甚至在和平谈判时都不改骄横的故态，经常冒犯对方，激起完全无法和解的争执。保罗视费舍尔之死为重大伤害，立刻下旨谴责国王，传他和他的所有支持者在九十天内前往罗马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他们如果抗命，就逐出教门。他剥夺国王的王冕；置王国于禁令之下；宣布亨利和安妮·博林的后裔不合法；解除所有天主教君主与英格兰的联盟；将英格兰王国赐予任何入侵者；命令贵族拿起武器反对他；解除他臣民的一切效忠誓言；中断他们和外国的贸易；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合法地将其掳获、奴役其人，转

^① More's Life of Sir Thomas More. Herbert, p. 393.

为己用。^① 这些绝罚虽然通过,但当时就被公开宣告无效。教皇直到跟英格兰谈判的希望彻底破灭、皇帝有能力执行判决时,才公开颁布破门令。当时,皇帝受到土耳其人和德国新教君侯的沉重压力。

国王知道查理会不遗余力地打击他。因此,他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削弱皇帝,使他无法报仇雪恨。^② 他跟弗朗西斯续订盟约,开始协商将幼女伊丽莎白嫁给弗朗西斯的第三个儿子昂古莱姆公爵。这两位君主还进一步跟德国新教诸侯结盟,皇帝的野心引起了这些君侯的疑忌。亨利不仅用金钱资助他们,还派赫特福德主教福克斯出使,弗朗西斯也派兰利勋爵贝莱出使,跟德国新教诸侯谈判。但在宗教改革的第一阵狂热中,各邦关系良好,不仅需要利益一致,还需要神学教义一致才行。虽然弗朗西斯和亨利都用接受《奥格斯堡信纲》引诱各诸侯,却在各自国土内严禁一切改革派传道者,这不是好兆头。^③ 亨利极力伪装,乃至自居为世界首席神学家,还邀请梅兰克顿、布赛尔、斯塔米乌斯、德拉古和其他德国神学家,以便他们跟他协商,教导他基本教义。现在,这些神学家举足轻重,连最受敬重的古希腊的诗人和哲人都没有受到这些可怜的玄学诡辩家们同样的欢呼和敬仰。德国各君侯告诉国王:他们不会让出他们的神学家。亨利知道路德的追随者在德国跟兹温格利的门徒积不相和,原因在于:虽然他们在一切其他方面意见一致,但在圣餐问题上还有若干细节分歧。因此,他无望跟这些狂热的辩士达成协议,倒也不因拒绝而大惊小怪。他还预见到:他即使不跟斯马尔卡登同盟合作,他们也会为自己的利益反对皇帝。弗朗西斯跟皇帝的仇恨如此根深蒂固,他总能在这些统治者当中找到某一个真诚的盟友。

在这些谈判期间,英格兰发生的事件预示:这些争论可能获得更友好的解

① Sanders, p. 148.

② Herbert, p. 350, 351.

③ Sleidan, lib. 10.

决，甚至为亨利和查理的和解开辟道路。凯瑟琳王后疾病缠身，终于去世了。她卒于亨丁顿郡金伯顿，卒年五十岁。她去世前不久，给国王写了一封非常温柔的信，称他为“最亲爱的主人、国王和丈夫”。她告诉国王：现在她大限将至，最后一次有机会谆谆教导他宗教义务的重要性。相形之下，人类一切荣华和享乐不过是虚空。虽然亨利溺爱这些易朽的利益，因而给她带来了许多灾祸，给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但她还是宽恕他过去所有的伤害，希望上天也同意宽恕他。她别无所求，只求把女儿托付给他；女儿是他们爱情仅有的保证，希望亨利保护她的男女仆人。她最后的结语是：“我发誓，我渴望见你，超过一切。”^①凯瑟琳柔情的最后证明让国王大为感动，甚至流下了眼泪；但据说安妮王后对情敌之死欢欣鼓舞，超过了体面或人道允许的程度。^②

皇帝认为：姑母去世已经消除了他和亨利私人恩怨的基础。现在，英法联盟解散、帝国和英国续订以前对他极为有利的联盟，并非不可能。他向亨利提议：在这些条件下恢复以前的亲善：^③亨利应该跟罗马教会和解，协助他对土耳其人作战，跟他一起反对弗朗西斯。这时，弗朗西斯正在威胁米兰。国王答复说：只要皇帝承认以前友谊破裂完全不是他的责任，他就乐于跟皇帝保持良好的关系。至于所提的条件：反对罗马教廷的程序如此正当，已经获得英格兰国会的充分批准，现在不可能撤回；基督教君侯理应彼此和平相处，他反对信仰的敌人、绝不后人；他一旦跟皇帝重新和好，就变成查理和弗朗西斯共同的朋友，要么在他们之间斡旋，要么帮助受到损害的一方。

亨利过去领教过皇帝一贯的两面三刀和虚情假意，又获得了欧洲当前事务的情报，因此对皇帝的提议更加冷漠。米兰公爵弗朗西斯科·斯福查死而无嗣；皇帝坚持：他是日耳曼帝国的元首，米兰公国是帝国的封邑，理应由他继

① Herbert, p. 403.

② Burnet, vol. i. p. 192.

③ Du Bellay, liv. 5. Herbert. Burnet, vol. iii. in Coll. No 50.

承。为了不引起意大利各邦的反感，他打算把这块领地授予各党派均不反感的亲王，甚至提议由法兰西国王的第三个儿子昂古莱姆公爵治理。法兰西国王声称：斯福查死后，他对米兰的权利已经恢复，他满足于让二儿子奥尔良公爵代替他。皇帝假装同意这个提议，但他慷慨让步的唯一目的只是争取时间，直到他做好战争准备，能够入侵弗朗西斯的国土。这些君侯的夙仇在战争中重新爆发；他们不顾身份，相互施加人身侮辱，与其无可置疑的勇武极不相称。不久后，查理亲自率领五万军队入侵普罗旺斯，但劳师无功。他的军队由于疾病、疲惫、饥荒和其他灾难而毁灭。他不得不解除马赛的围困，率领余部退回意大利。一支近三万人的强大帝国军队从尼德兰一侧入侵法国，围攻普罗内，但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法军逼近时撤退了。亨利由此满意地发现：他的盟友弗朗西斯似乎无须外援就能自卫。欧洲大陆战争激烈，可以充分保障他的和平安全。

如果英国宫廷还有担心的地方，那只能在苏格兰。詹姆斯听说盟友弗朗西斯处境危险，便慷慨地征集了一些军队，雇用船舶将他们安全运往法兰西。他甚至亲自渡海，急欲加入法王在普罗旺斯的营垒，跟他同甘共苦。他在里昂遇见法王，后者已经击退皇帝，正在返回首都。苏格兰国王像及时雨一样受人欢迎，乘机向法王的女儿马格达伦求婚。法王无意反对联姻，只是担心女儿虚弱的身体，似乎随时可能寿终正寝。但詹姆斯已经赢得了公主的欢心和同意，父亲就不再反对女儿和朋友渴望的联姻。他们就此结合，不久后渡海回到苏格兰。不出所料，年轻王后不久后就在那儿去世。但弗朗西斯担心亨利不满法苏亲密联盟没有将他包括在内；亨利同样是他的朋友，关系比雄主之间通常的关系更热忱。因此，他派波麦拉耶前往伦敦解释这一举措。但亨利照例坦白直爽，公开表示不悦，甚至拒绝跟大使协商。弗朗西斯担心关系破裂，因为亨利的举措多半依据脾气和冲动，不太考虑政治上的审慎。但国王既然跟教皇和皇帝为敌，就等于限制了自己的行动自由，不能进一步跟弗朗西斯反目。

最后,法兰西和苏格兰双方都平静无事。

由于激烈的宗教变革,英格兰的国内和平似乎濒临破裂。可以肯定:在这个危急关头,主要是国王获得的决定性权威和他对全体臣民的压倒性优势保证了公共和平。这一时期,不仅王室深受爱戴,亨利个人也颇受尊重。甚至他震慑众人的恐怖手段都没有伴随多少仇恨。他坦白、诚实、恢弘、慷慨的美德抵消了狂暴、残酷、急躁的恶习。他对外交事务的活力而非技巧,满足了英国人的虚荣心,使重要社会阶层更愿意忍受国内暴政。国王现在意识到他的有利地位,得寸进尺地将权威推向极端。他首先采取了若干预备性的权宜之计,最后决定向修道院开刀,攫取他们丰厚的收益。

仅仅从政治方面考虑,声势浩大的修道院是天主教会带来的巨大不便,所有其他不便都跟这些宗教机构有着不解之缘。教皇的僭越、宗教裁判所的暴政、繁多的宗教节庆、自由和勤勉蒙受的一切束缚,最终都源于修道士的权威和潜势力。修道院遍布各地,到处弘扬迷信和愚行。这些修道士狂热敌视亨利,他们认为:废除了教皇在英格兰的权威,就撤除了防范王室和廷臣贪婪的唯一屏障。他们现在受到国王的视察;罗马颁发的据说神圣的法旨宣告无效;海外的宗教改革不断进展,各地修道院皆遭废除,使他们有理由担心英格兰步其后尘。虽然国王目前还坚持炼狱的教义,大部分修道院都依靠这种教义建立和维持;但可以预见:随着斗争进展,他跟古老教会的隔阂会越来越大、跟改革派会越来越接近,他的政治利益自然而然地要求他跟改革派联合。修道士在这些考虑的驱使下,无所不用其极地煽动人民反对国王的政府。亨利发现他们的安全与自己的安全不能相容,决心抓住目前的机会一举毁灭公开的敌人。

国务秘书克伦威尔受命担任代理主教,这个职位是国王针对教会的至高、绝对或无上权力设立的新官署。他任用莱顿、伦敦、普莱斯、盖奇、佩特、贝拉西斯和其他人为特派员,巡抚各地,严格盘查所有修道士的举措和行为。在朋

党时代，尤其是宗教朋党时代，不必指望从敌人手里获得公正。众所周知，国王调查的目的就是寻找取缔修道院的借口。我们自然可以得出结论：特派员的报告可信度极低。他们鼓励修道士告发同袍，相信最微不足道的证据，甚至改革派的朋友散播到海外的流言飞语都视为可靠证据。因此，据说许多修道院发现了无法无天的混乱。比如，女修道院不守清规、宣淫纵乐；堕胎、杀婴、同性恋，信而有征。在那些年代里，由于人们盲目服从，修士和修女确实有可能比现在罗马天主教国家的同袍更肆无忌惮、放荡淫乱。不过，最有可能：这些谴责涉及的恶行跟修道院制度和修道士生活有天然的联系。因此，上述特派员牵涉到根深蒂固的残酷竞争。在同样的院墙中，这种竞争的分量极重。他们从来不能忘记相互的仇恨，这些修道士切断了一切天然的依恋，通常注定会比其他人心肠更自私、性情更顽固。宗教骗子千方百计地增加人民的虔诚和慷慨，无疑可以视为一个建立在幻觉、谎言、迷信基础上的团体。修道院还受到怠惰和愚昧的谴责，无疑确有其事。虽然修道士保存和发明了空想与挑剔的哲学，但不能指望刚毅或优雅的知识会从这些人当中产生。修道士的生活注定冗长而单调，剥夺了所有的竞争，不能培育心灵、陶冶天赋。

某些修道院被克伦威尔及其特派员的严厉盘查吓坏了；向国王献出收益，表示屈服；修道士获得少量年金，以奖励其谄媚。教团解散，年龄不满二十四岁的修士和修女由此不再受誓言约束。修道院对即使超过二十四岁的修士和修女也开放门户，任何人都可以自愿恢复自由。但所有这些权宜之计都没有充分实现国王的目的，他便运用上通常的权力工具：国会。为了给拟议的革新做准备，调查报告公开出版，激起举国恐怖，开始反对他们祖先崇拜至深的宗教机构。

国王虽然决心彻底废除修道院团体，但仍然打算逐步推行这项大业。他

指示国会：当前不能走得太远，只限于解散岁入二百镑以下的小修道院。^① 调查发现：这些修道院最为腐败，更不识廉耻、不受监督。^② 拿他们开刀，由此为更大的革新开道，被视为最安全的方法。这项法案解散了三百七十六家修道院；他们的岁入为数达三万二千镑，以及财物、动产、器皿、餐具总计不下十万镑，都收归国王所有。^③ 这项重要法律似乎并未遭遇任何反对。亨利的权威竟然如此绝对！一家法庭建立起来，处理这些财产的安置事宜，称为“国王的开源法庭”。人们自然从这种情况得出结论：亨利有意继续掠夺他祖传的教会。^④

以前通过的法案授权国王任命三十二名特派员规范涉教法规，现在重新恢复，但这个计划从来没有付诸实施。亨利认为：目前法律的复杂性增加了他的权威，能将神职人员保持在更大的依附地位中。

国会进一步完成了威尔士并入英格兰的程序。几位大贵族和所谓的巡阅使各置法庭，妨碍了威尔士的司法操作，鼓励了抢劫和掠夺；这些法庭予以撤销，国王法庭的权威无人可及。本届国会也废除了英格兰的一些类似法庭。^⑤

下议院意识到：以前国王想保障监护权和家臣的利益时，他们反对国王的意志，结果一无所获。现在他们愿意唯命是从，制定国王想要的法律。^⑥ 颁布的法律规定：土地占有权应该判给土地使用者而非受到监护的人。

所有这些法律通过后，国王解散了国会。本届国会值得记录，不仅因为它引进了重大的宗教改革，也因为会期长、休会频繁。亨利发现国会言听计从，

① 27 Hen. VIII. c. 28.

② Burnet, vol. i. p. 193.

③ 据称：小修道院解散时，遣散了十万修道士。参见 Hollingshed, p. 939。如果是这样，他们大多数一定是托钵修道士。因为岁入不可能供养如此之多的修道士。无疑，托钵修道士仍然继续他们以前的职业。

④ 27 Hen. VIII. c. 27.

⑤ 27 Hen. VIII. c. 4.

⑥ 27 Hen. VIII. c. 10.

在宗教纷争当中不愿冒险重新选举。他连续召集同一届国会超过六年，这种做法当时在英格兰极不寻常。

本届国会期间，教士会议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审慎考虑翻译新版《圣经》。丁达尔虽然在新版中作了校正，但教士们仍然抱怨他的《圣经》译本不信不实。现在教士会议拟议自己翻译一个不容易受到这些批评的版本。

改革派的朋友宣称：把上帝的真言隐藏在陌生的语言中，由此违抗天意，荒谬莫此为甚。天意要将良言教义传遍万邦，救赎普世。如果这种做法不是非常荒谬，至少手段非常恶劣，证明神职人员的经传和疏注直接违背了至高智慧口授的原典。人们长期受到唯利是图的伪饰蒙蔽，现在有必要亲眼察看、验证：神职人员自诩的权利是不是真正载在完全源于上天的典章之中。探索和好奇的精神已经恰到好处地复兴；人们现在必须在各教派相互冲突的教义之间作出选择，根据适当的材料作出决定。尤其是，神圣的《圣经》应该放在他们面前。由于语言参差，上帝呈现的意志多多少少有些模糊，但经过他们的努力，又一次展示在人类面前。

另一方面，古老宗教的支持者坚持：让人们亲眼察看的借口纯属欺骗，本身就是极其恶劣的诡计。新教传道士希望获得指引民众的权力，把民众从教士指导下拐骗过来，而法律、古老的制度乃至上天本身都已经指定教士为民众的精神向导。人们由于无知、愚钝、不可避免的业余性质，完全不能胜任为自己选择教义的任务；即使把材料放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可能懂得如何适当运用，不过是笑柄而已。甚至在日常生活、世俗事务中，人类理性本来更有用武之地；法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民众个人判断的权利，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和公共的利益而规制了他们的行为举止。神学问题远远不是粗俗大众所能理解的；神职人员自己虽然获益于一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勉力于经籍，仍然不能保证恰到好处地判断；除了经文的许诺，上帝永远与教会同在，地狱之门不会胜过她。最明智的异教徒都犯下了严重错误，证明个人多么不适合在

这片深厚的黑暗中独自摸索。如果没有经文，依靠每个人的判断，就会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相反，这样会大大增加致命的幻觉。圣书本身如此含混，造成的困难和表面上的抵触如此之多，因此交给愚昧轻浮的群众就会成为危险的武器。《圣经》很大一部分由诗体组成，同时多种比喻和人物没有确定的意义；这足以点燃虔诚的狂热，由此将文明社会投入愤怒的火海。一定会产生成千上万个教派，每一个都自称祖述圣书。运用似是而非的论证，甚至根本不用论证，就能诱使愚夫愚妇接受最荒谬的教义。这样的混乱本身就会危及地方治安，即使可以补救，也一定需要人民默许某种新的权威。不经历进一步斗争和探索，而和平地拥护古老、更可靠的教会，显然更好。

后者这些论证更符合教会当局的口味，如果没有克兰默、拉蒂默和其他主教的权威，很可能在教务会议上胜出。据信，这些主教的意见代表了国王的看法。教务会议投票通过了重新翻译《圣经》的决议。此书在三年内完成，在巴黎付印。公认这是改革派的一大收获，他们的事业大有进展。在这样重大的胜利后，不久就可以期望更大的进展了。

但新教支持者正在欢欣鼓舞、前途无量时，却遭遇了奇耻大辱，似乎一切希望都已破灭。他们的女恩主安妮·博林失去了国王的宠爱；不久，龙颜大怒、香消玉殒。亨利在离婚诉讼的六年里，对这位女士的爱始终不渝。他的激情越是受到阻碍，他的追求就越是执著。然而，他的感情在不能保证长期拥有的困境中，能够维持和滋长；一旦如愿以偿，就失去了活力。国王的心明显疏远了配偶。安妮的敌人很快就意识到这种致命的变化。他们一发现小动作不会引火烧身，就致力于扩大裂痕。安妮生子死产，亨利极其喜爱男性后嗣，这时大失所望。他的性情既狂暴又迷信，想要无辜的母亲为不幸负责。^① 但安妮的敌人挑起国王怒火的主要方法是刺激他的嫉妒心。

^① Burnet, vol. i. p. 196.

安妮的举止完全清白,甚至堪称贞洁,但她性格欢快,甚至流于轻浮,抛弃了警惕性,缺乏她的地位所必需的慎重。她在法国受教育,因此更容易随心所欲。她难以适应英格兰宫廷的严格规矩。她喜欢用美貌左右周围的人,主要出于虚荣而非骄傲。她放任自己跟以前的平辈亲密相处,后者就会自称享有了她的友谊和青睐。这种平易近人的做派触犯了亨利的傲慢。情人是完全盲目的,但丈夫却明察秋毫。王后无害的潇洒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蒙受了恶意的解释。尤其是洛克福德子爵夫人,她嫁给了王后的兄弟,但妯娌相处极坏,她便以最残酷的怀疑挑唆国王。她生性放荡,因此造谣中伤完全不顾事实或人道。她伪称自己的丈夫参加了王后有罪的通信。她不满足这种栽赃,还要中伤王后的一举一动,把王后对任何人的青睐表现都说成私情的证明。宫廷侍从官亨利·诺里斯、国王内侍威斯頓和布雷里顿、国王侍役马克·斯麦頓都享有王后友谊的表现;他们热忱而忠诚地为她服务,不过主要出于感恩戴德,未必对这样和蔼可亲的王后掺有柔情。但国王的嫉妒心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找不到特定的目标,就把狂怒发泄在周围所有人身上。

如果亨利的嫉妒仅仅源于爱情,纵然来势仓促,凶猛到了极点,一定会受到许多次懊悔和反复的制约,最后可能只会增加已经建立的爱情。但亨利的嫉妒更加严苛,完全基于虚荣心。他的爱情已经转向别的目标。约翰·西摩爵士的女儿简是王后的女侍,具有非凡的美貌和品德,国王完全被她迷住了。他决定牺牲一切以满足这个新嗜好。大多数君主不觉得风流有多大的罪过,认为爱上宫廷少女不是侮辱她们,而是给她们面子。亨利不像他们,差不多认为婚姻之外不能另有私情。他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遭遇了更多的困难,犯下了更大的罪行,比他打算通过合法婚姻避免的困难和罪行更严重。他由于策划将新情妇送上龙床和御座,更乐于相信一切诬陷不幸的安妮·博林的暗示。

在格林威治的一次比武大会上,国王第一次公开表现出嫉妒。王后碰巧

落下一块手帕；事情大概纯属偶然，但国王却解释成王后向她的情夫卖弄风情。^①他立刻退场，下令将王后禁闭在卧室里；逮捕诺里斯、威斯顿、布雷里顿、斯麦顿和王后的兄弟洛克福德，将他们投入监狱。王后对他的狂怒感到惊讶，以为亨利只是想试探她，却发现他是认真的。她回想起国王顽固残酷的秉性，为自己面临的悲惨命运做好了准备。第二天，她被送往伦敦塔，在路上才得知假定的罪名。在那以前，她一无所知。她认真地申辩无辜，入狱时跪下祈祷上帝帮助她，因为她没有犯下被诬陷的那些罪行。她在惊讶和困惑之下，陷入歇斯底里的混乱中。在这种情况下，她认为自证清白的最好方法就是和盘托出。她暴露了某些轻浮不谨之处——由于天真而做出，同样由于天真而承认。她承认：她曾经让诺里斯推迟婚期；告诉他，等她守寡就有希望。她说：她责骂威斯顿迷恋表亲、对妻子冷淡。但威斯顿回答说：她误解了他感情的对象，因为他迷恋的是她。因此，她把威斯顿痛骂了一顿。^②她肯定：斯麦顿只有两次进入她的卧室，演奏羽管琴。但她承认：他有一次大胆地对她说，他只要看一眼就满足了。国王不仅没有对她的坦白和诚实满意，反而认为这些轻率的举动只会预兆更加罪大恶极的亲密关系。

王后前途无量时，出于天性博施济众，然而现在这些人谁也不敢斡旋国王对她的怒火。她的一颦一笑曾经重于九鼎，现在却受尽炎凉、无人问津。甚至她叔父诺福克公爵都重视党派超过血缘，变成了她最危险的敌人。所有天主教支持者都希望：她的死会结束国王和罗马的争执，回到他早年跟教廷亲密无间的自然状态。在王后所有的支持者当中，只有克兰默仍然维持着对她的友谊。只要国王急躁的性情许可，他就会努力缓和他不利于安妮的狂暴偏见。

① Burnet, vol. i. p. 198.

② Strype, vol. i. p. 281.

王后本人从伦敦塔给国王写了一封信，充满了最温柔的劝告和最动人的无罪申辩。^① 这封信没有打动亨利冷酷无情的心，他决心牺牲安妮·博林的生命为自己的再婚开辟道路。诺里斯、威斯顿、布雷里顿、斯麦顿受审，但没有合法的证据反对他们。主要罪证来自温菲尔德夫人的道听途说，而她已经去世。斯麦顿徒然贪生怕死，自承跟王后有过罪恶的关系。^② 但甚至王后的敌人也不指望能从这种坦白中获益，因为他们从来不敢让斯麦顿跟她对质。斯麦顿立刻处以极刑，威斯顿、布雷里顿也和他一起被处决。诺里斯颇受国王恩宠，许诺免其一死，条件是他必须认罪，指控王后。但他高尚地拒绝了这个建议，说他凭良心认为王后是完全无辜的。而且，他处在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什么可以指控她。他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意陷害无辜。

王后及其兄弟受到同辈陪审团的审判。陪审团包括萨福克公爵、埃克塞特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其他二十三人。她叔父诺福克以冢宰身份主持审判。他们受到近亲通奸罪的指控，事实还是诬告无法判断。据说，主要证据不过是：有人看到洛克福德当着几位伙伴的面，躺在她的床上。指控她的一部分证

① 这封信如此自然，甚至高雅，值得保存原文措辞，流传后世。原文如下：

“陛下不悦，妾身竟蒙牢狱之祸，错愕无地。盖圣谕、诏狱言之凿凿，臣妾实不知所云。陛下置妾于狱（愿妾吐实蒙恩），非不知臣妾夙仇之尚在也。臣妾甫闻彼讯，即明圣意。诏云：‘吐实则安。奉诏，固妾之愿也。然贱妾蒙罪之由，曾无分毫之虑，固非陛下所乐见。天日昭昭，君侯之有后，受分之忠，用情之挚，未有若安妮·博林者。苟为上帝暨陛下所欲；一切名分、地位，臣妾固甘之如饴。妾虽忝居后位，未尝有片刻忘形；然君恩不测、二三其德、荣华如幻、盛衰无常，固妾所深悉而逆料者。陛下拔妾于寒门、伴龙颜而仪天下，非妾所敢奢望。陛下若以臣妾堪受殊荣，则浮念有所不動、豫言有所不入，臣妾奉还君恩可也；否则陛下隆恩，尽可弃贞妻幼女于污名。天王仁圣，臣妾甘就斧钺；然煌煌法庭，毋令臣妾夙仇身兼原告、法官之任。公堂公审，臣妾始得雪冤于天下。继而陛下圣明，臣妾白冤、陛下释疑、止滔天之谤、填中外之口，顾指间事。否则，臣妾罪迹既彰、天下共弃，亦妾之分也。若是，无论天意、君心将焉置妾；陛下堂堂之名当不致公然蒙谤，臣妾以身赎罪而已；天人共鉴，陛下可免罚无辜、任私情之讥。盖陛下垂怜之日，固明知妾身之为妾身也。彼时臣妾颇有贤名，陛下亦深悉妾身今日之所以蒙嫌负谤者。然若圣意已决；妾固当伏斧锧，陛下无疆之乐不免为污名所集矢。若是，妾身自当祈愿上帝宽恕陛下大罪，一如妾身宽恕夙仇。由此，上帝裁判一切、二人曲直立现，当不致严责陛下苛待妾身、有失君王之体。上帝无疑将还妾身以清白（无论世俗之见云何），昭然众见。

臣妾临终，唯一言耳：陛下龙颜震怒，妾自当之，毋伤诸绅无辜者。彼等坐妾事下狱，妾固知之。陛下若有怜妾之意，闻妾之名犹能悦耳；何妨纳妾之谏，妾亦无复他求，自当祈祷三位一体福佑陛下、引导陛下一应政事。

不贰忠臣、矢节贞后安妮·博林于伦敦塔暗狱第六日敬上”。

② Burnet, vol. i. p. 202.

据是：她曾向宠臣保证，从来没有爱过国王；又分别对他们每一个人说，她爱他超过其他任何人。哪一条算是毁谤国王和她的后裔呢？根据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以本朝第二十五年通过的法案将她定罪。法案又宣布：毁谤国王、王后及其后裔坐罪。如此显而易见的荒谬，那时居然得以通过。英格兰贵族认为这些理由足以牺牲无辜的王后，满足他们残酷的暴君。王后虽然没有顾问的帮助，仍然镇定自若地自我辩护。观众不能自己，宣布她完全无辜。但法官们奉宫廷旨意，反对她和洛克福德，判决她火刑或斩首，由国王随意选择。可怕的判决宣布时，她毫无惧色，只是举手向天，说道：“噢，天父！噢，造物主！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最清楚我不应该遭遇这种命运。”然后，她转向法官，以最令人同情的语气宣布她的无辜。

这样残酷的报复还不能让亨利满意；他决定完全取消他和安妮·博林的婚姻，宣布她的后裔为私生子。亨利回忆说：她在英格兰宫廷露面后不久，她和诺森伯兰伯爵（后来的佩尔西勋爵）的感情众所周知。现在，他向贵族们询问这些婚约的问题。诺森伯兰在两位大主教面前发誓：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婚姻誓言或约定。他当着诺福克公爵与枢密院众卿发誓，同时最郑重地声明誓言的严肃性。^① 不过，王后受到执行最严厉判决的威胁时，在劝诱下当庭承认：她和国王的婚姻有些法律障碍。^② 苦恼的大主教担任法官，根据这种自白，觉得只有宣布婚姻无效、不成立。亨利在狂怒的驱使下，没有注意到他的诉讼完全自相矛盾：如果安妮的婚姻一开始就不合法，她就不可能犯下通奸罪。

王后现在为宣判的死刑作准备。她向国王诀别；承认国王有恩于她，由此不断提拔她。她说：她本是小贵妇；国王先封她为女侯爵，然后是王后；现在她在俗世已经无可再升，他就送她进天国成圣徒。然后，她重新申明无辜，托付他照料女儿。伦敦塔卫戍官和全体人马靠近她身前，她做了类似的宣告，然后

① Herbert, p. 384.

② Heylin, p. 94.

恢复了通常的镇定，甚至愉快。“我听说刽子手非常专业，”她说，“我的脖子太细了。”她微笑抚颈。不过，她上断头台时，声明无辜的语调软化了一点。她大概回忆起凯瑟琳王后的顽固；她反对国王的意志，让他疏远玛丽。因此，在最后关头，她对伊丽莎白的母性超过了她对不公正判决的愤怒。她遭遇的不公自然会激怒她。她说：根据法律的判决，她要死了。她不谴责产生判决的任何人、任何事。她真心为国王祈祷，称他为最仁慈温和的君主，承认他一直待她善良亲切。如果任何人认可她的理由，希望他从最好处考虑。^① 加莱的刽子手比英格兰的刽子手更专业，被召来对她行刑。她的尸体草草扔进普通的榆木棺材，仓促收殓，葬于伦敦塔。

毋庸置疑，不幸的王后没有罪。亨利本人在狂怒之下，不知道指控谁是她的情人。虽然他归罪于安妮的兄弟和另外四个人，却拿不出什么反对他们的证据。在我们看来，安妮的所作所为都不像是国王的指控所暗示的风流放荡者。即使她丧失了一切廉耻和谨慎，也逃不过敌人的侦察，肯定会给它们提供不利证据。但国王为她提供了最有效的辩护，在她行刑后那天娶了简·西摩。^② 他急不可待地满足了新情欲，以至于完全不顾体面。他长期爱慕的人惨遭屠戮，没有片刻软化他冷酷的心。

玛丽女士认为继母之死是一个好机会，可以跟国王和解；但国王除了其他原因以后，还因为她站在母亲一边跟他作对而心存芥蒂。亨利一开始没有接受她的殷勤，迫使她进一步表示屈服和忠顺。年轻的玛丽公主当时大约二十岁，国王强迫她接受自己的神学信条和至高权威，弃绝教皇，承认母亲的婚姻为非法近亲通奸。公主难以忍受这些要求；但几经犹豫和否定，最后还是致信父亲，^③ 接受了亨利要求的条款。由此，她重获恩宠。但国王虽然跟第一次婚

① Burnet, vol. i. p. 205.

② Ibidem, p. 297.

③ Burnet, vol. i. p. 207. Strype, vol. i. p. 285.

姻的苗裔和好，并没有抛弃伊丽莎白女士。新王后性格极其温柔，对伊丽莎白公主宠爱有加。

安妮王后受审、定罪以及随后的事件使国王有必要召集新国会。他向国会发表演说，致意国民：他虽然两度大婚不幸，但为了国民的利益仍然冒险做第三次尝试。国会发言人对这番表白报以得体的感谢，借此称颂国王天纵英明、资质优美。他奉承道：国王公正仁慈堪比所罗门；勇敢刚毅堪比参孙；俊美清秀堪比押沙龙。国王命大法官代言，非常谦虚地回答：他配不上这些赞美，因为他即使真有这些禀赋，那也是全能上帝的恩赐。亨利发现：国会不仅满口谀辞，实际上同样俯首帖耳；即使他最无法无天的激情，议员们也都会一如既往地遵奉。国会批准亨利与安妮·博林离婚；^①剥夺王后及其一切同谋的公权；宣布国王以前婚姻的后裔为私生子；甚至规定承认其合法性将构成大逆罪；诋毁国王、现任国王及其后裔，同样构成大逆罪；王位由简·西摩或继任王后的后裔继承；万一国王死而无嗣，他有权立遗嘱或以特许状处置王冕。他们授予国王如此广大的权威，原因在于这位国王的性情如此狂暴而反复无常。任何人拒绝效忠法案任何一款，都将课以大逆罪。这种条款在王国建立了某种政治性宗教法庭，滥用大逆罪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国王还获得授权，以乾纲独断或特许状，处置城堡、荣誉、权利或特许权；授权延伸到他有权建立领地和司法管辖权，从而肢解王国的地步。另一项法案规定：未经国王同意，私娶享有王国第一等级顺位继承权的公主，构成大逆罪。这项法案通过的原因是：诺福克公爵的弟弟托马斯·霍华德蓄意设谋，私娶国王的外甥女、御妹苏格兰王后和昂古斯伯爵的女儿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女士。事情败露后，夫妇二人都被送往伦敦塔。道格拉斯女士不久后去世，但霍华德死在狱中。本届国会专门为托马斯·霍华德通过了一项剥夺公权法案。

^① 国会撤销国王与安妮·博林的婚姻，提出的理由如下：“陛下选择了卓越有德的简女士；简女士正当妙龄、美貌超群、身体纯洁；因而上合天心、下应圣意。”

另一项法案同样加强了王权。国王及其所有继承人获得授权：通过特许状更新或撤销国会在他二十四岁以前通过的法案。任何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继续承认罗马主教的权威，或以任何方式企图在英格兰复辟罗马教会，皆课以蔑视王权罪。犯者动产充公，人身不受法律保护。教俗两界的任何官员拒绝宣誓弃绝教皇，即课以大逆罪。规定的弃绝措辞为：“上帝、诸圣徒、神圣的传道者助我。”^①教皇获悉安妮·博林蒙羞处斩，希望打开和解的门户，便向亨利示好，但获得的回应不过如此。亨利现在已经不在乎教皇的谴责，弃绝罗马大大增加了他的权威和岁入，因此他决定继续坚持目前的措施。本届国会证明臣民对他多么畏威怀德，他多么信赖国会，甚至超过前几届。虽然选举仓促举行，没有任何准备或策划，但议员们仍然无限忠于国王本人及其政府。^②

与国会同时召开的教务会议极其忠顺，鼓励国王跟罗马教廷彻底决裂。这次会议上，人心已分党派。改革派的热忱随着最近的一些成功而增长，天主教徒同样受到恐惧和损失的刺激；但国王的权威保证了所有人的恭顺和缄默。没有人充分理解王室新获得的特权和至高权力的边界在哪里，甚至连最狂躁的神学夙仇都受到王权的节制。克伦威尔担任代理主教，主持会议。天主教徒希望：安妮王后垮台后，他的权威会大受打击；但他们惊讶地发现：国王对他仍然宠信不衰。指出代理主教克伦威尔的教会长老还有：伍斯特主教拉蒂默，索尔兹伯里的萨克斯顿，罗切斯特的希尔塞，赫里福德的福克斯，圣大卫的巴洛。反对派的首领是约克大主教李，伦敦主教斯托克斯里，达勒姆的汤斯达尔，温切斯特的加德纳，林肯的朗兰德，奇切斯特的谢尔本，诺维奇的尼克斯，卡莱尔的凯特。前一个党派由于反对教皇，支持国王的野心和权力欲。后一个党派坚守古老的神学宗旨，更符合亨利推论的教义。国王轮流宠信两党，主要不是因为这些考虑，而是为了弄权的需要。

① 28 Hen. VIII. c. 10.

② Burnet, , vol. i. p. 212.

大多数教会反对改革。教务会议下院列举了六十七条他们称为谬误的清单；这些教义有的源于古代罗拉德派，有的源于现代清教徒，他们有时称为福音派。他们将对这些观点的责难提交给上院，但陈情书的序言充满了奴颜婢膝的精神：“他们明白国王是教会至高无上的首脑，服从国王的命令。凡是国王不乐意的，他们既不会说，也不会做。他们弃绝教皇僭越的权威，及其一切法例、创新；现在，这些都已经废止、失效。他们献身于全能的上帝及其法律，忠于国王及王国境内法律。”^①

教务会议几经争论，最后确定了信纲。他们的信纲和会议本身和国王的神学信条一样混杂，他们决定完全跟国王保持一致。他们决心坚守《圣经》和使徒、尼西亚、亚大纳西信经的正统信仰。这份信纲是改革派的决定性胜利。秘密忏悔和苦修赎罪获得承认，符合天主教的教义。但没有提到婚姻、临终涂油礼、坚信礼、圣职受任礼为圣事，这种忽略引起了新教徒的抗议。会议宣布了真在论，符合古老教义；接受条件基于基督的美德、上帝的慈悲和善意，符合新教义。

两派似乎势均力敌，各自获得了几项条款。在后面的几项条款的制定中，两派似乎都有所得。天主教派成功地宣布：《圣经》准许使用圣像。新教徒警告人们反对偶像崇拜，不要滥用这些合理的陈述。向圣徒祈祷的权宜之计得以保存，纳入了古老的信仰。抵制各行各业或各种活动特殊的主保圣徒，接受了最近的革新。古老的祭拜仪式；圣水使用；圣灰星期三、棕榈星期日、善心星期五活动仍然保存。但教务会议也接受了轻视这些典章制度的新教条，否认它们有任何直接赦罪的权力，宣布它们唯一的优点就是有助于心灵的虔诚和忠信。

但信纲在炼狱的问题上试图调和对立的教旨，表现出最奇特的打官腔、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它就此称：“根据慈善组织、《马加比书》、各位古代作者的意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是极其善良慷慨的做法；早期教会一开始就沿袭此

^① Collier, vol. ii. p. 119.

道。因此,所有主教和师尊都应该教导人民,不要因循例而难过。不过,既然《圣经》没有明确肯定死者灵魂升入乐园前停留的地方和他们受苦的性质,因此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留给上帝。“上帝无限的仁慈可以方便地接受褒奖死者的善言,我们为死者所做的祈祷都可以信托给它。”^①

教务会议制定的信纲条款经国王修正后,由与会所有代表签署。或许除了亨利本人以外,教务会议乃至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不折不扣地接受所有条款。虽然上述条款没有任何自相矛盾之处,但在英格兰以及所有党派纷争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各派各自拥护自己赞同的条款,几乎没有一项条款是中性的。在那些爱好推论和空想的人当中,同一个命题很少有两个人意见相同。新教徒全都反对罗马,比信纲条款更加激进。没有一个天主教徒能够激进到信纲条款的程度。国王能保持国家微妙的平衡,从而显示了登峰造极的专制主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君主试图改变一国的宗教,即使有党派支持,也是最危险的事业;王权经常因此而毁灭。但亨利竟能在狂暴的运动中建立政治机制,还能规范甚至制止改革的发展。他可以发号施令:继续前进,到此为止。他能让国会和教务会议遵命表决——不仅符合他的利益和情绪,甚至符合他最反复无常的性情;不,符合他最微妙、最学究气的聪明。

无疑,这两个国民会议都赞同增加国王对人民的权力、提高他的权威,比区区君主,甚至借军队之力、所能获得的权威更加绝对。不过,最奴颜婢膝的屈从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度。最近所有的革新,特别是解散小修道院,使残余部分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② 民心由此不满,叛乱随之而来。遭到驱逐的僧侣在

① Collier, vol. ii. p. 122, & seq. Fuller. Burnet, vol. i. p. 215.

② 教务会议以前提出过解散小修道院的建议,遭到当时还在世的费舍尔主教强烈反对。他对教友们说:这简直是给国王指路,教他怎样对大修道院下手。“一把斧子,”他说,“需要斧柄,就到森林里向大树哀诉:它没有斧柄就无法工作,只能无所事事,因此向树木索取。树木愿意给它一棵小树苗做斧柄;为了提防诡计,只给他最小的树苗做斧柄。但斧子现在已经完备,就开始在同一片森林里工作。没过多久,森林里的大树小树都已经荡然无存。诸位大人,就是这样。如果你们把小修道院交给国王,就是把斧柄交给他。由此,他可以随心所欲在你们的黎巴嫩砍倒所有的雪松。”Dr. Bailie’s life of bishop Fisher, p. 108.

全国到处流浪，刺激了人民的虔诚与同情。古老宗教在民众当中仍然极有势力，能够驱使平民百姓。既然现在古老宗教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就要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利益唤起民众的热忱。^① 不满情绪甚至已经蔓延到某些贵族和绅士身上；他们的祖先建立修道院，为自己的幼子谋出路，以此满足虚荣，也颇有实际利益。他们出于迷信，更相信修道院对祖先的灵魂有益。多少年来，灵魂在炼狱中受到煎熬，需要弥撒的解救。因此为了个别人真真假假的错误就解散这些虔诚的机构，似乎有欠公平。即使最温和稳健、通情达理的人都认为：根据本国主流的一切神和人的法律，把那些投入一段生命的人赶出自己的产业，几乎不考虑他们未来的安置，多多少少是不公正的。调查修道院的特派员之流既贪婪又腐败，从没收教产的任务中营私自肥；他们的行径昭昭在人耳目，大大增加了普遍的不满。^②

但人们还没有公开暴动，直到在俗教士也加入抱怨的行列。神职人员几乎没有接受克伦威尔——他行使的权威如此新颖、如此绝对、如此无限，激起了他们的憎恶和恐惧。他以国王的名义颁布条例，不经国会或教务会议同意，就废除了许多古老的节日；禁止了几种对教士有利可图的迷信，例如朝圣、圣像、圣物，甚至命令圣俸必须留出相当一部分用于教区修缮、奖学金和济贫事宜。在俗教士发现自己落到卑屈的地位，就向人民灌输自己长期怀有的不满情绪。

林肯郡首先发生叛乱。以巴林斯长老麦克里尔为首，他打扮成普通手艺人，自称柯布勒队长。这支乌合之众为数超过两万人。^③ 但他们人数虽多，几乎没有极端反对国王的表现，似乎仍然敬畏他的权威。他们承认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脑；但他们抱怨出身微贱的奸臣解散小修道院，使教区的珠

① Strype, vol. i. p. 249.

② Burnet, vol. i. p. 223.

③ Ibid. p. 227. Herbert.

宝、器皿有被侵吞之虞。他们请求国王咨询王国贵族，拨乱反正。^① 亨利几乎没有担心危险，尤其是这些他所鄙视的卑微群众。他派萨福克公爵率军平叛，严词答复他们的请愿。一些绅士受群众胁迫加入叛乱，秘密跟萨福克联系。他们告诉公爵：国王的答复激怒了叛军，是武装叛乱得以维系的主要原因，更温和的答复大概会瓦解叛乱。亨利在伦敦征集了一支大军，准备亲征平叛。他自觉实力雄厚，可以放低身段而不至于有损尊严。他发布新公告，要求他们归顺，暗中保证赦免。计谋生效，民众散去。麦克里尔和一些首领落入国王手中，遭到处决。大部分民众平静地返回原有的位置。更顽固的少数人逃往北方，加入了那里的叛乱。

北方的叛乱比林肯郡人数更多，在其他方面也更可怕——因为人们更习于用武，且苏格兰近在咫尺，可以趁火打劫。一位绅士阿斯克担任叛军首领，长于驭众。他们自称“求恩巡礼”。一些教士手持十字架，走在队伍前面。他们的旗帜上绣着十字架、圣杯和基督五个伤口的图案。^② 他们在衣袖上佩戴五个伤口的象征，耶稣的名字绣在当中。他们全体起誓：加入求恩巡礼并无他意，仅仅为了热爱上帝，关心国王及其后裔。他们希望清君侧，驱逐出身微贱的奸臣，恢复教会，镇压异端。在这些公正的借口诱惑下，约克郡、达勒姆郡、兰开斯特郡和北方各省大约有四万人聚集在他们的旗下。他们人多势众，士气如虹，激起了宫廷的忧虑。

什鲁斯伯里伯爵存心勤王，虽然一开始没有获得委任，但还是集结军队、准备平叛。坎伯兰伯爵在斯基普顿城堡击退了叛军。拉尔夫·埃弗斯爵士保卫斯卡巴洛城堡，击退了他们。^③ 埃克塞特侯爵考特尼是国王的嫡堂兄，奉宫廷命令征集军队。亨丁顿伯爵、德比伯爵、拉特兰伯爵步武其后。但叛军占据

① Herbert, p. 410.

② Fox, vol. ii. p. 992.

③ Stowe, p. 574. Baker, p. 258.

了赫尔和约克，围攻庞弗雷特城堡。约克大主教和达西勋爵已经退入城堡。庞弗雷特很快陷落，大主教和勋爵暗中希望叛乱成功，假装屈从外力，加入了叛军。

诺福克公爵奉命统率王师，镇压北方叛乱。在宫廷中，他公认是古老宗教一派的首脑，因此蒙受了同情叛乱的嫌疑；这场叛乱本来是他镇压的目标。不过，他举措谨慎，似乎洗清了这种责难。他和什鲁斯伯里伯爵会师，在唐卡斯特附近扎营。他的军队为数不过五千余人；他选择在河对岸驻军，以河滩为屏蔽对抗叛军。叛军计划天明后发动进攻；但当夜暴雨滂沱，渡河已经不可能了。诺福克明智地抓住机会跟他们谈判。他为了开启谈判之门，派去一位传令官。叛军首领阿斯克以礼相待，他自己端坐正位，约克大主教和达西勋爵伴随左右。双方达成协议：送两位绅士携带叛军的提议去见国王。亨利故意拖延答复，诱使叛军相信他们会完全如愿以偿，预料他们很快就会四散。他获悉计谋得逞，就要求叛军立刻放下武器求饶。他承诺：除了他指名的六人和他保留指名权的四人以外，赦免所有人。虽然大部分叛军由于给养不足，已经回家，但他们依然最严肃地承诺道：如果国王没有满意的答复，他们就会回到自己的旗帜下。因此，诺福克不久就发现自己的处境跟以前一样艰难。他再一次跟群众首领谈判。他答应他们派三百人携带和解提议去唐卡斯特。他希望：通过阴谋诡计和利益分歧，在如此众多的民众当中挑起不和。阿斯克想自己当代表，要求保证人质安全。但国王得讯后回答：他不至于对随便哪一位绅士如此不尊重，而把他送进歹徒手里当人质。叛军要价过高，连诺福克都无法接受。他们再一次准备以武力抗争。叛军人数众多、斗志昂扬，殊为可畏。虽然他们与王师之间有小河阻隔，诺福克仍然有充分的理由畏惧他们的狂怒。但叛军正在准备渡河时，第二场滂沱大雨从天而降，因此他们无法执行计划。民众部分由于给养不足、部分由于迷信，因晦气重演而失望，突然自行溃散。诺福克公爵已经获得授权，向溃军宣布大赦。国王批准了这种宽大措施。不

过,他发表了一份反对叛军的宣言,以回答他们的怨言。他的高傲风格很适合表现出君主的骄慢。他告诉群众:他们对政治的判断力不比盲人对色彩的判断力更强,不用装腔作势。他补充说:“朕暨枢密众卿以为:汝辈不过外行粗人,竟敢指点江山,妄干朝政,岂非咄咄怪事。”

和平似乎难以持久,因此诺福克奉命集结军队、进军北国,以便迫使群众全面屈服。达西勋爵和阿斯克奉召出庭,前者因抗命或延迟而下狱。到处都充满猜忌和怨言。不久,马斯格雷夫和蒂尔拜为首的新叛乱爆发。叛军八千人围攻卡莱尔,被市镇击退。他们在撤退途中遭遇诺福克,结果一败涂地。诺福克俘虏了叛军绝大部分军官,立刻以军法全体处决,为数达七十人之多,只有马斯格雷夫逃走了。哈莱姆和弗朗西斯·比格特爵士试图突袭赫尔,铩羽而归。诺福克机警地镇压了其他几次暴动。接二连三的叛乱激怒了国王,决定不再遵守他承诺的大赦。他一如既往地狂暴,要让无辜者代人受过。诺福克奉上命展开王旗,便宜行事,犯上作乱者军法从事。除了第一次叛乱的首领阿斯克以外,罗伯特·康斯坦布尔爵士、约翰·巴尔默爵士、托马斯·佩尔西爵士、斯蒂芬·汉密尔顿爵士、尼古拉斯·坦佩斯特、威廉·姆利和许多其他人都投入监狱,他们大部分都定罪、处决。赫斯勋爵定为林肯郡叛乱的从犯,在林肯郡处决。达西虽然自称受到胁迫,以多年为王室效力为词,仍然斩于塔山。他在正法前,指控诺福克秘密鼓励叛乱。但亨利要么了解这位绅士的服务、相信他的忠诚,要么忌惮他的雄厚势力和干济之才,不予采信。他惩罚叛乱、心满意足,于是重新发布大赦令、信守不渝。^① 他颁布特许状,在约克郡建立法庭,以便决断北方各郡的法律事务。这是叛军提出的要求。

亨利所向披靡;不久王子诞生,受洗时取名爱德华,使他的喜悦完美无瑕。不过王后两天后就去世了,对他的幸福并非毫无影响。^② 但亨利热心求子,为

① Herbert, p. 428.

② Strype, vol. ii. p. 5.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时已久；现在他已经宣布两位公主为私生子，为防止王位继承纠纷，王子实在必不可少。因此，国王这一次沉浸于喜悦中，无限地心满意足。王子不到六天，就封为威尔士亲王、康沃尔公爵、切斯特伯爵。王后的兄弟爱德华·西摩爵士原先已经封为比彻姆伯爵，现在提拔到赫里福德伯爵的尊位。海军上将威廉·菲茨威廉爵士封为南安普敦伯爵。威廉·博勒特爵士封为圣约翰勋爵。约翰·罗素爵士封为勋爵。

亨利镇压叛乱、生下王子，加强了他在国内的权威。于是他更多地考虑对外事务，让各方追求跟他结盟。但他在查理和弗朗西斯的战争中保持中立；这场冲突绵延日久，打了很多胜仗，却没有决定性的事件。亨利虽然更倾向于弗朗西斯，但他决定没有必要为此冒险或靡费。大约在此时，各君侯缔结了一份停战协定；后来，停战期限延长到十年。于是，亨利不再为盟友操心，欧洲和平得以重建。

亨利继续谋求跟德国新教君侯结成巩固的联盟。德国各邦在布伦斯维克召开国会，亨利派克里斯托弗·蒙特出使布伦斯维克，但这位大臣的谈判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德国各君侯想知道：亨利不喜欢他们告解的哪些项目。他们给亨利派来新使节，同时负有谈判和论争的责任。他们试图说服国王：他接受圣餐的方式、准许私人弥撒、要求神职人员独身，都是谬误的罪孽。^① 亨利不承认他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错误；不满他们自居口衔天宪，对他这样伟大的国王和神学家发号施令。他有充分的论据和三段论为自己辩护，没有辩出任何结论就把大使打发走了。亨利也有点担心自己的臣民变成这样的神学家，质疑他的教旨。于是，他采取重大预防措施，出版了今年完成的《圣经》译本。他只准许某些教区教堂保存一份《圣经》副本，用铁链锁住。他谨慎地发表宣言，告诉人民：“国王并无义务如此宽纵臣民，实为慈惠慷慨所致；臣民自当用之以方，

^① Collier, vol. ii. p. 145. from the Cott. Lib. Cleopatra, E. 5. fol. 173.

读经乃修德之具，不可私相争执。”他下令：“神职人员做弥撒时，谁也不准大声读《圣经》，以免打扰他。经文若有疑义，须向饱学之士请教，断不得妄下雌黄。”他的这些举措跟其他的做法一样，都采取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中道。

亨利只对一项措施态度坚定。这项措施就是彻底摧毁修道院。目前的时机似乎对这项大业非常有利——叛乱刚刚平定，王权如日中天。有些修道院蒙受了教唆叛乱、私通叛党的嫌疑；国王受此刺激，对修道院更加深恶痛绝。他下令再度巡视英格兰全境的修道院，其实只是为了寻找镇压它们的借口；对于掌握绝对权力的君主而言，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修道院和修道士明白他们面临的危险；从小修道院的前例来看，国王的意志无法阻挡。大多数修道士倾向于主动放弃修道院，以便争取较好的待遇。在承诺不起作用的地方，使用了威胁，甚至极端的暴力。有几家修道院自从脱离罗马以来，一直由宫廷指派，更容易受到朝廷的左右。还有另一些修道院已经暗中接受了改革派的教义，很高兴从他们的出家誓言中解脱出来。整个计划大获成功，不到两年时间，国王就把所有修道院的岁入据为己有。

有些地方，特别是牛津郡，女修道院拥有巨大的收益，她们的生活方式完全无可指责。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们的家园不应该卷入普遍的毁灭。^① 似乎修女和修道士差别很大，前者值得敬佩，而后者颇受非议。所有等级的男性如果勤勉劳动，大概都会造福公众，他们谁也不会找不到适合其地位、能力的工作岗位。但家庭妇女一旦不适于婚姻，确实很难找到适当的位置；良家妇女比低等级的女性更有可能遇见这种情况。女修道院是她们体面而惬意的避难所，否则她们难免无所事事，经常由此贫困潦倒。但国王决心取缔所有类型的修道院；大概认为：如果王国境内不存在任何一种修道院，人们就会更快地忘记这些古老的机构。

^① Burnet, vol. i. p. 328.

当局为了让人民更快地适应大变革，到处散播许多修道院僧侣生活糜烂的故事，煞费心思地中伤这些宫廷决心毁灭的人。圣徒遗物和其他迷信产物曾经长期受到人们的崇拜，现在它们的荒谬可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现在的宗教精神不那么痴迷于外在仪式和看得到摸得着的实体，当局鼓励它转向这个新方向。没有必要详尽列举所有细节。新教史家得意洋洋地提到修道院的圣物宝库：圣埃德蒙的手杖尖端；焚烧圣劳伦斯的几块炭；十一家修道院珍藏了圣母玛丽亚的腰带；圣女乌苏拉有两三个头；触摸兰开斯特的圣托马斯，可以包治头疼；孕妇相当崇拜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衬衣碎片；有些圣物防雨有奇效；另一些圣物可以除去麦田里的杂草。不过，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时代都有这样的愚行，甚至连最典雅的古代也不例外；罗马天主教会并不特殊，不应该受到格外狂暴的谴责。

修道院里还发现了，或者据说发现了更假的欺诈。比如，格洛斯特郡的海尔斯修道院展示了耶路撒冷带来的基督宝血，为时长达几代人；不难想象这种圣物多么受人崇拜。神奇的圣物还伴随着圣迹；只要有人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就看不见哪怕是近在眼前的宝血；他只有行善积德、足以将功赎罪，才能重新看见宝血。这家修道院解散时，机关完全暴露。两位修道士参与机密，他们每星期都用新鲜鸭血替换旧血。他们将血放进小晶瓶；瓶子一侧薄而透明，另一侧厚而不透明。富有的朝圣者一来，他们就让他看不透明的一侧。然后，朝圣者为了赎罪，就会在弥撒和布施上大把花钱。他们等到朝圣者的金钱、耐心和信仰差不多消耗殆尽时，再把瓶子转过来，让他心满意足。^①

肯特郡的博克斯利修道院保存着神奇的十字架，称为“慈惠十字架”。僧侣走近时，圣像的嘴唇、眼睛和头就会活动。罗切斯特主教希尔塞在圣保罗十字架前将它打破，向所有民众显示秘密驱动它的机关弹簧和齿轮。威尔士人

^① Herbert, p. 431, 432. Stowe, p. 575.

崇拜巨大的木制偶像，称为“达维尔·加瑟林”。这个偶像也被带往伦敦，砍成碎片。碎木头用来烧死修士弗雷斯特，实现了精心安排的残酷复仇。^① 弗雷斯特的罪状是否认国王的至高权力，信奉某些异端邪说。一家修道院为了偿还四十镑债务，典押了薄银片装裹的圣安德鲁斯手指。但国王的巡抚拒绝付这笔账，民众看到可怜的债权人收下抵押品，不禁兴高采烈。

一切古老迷信的遗迹扫地殆尽，但没有一个像毁灭托马斯·贝克特（通称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的神龛那样狂热。这位圣徒因为热忱保卫教会特权而封圣，因此僧侣极力鼓励朝圣者向他的坟墓表示虔诚。他们声称：圣托马斯的遗骨产生了无数奇迹，能向虔诚的出家人施惠。他们每年展出一次尸体，在那一天举行庆典，称为“化体日”。“化体日”变成了普遍的节日。每五十年举行为期十五天的大庆，向圣徒致敬。随后，朝拜圣墓的所有人获得大赦。坎特伯雷一度记录过十万朝圣者。在这里，圣徒崇拜已经完全压倒了对上帝的崇拜；非但如此，甚至压倒了对圣母的崇拜。例如，上帝的圣坛一年收到供奉三镑两先令六便士；圣母的圣坛一年收到供奉六十三镑五先令六便士；圣托马斯的圣坛一年收到供奉八百六十三镑十二先令三便士。第二年，差距甚至更大了。上帝的圣坛没有分文供奉；圣母的圣坛只有四镑一先令供奉；但圣托马斯的圣坛收到九百五十四镑六先令三便士供奉。^② 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朝拜这个神奇的圣墓，向神龛奉献的宝石配得上基督教世界最富有的君侯。亨利多么憎恶这位圣徒的性格，这种崇拜跟他贬低罗马教廷权威的计划多么背道而驰。他不仅掠劫了神龛里奉献给圣托马斯的财宝，还传唤圣徒本人出庭、受审，定为叛徒。他下令从日历上删去圣托马斯的名字，从所有祈祷书上删去他的纪念，并且焚骨扬灰。

国王历次取缔的修道院总共有六百四十五家，其中二十八家修道院在国

① Goodwin's Annals. Stowe, p. 575. Herbert. Baker, p. 286.

② Burnet, vol. i. p. 244.

英國史 III
都鐸王朝早期

会拥有议席。各郡平均毁掉九所学院、二千三百七十四所小教堂和独立礼拜堂以及一百一十家医院。这些机构的岁入总计十六万一千一百镑。^① 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英格兰所有土地、财产、岁入共计一年四百万镑。因此，即使算上小修道院，僧侣的岁入也不过国家岁入的二十分之一。这个数字远远少于一般的估计。修道院拥有的土地通常租金甚低；农民自视为某种业主，留心在期满之前续订租约。^②

由于这些强暴的举措，各地流言四起。人们提出许多质疑：传道士和修道士仅仅是受托人或终身租赁者；即使出于自愿，也无权将土地全部产权转交给国王。当局为了让人民适应重大的革新，告诉他们：国王以后再也用不着征税，依靠修道院的土地就可以支付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全部政府开支。^③ 亨利一面用这些论据取悦民众，一面采取有效措施利诱支持他的做法。^④ 他把修道院的岁入赠给廷臣和宠臣，或者低价出售给他们，或者以不利条款跟他们交换土地。亨利慷慨博施；据说有一个女人做的布丁合他的胃口，他就把整个修

① Lord Herbert, Camden, Speed.

② 关于修道院解散, Coke's institutes, 4th Inst. chap. 1. p. 44 有一段奇特的记录。这段记录颇能显示亨利八世一朝，甚至直到爱德华·科克爵士时代的英国政府观念，故而摘录如下。这段记录清楚地显示：当时的人民几乎没有心存自由的想法，想让王权不受约束，只想自己尽可能摆脱政府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常备军、固定的岁入被视为重大的福佑，完全归功于亨利的慷慨。亨利几乎不担心王权没落，英国人会享有目前的自由。科克这一章的标题是：“国会议案，关于看来合理的新建议。”他写道：“在国会中提出任何看来合理的议案，引导上下议院通过法案（尤其是涉及重要事务的法案）时，如果两院都赞同提案、承诺通过，他们必定是为了国民全体的信托，才必须提出议案、承诺通过（两院都赞同的提案），确保该法案的利益。因此亨利八世朝国会发生争吵（众多事例之一），提案和承诺的事务无法运作时，就说明他们不堪信托。国王在这方面告诉两院议员：国王必须具备三种能力，王国才会安全。这三种能力是：其一，人君自食其邑，有能力保卫王国、抵抗突然发生的入侵和叛乱。其二，人君支援盟友，否则就得不到盟友的支援。其三，人君酬劳忠仆。现在的提案是：如果国会将所有修道院、小女修道院、男修道院、女修道院和其他修道院授予国王，从现在到永远，他就会采取措施，不让这些修道院转为私人用途服务。不过，第一，为了上述目的，国王的财库必须充实。第二，王国始终保持训练有素的四万军队以及熟练的军官和队官，加强其力量。第三，为了臣民的利益和安逸，他们以后（正如提议的计划）不应该再承担补助金、十五分之一税、贷款或其他共同开支。第四，为了避免王国荣誉因前述的修道院解散而受损，由国王封授一批贵族，代替修道士和传道士的二十九个上议院议席（国王封爵，以后更多），不赘述。各种国会法案的权威将前述修道院授予国王，但前述计划及其任何部分都没有续保条款。”

③ Coke's 4th Inst. fol. 44.

④ Dugdale's Warwickshire, p. 800.

道院的收益交给她做报酬。^① 国王也给传道士和修道士颁发年金，跟他们以前的收益或功绩成正比；每个僧侣一年有八马克年金。他建立了六个新主教区：威斯敏斯特、牛津、彼得博罗、布里斯托尔、切斯特和格洛斯特，其中五个至今还存在。由于所有这些开支和靡费，国王攫取教会土地的收益没有平民百姓想象的那么大。修道院的毁灭几年前就可以预见到；僧侣已经采取措施，侵吞了大部分储藏、家具和器皿；因此，大修道院在这些方面受到的掠夺不如小修道院之甚。

修道院不仅占有土地，寺院修士还享有英格兰相当一部分圣俸和附属的什一税。这一次，这些收益也移交给国王，并通过这种方式转移到俗人手里。在许多最热忱的教会人士眼中，这种滥权行径亵渎神圣，罪大恶极。英格兰的修道士以前生活得相当舒适，享受的岁入超过定例规费。我们所见的材料称：萨里郡的切特西修道院只有十四位僧侣，年收益却有七百四十四镑。林肯郡的弗内塞修道院只有三十位僧侣，年收益估计为九百六十镑。^② 修道士为了消耗岁入、博取民望，慷慨博施。他们不仅供养穷人，还救济了许多落魄绅士。这些绅士游食于各个修道院之间，完全仰仗僧侣的餐桌。僧侣消极的生活方式和慷慨好客的习惯将修道院变成了游手好闲的懒虫苗圃；但国王无意以过激的突然革新开罪于人，因此规定修道院的新业主有义务维持古老的好客习惯。不过，没有几个地方当真履行了这个承诺；履行承诺的地方也没有坚持多久。

罗马教廷得知所有这些侵凌行径后，其愤怒可想而知。长期以来，罗马教会一直渴望全世界臣服其夸张的尊号。他们以华丽的修辞，向亨利本人及其举措发出神圣的诅咒。教皇最终接受劝诱，颁发业已通过的法旨，反对这位君主。法旨公开将亨利的灵魂送给魔鬼，将他的领土交给第一个入侵者。教廷

① Fuller.

② Burnet, vol. i. p. 237.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到处中伤亨利，将他比作古代最臭名昭著的迫害者，甚至这些暴君还比他略逊一筹。甚至异教徒都尊重死者，亨利却向这些死者宣战。亨利公然跟上天为敌，仇视所有圣徒和天使。尤其是，教廷经常谴责他类似尤里安皇帝——据说，亨利效法尤里安的叛教与博学，却没有尤里安的道德品质。亨利一开始对宗室波尔的毁谤和敌视泰然处之；但后来就禁不住劝诱，开始千方百计地向那位著名红衣主教发泄愤怒。

雷金纳德·德·拉·波尔或雷金纳德·波尔是宗室后裔，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第四子。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是克拉伦斯公爵的女儿。他天资出众、生性慷慨，早年就已经崭露头角，终其一生，堪称出类拔萃。亨利待他甚厚，有意提拔他为最高级神职人员。国王已经委任他为埃克塞特教务长，更有利于他磨砺学业，且预示未来还将对他恩宠有加。^① 波尔在巴黎大学读书时，国王请求饱学之士支持他离婚；但波尔不顾英国代理人的说辞，拒绝染指此案。亨利平时性情狂暴，却以更温和的态度忍受了他的怠慢。波尔品学兼优；亨利明显指望他能为朝廷和王国增光添彩，不想完全跟他绝交。国王仍然保留了他的教务长位置，准许他在帕多瓦大学完成学业。国王甚至待他颇为殷勤，想笼络他归顺。波尔在大学期间，亨利写信要求他公开自由评价英格兰最近废除教皇权威的措施。波尔现在跟所有德高望重的意大利人友谊甚欢，包括萨多莱托、本博和其他真正品位和学术的复兴者。他在这些关系和宗教热忱的影响下，在某些方面忘记了他对恩主和君主亨利的义务。波尔写了一篇论文《教会的统一性》，激烈抨击国王的至高权力、离婚和再婚。他甚至呼吁皇帝报复亨利对皇族和天主教会的伤害。亨利虽然怒不可遏，但还是极力掩饰怒火。国王送信给波尔，召他返回英格兰，解释书中某些晦涩难解的段落。波尔对这种笑里藏刀的邀请保持警惕，决定留在意大利；他在那里受到普遍的钟爱。

^① Goodwin's Annals.

波尔这样才高位尊的人为了支持教皇和皇帝，甘愿牺牲本国的锦绣前程；教皇和皇帝认为自己有义务补偿他。波尔虽然教阶不过执事，仍然受封为红衣主教。大约 1536 年，他出任教皇特使，驻节佛兰德。^① 亨利明白：波尔选择这个职位，主要意图就是唆使英国天主教徒叛乱。因此，他向低地摄政匈牙利王后提出强烈警告；要求她将红衣主教打发走，不让他执行任务。国王现在已经跟波尔结成深仇，不再掩饰对他的敌意。红衣主教这方面在进一步地密谋反对亨利。人们甚至怀疑他图谋跟玛丽女士联姻，觊觎王位。国王每天都收到这位流亡者跟英格兰国内联络的警报。红衣主教的同谋者包括：埃克塞特侯爵考特尼；亚伯格芬尼勋爵的弟弟爱德华·尼维尔爵士；嘉德勋爵、御马监尼古拉·卡维爵士；红衣主教的兄弟、蒙塔库勋爵亨利·德·拉·波尔和杰弗里·德·拉·波尔爵士。这些人都在大司寇奥德利勋爵主持的法庭上受到起诉、审判、定罪；除了杰弗里·德·拉·波尔爵士遇赦以外，他们全都被处决。杰弗里爵士一开始就向国王举报密谋，因此特邀宽典。这些人的判决是否公正、有无冤陷，我们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当时的法庭判决某人有罪，并不真正说明他有罪。不过，有声誉的史家谁都没有对本案提出异议。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埃克塞特侯爵及其同盟者的罪证确实充分。^②

① Herbert.

② Herbert in Kennet, p. 216.

第三十二章

亨利八世(六)

兰伯特论战——召开国会——六款法案——圣旨与法律效力相同——诏定国本——国王议婚——迎娶安妮·克莱夫斯——琴瑟不谐——召开国会——克伦威尔倒台——克伦威尔伏诛——国王跟安妮·克莱夫斯离婚——国王迎娶凯瑟琳·霍伍德——苏格兰事务——新王后帷薄不修——召开国会——教会事务

亨利以铁腕摧毁了古老迷信加诸王国的羁绊，正得其宜。教皇的至高权力已经废除，修道院已经解散；此后，宗教改革的大部分政治目的已经实现。不过，很少有人预期：国王的革新不会到此为止。普遍的看法是：国王在敌对精神的驱使下，会将反对罗马教廷的斗争推向极端，会公开向这个强大教会组织的所有教义、崇拜和戒律宣战。他以前离开教皇，向公民会议申诉。现在，公民会议在曼图亚召开；他事先宣布：这次会议是精神僭主罗马教皇召开的、完全依附于教廷，因此他绝不会屈从。亨利为了类似的目的，安排本国神职人员发表宣言，称他们多方面偏离了古老教会的宗旨和实践。克兰默抓住一切机会，在这方面践行上意。王后简在世时偏爱改革派；国王

在她的诱导和劝说下,推动改革大获成功。王后去世后,加德纳出使法兰西归来,促使国王更加变得模棱两可。加德纳假装无条件服从国王的意志,常常能诱导他实现自己的目的。克兰默策划了更彻底的改革,获得赫里福德主教福克斯的支持。然而,福克斯的去世为邦纳的提升腾出了位置。迄今为止,邦纳似乎狂热地反对罗马教廷;但他决心牺牲目前的一切利益,跟加德纳结盟。据信,加德纳自己秘密参与了教皇的策划,甚至跟皇帝通谋。他跟这些势力协调一致,希望尽可能保存古老的信仰和崇拜。

亨利受情绪控制,敌视、反对罗马教皇,什么都阻止不了他。但另一些情绪中断了他的事业,给他提供了新的仇恨对象。国王从第一次婚姻的顾虑开始,渐渐改变了他受教的神学体系,但他仍然积极而武断地坚持剩下的几项教条,仿佛整个体系仍然完好无损。只有他一个人坚守这些观点,但廷臣的逢迎给霸君的骄横推波助澜,以致他自以为有资格根据自己的特殊标准来规定举国的宗教信仰。在迷信对常识的无数胜利中,真在论的胜利最为重要,也最臭名昭著,国王坚持的正统理论恰好就是这一条。他主张:所有背离真在论的教义都是可憎的异端。他认为:他跟罗马教皇断绝一切关系以后,仍然坚持纯正天主教信仰的核心要义,是超乎一切的荣誉。

伦敦塾师兰伯特曾经由于观念问题受到沃汉姆大主教的盘查和拘禁。^①不过,大主教死后,廷议变化,将他释放。他不顾招祸涉险,继续宣扬教义。他听到后来的林肯主教泰勒博士在布道中为肉体实在论辩护,忍不住向泰勒表示:他不同意这种教旨。他把反对意见归纳在不到十个题目之下。泰勒把他的论文转交给巴恩斯博士。巴恩斯恰好是路德派,坚持主张:虽然面包和葡萄酒的物质在圣餐中始终不变,但基督真正的血肉同样以某种神秘方式与这些物质成分同在。根据当时的法律和做法,巴恩斯所冒的风险不比兰伯特更小,

^① Fox, vol. ii. p. 396.

但巴恩斯充满了迫害的狂热，决心让此人受到应有的惩罚，原因是：虽然他们都背离了古老的教义，但兰伯特竟敢比他走得更远。他安排泰勒向克兰默和拉蒂默指控兰伯特——这两位无论自己有什么观点，都有义务遵奉亨利确定的正统教义。这些教会长老传唤兰伯特到场，试图让他改变论调。兰伯特非但没有服从，反而向国王申诉，让他们大吃一惊。

国王有机会同时表现自己的至高权力和博学多才，很是满意。他接受申诉，以极不公正的方式，将审判和辩论混合在一起。他发布公告，准备加入跟塾师辩论的行列。威斯敏斯特大厅竖起绞刑架，为观众预订了位置。亨利戴上王冕，备齐一切君主威仪。教会长老右列伴驾，世俗贵族左列伴驾。法官和杰出律师的席位安排在主教后面；廷臣显要的席位安排在贵族后面。贵胄云集，不幸的兰伯特在他们中间露面，他必须舌战对手国王，为自己的论点辩护。^①

奇切斯特主教宣布开庭。他说：兰伯特被控异端，不服主教的判断，向国王申诉；仿佛他指望申诉会对他有利，国王会受到保护异端的诱惑。国王陛下确实摆脱了罗马主教的僭政，解散了像蜂巢中雄蜂一样不劳而获的修道士，废除了对圣像的偶像崇拜，出版了《圣经》英译本，教化全体臣民，做了一些人人都会满意的小改革。不过，陛下仍然会保卫天主教会的纯洁性，而最严厉地惩罚一切背离教义的人。国王已经借助目前的机会，在如此博学而庄严的观众面前确定兰伯特的谬误；他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就要受到应有的惩罚。^②

这一番不太鼓舞人心的开场白说完后，国王疾言厉色地询问兰伯特：关于圣餐时基督肉体存在的问题，他的观点是什么？兰伯特一开始说了一些恭维国王的话，亨利轻蔑而愤怒地拒绝接受。他接着敦促兰伯特言归正传，引用《圣经》和学者的话。观众为国王有力的论证和广博的学识而欢呼。克兰默附

① Fox, vol. ii. p. 426.

② Goodwin's Annals.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议国王的论证，增加了几项新理由。加德纳加入论战，支持克兰默。汤斯达尔紧跟着加德纳，加入论战。斯托克斯利为汤斯达尔补充新论证。斯托克斯利发言后，六位大主教依次发言。论战——如果这能算论战的话——长达五小时；最后，兰伯特精疲力竭、晕头转向、胆战心惊、窘迫不安，终于无话可说。国王接着发起进攻，问他有没有心悦诚服。他一句话总结了这个有趣的问题，问兰伯特要死还是要活。兰伯特有坚持己见的勇气，回答说：全凭陛下慈悲。国王告诉兰伯特：他不会做异端的保护人。因此，如果这就是他最后的答复，他必须做好受火刑的准备。克伦威尔代表国王，宣判他有罪。^①

兰伯特大概受到虚荣心的刺激，在如此盛大的公开场面上没有改口；可怕的判决没有吓倒他。刽子手特别注意，要尽可能残酷地折磨这个只身反对国王的人。他被文火烧死，小腿和大腿只剩下残骨。这时，他的折磨还没有完结。有些卫兵比其他人更仁慈，用戟把他抬起来扔进火焰，完全烧光。他们尽这种友好的服务时，兰伯特大叫了几次：“唯有基督，唯有基督。”这就是他的临终遗言。^②

这次行刑前几天，四位荷兰再洗礼派、三男一女，已经背缚在圣保罗十字架的火刑堆上，以这样的方式被烧死。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教派的一男一女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③

这个时代的英国人命运不佳；他们如果蒙冤受屈，不能指望国会申冤。相反，国会每一次召集，他们都有理由担心：国会随后就会将某种暴政转化为法

① 科利尔(Collier)在他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ii. p. 152)当中保存了克伦威尔提供的会议记录。克伦威尔致信国王在德国的使节托马斯·怀亚特，写道：“国王陛下为了敬畏圣餐，公开坐在大厅里主持辩论，审理和判决一位可怜的圣餐礼异端分子。11月20日，此人被烧死。国王行使英格兰教会最高首脑的职权，如此高贵、如此庄严、无比崇高，令人叹为观止。陛下多么仁慈，想要说服这个可怜人皈依正道。陛下辩驳他的论证多么有力、多么清晰。我真希望基督教世界所有的君侯和统治者都在场观看。无疑，他们会非常仰慕陛下无比的睿智和明断；令公认基督教世界中所有的国王和君侯跟他比起来，犹如镜子跟光明相比。”亨利在这样的吹捧下，把自己的观点视为人类的准则，决心以最严厉的惩罚来贯彻他有力而清晰的圣餐变体论。

② Fox's *Acts and Monuments*, p. 427. Burnet.

③ Stowe, p. 556.

律。有些时候，或许武断的君主及其大臣尚未设计，或是自己都觉得不合适，国会却会变本加厉，付诸实施。国王这时召集的新国会表现出无以复加的奴性。如果国王有这种打算，本届国会很可能就是英格兰的最后一届国会。但亨利发现这种统治工具非常有用，因此从来没有想过完全排除它。

国会开幕时，大法官告诉上议院：陛下热忱地希望根除王国的一切宗教纷争。国王承担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希望他们从自己当中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拟定某种信纲，而后提交给国会。上议院提名新封贵族克伦威尔；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达勒姆、伍斯特、巴斯、威尔士、班格尔和伊利主教。议院可能已经明白，他们承担的义务有多少希望。这个小型委员会本身就意见不合、四分五裂，得不出任何结论。随后，诺福克公爵对国会说：既然委员会已经没有拟定报告的希望，那么想要拟定信纲，就应该将委员会减少到六人。新指定的委员会受命起草需要的议案。这些贵族体会上意，立刻满足了国王的愿望。短暂休会后，六款议案产生了——清教徒有充分理由称之为血腥法案。两院通过议案，国王准予用玺。

这个法案确定了：真在论教义；一种圣餐礼；婚姻贞洁誓言的永久性义务；私人弥撒的功用；神职人员独身；秘密忏悔的必要性。任何人否认关于真在论的第一款，皆受火刑，没收财物，且比照大逆罪，不承认弃绝的特权。这种闻所未闻的严厉措施连宗教法庭本身都不知道。任何人否认其他五款，即使认错，也要没收动产、随国王的心意判处监禁。固执己见或是反悔即为重罪，判处死刑。神职人员结婚，受同样的惩罚。他们第一次犯戒，处以没收和监禁；第二次处死。任何人放弃忏悔、在习惯的时间接受圣餐，没收动产、随国王的心意判处监禁。定罪以后固执己见，判处死刑、没收动产，比照重罪。^① 国王应该任命特派员调查异端和不规范的做法，罪人交法庭审理。

^① 31 Hen. VIII. c. 14. Herbert in Kennet, p. 219.

国王制定该法，使得两派都受到压迫，甚至天主教徒也有理由抱怨：男女修道士即使离开修道院，仍然毫无理由地不准结婚。^① 但法案的严厉主要针对新教徒。根据党派斗争的准则，古老宗教的拥护者认为：敌人的不幸就是自己的胜利和成功。克兰默有勇气在国会中反对这个法案。国王要求他缺席，却不能说服他这样表示忠顺。^② 亨利习惯了克兰默的直率和坦诚，相信他的意图大体上纯洁，因此这一次破例宽容他，甚至不允许任何人悄悄说他的坏话。不过，大主教现在有义务服从法案、抛弃妻子。他妻子是著名纽伦堡神学家奥兰德的侄女。^③ 亨利对这种服从的表现很满意，赞许和恩宠一如既往。由于这个法案，拉蒂默和萨克斯顿因抛弃教区，被捕入狱。

国会就这样放弃了所有的宗教自由，继而完全放弃了他们的世俗自由。他们没有丝毫踟蹰或犹豫，就通过了彻底颠覆英国宪制的法案。他们议决：圣旨跟国会通过的法案有同等效力。国会似乎唯恐事情不够糟——这条法律本来不过是宣示，他们却有意以此解释王权的天然边界。法案序言说：国王多次颁布圣旨；然顽民恣意犯上，目无王权。宽纵可能鼓励忤逆之徒不仅违抗全能上帝的律法，还要侮慢至上的王权，因此陛下是可忍孰不可忍。紧急情况经常发生，需要国王及时应对，不可能慢慢召集国会、共议举措。虽然国王的权威源于上帝，获得了在公益问题上博采众议的授权，但忤逆臣民犯上作乱，迫使他只能采取激烈的非常手段。国会根据这些理由，排除一切怀疑，通过了确定王室特权的法案。于是，陛下有权根据枢密院的建议，颁布圣旨，强制服从；抗旨罪刑，唯陛下圣断是从。这些圣旨具有永久性的法律效力。^④

国会通过这项法案后，还要假装保持对政府的某些限制——要么是愚蠢，

^① 传说法案通过后不久，诺福克公爵遇见一位很可能倾向改革派的教士，问他：“先生，法律禁止教士有妻子，你怎么看？”教士回答：“是啊，爵爷，你们已经做到了；但我不敢担保，你们能禁止别人的妻子有教士。”

^② Burnet, vol. i. p. 249, 270. Fox, vol. ii. p. 1037.

^③ Herbert in Kennet, p. 219.

^④ 31 Hen. VIII. c. 8.

要么就是视而不见。他们颁布法律：圣旨不得剥夺任何人的合法产业、自由、继承权、特权、特许权，而且不得侵犯王国习惯法和良俗。他们没有考虑，惩罚抗旨不可能不侵犯臣民的自由和财产。于是王室掌握了颁布新法律的权力和执行权，就等于掌握了全部立法权。确实，英格兰列王一直习惯于下旨强迫臣民服从王室权威，这种特权无疑是绝对权力的强有力征兆。不过，在个别紧急情况下运用权力，以当时的必要或权宜为理据，仍然不同于法案明确授权，不再有节制和限度。

如果还能有任何法律比这项法案更违背自由的精神，那就只能是同一届国会通过的另一项法案。他们通过的剥夺公权法案，不仅针对埃克塞特侯爵、蒙塔库勋爵、达西、赫斯和其他正式受审定罪的人。亨利对红衣主教波尔恨之入骨，波及他的所有亲戚和朋友，尤其是他的母亲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国王因此对她深恶痛绝。伯爵夫人被控：运用她的权威阻碍其佃客阅读《圣经》新译本；接受罗马教皇法旨，据说有人在她的考德雷乡间别墅看到了法旨；秘密跟儿子红衣主教联络。但亨利发现：这些罪名要么毫无证据，要么依法不可能严惩，因而满足不了他的希望。因此，他决定采取更简要、更横暴的方式。他派唯命是从的克伦威尔询问法官：国会能否不经传唤列席，预先剥夺某人的公权？^① 法官回答：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国会身为最高法院，理应依法诉讼，为下级法院表率。任何下级法院都不能如此武断定案，他们认为国会肯定不能。他们受到压力，不得不作出更明确的答复：除非剥夺公权法案以后不再讨论，且保存为法律的一部分。亨利由此决定：这种诉讼方式虽然违背一切公正的原则，却可以行得通。他只顾迫不及待地打击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克伦威尔向上议院展示北方叛乱的旗帜，上面绣有基督的五道伤口。他断言：这面旗帜是在伯爵夫人家里发现的。^② 但没有提出其他证据可以给她定罪。国会没

① Coke's 4th Inst. p. 37, 38.

② Rymer, vol. xiv. p. 652.

有进一步调查，就通过了剥夺她公权的法案。他们没有更可靠的证据，就在同一项法案中连坐了埃克塞特侯爵夫人、阿德里安·福斯蒂丘爵士、托马斯·丁格利爵士。这两位绅士被处决；侯爵夫人遇赦，幸存到国王去世以后；伯爵夫人获得缓刑。

本届国会只通过了一项有益的法案：认可修道院解散；但即使这项法案也包含了许多谬误和暴政；将一切私权从属于公益，极其不公不义。不难想象：修道士交出修道院的计划多有招致非议之处。一切手段都已经用尽。他们已经面对影响人性弱点的一切动机。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要求出身高贵的修女让步。大多数修女都认为：这是毁灭她们的事业；亵渎神明、罪大恶极。^① 科尔切斯特、雷丁、格拉斯腾伯里三位修道院长比其他人更坚定。当局为了惩罚他们的抵抗，警示其他人，将他们打成大逆罪。刽子手处决了三位修道院长，修道院收益充公。^② 而且，早在这些暴行发生以前，国王就明白：人们屈服不过因为贪生怕死，绝不是心悦诚服。因此他决定：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启用他习惯的工具——国会法案。国会在这项法案序文中宣称：所有修道院长的屈服，“根据他们的自愿和普通法的正当行为条款，没有强制”。结果，两院核准了修道院的屈服，保证修道院产业永远归国王及其继承人所有。^③ 值得注意：所有主教修道院长仍然坐在上议院中，没有一人对这项不公不义的法案提出抗议。

本届国会确定了所有国务重臣的等级：代理执政克伦威尔位列满朝众公卿之上。他不过是铁匠的儿子，却高居万人之上，仅次于王室。他没有受过人文教育，却出任教会首脑。

六款法案刚刚通过，天主教徒就开始积极揭发抗命者，没过多久，入狱者

① Collier, vol. ii. p. 158. & seq.

② 31 Hen. VIII. c. 10.

③ 31 Hen. VIII. c. 13.

就不下五百人。

但克伦威尔虽然无意阻止法案通过，却有能力不予执行。他在萨福克公爵、奥德利大法官和克兰默的支持下，抗议许多抗命者受到的残酷迫害，获准释放他们。国王的性情反复无常，使两派都有机会轮流占上风。亨利刚刚通过这项法案，即给改革派沉重打击；接着，就全面许可每人每家拥有《圣经》新译本。新教徒把这个让步视为重大胜利。

亨利只要仍然宠爱王后，就明显受妻子左右；两派的胜负似乎取决于新王后的人选。简·西摩是亨利所有王后中最受宠爱的，她一去世，国王就开始考虑再婚。他首先垂青于皇帝的侄女、孀居的米兰公爵夫人。他提议联姻，但遇到一些困难。他顾及弗朗西斯的友谊，宁可选择一位法国公主。他对洛林家族亲王吉斯公爵的女儿、朗格维尔公爵夫人有意；但弗朗西斯告诉他，这位夫人已经跟苏格兰国王订婚了。但亨利国王不肯罢休，他极其渴望联姻。他得知公爵夫人的造诣和美貌，早已倾心。亨利派米奥泰去见公爵夫人，观摩其人其行。这位代理人发回的报告进一步点燃了亨利的欲火。他得知公爵夫人身材高大，就更觉得她是合适的配偶，因为他现在有些发胖了。亨利不爱他的外甥苏格兰国王，且很高兴羞辱詹姆斯，因此更积极地议婚。他坚持：弗朗西斯应该更重视他，而不是苏格兰国王。弗朗西斯明知英法联盟对他的利益更为重要，不想冒犯朋友和盟邦；但他为了避免进一步的追求，立刻送公爵夫人去苏格兰。弗朗西斯为了不伤害亨利的感情，为他向旺多姆公爵的女儿玛丽·德·波旁提亲；但亨利得知詹姆斯以前拒绝过这位公主，不愿再听这样的婚事。法兰西国王接着建议他在苏格兰王后（以前的朗格维尔公爵夫人）的两个妹妹中选一个，其中一位公主甚至比王后更美貌。国王择妻一丝不苟，仿佛他的心里真能容纳下如此细腻的感情。在这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上，他不相信任何渠道，甚至画像。他向弗朗西斯建议：两人以政务为词，在加莱会晤；法兰西国王应该把吉斯家的两位公主和法国最出色的女士带来，方便他从中选择。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但这个建议使弗朗西斯的骑士精神大受震动。他说：他高度尊重女性，不能将最出色的女士像牲畜一样赶到市场、供买主挑选臧否。^① 亨利根本不在乎这些细节，继续坚持他的提议；但弗朗西斯虽然极想帮忙，最后还是拒绝了。

国王开始转而考虑德国盟友。斯马尔卡登同盟的君侯极其憎恶皇帝迫害他们的宗教，因此亨利希望跟他们联姻，续订盟约。国王认为这种盟约对他颇为有利。克伦威尔乐于支持这项提议，为国王向克莱夫斯的安妮求婚。她热情的公爵父亲在路德派君侯当中有广泛的利益，她姐姐西比拉嫁给了新教联盟的首脑萨克森选帝侯。汉斯·霍尔本的画像尽量美化公主，因此亨利决定向她父亲求婚。虽然萨克森选帝侯反对，但经过一些协商，婚约最后达成。国王急欲亲眼看到新娘的真面目，因此微服前往罗切斯特。亨利发现公主确实像他希望的那样身材高大，但完全缺乏美貌和优雅，根本不像他看到的画像中人。国王发誓说：她就是一个佛兰德大块头女人，宣称永远不会对她有什么感情。他发现新娘除了荷兰语，不会说任何语言，而亨利对荷兰语却一窍不通，事情就越来越糟了。她谈吐的风度似乎完全不足以弥补相貌的平庸。国王忧郁地返回格林威治，向克伦威尔、罗素勋爵、安东尼·布朗爵士和安东尼·丹尼爵士哀叹他的厄运。丹尼爵士为了安慰亨利，告诉他：列王经常遭遇这种不幸，因为一般人都是自己选择妻子，列王却只能仰仗其他人的判断和想象。

国王的顾问彼此争执：要不要解除婚约，把公主送回她的祖国。当时，亨利的处境非常危险。皇帝和法兰西国王签订了十年休战协定；人们认为，对立的两位君主已经达成了良好的谅解。法国和帝国有联合的迹象，引起了英国宫廷极大的疑忌。皇帝了解弗朗西斯慷慨恢弘的天性，信任他甚至达到了雄主之间罕见的程度。根特居民在低地发动了一场叛乱，可能导致最危险的后果。查理当时驻跸西班牙，决定亲赴佛兰德平息叛乱，但他选择的路线颇为困

① Le Grand, vol. iii. p. 638.

难。意大利和德国的路线太长；由于英国海军，海峡路线又太危险。他请求弗朗西斯准许他假道法国，把自己交到严重冒犯过的敌人手中。法兰西君主在巴黎接待了他，极尽奢华和殷勤。弗朗西斯虽然有复仇和利益的动机，情妇和宠臣又唆使他抓住目前的机会，但他还是礼送皇帝安全出境。查理在法国境内时，他绝口不提事务，以免蒙受胁迫皇室贵宾的嫌疑。

亨利获悉所有细节，相信两国君主已经衷心结成全面同盟；他们在宗教热忱的驱使下，可能以联军渡海进犯英格兰。^① 现在，他的利益和安全似乎更需要跟德国各君侯结盟。他知道：如果送回克莱夫斯公主，就会严重侮辱她的朋友和家人。因此他虽然讨厌公主，但还是决定完婚。他告诉克伦威尔：既然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他只有接受束缚。克伦威尔知道自己的利益跟这件婚事息息相关，因此婚后第二天就急忙向国王打听：对王后的感受有没有好转。国王告诉他：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讨厌她，与她距离越近就越让人厌恶。他决定以后再也不会跟她搅在一起，甚至怀疑她不是真正的处女——他对这一点非常精细。不过，他继续对安妮以礼相待。他甚至似乎一如既往地信任克伦威尔；他虽然表面上能控制自己，但潜伏在胸中的愤怒一有机会就会爆发。

新一届国会召开，没有一位修道院长获准进入上议院。国王通过大法官之口向国会抱怨：臣民当中仍然存在巨大的宗教分歧。他断言：既然《圣经》英译本已经出版，全人类的信仰理应有了标准，因此这种可悲的状况就更加难以忍受。但他已经指定了一批主教和神学家起草人民遵奉的信纲。他下定决心：基督、基督的教义和真理一定要胜利。国王似乎更多地期待这些博士的新书能确定真理，能胜过《圣经》的发行。代理主教克伦威尔也以国王的名义向上议院讲话；上议员回过来对他大肆吹捧，尤其是说：凭他的功德，配得上做全宇宙的代理主教。这位大臣似乎仍然深得君心。他列席国会以后不久，就封

① Stowe, p. 579.

为埃塞克斯伯爵，授嘉德勋章。

这时，英格兰还剩下一个宗教团体：耶路撒冷的圣约翰骑士团（通常称为马耳他骑士团）。骑士团部分是教会，部分是军队。他们以其勇武，为基督教世界服务；在耶路撒冷、罗德岛、马耳他阻击蛮族的迅速推进，屡建奇功。英格兰修道院普遍屈服时，他们发扬蹈厉，拒绝将收益交给国王。亨利不能容忍任何团体忠于罗马教皇，不得不借助国会解散这个教团。他们的收益很可观，给国王已经兼并的许多产业所补匪细。但他掠夺教会，所获丰厚，却恣意浪费。他贪婪的掠夺赶不上慷慨的靡费。本届国会惊讶地发现：国王要求十分之四税；两年内每镑征收一先令补助金。公众极其不满，因此回答说：王室绝不应该再向人民要求补助。下议院虽然乐于慷慨牺牲同胞的鲜血，却非常吝惜自己的钱袋。令人畏惧的绝对君主为了纤介之数，不得不煞费苦心。教务会议同意：两年内每镑征收四先令。这些征敛的借口是：亨利为了保卫王国，沿着海岸修建要塞、装备海军，开支浩繁。目前，他在大陆上没有可靠的盟军，因此，防范入侵的开支更大。

国王恩宠克伦威尔默许安妮·克莱夫斯的婚姻，他们两人都把假象信以为真。亨利对王后隐秘的嫌恶每天都在增加，终于无法控制，促使他立刻谋求解散讨厌的婚姻，从而把大臣卷入毁灭之中。这位大臣是这段婚姻无辜的始作俑者。其他因素也促成了克伦威尔的倒台。他出身寒微，非但官居代理主教、凌驾于所有贵族之上，甚至一手遮天、独占众多要职。因此，所有的贵族都恨他。代理主教的职务赋予他近乎绝对的权力，高踞于教士，乃至俗人之上。除此之外，他还兼任掌玺大臣、大冢宰、监护师保。他获得嘉德勋章——这一向是名门甲第的殊荣，似乎受到出身如此卑贱的人玷污。人民敌视他，因为他是掠夺修道院公认的始作俑者；平民对修道院仍然敬畏、热爱。天主教徒认为他是他们宗教隐秘的敌人。新教徒看到他表面上赞同针对他们的一切迫害，对他极为不满；他们谴责他怯懦，甚至阴险。国王发现政府已成众矢之的，因此并非不乐意让克伦威尔承担公众的怨愤。他希望通过这样轻而易举的牺

牲，来重新赢得臣民的爱戴。

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因突然开启了所有这些动机，引起了政府部门意想不到的剧变。国王的感情集中于诺福克公爵的侄女凯瑟琳·霍华德；他决心满足这种新感情，却找不到跟现在的配偶离婚、将凯瑟琳送上龙床和御座的权宜之计。诺福克公爵长期仇视克伦威尔，想利用凯瑟琳唆使国王毁掉这位大臣；以前安妮·博林就是这样对付沃尔西的。等到万事俱备，公爵奉圣旨在枢密会议上逮捕了克伦威尔，指控他大逆不道，关进了伦敦塔。针对他的剥夺公权法案随即通过；上议院认为：不经审判、核准、举证，就可以判处一个人死刑。几天前，他们还宣称此人配得上做全宇宙的代理主教。下议院通过法案，但并非无人反对。克伦威尔被控异端和大逆，但大逆不道的证据全不可信，甚至荒谬绝伦。^① 他罪该一死的举措似乎仅仅是充当了国王暴政的工具，在前几届国会中指导同样不公不义的法案，反对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和其他人。

克伦威尔试图以最谦卑的恳求软化国王，但毫无用处。因为只把大臣和宠臣毁掉一部分，不是这位君王的做法。虽然不幸的囚犯有一次写信给他，措辞让他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但他还是抑制一切同情的表现，拒绝赦免。克伦威尔信中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的：“我，一个最不幸的囚犯，准备就死；这是上帝和陛下之所欲。但软弱的肉体唆使我恳求陛下大发慈悲，宽恕我的过错。陛下最悲惨的囚犯和最可怜的奴隶托马斯·克伦威尔，以沉重的心和颤抖的手，书于伦敦塔。”下面一点是“最高尚的陛下，我苦苦哀求：慈悲，慈悲，慈悲。”^② 他在刑场上都没有认真申诉无辜、抱怨判决。他知道：如果表现出这些违抗国王意志的迹象，亨利会迁怒于他的儿子，因此迫害不会随他死去而告终。克伦威尔审慎、勤勉、能干，本来应该有更好的主人和更好的命运。他虽然出身寒微、位极人臣，却并没有骄慢、欺下的表现，精心报答贫贱时所受的恩德。他在

① Burnet, vol. i. p. 278.

② Burnet, vol. i. p. 281, 282.

意大利战争中当过雇佣兵，受惠于一位卢奎斯商人的斡旋，后者已经完全忘了他这个人和帮他的这个忙。克伦威尔飞黄腾达后，正好在伦敦看到了他的恩人；后者时运不济，已经倾家荡产。大臣立刻将恩人请来，提醒他过去的友谊和恩德，使他恢复了原有的兴旺和富裕。^①

剥夺克伦威尔公权的法案通过时，安妮·克莱夫斯的离婚程序也在同时开展。上下议院协调一致，向国王请愿，希望他准许审核这次婚姻。上谕立刻下达，将相关事务交给教务会议。安妮的父亲以前曾经把女儿许配给洛林公爵，但那时她和公爵都还是孩子，后来双方都同意撤销婚约。但亨利国王以这个婚约为依据，要求离婚。他另外还有两条理由，似乎都有点古怪：他娶安妮·克莱夫斯时，“内心深处”并不赞同，他觉得圆房不合适。教务会议对这些理由表示满意，庄严宣布撤销国王和王后的婚姻。国会批准了神职人员的决议。^② 不久后，判决就传达给公主。

安妮幸而天性淡漠，甚至对女性最敏感的问题都满不在乎。国王的嫌恶和离婚诉讼一点都没有让她感到不安。国王提议收养她作为自己的妹妹，地位仅次于王后和自己的女儿，供给三千镑年金；她欣然接受了亨利的安置，同意根据他的条件离婚。^③ 她甚至写信给哥哥（她父亲这时已经去世），说她在英格兰非常如意，劝他跟国王保持良好关系。她唯一表现出自尊心的例证是：她受到这样的轻侮后，拒绝返回祖国；而是留在英格兰，在这里去世。

虽然安妮态度温和，离婚案还是使国王和德国诸侯的关系大为恶化。但欧洲局势已经大变，国王因此更不在乎他们的愤怒。弗朗西斯和查理的亲密

① Burnet, vol. i. p. 172.

② 本届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宣布婚约不能构成离婚的依据。仿佛安妮·博林和安妮·克莱夫斯的两次离婚案不曾用过这个借口似的。这就充分显示了亨利如何戏侮法律和常识，国会如何卑躬屈膝地追随他的反复无常，双方如何丧尽廉耻。不过，据说国王制定这项法律的意图是恢复伊丽莎白公主的王位继承权。他的性格从来只顾眼前的目标，看不到更远，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自相矛盾。国会宣布：否认亨利和安妮·克莱夫斯离婚，构成大逆罪。参见 Herbert。

③ Herbert, p. 458, 459.

关系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因为他们性格不同，很快就重新点燃了原有的猜忌和仇恨，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猛烈。查理在巴黎期间，由于弗朗西斯天性率直，鲁莽地向这位利益攸关的君主暴露了自己经营的一些敏感关系。高贵的心灵慷慨待人、心满意足，自然会有这种反应。弗朗西斯现在已经完全不怀疑皇帝；希望两人相互支持，可以忽略所有其他盟友。他不仅将法国跟苏莱曼苏丹和威尼斯人的谈判告诉了客人，还公开了英格兰宫廷恳求他联手反对帝国的建议。^① 查理一回到自己的领土，就显示出他配不上自己受到的接待。他拒绝履行诺言，让奥尔良公爵占有米兰。他告诉苏莱曼苏丹和威尼斯元老：他们的盟友怎样对待他们。虽然弗朗西斯轻易抛弃了有大恩于他的老朋友亨利，为了新盟友而牺牲了他，但查理注意到不能忽视他。轻信坦率的法兰西国王泄露给查理许多内幕，皇帝甚至将这些内幕歪曲、毒化后四处散播。亨利若有真正的判断力和慷慨的心灵，仅仅此事就足以教导他应该如何选择盟友了。但他生性骄横跋扈，因此立刻跟弗朗西斯绝交；后者出乎意料，把皇帝看得比亨利还重。查理建议他续订前盟，他欣然同意。亨利自以为这个联盟足以保证安全，便不再重视法兰西和德国诸侯的友谊。

亨利外交路线的新变化使他的天主教臣民非常满意，克伦威尔的毁灭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于是，天主教徒希望他们最终能胜过对手。国王跟安妮·克莱夫斯离婚后不久，就娶了凯瑟琳·霍华德。人们认为，这次婚姻有利于天主教一派，随后的事件符合天主教徒的希望。诺福克和加德纳主导国王的枢密院，开始凶狠地迫害新教徒，六款法案严加执行。巴恩斯博士曾经推动迫害兰伯特，现在轮到自己体会到迫害精神的严酷了。根据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他没有经过审判，就跟杰罗姆、加拉德一起烧死。他甚至在生死关头还在讨论神学问题。他和法吏争论圣徒祈祷问题时，说道：他怀疑圣徒能否为我们祈

① Pere Daniel, Du Tület.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祷；如果他们能，希望他们半小时内为法吏和观众祈祷。他接着恳求法吏把他遗愿带给国王，天真地想象他对送自己上刑场的国王很有权威。他送去的遗愿是：亨利不仅要镇压迷信仪式，还应该非常警惕通奸和平民随意赌咒。^①

亨利一面残酷镇压新教徒，一面也不放过否认他至高权力的天主教徒。当时有个外国人在英格兰，颇有道理地说：反对教皇的人被烧死，拥护教皇的人被绞死。^② 国王随后卖弄他的暴政不偏不倚，迫使两派臣服、人人恐惧。巴恩斯、加拉德和杰罗姆在三个柴堆上行刑；他们每一个身边的柴堆上都有一个天主教徒，也是因为宗教信仰而受刑的。这些天主教徒是阿贝尔、费瑟斯通和博威尔。他们说：惩罚最可怕的部分莫过于跟异端分子一起烧死。^③

在亨利的专制权力之下，英国人的精神似乎已经完全沉沦，且有一些不满的表现。乔治·内维尔爵士在约克郡领导了一次不重要的叛乱，但很快遭到镇压。内维尔和另一位罪魁祸首伏诛。人们推测：叛乱是红衣主教波尔煽动的结果。国王立刻决定：让判处死刑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为儿子顶罪。他下令立刻将她处决。伯爵夫人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仍然不失列祖列宗的气概。^④ 她拒绝俯首到砧板上，也不屈服于未经审判的判决。她告诉刽子手：如果想要她的头，就得自己来拿。于是她摇动可敬的白发，从刑台边逃走。刽子手拿着斧头追她，几次想砍断她的脖子都失败，最后终于砍下致命的一斧。金雀花王朝的世系就此断绝。这个宗室统治英格兰三百年；有伟大的荣耀，但也有更大的罪恶与不幸。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死后不久，以前为王室服务的伦纳德·格雷勋爵也坐大逆罪被斩首。我们几乎不知道他的罪名有什么依据。

北方叛乱迫使亨利巡视那一带，以便稳定人心，让人民服从政府，废除这些地方盛行的古代迷信。他这次出行还有其他的动机——他计划在约克跟外

① Burnet, vol. i. p. 298. Fox.

② Fox, vol. ii. p. 529.

③ Saunders, de Schism. Engl.

④ Herbert, p. 468.

甥苏格兰国王会谈；如果可能，就建立起紧密和牢固的联盟。

宗教改革的同样精神在欧洲另一部分盛行，已经传入苏格兰；早在这个时期以前，就已经激起了同样的猜忌、恐惧和迫害。大约在 1527 年，年轻世家子帕特里克·汉密尔顿出任费恩修道院长，然后出国求学；但他在海外与一些改革派相处，回国时已经非常敌视教会。他的出身和品德本来可以保证他在教会中身居高位，但年轻人的激情和求新的热忱使他无法掩盖自己的真实感情。多明我会长老坎贝尔假装友善、同情他的观点，潜移默化地赢得了他的信任，后来向圣安德鲁斯大主教比顿检举他。汉密尔顿应邀前往圣安德鲁斯，跟一批神职人员论战。会议为自由意志、原罪和诸如此类的题目辩护，最后判决汉密尔顿应该为他的谬误而受火刑。年轻人不为荣显所移，同样不为死亡所动。他鼓励自己：光荣地忍受真理的考验，即刻赢得殉道者的酬劳。人民同情他的年轻、美德和高贵的出身，为他视死如归而感动。不久，一次偶然事件更坚定了他们的倾向性。坎贝尔在刑场上还在侮辱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宣称要传唤他到基督面前对质。后来这位迫害者要么在这些事件中受了惊，要么就是良心发现，也可能突然患了热病，不久就发起烧来，神志不清，去世了。于是，人民把汉密尔顿视为先知和殉道者。^①

汉密尔顿使一批门徒改变了信仰，其中包括弗雷斯特修道士——弗雷斯特变成了狂热的传道者。他虽然没有公开态度，但仍然蒙受了倾向于新观点的嫌疑。他的辖区主教唐克尔命令他遵循好的福音书或使徒书信，而不是别的。弗雷斯特回答：新旧约他都读过，没有发现任何部分有坏的福音书或使徒书信。那时，人们认为极度忠于《圣经》文本是异端的标志。弗雷斯特不久就受到审判，处以火刑。神职人员商议行刑地点时，一位旁观者建议在地窖里烧死他；因为帕特里克·汉密尔顿先生的烟火吹到谁身上就会感染谁。^②

① Spotswood's Hist. church of Scotland, p. 62.

② Spotswood, p. 65.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当时不仅苏格兰，乃至全欧洲的教士都困难重重。改革派的目的是彻底颠覆古老的教会体制，称之为偶像崇拜、不虔诚、可憎。神职人员发现他们的荣誉和产业摇摇欲坠，认为他们有权利不择手段地抵抗这些危险的入侵者，因此他们处决这些异端分子的理由就像人们有权杀死海盗或强盗一样简单明了。他们说：教会从来没有接受宽容的原则。其他问题犹可，但异端会动摇教会的根基，使现存教会的财产，甚至存在本身都会岌岌可危，因此对此谈论宽容显然是荒谬的。由此，教会的政策和倾向点燃了迫害的火焰。不过，他们发现这种补救方法极不可靠。他们注意到：惩罚的火焰点燃了改革派的热忱，很容易打动旁观者的同情心。新教义不顾暴露的一切危险，秘密蔓延开来，人们的思想渐渐适应了宗教革命。

但苏格兰教士面临着危险的征兆：贵族看到了英格兰的前例，便将贪婪的目光投向教产，希望通过改革掠夺教产以自肥。詹姆斯国王自己非常缺钱，多多少少渴望富丽堂皇，特别想大建宫室；他已经受到类似动机的影响，开始用邻邦僧侣的下场来威胁教士。亨利也一直劝说外甥效法自己，他游说苏格兰国王到约克会晤，希望诱使他改变信仰。这样既能满足他的骄傲，又能保证未来的安全。苏格兰国王作出了这个承诺。

詹姆斯这个决定使教会大吃一惊，他们千方百计阻止他付诸实施。他们陈述了革新的危险；认为，贵族势力已经过大，进一步增加必有恶果，且深入英国异端敌人手中太冒险，另外依赖他们就会丧失法兰西和所有外国列强的友谊。他们除了这些考虑，还提供了眼前的财富为补充——他们发现国王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金钱的影响，当时就赠给他五千英镑。他们承诺：教会随时准备资助他的需要。他们指出：没收异端分子产业，可以解决他的财政问题，会每年给王室增加十万镑岁入。^① 新王后年轻、美丽、娴于辞令，支持所

^① Buchanan, lib. xiv. Drummond in ja. 5. Pitscotie, ibid. Knox.

有这些理由,对詹姆斯影响很大。詹姆斯最后决定:首先推迟旅行,再把借口告知英格兰国王。然而亨利为了准备这次会晤,已经先期抵达约克。^①

亨利大失所望、恼羞成怒,发誓要报复他的外甥。他开始准许海上掠劫和陆上入侵,把他的威胁付诸实施。但他不久就在自己家族内部受到更严重的侮辱,触犯了他格外敏感的地方。他自以为新婚琴瑟和谐。凯瑟琳容貌秀丽、性情和蔼,完全吸引了他的感情。亨利毫不掩饰对她的依恋。他甚至公然在小教堂里严肃地感谢上天恩赐他帷薄之乐。他指示林肯主教专门为此草拟祈祷词。但王后的所作所为配不上这份柔情。一位名叫拉塞尔斯的人向克兰默报告她有苟且之事。他告诉大主教:他妹妹以前是诺福克老公爵夫人家的仆人。凯瑟琳原先在这家里受教育、行为极不检点,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德汉姆和莫诺克以前都是公爵夫人的仆人,都是凯瑟琳的入幕之宾。她甚至根本不在乎家中其他仆人知道她的风流事。大主教对这个消息左右为难,隐瞒和揭发都同样危险,便跟赫里福德伯爵和大法官商量。他们一致同意:这种事情无法隐瞒;大主教似乎是将其报告给国王的最合适人选。克兰默很不情愿谈起这样微妙的话题,便把全部经过记录下来,递交给国王。亨利获悉此事,无限惊讶。他一开始非常信任王后的忠诚,不肯相信这份报告。国王对掌玺大臣、罗素勋爵、海军上将、安东尼·布朗爵士和沃斯莱说:他认为这完全靠不住。克兰默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如果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他马上就会面临无法逃避的灭顶之灾。但国王在急躁和嫉妒的驱使下追根问底。掌玺大臣奉命核查拉塞尔斯;拉塞尔斯坚持他的说法,要求让他妹妹作证。这位贵族接下来假装打猎,前往苏塞克斯(当时拉塞尔斯的妹妹住在那里)。大臣发现:她仍然坚持以前的说法,特别是帷薄不修的事实,因此只有面对难以忍受的可能性。大法官同时逮捕了德汉姆和莫诺克;审讯之下,他们

^① 亨利送给外甥一批装潢富丽的图书。詹姆斯一看书名,就知道它们倾向于为新教义辩护,便当着送礼使节的面把它们扔进火里。他还补充说:与其让这些书毁掉他,不如让他毁掉这些书。参见 *Epist. Reginald. Pole. part i. p. 172.*

完全交代了王后的罪行，还发现了更不体面的细节。公爵夫人家的三位女仆承认：她们知道秘密，甚至有人晚上经过她和情人的床。所有调查报告放在国王面前；亨利深为震撼、久久无语，最后流下了眼泪。他曾经在安妮·克莱夫斯的事例中吹嘘：他精通如何鉴别处女。可他惊讶地发现：在目前的王后身上，这一套完全不起作用。王后随即受到盘问，矢口否认；但她得知一切都已经暴露，就承认婚前有罪，只坚持说婚后再也没有背叛国王。但有证据表明：婚后有一位名叫科尔佩普的人曾单独跟她过夜。显然，她让旧情人德汉姆为她服务。她的说辞似乎完全不足凭信，何况国王并没有兴趣区分罪行轻重。

亨利发现：无论如何，为了迅速而充分地报复所有罪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召集国会这个轻车熟路的暴政工具。两院收到王后的供词，向国王致辞。他们恳请国王不要因这次不幸事件而难过，这是所有男人都很容易碰上的；而是应该考虑人性的脆弱和人事的变幻，从这些考虑中获得安慰。他们想要通过针对王后及其同盟的剥夺公权法案，而请求国王恩准。他们希望国王不要御驾亲临——这样只会重新引起陛下的烦恼，有碍御体健康，而是为此委派特使。有一条法律规定：中伤王后和国王构成大逆罪，因此，如果他们有人违反了该法案任何条款，恳请陛下宽恕。

国王亲切地回复了所有这些请求，国会继续其程序，通过剥夺公权法案，针对王后和秘密出轨的洛克福德子爵夫人。科尔佩普和德汉姆也包括在法案中。国会同时通过了通谋大逆罪的剥夺公权法案，针对——凯瑟琳的祖母，诺福克老公爵夫人；凯瑟琳的叔父，威廉·霍华德勋爵；霍华德勋爵夫人；布里奇沃特伯爵夫人和其他九个人。他们的罪行是：明知王后婚前的丑行，却隐瞒不报。亨利照例欺人太甚，期望父母应该抛弃天伦之情，不顾羞耻和体面，把最隐秘的家丑泄露给他。国王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种诉讼的残酷性。他赦免了诺福克公爵夫人和大多数通谋大逆罪的犯人。

不过，他为了确保这种致命的事件以后不影响他和他的继承人，安排国会

通过了一项颇为古怪的法律。法案规定：如果有人知道或是强烈怀疑王后有罪，可以在二十天之内向国王或枢密院揭发，不受以前任何禁止毁谤王后的法律惩罚；但法案同时禁止所有人把消息传到国外，或是彼此传播小道消息。法案还规定：如果国王娶的女人曾经不检点，却冒充真正的处女而不事先向国王坦白，就构成大逆罪。于是，人民拿这一款寻开心，说国王以后只能找寡妇了；因为爱惜名誉的处女再也不敢冒这一条规定的风险了。^① 所有这些法律通过后，王后和洛克福德夫人在塔山斩首。她们的举止表现得相当符合放荡的生活。洛克福德夫人害死了安妮·博林，因此死不足惜。她的罪行败露后，人们更加确信当年有理由同情不幸的王后。

国王没有向本届国会要求任何补助金，但他在别处发现了充实国库的方法。他进一步解散大学、医院和诸如此类的设施，逼得原先担任主管或总监的廷臣把岁入交给国王。他们一连八次得手，但接下来就遇到了障碍。这些设施大部分由本地条例建立，没有总监或委员可以全票通过转让，因此这种投票难以实现。随后国会撤销了所有这些条例，国王及其宠臣现在可以恣意掠夺这些设施的收益。^② 教会长期受到掠夺，又遭遇新的侵凌，没有人感到惊讶。亨利的手段有条不紊，现在开始毁灭在俗教士。他向许多主教勒索教区土地，用这种方法掠夺了坎特伯雷、约克和伦敦教区，让贪婪的寄生虫和马屁精大发横财。

教士通常非常幸运，同时推进世俗利益、守护正统信仰；人民既愚昧又迷信，把这两种激情看成宗教虔诚的证明。但亨利的性情狂暴而固执，分别处理了这些对象。掠夺教会，以满足他的贪婪；迫害异端，以满足他的傲慢与偏执。他安排国会缓解六款法案的惩罚；教士婚姻现在变成了没收动产和终生土地

① Burnet, vol. i. p. 314.

② 本届国会颁布法案：国王任命特派员的各郡应该受到大逆罪审判。大逆罪法案在本朝成倍增加，这种权宜之计免除了审理罪案的困难和费用。同一届国会将爱尔兰并入王国，亨利从此增加了爱尔兰国王和其他头衔。本届国会下议院首先实施发言人发布令状、释放被捕议员的惯例。这种前例增加了下议院的权威，以后产生了重要的后果。Hollingshead, p. 955, 956. Baker, p. 289.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用益的唯一对象。他仍然同样倾向于保持严格的纯洁性。他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由两位大主教、各地的七位主教和大批神学博士组成。他根据至高权力，指派他们为人民选择宗教。委员会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541年国会就通过法律，批准了这些神学家以后经国王同意而确定的任何教旨。他们不耻于这样公然地表明：他们的教规除了君主的武断意志，并无精神和世俗依据。法案中只有一款看上去多多少少还有点自由的精神，即规定教士委员会确定的教规不得与王国的法律、条例相抵触。但其实这一条是国王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插进去的。法律越是复杂矛盾，他就越能主宰每个人的生命财产。他仍然猜忌教会自古相传的独立性，很乐意以这一款为借口，把上诉从教会法庭转移到申诉法庭。出于类似原因，他始终没有公布教规。亨利在一切情况下都鼓励法官插手教会案件，只要他们认为涉及王室特权的法律即可。这是一项可喜的创新，不过开始时却是为武断权力而发明的！

国会的权威——或者说，国会承认国王是教会最高首脑——使国王如虎添翼。亨利相信领导教会是他固有的权力，他简任的委员会应该整理教规体系，确定国民的信守和信仰。不久出版的小册子《基督徒手册》经教务会议接受认可、投票通过，确定为正统信仰。所有微妙问题：信仰、自由意志、善功、慈惠都获得了明确定义，倾向于改革派的观点。几年前只核准了三种圣礼，现在增加到七项，这满足了天主教徒的感情。国王的反复无常贯穿了整个手册，此书其实可以视为亨利的作品。亨利的意见就是全国的教规，因此，他在这种情况下不愿意让教规、权威，甚至他自己以前的规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人民不久就有机会看到国王反复无常的更多例证。《基督徒手册》没有让他满意多久，他下令编撰一部新书《基督徒博闻》。没有要求教务会议同意，就凭借自己和国会的权威出版了该书，确定为新的正统教义。《博闻》跟《手册》内容不同，^①但国王对新信条和旧信条的态度同样独断。他要求全国的信仰

① Collier, vol. ii. p. 190.

唯他马首是瞻。他在这些作品中特别细心地灌输消极服从的教义，同样细心地保证国民去实践这种教义。

国王向人民传播自己这些著作时，他和教士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圣经》。宗教会议审议了《圣经》新译本。加德纳提议：不宜全盘使用英译，应该保留若干拉丁词。他声称：这些拉丁词有着特殊的精神和意义，俗语中没有对应的词。^① 这些词包括：教会会众、忏悔者、大祭司、悔罪、大屠杀、圣事、基本、仪式、奥秘、长老、献祭、人类爱、赎罪、规矩、圣体、慈悲，诸如此类。但这些乱七八糟的词汇极其野蛮，唯一目的就是让人们保持古老的愚昧。会议驳回了这个提议。不过，开启民智，至少在辩论这方面，仍然更危险。《圣经》出版后不久，国王和国会收回了以前的让步；^②除了绅士和商人，禁止其他人精读《圣经》。^③ 他们甚至对这项自由的后果都经过了明显的犹豫和恐惧，才予以批准。这些人只有在“安静和良好的秩序下”，才获准阅读《圣经》。这项法案开宗明义：“许多煽动者和愚民滥用了赐予他们读《圣经》的自由，歪曲了经文的意义，因此产生了大量的意见分歧、仇恨、骚乱和分裂。”看来只要准许自由探讨，国王的全体一致模式就难以实现。

弥撒书也在国王修订后通过，至今变化不大。只是删除了教皇的名字和某些可疑或虚构的圣徒。后来，每一部新书出版，甚至旧书出售都要经过类似的防范措施。教皇一词仔细地省略或抹去——^④好像审查能把这个词从语言中删除掉，好像这样审查不会给人民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这一次，国王仔细清除了教会渐渐产生的另一种弊端——戏剧、幕间节目和闹剧经常嘲笑以前的迷信。由此，群众对古老教义和祭仪的敬畏渐渐消

① Burnet, vol. i. p. 315.

② Which met on the 22d of January, 1543.

③ 33 Hen. VIII. c. i. 不过，当时英格兰没有多少人有阅读能力，《圣经》文本阅读不可能影响很大。现在王国境内的钦定《圣经》有几百万册，当时那一版只印了五百册。

④ Parliamentary history, vol. iii. p. 113.

散。^① 我们不曾听说：天主教会试图以其强大组织或类似手段回敬对手。这些手段表现出狂热的精神，改革派经常受到这种精神的驱使。或许人民并不喜欢这方面的嘲笑；或许清教徒的崇拜更简朴、精神更抽象，更不容易丑化嘲笑（嘲笑通常以感官表现为基础）。因此，国王完全禁止这些宗教喜剧，是对天主教一方极其友好的让步。

亨利就这样孜孜不倦，通过论证、教条和刑罚来统一臣民的宗教观念。但他亲自投入所有这些最严肃的学术争论，就是以身作则地鼓励人民研究神学。此后，人民纵然出于眼前的恐惧而不说不写，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强加的教义或教旨了。

^① Burnet, vol. i. p. 318.

第三十三章

亨利八世(七)

对苏格兰开战——索尔维之捷——詹姆斯五世去世——与苏格兰订约——新冲突——与法兰西开衅——召开国会——苏格兰事务——召开国会——法兰西的战役——召开国会——与法兰西和苏格兰议和——迫害——萨里伯爵伏诛——诺福克公爵被剥夺公权——国王去世——国王的性格——本朝花絮

苏格兰国王拒绝了亨利的殷勤建议，亨利决心报复。他很乐意为此从国会获得一笔补助金，但出于谨慎，他不想向国会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国会以节俭为准则，不理解他的暗示，国王大失所望。但他继续备战，一俟入侵准备就绪，就发表宣言，论证敌对行动的正当性。他谴责詹姆斯辱盟背誓，拒绝事先承诺的会谈，这是争执的真正原因。^① 但他为了显得更加理直气壮，还提到了其他伤害，包括：他外甥保护了一批英国叛徒和流亡者，占据了一些亨利声称属于英格兰的领土。他还重提古老的宗主权要求；传唤詹姆斯对他行效忠礼，承认他的宗主和长辈

^① Buchanan, lib. 14. Drummond in James the Fifth.

地位。他派诺福克公爵统率军队，称他为苏格兰人的鞭子。虽然詹姆斯派阿伯丁主教、达西的詹姆斯·里尔蒙特爵士去安抚舅父，但他无意接受和谈条件。诺福克在纽卡斯尔集结大军；罗伯特·鲍尔斯爵士在拉尔夫·萨德勒爵士、拉尔夫·埃弗斯爵士、布里安·拉托斯爵士和其他人的协助下，入侵苏格兰。英军向杰德堡挺进，准备掠劫、毁坏该城。昂古斯伯爵和他弟弟乔治·道格拉斯流亡多年，依靠亨利供养；这次随英军一起入侵。鲍尔斯麾下军队超过四千人。詹姆斯并没有疏忽防务，部署了相当多的军队，由亨特利伯爵统率，保护边境。休谟勋爵率领封臣，急行军增援亨特利；他与英军遭遇，战斗随即爆发。交战中，亨特利所部开始出现士气大振。英军害怕被围被俘，开始溃逃；苏格兰人穷追不舍。埃弗斯、拉托斯和其他几位要员被俘。只有为数不多的小人物在遭遇战中阵亡。^①

这时，诺福克公爵开始从纽卡斯尔大营出师；什鲁斯伯里伯爵、德比伯爵、坎伯兰伯爵、萨里伯爵、赫特福德伯爵、拉特兰伯爵和其他众多贵族从征。公爵率军向苏格兰边境推进，所部英军不下两万人。苏格兰只有竭尽全力，才能抵抗如此强大可畏的敌人。詹姆斯在法拉和绍特雷伊集结全军；准备一获悉诺福克犯境，就挥军迎战。英军在伯维克渡过特威德河，沿河推进，直至凯尔斯；但获悉詹姆斯已经集结了一万三千人军队，就重新在该村渡河，返回自己的国家。^② 苏格兰国王醉心于军事荣誉，急欲报复入侵者；他下令穷追不舍，把战争带进英格兰境内。他惊讶地发现：苏格兰贵族普遍不满他先前对教士的偏袒，反对他这个决定，拒绝参加他拟议的进军英格兰。詹姆斯为这次抗命激怒，叱责贵族胆小怕事，威胁要报复他们；但他仍然决定：率领追随他的部众，耀兵示威。他派一万军队渡河而西，进军英格兰的索尔威海湾；他自己紧随其后，随时准备加入前军。不过，他厌恶贵族的倔犟；下令夺取马克斯维尔勋爵

① Buchanan, lib. 14.

② 同上。

的帅位，改拜宠臣、低级绅士辛克莱为统帅。军队对这次易帅极为不满，准备一哄而散。这时，戴克斯和马斯格雷夫统率一小股英军逼近，为数不超过五百人。苏格兰全军大哗，立刻逃之夭夭；英军追亡逐北。这次战役几乎没有伤亡，因为几乎没有战斗；但许多人被俘，包括一些要人，其中有凯斯利伯爵、格兰肯伯爵、马克斯维尔勋爵、弗莱明勋爵、萨默维尔勋爵、奥利芬特勋爵、格雷勋爵。他们都被解往伦敦，交给不同的贵族监护。

苏格兰国王听到噩耗，大吃一惊；他自然垂头丧气、斗志尽失。他相信贵族都背叛了他，对他们大为恼怒。他耻于败在如此微不足道的敌人手中；懊悔过去、恐惧未来；不接受任何安慰，陷于彻底绝望。詹姆斯身心交瘁，以至于性命堪忧。他还沒有后裔；听到王后安全分娩的消息，就问孩子是男是女。他听说是女孩时，就在病床上自言自语：“王位得之于妇女，失之于妇女。亨利要么通过武力，要么通过联姻，总会得手的。”几天后，詹姆斯英年早逝。这位君主德才足称——他警觉、英武，非常适于平定当时困扰苏格兰的内乱；他执法公正严格，但支持平民和教会，以致开罪于贵族，不免受到这个等级仇视。清教徒也是他的对手，力图诬毁他的身后之名，却提不出任何重要罪名。^①

亨利一获悉英军告捷、外甥驾崩，就不出詹姆斯所料，提议儿子爱德华与苏格兰女继承人联姻，图谋将苏格兰并入自己的封疆。^② 他召集被俘的苏格兰贵族，首先严词责备他们撕毁条约的假想罪名，然后软化口气、提议联姻。他希望：这种手段可以消弭折磨两国的动乱，保证未来的平安。亨利提议不取赎金就释放他们，只要他们同意支持威尔士亲王和苏格兰小公主的联姻。这个联姻似乎极其自然，对两国都大有好处；苏格兰贵族很容易接受游说，同意

^① 詹姆斯一朝的迫害不能归因于他个人的固执。他和弗朗西斯一世、查理皇帝一样，没有这种毛病；他们两位和詹姆斯都在一生中的不同阶段倾向于新教。当时这些君主采取极端措施，原因在于：他们决定支持古老教会以后，形势已经不允许他们采取更温和、节制的措施。因此狂暴的宗教迫害是时代对宗教改革的倾向；只要稍微宽容新教传道士，就相当于预谋策划改变举国的宗教信仰。

^② Stowe, p. 584. Herbert, Burnet, Buchanan.

联姻。他们受命将人质交给纽卡斯尔的诺福克公爵，为完成拟议的联姻做担保。然后他们前往苏格兰，发现国内一片混乱。

教皇发现新教义在苏格兰蔓延，可能威胁他在当地的权威，就封比顿大主教为红衣主教，以便对他施加更大影响。人们久已公认比顿大主教是詹姆斯的首席大臣、天主教一派的首脑，这一派致力于保卫教会自古相传的特权和产业。他受到指控：为此采取了极其鲁莽的举措。据说，他伪造了国王的遗嘱：指定自己和另外三位贵族在公主成年前监国。^① 不过，史家对此并无共识。至少，大主教确实让垂死谵妄的詹姆斯读过这份授权文件，不过国王的同意和批准并非无懈可击。^② 比顿凭借遗嘱，执掌了王国大政。大主教和太后同心同德，获得国会同意，排除了艾伦伯爵对王位的觊觎。

艾伦的詹姆斯伯爵名叫汉密尔顿。伯爵的祖母是詹姆斯三世的女儿，他由此名列王位第二继承人。因此，红衣主教占据的监国高位似乎本来应该属于他。公主冲幼，伯爵似乎大有机会继承王位。因此，他得以招致大批党羽。伯爵虽然缺乏志向、活力或雄心，但他倾向于新教一方，于是，所有热心宗教改革的人都拥戴他。他依靠这些支持者和自己家族的附庸，就有能力反对红衣主教的政府。比顿大主教涉嫌伪造遗嘱，以及贵族从英国获释回国、伦敦提供若干金钱资助，都使力量平衡转而对伯爵有利。昂古斯伯爵兄弟抓住目前的机会返回祖国，竭尽家族的强大势力反对大主教。国会多数现在倒向他们原先反对的一方。艾伦伯爵受命监国，红衣主教交西顿勋爵监护。英国大使拉尔夫·萨德勒爵士开始谈判威尔士亲王和年幼女王的联姻事宜。双方很快达成以下协议：女王十岁以前应该留在苏格兰，以后去英格兰受教育；六位苏格兰贵族应该立刻交给亨利做人质；苏格兰王国虽然跟英格兰联合，但仍然保留

^① Sadler's Letters, p. 161. Spotswood, p. 71. Buchanan, lib. 15.

^② John Knox,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其法律和特权。^① 两国的战争本来是威胁苏格兰的悲惨灾难，现在通过这些公正的条件，似乎已经完全解决，一变为永久和睦与亲善。

但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说服西顿勋爵释放他——运用阴谋诡计，挫败了所有这些貌似井井有条的措施。他召集大多数教会显要；向他们指出：他们的收益和特权正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在红衣主教的劝诱下，秘密向教士征收了一大笔款项，交给红衣主教运用于颠覆敌人的策划中。^② 他不仅向党羽索取资助，还唤起他们为天主教信仰尽忠。他指出：苏格兰和英格兰联合肯定 是古老教会及其信仰覆灭的先声。红衣主教利用苏格兰人对南邻的反感，同样百无一失。苏格兰虽然畏惧亨利的兵威、无力抵抗，因而暂时同意他提议的联盟和联姻，但根深蒂固的国民习惯仍然极度敌视这些措施，希望两国决裂。但萨德勒谨慎地掩盖问题，耐心等到了遣送人质的时候。这时，大使才要求监国履行条约；但监国回答说：他的权威极其脆弱，国民现在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了，他无力迫使任何贵族自愿去英国做人质。萨德勒预见到这次拒绝的后果，他召唤所有被英国释放的俘虏，要求他们履行诺言、回英国为人质。除了凯斯利伯爵吉尔伯特·肯尼迪，他们谁也没有这样的荣誉感，都不愿履行承诺。亨利对这位贵族的做法非常满意，不仅友善地接待他，还待以殊礼，释放他和他两个留在英国为质的弟弟回苏格兰。^③

苏格兰贵族这种做法虽然反映这个民族缺乏荣誉感，却正中红衣主教下怀。他预见到：现在这些人都有牢不可破的利害关系，一定会始终憎恨和反对英格兰。两国不久就会开战。苏格兰目前满目疮痍，有必要向老盟友法兰西求援。法兰西国王虽然充分意识到他的利益在于支持苏格兰，但求援的要求不可能来得更不凑巧了——此时的他觊觎米兰，憎恨查理，欲对皇帝开战。以

① Sir Ralph Sadler's Letters.

② Buchanan, lib. 15.

③ Buchanan, lib 15.

前历次大战毫无结果；现在他除了保卫国土以外，更没有余力援助苏格兰。伦诺克斯伯爵马修·斯图亚特出身名门甲第，当时正在法兰西宫廷。弗朗西斯得知：伦诺克斯和汉密尔顿两家有夙仇，马修的父亲死于汉密尔顿家族之手，就送他回国，去援助红衣主教和太后。法兰西国王承诺：等他走后，就尽快提供资金，乃至军事援助。监国艾伦发现所有这些人都集结起来反对他，就集合自己的朋友，企图将女王掌握在手中，却遭到失败。他不得不跟敌人谈判，将监护幼主的重任托付给四位中立人士。他们是格拉汉姆、阿里斯肯、林德塞和利文斯顿四大强宗的族长。伦诺克斯在此期间回国，使亲法派对亲英派的胜利更无可置疑。^①

亨利在苏格兰遭遇法国阴谋的反对，大为恼怒。他进一步坚定了原有的决心：跟法兰西决裂、跟皇帝联盟。他对法兰西国王还有其他的不满——虽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足以抵消皇帝以前带来的重大伤害。他假称：弗朗西斯答应效法他，跟罗马教廷彻底决裂，却没有履行这方面的诺言。他不满法兰西允许他外甥詹姆斯首先娶马格达伦公主，然后娶吉斯家的公主。他认为这些联姻是某种担保，说明法兰西有意支持苏格兰反对英格兰的权力。^② 他得知法兰西国王拿他几次结婚的事情开玩笑，且对他相待妻子的方式颇有微词。他恼怒弗朗西斯受过他这么多恩惠，却把他出卖给皇帝。他抱怨法兰西的定期付款和承诺的年金从来不足额。他在所有这些动机的驱使下，跟老朋友和盟友疏远，跟一心讨好他的皇帝结盟。他们的联盟除了共同防御的规定外，还计划入侵法兰西。两位君主都同意：各自派两万五千军队入侵弗朗西斯的领土；要求法王付清欠款，以布洛涅、蒙特勒伊、特鲁安、阿德尔为抵押，保证以后的付款。但法国拒绝了这些条件。联盟的两位君主一致同意：为亨利要求法兰西王位，如果得不到，就要求诺曼底、阿基坦、吉耶纳公位；为查理要求勃艮第

① Buchanan, lib. 15. Drummond.

② Pere Daniel.

和其他一些领地。^① 他们为了给这些要求找借口，便遣使要求弗朗西斯放弃跟苏莱曼苏丹的联盟，以赔偿这种不自然联盟给基督教世界带来的一切损害。法兰西国王拒绝后，同盟向他宣战。应该提到的是：法兰西一贯敌视查理跟英格兰异端国王结盟，不下于同盟憎恶弗朗西斯跟苏莱曼结盟。他们注意到：皇帝曾经对克莱蒙特七世庄严宣誓，永远不会跟英格兰议和或结盟，因此他这次结盟践踏了誓言。

亨利国王一面跟皇帝谈判结盟，一面召集新国会，以便为拟议的对法战争筹集补助金。国会同意拨款，分三年支付。补助金以特殊方式征收，但每人不超过每镑三先令。^② 教士会议供给国王每镑六先令，分三年支付。教士缴纳的数目总是超过平民信徒，即使在天主教时期也是这样。正因为这样，亨利解散修道院，将其收益变卖或赏赐给贵族、廷臣时，查理皇帝才会说，国王杀了给他下金蛋的母鸡。^③

国会还协助执行了以前通过的法律——国王圣旨与国会立法享有同等法律效力。他们确定：任意九位枢密都可以组成法庭，惩罚一切抗旨行径。只要国王乐意，陪审团以及国会全体查证罪由可以完全废止；这样穷凶极恶的法律似乎必然导致恶果。国王可以随意下旨中止任何刑法条款，然后以抗旨而非违法为由审判罪犯。值得注意的是：蒙特乔伊勋爵对这项法律提出抗议。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终本朝之世，公益法案只遇到过这一次抗议。^④

本届国会颁布了法令：^⑤ 如果任何神职人员的祈祷或教导违背国王的著作《基督徒博闻》或他以后发布的任何教义——初犯应该认错，再犯应该解往

① Rymer, vol. xiv. p. 768. vol. xv. p. 2.

② 动产二十先令到五镑的人，每镑缴纳四便士。动产五镑到十镑的人，每镑缴纳八便士。动产十镑到二十镑的人，每镑缴纳十六便士。动产超过二十镑的人，每镑缴纳两先令。土地、封邑、年金二十先令到五镑的人，每镑缴纳八便士。土地、封邑、年金五镑到十镑的人，每镑缴纳十六便士。土地、封邑、年金十镑到二十镑的人，每镑缴纳两先令。土地、封邑、年金超过二十镑的人，每镑缴纳三先令。

③ Collier, vol. ii. p. 176.

④ Burnet, p. 322.

⑤ 34 and 35 Hen. VIII. c. 1.

火刑堆旁示警，拒绝或是第三次重犯就烧死。而平民信徒第三次重犯只罚没一切动产，处以终身监禁。罪犯必须在一年内受到起诉，可以作无罪辩护。这些惩罚比以前否认真在论的惩罚更轻。不过，这项法令补充说：六款法案仍然有效。国会为了让国王更彻底地主宰人民，宣布：国王以后可以随心所欲修改这项法令或其中任何条款。两派都在这项条款下俯首帖耳。国王最充分地证明：在宗教方面，他是王国唯一的权威。全体臣民在严刑峻法的威胁下，显然会默默接受他乐于推行的任何教义。

改革派开始抱有希望：强大的王权会对他们有利。国王娶了拉蒂默勋爵内维尔的寡妇凯瑟琳·帕尔；她为人贤淑，多少倾向于新教。亨利这次婚姻应验了以前的笑谈：他只有娶寡妇了。国王与皇帝结盟，似乎依旧有利于天主教一派；因此两派仍然近乎势均力敌。

目前这一年里，亨利和查理的强大联盟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胜利。战争一开始，弗朗西斯的盟友克里维斯公爵就打败了皇帝的军队。^① 弗朗西斯御驾亲征、先发制人，攻取卢森堡大公国全境，所向披靡。他随后占领兰德雷塞，在这里加筑了几座要塞。查理最终在低地集结大军，几乎攻陷了克里维斯公爵所有的要塞，而后迫使公爵接受城下之盟。然后他获得六千英军增援，屯兵兰德雷塞城前，以四万余人围城。两位敌对的君主短兵相接，人人期待着大场面；但这时法王发现了向兰德雷塞运送给养的方法，就这样实现了目的娴熟地退兵了。查理发现季节已晚，不再抱成功的希望，只有回军冬营。

亨利在大陆上的搭档逢迎他的虚荣，但王国的利益跟苏格兰事务关系更深。监国艾伦为人懒散，没有雄心；没有朋友和侍从的敦促，从来无意管理朝政。他一发现太后、红衣主教、伦诺克斯伯爵一党占了上风，就很乐意接受任何和解条件，无论有多么不体面。他甚至真心诚意地保证：放弃改革派的教

^① Memoires du Bellay, lib. 10.

义，师从斯特林的天主教方济各会。他这样软弱轻率，丧失了举国上下的信任；清教徒到那时为止还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以后就成了他不共戴天的死敌。红衣主教完全掌握了王国。太后默认他的全权。监国只能言听计从。只有伦诺克斯阻碍他施政，带给他一些麻烦。

伦诺克斯和艾伦两家的夙仇使这两位贵族不共戴天。红衣主教和亲法派为了争取他的支持，诱惑他期望继承幼主的王位；这种竞争进一步唤起了汉密尔顿家族的仇恨。伦诺克斯还受到鼓励：跟太后联姻，博取监国的理据。他设想：为亲法派效力，就会获得这些酬劳。红衣主教发现：伦诺克斯和艾伦的友谊，他不能兼得。艾伦更容易操纵，又掌握当前的权威；显然更有利。伦诺克斯发现：他觊觎太后，但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艾伦有红衣主教支持，完全占了上风。伯爵退居丹巴顿郡，郡守完全忠于他。他秘密跟英格兰宫廷联系，召集附庸和党羽。所有这些人不是倾向于新教，就是有理由不满红衣主教的政府；现在他们拥护伦诺克斯为首领，乐于为他效力。伯爵不久就集结起一万大军，威胁立刻毁灭他的敌人。红衣主教没有旗鼓相当的兵力，但他为人精明，预见到伦诺克斯不可能长期维持这样一支大军。红衣主教为了争取时间，开始跟伯爵谈判。他运用各种手段引诱伯爵的追随者，说服道格拉斯家族改变立场，向全国指出内战和动乱的危险。伦诺克斯发现众怒难犯，最后只得放下武器，跟红衣主教和监国和解。和平眼下得以恢复，但两派互不信任。伦诺克斯修缮城堡，做好防御准备，等待英国援军；他希望依靠这些援军，就能压倒敌人。

冬季限制了亨利的军事行动。他在此期间召集新国会，国会根据他的授意，通过了关于王位继承的法律。国会宣布威尔士亲王或国王的其他男性后裔为王位直接继承人，然后恢复了玛丽和伊丽莎白两位公主的继承权。这项法案似乎相当合理，纠正了国王以前自相矛盾的横暴；但亨利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向都是欺人太甚、反复无常。他准许两位公主有机会继承王位，却不准

推翻宣布她们是私生子的旧法案。他从国会取得授权：如果两位公主拒绝接受他愿意施加的任何条件，就继续剥夺她们的继承权。他要求国会颁布法案：在他绝嗣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遗嘱或特许状随意处置王位。他不可能预见到：他将国会贬低为驯服工具，配合他多变而横暴的倾向，也就在同等程度上教导人民视国会法案为刍狗，由此让他很想实现的目的落空。

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宣布国王通用的尊号为“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国王，信仰保卫者，英格兰和爱尔兰尘世教会的最高首脑”。这里的自相矛盾一目了然：信仰保卫者是罗马教廷授予的，因为他站在教廷一方反驳路德派；而教会最高首脑则是反对罗马教廷主张的权力的。

国会还通过一项法案，豁免国王最近向国民征收的一般贷款。从以前通过的这一类法案看，贷款显然不是完全自愿的。^① 不过这项法案有一个特殊条款，除了亨利谁也想不出来：部分或全部收回贷款的人应该把收到的钱退还国库。^②

亨利为了保障他的教会模式，强迫臣民起誓，并不比他别的措施更讲理。各等级臣民已经被迫否认教皇的权威——但亨利对他们的誓词并不完全满意，又加了一条——所有以前宣誓的人都应该视为接受了新誓词。^③ 人们要受他们从未发过的誓言约束，真是奇怪的假定！国会批准的法案中，以废除六款法案最值得称道。法案规定：除非有十二人在专任特派员面前宣誓，不得控告任何人违反血腥的六款法；未经控告，不得为此控告或拘押任何人。任何传道士被控在布道时违反六款法，必须在四十天内付诸审判。

国王只要向国会要求补助金，无论多么温和，都会体验到王权的限度。因此他不敢冒险在这时提出拨款要求，害怕遭到拒绝。但他同时在法兰西和苏

① 35 Hen. VIII. c. 12.

② 35 Hen. VIII. c. 1.

③ 35 Hen. VIII. c. 1.

格兰开战，自己又一贯挥霍无度，靡费甚大，于是，他只得另寻充实金库的途径。他虽然已经勾销了自己的债务，但还是向臣民索取新贷款。他将金价从每盎司四十五先令提高到四十八先令，银价从三先令九便士提高到四先令。他这次改革的借口是防止金银外流，仿佛这种权宜之计真能有这样的效果。他甚至铸造劣币，以圣旨强令流通。他委任特派员征收供奉，以此道勒索到大约七千镑。伦敦市议员瑞德^①上了年纪，拒绝供奉，或是他的供奉没能让特派员满意。因此，他被征入步兵、派往苏格兰战场，在那里被俘。若茨同样倔犟，因此入狱，付了一大笔钱才获释。^② 这些特权的力量（当时通行无阻）可以随心所欲地强迫任何人服任何役、监禁任何人，勒索贷款更不在话下。这样一来，王权在某种意义上即变成了每个人人身和财产的绝对主宰。

这年年初，国王派海陆军入侵苏格兰。舰队有两百多艘船只，载运一万人马。莱尔勋爵达德利统率海军，赫特福德伯爵统率陆军。英军在里斯附近登陆，首先驱散了一支抵抗他们的小部队，攻陷该城，所向披靡，然后向爱丁堡进军。爱丁堡没有或几乎没有作任何抵抗，很快就打开了城门。英军首先掠劫，然后纵火焚城。监国和红衣主教无意反抗强敌，逃往斯特林城堡。赫特福德挥师东进，东部边境巡抚埃弗斯率生力军跟他会师。英军蹂躏苏格兰全境，焚毁哈丁顿和邓巴，然后撤回英格兰，总共只损失了四十人。艾伦伯爵集结了一批军队，但他发现英军已经撤退，转而讨伐伦诺克斯。伦诺克斯伯爵蒙受了私通敌军的嫌疑，并非无故。伯爵抵抗了一阵，不得不逃奔英格兰。亨利授予他一笔年金，甚至把外甥女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嫁给他。伦诺克斯投桃报李，保证他只要有力，就会将祖国夷为臣隶。^③

亨利的政策受到谴责，因为他突然而暴虐的入侵点燃了苏格兰人的怒火，

① Herbert. Stowe, p. 588. Baker, p. 292.

② Goodwin's Annals. Stowe, p. 588.

③ Rymer, vol. xv. p. 23, 29.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却没有压倒他们的斗志。通常的说法是：如果他想结盟，这种做法太过火；如果他想征服，这种做法太不够。^① 但他迅速召回军队，原因是急欲反对法兰西；他拟议以倾国之力执行这个计划。他跟皇帝协调一致，威胁要彻底毁灭法兰西君主国，但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英格兰的毁灭。两位君主一致同意：以十余万大军入侵法兰西。亨利承诺出师加莱，查理承诺出师低地。他们入境后不围攻市镇，而是绕过所有边城，直取巴黎。他们准备在巴黎城下会师，进而征服法兰西全境。弗朗西斯不过四万余人，不可能抵抗如此强大的力量。

亨利出境期间，委任王后监国。他率领三万人马，渡海到加莱。诺福克公爵、萨福克公爵、阿伦德尔伯爵费泽兰、牛津伯爵维尔、萨里伯爵、圣约翰勋爵鲍勒特、查特里的费瑞尔勋爵、蒙乔伊勋爵、威尔顿的格雷勋爵、安东尼·布朗爵士、弗朗西斯·布莱恩爵士和王国大部分活跃的贵族绅士随军出征。英军不久就跟佛兰德海军上将德·伯恩伯爵会师，伯爵统率一万步兵、四千骑兵。联军声势浩大，边境市镇无不披靡。法军主力为了迎击皇帝的军队，已经移师香槟一侧。

皇帝率领将近六万军队，比亨利更早投入战场。他不想等待盟友而贻误戎机，屯兵卢森堡，卢森堡向他投降。他随即进军默兹河上的康梅西城，攻陷该城。里尼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接下来围攻马恩河上的圣狄谢尔城；虽然市镇无险可守，总督桑塞尔伯爵仍然率领市民英勇抗战。皇帝师老兵疲，超乎预料。

皇帝屯兵圣狄谢尔城前，这时，英军已经在皮卡迪集结完毕。亨利要么是看到法兰西边境守备空虚，禁不住诱惑；要么是认为皇帝首先违约，围攻市镇；也许是终于意识到完全征服法兰西的危险后果。因此他没有向巴黎进军，而是屯兵蒙特勒伊和布洛涅城前。诺福克公爵兵临蒙特勒伊，国王亲征布洛涅。

^① Herbert. Burnet.

布洛涅总督维文麾下有一位英勇的老兵菲利普·科索，鼓励要塞抗击英军，直到弹尽粮绝。科索在围城中阵亡，怯懦的维文立刻献城投降。后来，他因为这次不名誉的投降而被斩首。

布洛涅围城期间，查理攻陷了圣狄谢尔。他发现季节已晚，征服法兰西的所有计划似乎都已流产，便有意跟这个王国议和。他为了寻找抛弃盟友的借口，派使节去英军大营，要求亨利全面履行约定、会师巴黎城下。亨利答复说：他既然已经屯兵布洛涅，弃城而去就会有失体面，是皇帝自己首先违约，围攻圣狄谢尔城。这个答复给查理提供了充分理由——他在克雷普跟弗朗西斯签订不包括英国的和约。他同意把女儿嫁给弗朗西斯的次子奥尔良公爵，以佛兰德为嫁妆；弗朗西斯投桃报李，从皮埃蒙特和萨伏伊撤军，放弃对米兰、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其余领地的要求。弗朗西斯达成对他极其有利的和约——部分因为战争开始时，安古耶伯爵在皮埃蒙特的塞里索利斯对帝国军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部分因为皇帝亟欲移师讨伐德国新教诸侯。查理命令帝国军队抛弃皮卡迪英军，亨利只得从蒙特勒伊撤围，返回英格兰。这次战役作为大捷向民众宣扬，但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亨利的军事行动一如既往，代价高昂，收获甚微。

在此期间，苏格兰战争有气无力地进行着，双方互有胜负。拉尔夫·埃弗斯爵士现在封为埃弗斯勋爵；他和布莱恩·拉托恩爵士骚扰苏格兰；蹂躏提维奥特达尔和梅斯，然后进军、攻陷科尔丁汉姆修道院，筑堡设防。监国集结八千军队，想把英军从那里驱逐出去。但他刚上战场就突然陷于恐慌，抛弃军队逃往邓巴。他抱怨军队抗命，借口他们可能会把他交给英军，因此不能不走。但普遍认为：这次不体面逃跑的真正原因是他缺乏勇武斗志。苏格兰军队被将领抛弃，陷于混乱；幸而昂古斯伯爵及其若干扈从救出大炮、保护后队，英军才没有大获全胜。埃弗斯恃胜而骄，向亨利夸口说：他已经征服了福斯以南的苏格兰全境，其功不细，当受上赏。诺福克公爵知道：跟尚武的民族为敌，保存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获得的土地，并非易事。他建议国王将埃弗斯自诩征服的土地赏给他。在英国人下一次入侵中，埃弗斯的希望化为泡影。这位将军率领五千人马进驻提维奥特达尔，蹂躏四野。这时他获悉梅尔罗斯修道院附近出现苏格兰军队。监国在昂古斯伯爵的敦促下积极起来，下诏动员邻郡各军，在那里集结了相当强大的军队，跟敌人旗鼓相当。罗斯伯爵之子诺曼·莱斯利率领一批法国志愿者，也加入了军队。他以生力军和自己的英勇无畏激励全军。苏格兰统帅为了稳固防线，命令骑兵全体下马。他们在安克拉姆附近高地陈兵待敌。英军屡胜而骄，轻敌殊甚。他们看到苏格兰马匹离开战场，以为敌军全线撤退，急于进攻。苏格兰军队迎战，秩序井然，占据有利地形。英军没有预料到会遭到抵抗，大吃一惊，不久就开始溃逃。苏格兰人追亡逐北，尸横遍野。埃弗斯和拉托恩阵亡，一千余人被俘。过了一段时间，弗朗西斯为了在这次战争中支援苏格兰人，派拉吉斯勋爵蒙哥马利率三千五百名辅助部队来援。^① 监国获得增援，就在哈丁顿集结一万五千人马，进军蹂躏英格兰东部边境。他所过之处无不残破，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就撤回本国，解散军队。赫特福德伯爵为了报复，出兵蹂躏苏格兰中西部边境。交战双方都给敌人造成了重大破坏，自己却无所收获。

这一年，英法战争同样没有值得留意的重要事件。弗朗西斯装备了一支舰队，包括二百多艘帆船，还有弩炮战舰，载运若干陆军在英格兰登陆。^② 他们驶向怀特岛，发现英军舰队停泊在圣海伦港。英军舰队只有不到一百艘船只；海军上将认为最好留守航道，希望将法军引入岩石间的狭窄水道，因为他们不熟悉那里的地形。两军舰队相互炮击达两天之久，除了英军最大舰只之一“玛丽·罗斯”号沉没以外，双方的损失都微不足道。

弗朗西斯准备这支强大舰队的目的是阻止英军增援布洛涅，他决心围攻

^① Buchanan, lib. 15. Drummond.

^② Beleair. Memoires du Bellay.

这座城市。为此,他下令建立要塞、以便封锁布洛涅港口。他消耗了相当多的时间和金钱,要塞却没有建好,只能抛弃。他虽然在边境集结了将近四万军队,却没有取得任何重要进展。亨利为了保卫他在法国的土地,征集了一万四千名德国兵;这些雇佣兵推进到列日主教辖区的弗勒里讷,无法继续前进,因为皇帝不许他们假道帝国领土。他们获悉:一支更强大的法军已经在边境另一侧就绪,准备阻击他们。战果和军饷匮乏,很快就引起了一场兵变。他们扣押英国专员为抵押,索要欠饷,撤回自己的国家。这次代价高昂的战争似乎有些缺乏远见。

两场战争的巨额靡费迫使亨利召集新国会。下议院拨给他一笔补助金,土地每镑缴纳两先令,分两年支付。^① 神职人员投票拨给他每镑六先令。但国会担心更多需索会接踵而来,强加在他们身上,于是试图慷他人财产之慨,减轻自己的负担。他们在一次投票中,将大学、附属礼拜堂、独立小教堂和医院的所有收益拨给国王。^② 亨利对这个让步很满意,因为这会增加他的权力,但他无意夺走学术机构的所有捐赠。他不久就特别通知大学:他无意触动他们的岁入。因此,这些古老的著名机构得以继续存在,这应该归功于国王的慷慨,而不是这个朝秦暮楚、奴颜婢膝的国会保护。

国会承认:根据上帝之道,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首脑;大主教、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的管辖权仅仅源于国王。他们在这项法案的序言里充分表现了朝秦暮楚的精神。^③ 他们说:只有国王享有上帝赋予的充分权力和权威;听取和决断一切教会事务,矫正一切异端、谬误、恶行和无论什么罪孽。法案在此没有提到教务会议,乃至国会的赞同。圣旨公认不仅有法律的效力,而且有启

① 动产或资金五镑到十镑的人,每镑缴纳八便士。动产或资金超过十镑的人,每镑缴纳一先令。

② 附属礼拜堂是小教堂、小礼拜堂或某些大教堂的特殊祭坛,依靠土地或其他收益,供养一位或几位教士,每天为其创建者或创建者指定的其他人做弥撒、做礼拜。独立小教堂独立于任何教会之外,捐赠目的同前。参见 Jacob's Law Dict.

③ 37 Hen. VIII. c. 17.

示的权威。王权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他们的言论，甚至指导他们内在的感情和观念。

国会休会前，国王御驾亲临，向他们发表讲演。他感谢国民忠爱之忱，不逊于历代先王所受，然后抱怨他们在宗教上各执己见、争讼不已、相互仇视。国王告诉他们：一些讲道坛已经沦为相互争执的战场；传道士叱责同僚是异端和再洗礼派，对方回敬他是教皇派和伪君子。国王准许人民使用《圣经》，不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争吵和辱骂的材料，而是为了让他们修身养性，引导孩子和家人。他痛心地发现：金玉良言受到糟蹋，用于酒馆客栈的扯淡，为毁谤合法的神职人员提供了借口。他遗憾地看到：他们急欲对上帝的真言妄加推测，却鲜有身体力行者。想象的知识如此丰富，慈悲却与日俱减。^① 国王的建议很好，但他以身作则，鼓励了推测和争执，完全不符合他提倡的温顺服从。

亨利用国会的拨款准备战争。他派赫特福德伯爵和海军上将莱尔勋爵率领九千士兵去加莱，其中三分之二是外国人。随后，英法两军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冲突，但双方都不能指望获得重大进展。亨利对弗朗西斯并没有深仇大恨，这场短暂的战争足以让他泄愤了。他越来越肥胖乏力，自知余年不多，因此担心争执不利于幼主，渴望议和。弗朗西斯一方同样不反对跟英格兰议和，因为他儿子奥尔良公爵刚刚去世，他重提对米兰的要求，预见到他和皇帝不久就会因此而决裂。于是，双方的全权大使在坎博会晤。坎博是一座小城，位于阿德尔和吉尼茨之间。两位全权大使很快达成一致，签订和约。和约主要条款为：亨利占据布洛涅八年，或是直到弗朗西斯付清以前的欠款。债务确定为二百万里弗，另外还有五十万里弗，留待以后调整。亨利的战争收获仅此而已；跟一百三十四万英镑的战争开支^②相比，不过三分之一，而且难以保证偿还。

^① Hall, fol. 261. Herbert, p. 534.

^② Herbert. Stowe.

国王现在结束了所有对外战争，有余暇专注于国内事务，尤其是他特别留意的统一教旨。他虽然准许《圣经》英译，但迄今为止仍然坚持做弥撒用拉丁文。不过，他最后接受劝说：同意弥撒连祷部分使用俗语。六款苛法多多少少让改革派丧气，这次革新又燃起了他们的希望。新连祷文有一段是：“拯救我们免受罗马主教及其所有可憎的暴行伤害。”克兰默凭借他的声誉，引导亨利进一步推动改革。加德纳交聘皇帝，君侧空虚，因而对他有利。但加德纳致信国王说，查理威胁道：如果亨利采取极端手段敌视天主教会，他就会中断帝国和英国的一切贸易。克兰默的计划因此推迟了一段时间才成功。这一年，克兰默失去了宫廷中最真诚、最强大的朋友：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几年前，萨福克的妻子、法兰西寡后去世。虽然君心难测，但亨利并非不可能长期保持热忱、稳定的友谊，这位贵族就是实例。萨福克与其主君自幼相知，似乎完全配得上国王的恩宠。萨福克公爵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国王正在枢密院议事。他抓住这个机会，表达丧友之痛，纪念死者的美德。他宣称：两人交谊期间，妹夫从来不曾试图伤害对手，从来不曾说任何人的坏话。国王补充说：“在座的诸位爵爷，这句话你们谁能当之无愧？”然后他环顾席上公卿的面色，看到因良心有愧而自然流露出的慌乱神情。^①

克兰默失去了公爵的臂助，更深陷廷臣的阴谋诡计中。他们出于党派、宗教，以及通常的利益动机反对大主教；在亨利的大臣和顾问中，这些情况都是司空见惯的。国王热衷于正统性，因而受到天主教派的左右。他们向亨利指出：他贯彻真理的热忱值得赞赏，却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责任完全在于大主教以身作则，事实上秘密鼓励和支持异端者。亨利看出他们的用意何在，在假装同意，授意枢密院调查克兰默的举措。他承诺：只要大主教确实有罪，就应该投入监狱，课以应有的惩罚。这时，所有人都认为大主教已经完了。老朋友出

① Coke's Inst. cap. 99.

于势利，敌人出于仇恨，都怠慢、轻侮大主教。克兰默只得跟仆人一起，在枢密院会议室门口侍立了几小时之久，才获准进门。枢密院最后召见他，宣布决定将他送往伦敦塔。克兰默说：他要向国王本人申诉。他发现申诉无人理睬，便取出一枚戒指；这个戒指是亨利的赠礼，作为宠爱和保护的凭证。枢密院惊慌失措。他们觐见国王，亨利严加叱责，告诉他们：克兰默的美德、他们的恶毒和嫉妒，他心里一清二楚。既然温和的方式不起作用，他决定以最严厉的训诫来粉碎他们的所有阴谋，教会他们更守本分、忠心侍奉。诺福克公爵是大主教的首要敌人，为他们的做法道歉。公爵说：他们唯一的目的是公开考验大主教，充分显示他的清白。亨利命令他们拥抱大主教，以示真心和解。克兰默性情温和，因此他这一方比通常的强制和解更有诚意。^①

亨利虽然宠爱克兰默，使针对他的所有指控完全落空，但他天性骄横易怒，随着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对推测意见跟自己不合的人越来越严厉。真在论是他特别在意的观点，情况尤其如此。年轻女子安妮·阿斯丘贤德美貌，^②是宫廷主要贵妇和王后本人的亲族，被控在这个敏感问题上独出心裁。亨利对她的性别年龄毫无宽纵——一个女人竟敢反对他的神学观点，反而更让他恼羞成怒。在邦纳的恐吓之下，她似乎有意改变论调，但她的说法有许多保留意见，不能让热忱的大主教满意。她被投入监狱，在狱中撰写祷词和论文，从而坚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绝不放弃自己的宗教原则。她甚至写信给国王，告诉他：关于上帝的晚餐，她相信基督亲口的教导和天主教会必需的神圣教义。但她不能接受国王阐述的教义——这种表示对她毫无好处，反而被视为变本加厉的侮辱。沃塞利继任奥德利大法官的职务，他相当倾向于天主教一方，奉命盘查她的宫廷保护人和贵戚命妇。但她对朋友忠心耿耿、可圈可点，坚不吐

^① Burnet, vol. i. p. 343, 344. Antiq. Brit. in vita Cranm.

^② Bale, Speed, 780.

实。她受到严刑拷打，仍然守口如瓶。有些作者^①补充了不寻常的场面：大法官站在拉肢架旁，命令伦敦塔典狱长加刑，但典狱长拒绝服从。大法官威胁他，典狱长仍然拒绝。法官在其他方面品德端方，只是被宗教狂热迷住了心窍。在这种情况下，他亲手操作拉肢架，几乎把犯人撕成碎片。她的坚定超过了迫害者的野蛮，他们的一切手段都徒劳无益。然后，她被判处活活烧死。她从拉肢架上被放下来，已经无法站立，只好用椅子抬到刑场。教士尼古拉斯·贝勒尼安、王室总管约翰·拉塞尔斯、裁缝约翰·亚当姆斯都以同样罪名，和她一起受刑。他们都被捆在火刑柱上。在这种可怕的情况下，大法官告诉他们：赦书已经颁布、签署，只要他们改变论点，马上就可以获赦。他们认为这个建议只是殉道者桂冠上的又一个装饰品，只是平静地观看着刽子手点燃吞噬他们的火焰。沃塞利没有考虑到：他们在大庭广众下的表现比他们的坚定意志更光荣。

虽然安妮·阿斯丘意志坚定、守口如瓶，没有让王后涉险，但王后不久又面临新的危险，间不容发地逃脱了。国王腿上生疮，再加上极度肥胖与恶习，生命岌岌可危，比平时更加暴躁易怒。王后以最温柔、最恭敬的方式侍候他，竭尽全力安抚他、顺从他，平息他不断发作的坏脾气。国王最喜欢讨论神学问题，而凯瑟琳有良好的判断力，能够参加任何讨论。她经常在这些讨论中暗暗倾向于改革派，轻率地暴露了自己的太多想法。亨利发现她竟敢跟自己意见不同，勃然大怒。他向加德纳抱怨王后的倔犟；加德纳正好抓住这个机会，挑拨离间、煽风点火。他称赞国王极力保持臣民的正统性；并提出，地位越高，惩罚越重；越接近国王，牺牲越能发挥警示作用、在后人眼中也越光荣。国王咨询大法官；大法官基于宗教热忱，极力附议。亨利天性鲁莽轻躁，在重臣挑唆下，竟然下令弹劾王后。圣旨随即下达，沃塞利承旨。由于王后牵涉大逆，他

^① 参见 Fox, vol. ii. p. 578. Speed, p. 780. Baker, p. 299。但博尼特(Burnet)质疑其真实性。叙述者福克斯(Fox)亲自记录。为了对国王公平起见，我必须补充一句：他对沃塞利的做法不满，表扬了典狱长。

大概同样会不择手段地审讯。王后的朋友以某种方式得到这份重要情报，立刻向她报信。王后意识到处境极其危险，但她凭借审慎和技巧，仍然有可能避开敌人的打击。她照常去见国王，发现亨利比她意想中更平静。国王开始谈他熟悉的老话题，似乎想挑战她的神学论证。她温柔地谢绝论辩，说女性天性愚钝，理解不了这样深奥的思索。她说：女人从创世开始就从属于男人。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男人，根据男人的形象创造女人。丈夫为妻子选择信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妻子的义务就是默默服从丈夫的观点。因此，她自己有双重义务：她有福的丈夫学识渊博、法眼无差，不仅为自己的家庭，而且为万国最明智、最博学的人选择信条。“凭圣玛丽起誓，不是这样！”国王回答说，“凯特，你现在更适合当神学博士，而不是受教育。”她温柔地回答：她明白自己多么配不上这样的赞美。她虽然通常不会拒绝陛下提出无论多么高深的任何论辩题目，但她完全清楚：她的想法不过是暂时给国王开心解闷而已。而且，她发现：谈话没人反驳，就会失去活力。她往往假装反对，只是为了让国王享受驳倒她的乐趣。她也打算通过这种无害的诡计，引诱国王谈论她经常经历的话题，从中获得教益。“宝贝，原来是这样啊。”国王回答说，“那我们又是顶好的朋友了。”他绝顶恩爱地拥抱了王后，保证他的慈爱和保护，便把她打发走了。她的敌人对这种突变一无所知，准备第二天根据上谕送她去伦敦塔。大法官率领四十名随从赶到时，国王和王后正在花园里亲密交谈。国王离开她一段距离，对大法官讲话，辞色无比严厉。她甚至可以听到片言只句：“流氓、蠢货、畜生”这些称呼如倾盆大雨似的落在法官头上。然后，国王命令大法官走开。她随后出面斡旋，让国王息怒。国王对她说：“心肝，你不知道，这家伙多么配不上你的好意。”王后间不容发地逃出大祸，以后再也没有反驳亨利的论点。加德纳恶意挑拨离间，以后再也没有赢得国王的恩宠或好感。^①

^① Burnet, vol. i. p. 344. Herbert, p. 560. Speed, p. 780. Fox's Acts and Monuments, vol. ii. p. 58.

但亨利性情暴戾，受到疾病的折磨，变得更加恶毒。不久以后，他就毁灭了一个地位比加德纳更高的人。在本朝，乃至于前朝，均公认诺福克公爵和他父亲位列王国臣工之首。他们勤劳王事，颇有勋绩。公爵本人年轻时扬威海上。他在弗洛登战役中击破苏格兰人，厥功甚伟。他镇压了危险的北方叛乱。他在对法战争中所向有功，不愧职守。他的幸运和勤勉似乎不相上下，因而位极人臣。他屡受君恩，广置产业。国王两次迎娶诺福克家的侄女；国王的私生子里士满公爵迎娶诺福克的女儿。他不仅是古老莫布里世卿的后裔、国王的外戚，还娶了白金汉公爵的女儿。白金汉公爵是爱德华三世的女系后裔。据信，诺福克仍然秘密信奉古老宗教，而且国内外都将他视为天主教一派的首脑。但所有这些越是提高了公爵的地位，就越会激起亨利的猜忌。他预见到：将来主少国疑，如此强大的臣子足以威胁公共和平和新建立的教会体系。但诺福克之所以开罪于君，莫过于公爵之子萨里伯爵引起了亨利的反感。

年轻的萨里伯爵前途无量，精通学者、廷臣、军人的种种造诣。他擅长当时必不可少的所有军事技术；他以身作则，保护和鼓励美术；他吟诗作赋，颇有佳作；他根据当时的浪漫豪侠之风，以笔和矛在所有舞会和比武中为情妇增光。他的志向和雄心跟他的天赋和才干一样出众。他的所作所为往往缺乏审慎和保留，这本来是他的地位所必需的。他镇守亨利攻陷的波隆纳，他个人的勇武虽然毋庸置疑，但跟法军作战却时运不济。国王对他多少有些不满，派赫特福德接替他。萨里受到这次侮辱，轻率地对这位大臣表示敌意。他拒绝娶赫特福德的女儿，甚至推托所有其他的提亲。亨利推测：他图谋娶玛丽女士。国王立刻决定：以最严厉的手段镇压这种危险的野心。

国王在所有这些动机的驱使下，密令逮捕诺福克和萨里。或许凯瑟琳·霍华德的旧恨未消，或许国王怨乌及屋，迁怒于她整个家族。他们在同一天入狱，关进伦敦塔。萨里是下议院议员，他的审判更迅速。至于证据，终本朝之世，只要涉及王室，国会和陪审团从来不在乎什么证据。他被控的罪名是：在家里

款待一些意大利人，这些人可能是间谍；他出资派一个仆人拜访在意大利的红衣主教波尔，因此涉嫌通谋这位可恶的教会长老；他将忏悔者爱德华的四分之一纹章加入了自己的纹章，因而涉嫌觊觎王位。不过，萨里及其祖先多年来一直使用这样的纹章，纹章学家甚至已经以其权威提出了正当理由。虽然萨里伯爵的辩护慷慨激昂、理直气壮，但陪审团还是判他犯有大逆罪，不久就明正典刑。

如果无辜还可以分级的话，诺福克公爵的清白无辜比他儿子更明显。他为王室立下的功劳更大。诺福克和公爵夫人关系恶劣，她把所有不利于他的消息都泄露给敌人。公爵的情妇伊丽莎白·荷兰德同样曲意逢迎宫廷的计划。控方虽然占尽一切优势，但发现的最大罪状却不过是他说过的一句话：国王病了，坚持不了多久；由于宗教分歧，王国可能陷于混乱。他给国王写了一封悲哀的信，援引旧勋、申诉无辜。他不久就为了取悦亨利，采取了更适当的做法：接受敌人的要求，坦白认罪。但什么也平息不了国王冷酷无情的天性。他召集国会，这是他最可靠、最迅速的暴政工具。上议院没有跟罪犯对质、没有审判、没有证据，就通过了剥夺公权法案，递交下议院。克兰默虽然多年跟诺福克公爵为敌，多次受到他严重的伤害，但仍然不愿意参加这样不公正的审判，便退隐克洛伊登教区。^① 国王现在已经是命与时争，唯恐自己死在诺福克前面，指示下议院赶紧通过法案。他的借口是：诺福克官居纹章院长；为了举办儿子封授威尔士亲王的典礼，必须重新任命纹章院长。虽然这个借口实在微不足道，但唯唯诺诺的下议院还是遵旨办理。国王派钦使御准法案，下令一月二十九日将诺福克公爵斩首。但伦敦塔获悉：国王已经在当夜驾崩，典狱长推迟承旨。枢密院认为：新君初立，不宜根据如此残暴不公的判决而处决王国最伟大的贵族。

^① Burnet, vol. i. p. 348. Fox.

国王的健康每况愈下，为时已久，这几天里，所有近臣都明白他大限将临。亨利刚愎自用，谁也不敢告诉他真实的病情，因为本朝有些人因预言国王驾崩而获叛逆罪。^① 人人都害怕国王怒火中烧，严惩善意提醒他的人。最后，安东尼·丹尼爵士冒险揭开了致命的秘密，劝诫他准备迎接近在眼前的命运。亨利表示顺天命，召克兰默入宫。但大主教还没有到，他就已经说不出话，不过神志仍然清醒。克兰默要求他作出临终时信仰基督的表示。他紧握大主教的手，即刻气绝。亨利卒年五十六岁，享国三十七年零九个月。

国王临终前一个月立下遗嘱，经国会验证，将王位首先传给爱德华王子，其次传给玛丽女士，再次传给伊丽莎白女士。他简任枢密院为幼主摄政；规定两位公主如果未经枢密院同意就私定婚姻，则剥夺王位继承权。他在自己的子女之后，指定御妹法兰西王后的长女、多塞特侯爵夫人弗朗西斯·布兰登为继承人；其次为法兰西王后的次女、坎伯兰伯爵夫人埃莉诺。他获得国会授权，跳过御姐苏格兰王后的后裔。但他补充说：如果法兰西王后的后裔绝嗣，王位应由后一位合法继承人继承。后来，这句话是不是指苏格兰王室，则引起了很大争议。大家公认，苏格兰王室不是萨福克家族的后一位继承人，而是前一位继承人。亨利用这种方式表述：意思是完全排除他们。亨利最近在苏格兰损兵折将、恼羞成怒，极其敌视该国；他毕生以狂暴、任性的脾气著称，至死不改。遗嘱的另一项条款同样反映出他自相矛盾的性格和举措——他留下弥撒钱，据说是为超度自己炼狱中的灵魂。可是，他已经摧毁了列祖列宗和其他人造福自己灵魂的整个体系，甚至他近年来颁布的所有信纲都不再有可疑的炼狱教义。大限将近时，他还决定：至少要关心自己未来的长眠，支持更安全的一方。^②

很难公正地总结这位君主的品质。赫伯特勋爵的史书最好地概括了他的

① Lanquet's Epitome of Chronicles in the year 1541.

② 参见 Fuller, Heylin, and Rymer, p. 110 的国王遗嘱。没有合理依据怀疑其真实性。

性格和举措——他和他这一朝都几经反复。他在国内享有毫无节制的绝对权威，在外邦当中获得尊重。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堪称伟大的君主。但他的暴政和野蛮使他没有资格称为善良的君主。他确实思维活跃、才智过人，有南面君人之资。他勇敢、无畏、警觉、坚定，还有良好的品质和广泛的才能，但往往缺乏严格可靠的判断力指引。众所周知，他在一切争执中从不屈服、从不宽恕，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人人都害怕跟这样的人作对。他的恶德目录涵盖了人性许多最恶劣的品质：狂暴、残酷、挥霍、贪婪、不义、固执、傲慢、偏执、放肆、任性。但这些恶德都没有达到恶贯满盈的程度。他在这些恶行的间歇中，也从来没有完全丧失美德。他诚实、坦率、殷勤、慷慨，而且至少能短暂地交友爱人。在这方面，他时运不济，本朝的偶然事件充分暴露了他的缺点。他被罗马教廷的举措激怒，临之以暴，似乎只有最严厉的手段才能防止迷信的臣民叛乱。但我们同时应该明白：他所处的环境有利于给他的性格增添伟大、恢弘的光彩。皇帝和法兰西国王竞相争夺他的友谊，他不明智的政策在全欧洲都具有重要性。他广泛的特权，国会的屈从（更不用说奴性），使他更容易施政、治国。因此，他的朝代在欧洲历史上格外突出。

亨利的统治虽然残酷、勒索、狂暴、武断，却不仅获得了臣民的尊重，还从来没有受到他们的憎恨，似乎有点不寻常。最终，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享有臣民的爱戴。^① 亨利的外观品质对他有利，适于迷惑群众。在下等人眼中，他华丽的派头和个人的勇武均光彩夺目。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英国人像东方奴隶一样彻底臣服。他们倾向于钦佩暴行和暴政，这些做法都落在他们自己头上，由他们自己承担代价。

亨利在对外事务方面，似乎渴望跟弗朗西斯交好，比一般邻邦君主之间的关系更真诚无私。他们都猜忌查理皇帝，性格有些相近（不过法兰西君主显然

^① Strype, vol. i. p. 389.

高人一筹），这加强了他们的亲善。据说，弗朗西斯颇受亨利之死影响，他表示为这个损失感到遗憾。他预见到：自己的健康江河日下，不会比朋友多活多久。^① 大约两个月以后，弗朗西斯去世。

亨利八世十次召集国会，国会举行了二十三次会议。在他漫长的朝代中，这些国会召集的总时间不超过三年半。在他统治的最初二十年中，这些国会召集的总时间不超过十二个月。由于宗教改革，国王后来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召集国会。虽然国会自古以来核准的事务以此最为重要，但他们越急欲遵旨，就越急于返回乡间宅邸。他们迅速通过议案，因此会期非常短暂。他们确实盲目服从国王所有反复无常的决定，不顾臣民的安全和自由。亨利不仅狂暴地迫害无论什么他乐于称为异端的东西，还成倍增加了以前列朝的大逆法。甚至对国王、王后或王子出言不逊就构成大逆罪。这些严苛的法案明显自相矛盾，却轻率地获得通过。由此，只要严格执法，人人都可以坐实大逆罪。例如，一项法案规定：承认国王和阿拉贡的凯瑟琳、或是安妮·博林的婚姻有效，就构成大逆罪。^② 另一项法案规定：蔑视或中伤玛丽公主和伊丽莎白公主，就构成大逆罪。^③ 说她们不是真正的公主，无疑构成中伤。这些问题如此敏感微妙，即使三缄其口也免不了大逆不道。因为以前的法案规定：任何人只要拒绝就法案任何内容宣誓，就坐实了大逆罪。因此，国王只要询问自己前两次婚姻的合法性就行了。如果有人拒绝回答，可以依法定为叛逆。如果他回答，无论肯定还是否定，同样逃不了叛逆罪。如此荒谬的自相矛盾产生于国王的狂躁和国会的奴性。很难说矛盾源于亨利的轻率，还是他有计划的暴政。

概括本朝重要的政治和商务法案，大概并非不合适。审视法律，最能显示时代的天赋。

① Le Thou.

② 28 Hen. VIII. c. 7.

③ 34, 35 Hen. VIII. c. 1.

废除古老宗教，相当有利于司法正规化。天主教迷信存在时，教士有罪却无法惩治；教会不许法官制裁其犯罪的成员；教会自身不受任何民事制裁。但亨利限制了这些有害的豁免权。副执事以下的所有教士犯有小叛逆罪、谋杀和重罪，不再享有豁免特权。^① 但以前的迷信不仅保护了教士的罪行，教堂和圣地为俗人提供避难所，同样也保护他们免受惩罚。国会取消了这些特权。一开始，大逆罪不受圣地庇护；^② 接下来，谋杀、重罪、强奸、盗劫、小叛逆罪不受圣地庇护。^③ 国会在其他方面限制他们。^④ 进一步的宗教改革取消了教士和其他臣民的一切区别，也完全废除了圣地避难权。教会法的衰敝已经提示了这些结果。

这个时代支持武风的唯一措施是：复兴和扩大了某些鼓励弓箭的古法。据信，王国防务相当有赖于此。于是，人人奉命准备弓箭，^⑤ 各教区奉命树立箭垛。^⑥ 弓匠奉命：每造一把紫杉木弓，就要为平民造两把榆木或荆弓。^⑦ 十字弓和手铳也禁止使用。^⑧ 英国弓箭手之所以强大可畏，原因在于：他们随身带戟，必要时可以跟敌人近战。^⑨ 即使在和平时期，国民也应该经常集合、列阵。全体有产者必须配备全套头盔和铠甲。^⑩ 那时，英格兰武风昌盛，因此，人们公认这种预防措施足以保卫邦国。国王当时已经拥有统率全体臣民的绝对权力，因此，他一有危险就可以更换军官、征集军团、随心所欲地组成任何规模的部队。国民没有党派和分裂时，外国势力从来不可能图谋入侵英格兰。仅仅

① 23 Hen. VIII. c. 1.

② 26 Hen. VIII. c. 13.

③ 32 Hen. VIII c. 12.

④ 22 Hen. VIII. c. 14.

⑤ 3 Hen. VIII c. 3.

⑥ Ibid.

⑦ Ibid.

⑧ 3 Hen. VIII. c. 13.

⑨ Herbert.

⑩ Hall, fol. 234. Stowe, p. 515. Hollingshed, p. 947.

伦敦市就能征集一万五千人。^① 不过,这些军队的训练很差,幸而加莱要塞是军官的苗圃。以后,首先陶奈,^② 继而布洛涅,提供了更多的苗圃。任何人只要在海外服役,就获准出让土地而不必缴纳规费。^③ 根据一般性许可,通过遗嘱就可以转让土地。^④ 国会对自己的特权漫不经心(确实,当时的国会也没有多少特权值得保存)。例如,有一位斯楚德先生在下议院提出锡业立法,因此受到康沃尔斯坦内法庭的严厉制裁。斯楚德拒绝缴纳强加给他的巨额罚款,就被戴上镣铐、投入地牢,险些丧命。国会虽然恭顺地臣服朝廷的权威,但还是绝无仅有地颁布通告:从此以后,议员在国会的举措不受指控。^⑤ 不过,这项禁令大概只适用于下级法庭。国王、枢密院和星室法庭几乎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

一项磅税和吨税法案显示:国会对自己的特权和君主的权利没有清楚的概念。^⑥ 亨利四世以来,国会把这项收益授予每一位君主。亨利四世一生只征收过一次。而亨利八世却获准征收六年,无需任何法律。在此期间有四届国会召开,没有人留心定期授权或禁止国王征收。最后,国会决定批准这项拨款。不过,他们作出让步时显然不清楚:自己授权的内容是什么;国王有没有权利自行征收。他们说:征敛只限于先王在世时,不能更久。但他们责备不给新君付税的商人。他们说:征收磅税和吨税的法案已经期满,却又毫不犹豫地称这项收益是国王分内之物。他们宣称:这些不法商人给国王造成了多方面的巨大损失。为了补偿国王的损失,他们投票批准国王终生享有此项收益,不能更久。值得注意:虽然有最后一款的限制,但一百多年了,他的所有继承人都在非法征收这项收益。举国默许,没有反抗,因而这种征敛勉强堪称常例。

① Hall, fol. 235. Hollingshed, p. 547. Stowe, p. 577.

② Hall, fol. 68.

③ 14 and 15 Hen. VIII. c. 15.

④ 34 and 35 Hen. VIII. c. 5.

⑤ 4 Hen. VIII. c. 8.

⑥ 6 Hen. VIII. c. 14.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查理一世企图延续同样的做法,却干犯众怒。几代人一直认可这种征敛,但人心已经大变。史家由于偏见或无知,仍然称这位不幸的君主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横暴举措。

国王获准为威尔士制定法律,无须经过国会同意。^① 他们忘记了:国会早已通过法案,规定圣旨与法律有同等效力,废除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区别。

这时,英格兰的大部分外贸集中于尼德兰。低地居民购买英国货物,转卖给欧洲各地。因此两国彼此依赖,万一决裂,双方都会大受损失。虽然亨利跟弗朗西斯的关系通常更友好,而低地国家一直依附皇帝;但国王在波翻云诡的政治变迁中,一直避免采用这种极端手段。

1528 年,英格兰与低地国家开衅,双方很快都感到不便——弗拉芒人不能购买英格兰的布料,英国商人不能购买呢绒。呢绒商只得解雇工人,工人没有面包,骚动不安。红衣主教为了安抚他们,把商人找来,命令他们照常购买呢绒。商人告诉大臣:他们没有办法照常卖掉货物。他们虽然受到红衣主教的威胁,但始终不肯改口。^② 最后两国达成协议:即使在战争期间,贸易仍然照常进行。

本朝末年,英格兰仍然没有莴苣、萝卜、芜菁或其他块根作物。以前这些蔬菜通常从荷兰和佛兰德少量进口。^③ 凯瑟琳王后想吃莴苣,只能派专使去那里。本朝初年或前朝末年开始从佛兰德引进、种植啤酒花。

一般而言,外国工匠比英国同行更敏捷、勤勉、节俭。因此,大凡外国工匠在英格兰定居,就会招致英国工匠的强烈妒恨。他们有根有据地断言:外国手艺人把他们所有的客户都抢走了。1517 年,贝勒博士在布道中煽动群众,经纪人林肯策划阴谋,两人掀起叛乱。伦敦学徒和其他穷人打开监狱,放出因伤害

① 34 Hen. VIII.

② Hall, folio 174.

③ Anderson, vol. i. p. 338.

外国人而入狱的囚犯。暴民随即向他们痛恨的法国人梅塔斯家进发，在那里大肆破坏——他们杀害了梅塔斯的几位仆人，抢劫他的财物。市长无法安抚他们；托马斯·莫尔爵士最近执掌司法，在伦敦市颇受尊重，也无能为力。暴民还威胁要给沃尔西红衣主教一点颜色看。红衣主教只得在家里设防，加强防卫。群众最后厌烦了混乱，自行解散。什鲁斯伯里伯爵和萨里伯爵逮捕了一些人。圣旨命令：妇女不得聚会传播流言飞语，所有男人都应该把妻子留在家里。第二天，诺福克公爵率领一千三百名武装人员入城，调查骚乱。贝勒、林肯和其他一些人被捕，关进伦敦塔，定为大逆罪。贝勒和另外十三人都被处决。其他四百名罪犯脖子上系着绳索，带到国王面前，跪下求饶。亨利知道当时应该赦免，没有进一步惩罚，就把他们放走了。^①

伦敦有大批外国工匠。亨利有一次猜忌弗拉芒人偏爱凯瑟琳王后，便以枢密院令驱逐他们；离开的弗拉芒人至少有一万五千人。^② 亨利自己在星室法庭公告中承认：外国人夺走了本地人的生计，使他们无事可做，只能依靠盗窃、谋杀和其他罪行糊口。^③ 这份公告跟其他法令一起出版发行。他还宣称：外国人为数众多，导致谷物和面包涨价。^④ 为了防范进一步的危害，所有外国工匠不得在家中容留两名以上的外国雇工或学徒。外国商人也受到类似的猜忌。关税强加于外国人，负担落在全体居民身上。^⑤ 国会做得比较好：鼓励更多外国商人和工匠移居英格兰，以激发本地人的竞争，提高他们的技艺。国会在一项法案中宣布：王国欠债和犯罪的犯人不下六万人。^⑥ 这个数字可信度不高。哈里森宣称：本朝处决了七万二千名小偷和强盗，差不多每年两千人。他补充说：伊丽莎白朝晚期，死刑犯一年不超过四百人。似乎当前英格兰全境

① Stowe, 505. Hollingshed, 840.

② Le Grand, vol. iii. p. 232.

③ 21 Hen. VIII.

④ Ibid.

⑤ 22 Hen. VIII. c. 8.

⑥ 3 Hen. VIII. c. 15.

的死刑犯不过五十人。如果这些事实可靠，亨利八世以来，道德水准一定大有进步。这种进步主要应该归功于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下层阶级因此得以养活自己、打发时间，后者差不多跟前者一样重要。

我们根据大约本朝初年通过的一项著名法案条款，很可能得出结论：英格兰跟前代的繁荣昌盛相比，已经极为衰敝。^① 爱德华二世一朝的法案宣布：市镇和自治市的法官应该履行审判职责，不得在任期内批发或零售任何酒类或食品。这项法律似乎是公正的，目的在于防止欺诈或偏私影响审判。但本朝废除了这项法律，提出的理由是：“自从该项法律和条例通过以来，英格兰王国境内的许多城市、自治市、市镇和现存市镇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衰败；立法当时存在的商人和有产者居民已经不存在。今天，同一批市镇和自治市的居民通常是面包师、酿酒人、鱼贩子、粮商之类，几乎没有留下其他人可以担任法官。”人们有贵古贱今的倾向，因此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就相信了国会的推理，颇有危险。观点千差万别，因此有些人可能从同样的事实推出相反的结论。亨利八世一朝和以前列朝相比，治安更加正规，执法更加严格。这种优势诱使地主离开地方市镇，返回乡村居住。红衣主教沃尔西向国会陈辞，表示：海关收益超过以前，证明财富增长。^②

如果英格兰的贸易、工业和人口确实衰退，那么本朝大多数法律并不能有效地弥补损失，只有废除修道院、减少宗教节日和重要纪念日的法案例外。比如，国会试图立法固定工匠的薪资；^③ 国会反复通过法律，禁止奢侈的服装；等等，^④ 大概不会有什么效力。大法官和其他大臣获得授权：固定家禽、奶酪、黄油的价格。^⑤ 他们甚至通过法案来固定牛肉、猪肉、羊肉、小牛肉的价格。^⑥ 他

① 3 Hen. VIII. c. 8.

② Hall, folio 110.

③ 6 Hen. VIII c. 3.

④ 1 Hen. VIII. c. 14. 6 Hen. VIII. c. 1. 7 Hen. VIII. c. 7.

⑤ 25 Hen. VIII. c. 2.

⑥ 24 Hen. VIII. c. 3.

们指定：每磅牛肉和猪肉定价半便士，羊肉和小牛肉定价一便士半法寻；都是当时的货币价格。法案开宗明义：肉铺卖的这四种肉是穷人的食品。这项法案后来被废除了。^①

乡村人口仍然不断减少；人们放弃耕作，把土地改成牧场。^② 时而有新法律颁布，禁止这种做法。任何农场要获准抛荒，国王有权收取半租。^③ 业主耕地无利可图的原因，大概是农业技术不精。法律规定：羊群的数目不得超过两千头。^④ 法案称：业主或农场主的羊群往往多达两千四百头。值得注意的是：国会将羊肉涨价归因于羊群增加。因为他们说：商品落入更少的人手中，这些人随意涨价。^⑤ 但涨价的原因更有可能是日常流通货币的增加，因为这样一种商品似乎不大可能囤积。

1544 年，剑桥郡一英亩好地的租金似乎是一先令，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十五便士，^⑥ 比目前的租金便宜十倍。但商品不过便宜四倍。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的耕作技术恶劣。

国会制定了一些关于乞丐和流浪汉的法律。^⑦ 在这方面，仁慈的立法者必定受到最有力的人道考虑影响。初看起来，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最后解决的方式很难不破坏勤勉之德。修道院以前供养穷人，但同时也鼓励了懒惰和卑劣。

1546 年，法律将利率固定为百分之十。这是英格兰第一个已知的合法利率。以前，所有这样的贷款都视为高利贷。这项法案开宗明义，称利息为非法和罪恶。偏见仍然强大，以后的朝代废除了允许利息的法律。

本朝和以前以后列朝一样，充满了垄断性法律，比如某些特殊产业只准特

① 33 Hen. VIII. c. 11.

② Strype, vol. i. p. 392.

③ 6 Hen. VIII. c. 5. 7 Hen. VIII. c. 1.

④ 25 Hen. VIII. c. 13.

⑤ 25 Hen. VIII. c. 13.

⑥ Anderson, vol. i. p. 374.

⑦ 22 Hen. VIII c. 12. 22 Hen. VIII. c. 5.

许的市镇经营。^① 类似的荒谬举措仍然有太多遗迹。先前的法律开放了垄断公司,它们不得不接纳各行各业的商人。在以后的朝代,国会又通过法案予以关闭;除了垄断公司以外,禁止任何人染指这些贸易。^②

亨利本人颇有学术天赋,因此殷勤鼓励其他人从事学术。他在剑桥建立了三一学院,慷慨捐赠。沃尔西在牛津建立了基督堂,有意命名为红衣主教学院。但他还没有彻底完成计划就倒台了,国王攫取了所有资产。据说大臣对这次暴行耿耿于怀,有甚于他遭遇的任何其他不幸。^③ 但亨利后来归还了学院的资产,只是改了一个名字。红衣主教在牛津建立了第一个希腊文教席。这次革新将大学分裂为狂暴的派别,经常互斗。学生们各立党派,冠以希腊人与特洛伊人的名字,往往像这些民族以前那样大打出手、仇深似海。更新、更正确的希腊文拼写方法引进后,希腊人自己又分裂为不同党派。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徒喜欢旧式拼法,新教徒支持新式拼法。加德纳运用国王和枢密院的权威,压制这方面的革新派,保护希腊字母表陈陈相因的拼法。那时连这一点微不足道的自由都容不下!如果拥护新式拼法,那么鞭刑、降级、开除就是最轻的惩罚。主教宣称:宁可完全取消大学的希腊文,也不能允许修改希腊字母表的拼法。牛津引进希腊文,激起剑桥大学如法炮制。^④ 沃尔西有意在牛津大学复制所有的梵蒂冈手稿,以丰富他的学院图书馆。^⑤ 国王及其大臣稽古右文,有利于英格兰的向学风气。伊拉斯谟斯说起英国贵族绅士尊重学人,非常心满意足。^⑥ 另外,无须特别说明本朝和前朝的作家。因为当时的人士没有丝毫资格跻身于经典作家之列。托马斯·莫尔爵士虽然用拉丁文写作,但似乎最接近于经典作家的典范。

① 21 Hen. VIII c. 12. 25 Hen. VIII. c. 18. 3 & 4 Edw. VI. c. 20. 5 & 6 Edw. VI. c. 24.

② 3 & 4 Edw. VI c. 20.

③ Strype, vol. i. p. 117.

④ Wood's Hist. & Antiq. Oxon. lib. i. p. 245.

⑤ Ibid. 249.

⑥ Epist. ad Banisium. Also epist. p. 368.

第三十四章

爱德华六世(一)

摄政之治——摄政的改革——护国公赫特福德——改革完成——加德纳的反对——外务——苏格兰改革进展——刺杀比顿红衣主教——指挥苏格兰战争——平基战役——召开国会——改革进一步推进——苏格兰事务——年轻女王送往法兰西——西摩勋爵密谋集团——沃里克伯爵达德利——召开国会——剥夺西摩勋爵公权

先王安排身后事宜，确定了幼主的摄政团体和王位继承资格。他想：大臣在他生前总是唯唯诺诺，在他死后也绝不敢偏离他设定的计划。他确定：王子满十八岁时成年。那时，爱德华王子只有九岁零几个月。亨利指定了十六位顾命大臣，在爱德华成年以前监护国王和王国。他们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大法官沃塞利，太傅圣约翰勋爵，掌玺大臣罗素勋爵，大冢宰赫特福德公爵，海军上将莱尔子爵，达勒姆主教汤斯达尔，骑兵统领安东尼·布朗爵士，国务秘书威廉·佩吉特爵士，籍没法院大法官爱德华·诺斯勋爵，民事诉讼法院首席法官爱德华·蒙塔古爵士，布洛姆利法官，安东尼·丹尼爵士，内

廷总管威廉·赫伯特爵士，加莱司库爱德华·沃顿爵士，坎特伯雷教务长沃顿博士。亨利将所有摄政权托付给这些顾命大臣，并且为他们指定了十二位枢密。枢密没有直接的权力，只能遇事时提出建议、协理政务。枢密包括：阿伦德尔伯爵，埃塞克斯伯爵，少府托马斯·切尼爵士，审计长约翰·盖奇爵士，副冢宰安东尼·温格菲尔德爵士，国务秘书威廉·佩特里爵士，理查德·里奇爵士，约翰·巴克爵士，拉尔夫·萨德勒爵士，托马斯·西摩爵士，理查德·索斯维尔爵士，埃德蒙·佩克汉姆爵士。^① 这次提名同样体现出亨利惯常的任性。遗嘱执行人包括几位寒族，而贵胄阿伦德尔伯爵、托马斯·西摩爵士只能侧身枢密之列。

但顾命大臣和枢密的第一项举措就偏离了先王明文规定的旨意。他们一举行会议，就提出：政府群龙无首，因而丧失了尊严。王国需有一位首脑可以代表国王陛下：接受外国大使致辞，接收英国驻外大臣的报告，以他的名义颁布一切法令和圣旨。国王的遗嘱似乎就要在这种缺陷下施行。另外，有必要增加一位护国公，护国公应该享有一切王室威仪，有义务在一切举措中遵循顾命大臣的意见。^② 大法官沃塞利非常不喜欢这个提议。大法官心高气傲、野心勃勃，自以为有资格位居顾命大臣前列，仅次于大主教。他知道：大主教既没有治国之才，又没有治国之志。他当然希望：指引公共事务的大权在很大程度上会落入他的手里。因此他反对设立护国公，提出这种革新违反了先王的遗嘱。先王的遗嘱经国会核准，对一切问题都有法律效力；只有确定遗嘱的权威才能修改遗嘱。但他似乎是唯一的反对者。大多数顾命大臣和枢密都是亨利提拔的廷臣，他们出身寒微、家世无恃，习惯于服从先王，自己的权威不足以治国。他们更乐意支持这个提议，这样似乎最适于保障公共和平和安宁。因此他们同意提名一位护国公，选择了赫特福德公爵。公爵是国王的舅父，跟国王

^① Strype's Memor. vol. ii. p. 457.

^② Burnet, vol. iii. p. 5.

的安全休戚相关，自己又不致觊觎王位。他没有独立的利益关系，不会危害爱德华的人身和权威。^① 接着，政府发布公告，向公众通报这个变化；且分遣使节，向各国宫廷宣布信息。文武百官请辞原职，接受幼主任命。主教们不得不同样请辞，因为他们的新任命专门插入了说明：他们只有在国王满意时才能在任。^② 由此而明确表述：教俗两界的一切权威和管辖权都源于国王。^③

顾命大臣接下来的措施更符合亨利的遗嘱，因为他们许多人在其中有份。由于以前的剥夺公权和绝嗣，使得上议院出缺甚多。先王有意新封贵族，填补缺额。他为了让新贵族有能力支持其尊位，决定赐予他们相当的田宅、美缺。亨利甚至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们。他在遗嘱中指示顾命大臣履行所有承诺，以使^④他们能以最可信的方式落实先王的意图。亨利一向对威廉·佩吉特爵士、安东尼·丹尼爵士、威廉·赫伯特爵士不拘形迹。顾命大臣召见他们，获得了他们了解国王诺言的证据，证明证据可靠。顾命大臣继而完全兑现承诺。赫特福德封萨默塞特公爵、大司马、大司库；沃塞利封南安普敦伯爵；埃塞克斯伯爵封北安普敦侯爵；莱尔子爵封沃里克伯爵；托马斯·西摩爵士封萨德里勋爵、海军上将；理查德·里奇爵士、威廉·威洛比爵士、爱德华·谢菲尔德爵士封男爵。^⑤ 有几个人拒绝晋爵，因为国王的承诺还包括给新贵族赐田，但这一部分许诺要推迟到更方便的时候才实施。在世风日下的时代，包括护国公萨默塞特在内的许多人都领受了教会的优缺、膏费、堂俸。教会特权和产业饱经侵占，俗人领受圣俸的不法举措现在开始盛行。

南安普敦伯爵总是反对萨默塞特。即使在亨利武断的统治下，朝臣仍然秘密结党。幼主当国，通常朝纲不振，更不可能压制朋党。南安普敦执掌御

① Heylin, Hist. Ref. Edw. VI.

② Collier, vol. ii. p. 218. Burnet, vol. ii. p. 6. Strype's Mem. of Cranm. p. 141.

③ Strype's Mem. of Cranm. p. 141.

④ Fuller, Heylin, and Rymer.

⑤ Stowe's Annals, p. 594.

玺、黜涉理臣，本来应该在国务上多花时间，却忙于私事，怠于公务。伯爵委托索斯维尔、特雷戈奈尔、奥利弗、贝拉塞斯四位律师，在他离开时代行大法官职权。这种做法非常不得人心。更有甚者，两位教法学家获得委任。这次提名使律师们怀疑：大法官有意贬损普通法。怨诉上达受护国公左右的枢密院。萨默塞特很高兴能抓住机会打击南安普敦，他们就这个不寻常的案例咨询法官。法官回答：委任不合法；大法官滥行铨叙，理应夺玺待罪。枢密院传唤大法官。他坚称奉先王遗命、国会立法尽职，未经国会审判不能罢免；如果他的委任不合法，可以留中不发，恶果很容易纠正；以如此细故罢黜重臣，恶例既开、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但枢密院不顾他的这些辩护理据，还是宣布他擅用御玺，课以罚金，圈禁私宅待罪。^①

罢黜南安普敦增加了护国公的权威，有利于压制摄政时期的朋党，但萨默塞特并不满足于此。他雄心勃勃，得陇望蜀。他借口顾命大臣投票选举他为护国公，不足以建立充分的权威，而是从幼主那里取得特许状，完全推翻了亨利八世遗嘱安排的政府，甚至可能颠覆了王国的一切法律。护国公全权摄政，任命枢密院，包括四位前任枢密和除南安普敦以外的全体顾命大臣。他保留了随心所欲提名其他枢密的权力；只有在自己认为有必要时，才咨询枢密院。护国公及其枢密院还获得授权：自行斟酌、施行他们认为符合公益的任何措施，且不受任何法律、法案、公告、条例的制裁和谴责。^② 即使这份特许状更节制，且受亨利指定的顾命大臣引导，但其合法性仍然很成问题。既然这种监护只能信托给个人，无法由他人代理，而特许状的要旨没有提到顾命大臣，显然是护国公私下里从幼主手中弄到的。萨默塞特监国纯属篡夺，任何理由都无法正当化。不过，由于顾命大臣纵容、默许新体制，因而人们普遍予以接受。幼主非常依恋舅父，萨默塞特为人又大体上较温和、正直，因此护国公的权力

① Hollingshed, p. 979.

② Burnet, vol. ii. Records, No 6.

和头衔没有受到抵制。所有明智人士同样看出：宗教纠葛使国民四分五裂，更有必要把政府交给一个人，这样他可以遏制出格的竞争，维持公共安宁。虽然特许状有些条款意味着正式颠覆一切有限政府，但当时的人士缺乏这方面的警觉。自古逐鹿问鼎，不外乎赤裸裸的干求、觊觎。在许多重大、臭名昭著、不得人心的实例中，只有武断为治的实践才会有时开罪于国民。

亨利手握大权、性格专横，迫使新旧教派臣服，但他一死，新教徒的希望和天主教徒的恐惧死灰复燃。党派热忱于到处引起争执和仇恨，通常预示着更致命的分裂。人们长期认为护国公是改革派的秘密成员。他现在扬眉吐气，用不着谨慎地隐瞒意图：矫正古老宗教的弊政，引进更多的新教改革。他甚至注意作出这样的安排：只有新教徒才能负责国王的教育。幼主对各种学问都有浓厚兴趣，尤其是神学，远远超过儿童惯有的程度。人人都能预见：在他这一朝，天主教将在英格兰彻底毁灭。他们早就宣称偏爱新教，最后可能让新教大获全胜。

南安普敦倒台后，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枢密寥寥无几，大部分阁臣甚至乐见宗教改革的进展。他们大多数都从教会的毁灭中发家致富，倾向于扩大英格兰与罗马教廷的裂痕；他们确立相反的信纲、纪律和崇拜，使英格兰教会不可能跟母教会联合。^① 他们的贪婪也是改革精神的主要来源，他们已经掠夺了寺院教士，又受到掠夺在俗教士前景的刺激。他们知道：只有古老教义和教会片甲不留，他们才有希望实现这个事业。

罗马教会的迷信为数众多，负担沉重。因此，许多改革派在敌对精神的驱使下虔诚奉献。他们热忱地宣称：所有仪式、庆典、荣华、等级和外在表现都是修道的障碍，妨碍他们直接跟上天交流。许多因素协同作用，点燃了这种大胆的精神：教义标新立异；改宗马到成功；遭受狂热迫害；反对古老教义和习惯；必须取得俗界赞同，方法是镇压教会、掠夺教产。只要改革压倒了世俗当局的

^① Goodwin's Annals. Heylin.

反对，宗教精神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造成的后果往往跟古老迷信一样危险。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由世俗当局发起，过渡比较平缓，许多古老教会得以保存。教义保存了相当程度的从属性，以及公共典礼的排场、秩序、仪式。

护国公计划推进宗教改革，总是向克兰默请教。克兰默温和审慎，反对一切激烈的剧变，决定通过潜移默化的革新，给人民带来最纯洁、完美的教义和信纲。他大概还预见到：细心避免极端变革的体系最有可能维持久远。纯粹精神的虔诚只适用于新教派的第一阵热情。热情一旦松弛，就会开辟迷信入侵的途径。因此，他似乎倾向于建立教会等级，适应强大的既存政府，充当抵御罗马的永久性防线。这样，即使在热忱减少，甚至完全消失以后，仍然能保持人民的敬畏。

温切斯特主教加德纳以其巨大权威极力反对进一步改革。他虽然最近开罪于亨利，在摄政枢密院内没有一席之地，但他凭年龄、经验、能力，有资格受到天主教一党的最大信任。这位教会长老仍然继续吹捧先王的伟大智慧和学识，后者确实受到国民普遍而真诚的景仰。他坚持：至少在幼主成年以前，要审慎地维持伟大君主建立的教会模式。清教徒公开攻击圣像，加德纳为圣像辩护。他表示：圣像有助于在没有文化的群众中保持宗教感情。^① 雷德利主教在布道中谴责圣水时，他甚至屈尊为圣水撰写辩护词。他坚持说：上帝的德行可以将圣水变成行善的工具，犹如圣彼得的影子、基督的衣角、涂在盲人眼睛上的唾沫和黏土。^② 他尤其坚持：法律应该遵守，宪法不容侵犯，不遵循君主意志、违背国会法案是危险的。^③

虽然英格兰当时至少还有法律和宪法的观念，可以用作论据、反对当局此时的举措，但加德纳的申诉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说服力。一项国会法案已经赋予国王立法权，甚至幼主的圣旨也有法律效力。护国公发现这项法

① Fox, vol. ii. p. 712.

② Ibid. p. 724.

③ Collier, vol. ii. p. 228. Fox, vol. ii.

案对他有利，决定运用权威支持改革派。他在过渡期间暂停主教管辖权，普遍调查英格兰各主教管辖区。^① 巡按使由教士和俗人组成，奉命巡回六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矫正教士的放纵和不法行径，废除古老的迷信，使信纲和礼拜更接近改革派教会的标准。萨默塞特和克兰默处理这些敏感问题时显然相当温和。巡按使奉命：暂时保留没有滥行偶像崇拜的圣像；指示人们不要鄙视尚未废除的典礼，只要警惕某些特殊迷信，例如用圣水洒床、鸣钟、圣烛驱邪。^②

不过，最需要当局矫正的做法莫过于滥用布道。现在，为古老习惯和迷信辩护的布道遍及英格兰举国上下。宫廷为了减轻支付僧侣年金的国库负担，往往把他们安置在空闲的教堂里，从而增加了问题。僧侣根据他们的利益和教义倾向行事，这些教义就是为了教士的利益而发明的。因此，当局下令限制他们布道的题目，且出版了十二种布道书，吩咐他们向人民宣读。他们除非获得明确许可，不得在教区教堂以外布道。这项禁令的目的是限制天主教教士，而新教徒获得特许，到处通行无阻。

邦纳对这项措施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但不久就灵活地默许了。加德纳更勇敢、更坚定，他力陈不断革新的危险性、坚持某些制度的必要性。“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他说，“滥用自由是危险的。你如果打开古老的渠道，水就会流得更远，超出你的设想。你如果一味沉溺于新奇，就无法制止人民得寸进尺、轻率任性。”他有一次说道，“就我而言，我只关心体面地安排好一生的第三幕和最后一幕，从容退场。只要保证了这一点，我并不在乎其他事情。我年逾古稀、大限不远。死亡的判决既没有赦免，又没有缓刑。自由之道莫过于直言不讳、本着良心做事，我从未偏离此道。直言正行，乐莫大焉；谨守弗渝，他非所计；成败利钝，一以贯之。义之所在，人莫予夺。非道绝义，祸由己招；慚德在我，青紫何堪！”^③ 枢密院

① Mem. Crann. p. 146, 147, &c.

② Burnet, vol. ii. p. 28.

③ Collier, vol. ii. p. 228. ex MS. Col. C. C. Cantab. Bibliotheca Britannica, article GARDINER.

对加德纳的反对勃然大怒，严加贬谪，将他派到弗利特。

加德纳反对新版布道书的要点之一是：布道书确定了形而上学的微妙边界、神恩慈惠和因信称义的信条。他认为，对已经了解的人，这些是多余的；而对平民百姓，这些早已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能力。一位著名殉道史学家鉴于这一点，称加德纳为“麻木不仁的蠢货；在神义论方面，完全体会不到上帝的精神。”^①当时最低贱的新教徒都自以为充分理解了这一切教义，衷心鄙视古老宗教最博学的信徒，后者完全清楚他们的无知。改革派确实在神义论方面非常幸运，其反对天主教的所有仪式、场面、迷信可望成功。他们弘扬基督及其苦难，否定自身所有独立的美德；目的在于迎合大众，恰好符合一般宗教颂神、自抑的教义。

达勒姆主教汤斯达尔和加德纳一样，对新教规颇有微词；也被逐出枢密院，但暂时没有严加贬谪。他为人温和、品德出众，在王国境内首屈一指。

同样的宗教热忱促使萨默塞特在国内推进宗教改革，也促使他关注海外。这时，新教徒的处境极其危险。罗马教皇几经犹豫、长期拖延后，终于在特伦特召集会议，矫正教会弊端、确定教义。皇帝希望压制罗马教廷的权力，争取新教徒，致力于推动前一个目的。教皇由于自己的重要地位休戚相关，宁愿更重视后一个目的。教皇指示主持会议的特使：拖延会议；挑动神学家争论、挑剔、辩驳提交给他们的九点信纲。这个政策太容易执行了，教皇特使不久就有必要出面斡旋，平息神学家之间的敌意，最终让他们达成若干决议。^② 教皇特使还有更困难的任务：节制或转移会议改革派的热忱，压制教会长老的野心。教会长老一心想牺牲罗马教皇，提高主教的权威。教皇特使发现主教派的观点占了上风，便借口特伦特瘟疫流行，突然将会议迁往博洛尼亚。他们希望：在那里，会议更会听从法座的旨意。

皇帝渴望宗教会议服从他的野心和政策，不亚于教皇。他决定以异端为

① Fox, vol. ii.

② Father Paul, lib. 2.

借口，征服新教诸侯，压制德国自由；但他为了防止敌人联合，必须极其巧妙地隐蔽其意图。他诱使帕拉丁和勃兰登堡选帝侯脱离新教阵营。他出兵讨伐萨克森选帝侯和赫斯伯爵领主，凭借战争的机运俘虏了前者；借口变节和推诿，撕毁自己的安全承诺，扣押了后者。他似乎已经达到野心的顶峰。德国诸侯对皇帝的成功大为震惊，当听到亨利八世和弗朗西斯一世相继去世，更为丧胆。因为他们以前每一次有难，都依靠这两位君主的援助。^①

亨利二世继承法兰西王位。他勇武干练，但不像弗朗西斯那么轻率，不那么仇恨和妒视查理皇帝。他虽然遣使交聘斯马尔卡登同盟各诸侯，承诺保护他们，但这样做无疑是刚刚即位就跟皇帝的强大势力开衅。亨利认为同盟是他任何时候都能够掌握的可靠资源。^② 他受到吉斯公爵和洛林红衣主教的很大影响，根据他们的建议，宁可立刻援助老盟友苏格兰。苏格兰人甚至早在亨利八世去世之前就在大声疾呼，要求法兰西君主国保护。

苏格兰新旧教派的仇恨每天都在激化。红衣主教决定以最严厉手段制裁改革派，快刀斩乱麻。绅士维希特热衷于布道，反对古老迷信。教士惊恐不安，不无道理地担心致命的宗教革命。此君自诩道德纯洁、学识渊博，但这些优点不见得可靠，因为我们知道：在改革派当中，激烈的态度可以替代许多美德。这个时代普遍蒙昧。因此大多数苏格兰教士能想象——《新约》是路德派的作品，宣称《旧约》才是上帝的真言。^③ 不过无论如何，这些优点已经归到维

① Sleidan.

② Pere Daniel.

③ 参见 Spotswood, p. 75 和同一位作者的 p. 92。他告诉我们的故事证实了苏格兰天主教教士的这个特点。关于主祷文称呼上帝或圣徒的问题，圣安德鲁斯大学有一场大辩论。修道士一般都知道改革派取消了圣徒，决心保持顽固不化的荣誉，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教义建立在什么论据上。有些人主张：主祷文称上帝为形，称圣徒为质。另一些人主张：主祷文称上帝是至高；称圣徒是次高。还有人主张：主祷文称上帝为终极，称圣徒为非终极。但大多数人主张：主祷文称上帝是精确；称圣徒是广延。一位天真汉侍奉副院长，觉得这个问题让博士们多次讨论，想必关系重大。有一天，他问副院长：主祷文是什么东西？此人名叫汤姆。副院长回答说：汤姆，我们不知道主祷文怎么说。他突然回答：先生，除了上帝还有谁？副院长接着说：那我们应该把圣徒怎么办？他回答：以魔鬼的名义，给他们信纲和信条，他们大概就会满意。这个答案传到国外，许多人说：他的决断比所有冠冕堂皇的博士更明智。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希特身上,他急欲革新。这些才干使他的布道深得人心,获得了群众的注意和喜爱,对此,他心满意足。他在邓迪传道,大有斩获,使当地法官惊恐不安。他们不能或不愿采取严厉措施,只是满足于禁止他自由传道,打发他出境。维希特愤于他们竟敢抵制他,还抵制上帝的真言,就效法古代先知,威胁他们大祸将临。他退向西部乡村,改宗者越来越多。此时,邓迪暴发瘟疫。所有人都大声疾呼:市镇驱逐了虔诚的布道者,现在天谴降临了!他们只有弥补冒犯之罪,瘟疫才会停止。维希特一听说他们改变态度,就回来传道。但他为了避免人群密集传播瘟疫,就把讲道坛竖在大门顶部。病人在门里,其他人在门外。传道者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人们当前的恐惧传播福音,百无一失。^①

维希特的勤勉与成就引起了比顿红衣主教的注意。他决定惩治著名改革派传道者,杀一儆百。红衣主教派博斯威尔伯爵逮捕他,违背伯爵对这个可怜人的诺言,交给自己。他抓住牺牲品,送往圣安德鲁斯,在那里判他异端罪,以火刑处死。监国艾伦天性优柔寡断。红衣主教争取他虽然成功,却无法让他赞同定罪并处决维希特。因此他决定:不靠世俗军队协助,自己惩罚异端。他亲自从窗口观看这悲惨的场面。维希特逆来顺受,但对敌人并不嘴上留情。他预言:红衣主教敌视真正的虔诚和宗教,几天之内就会在同一个地方躺在地下,犹如现在身居高位。^②

这个预言可能直接造成了预言的实现。酷刑激怒了这位殉道者的门徒,他们密谋反对红衣主教,跟诺曼·莱斯利通谋。莱斯利因私人纠葛,不满红衣主教。他们的计划非常隐秘而成功。一天凌晨,他们闯入红衣主教的宅第。密谋者不到十六人,却分别抓住了一百名商人和五十名仆人,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就把他们撵了出去。密谋者关上门,极其谨慎地执行计划。红衣主教在堡内听到声音,警惕起来,堵住卧室门。密谋者放火开道,据信:他在获得生命

^① Knox's Hist. of Ref. p. 44. Spotswood.

^② Spotswood, Buchanan.

安全保证的承诺后，开了门。红衣主教提醒他们：他是教士，不放过他，他就会诅咒他们。两名刺客拔剑冲向他，但第三个刺客詹姆斯·梅尔维尔在刺杀行动中更冷静、更周到，制止了同伙，提醒他们考虑：这种牺牲是上帝的事业和裁断，应该从容而庄严地执行。然后，他拔剑指向比顿：“邪恶的红衣主教，忏悔你所有的罪孽和不义吧；尤其是谋害维希特，他是上帝派来点化这片土地的工具。他的死亡呼喊着复仇。我们是上帝的工具，会让你自作自受。我在此向全能的上帝声明，我不恨你个人、不贪你钱财、不畏你权势。我杀你，只因为你以前一直是、现在仍然是耶稣基督及其神圣福音最卑鄙、最顽固的敌人。”梅尔维尔说完这些话，没有像告诫所言给比顿完成忏悔的时间，就一剑刺穿他。红衣主教倒在他的脚下。^① 谋杀发生在 1546 年 5 月 28 日。刺客获得朋友增援，人数达到一百四十。他们准备坚守城堡，遣使向伦敦的亨利求援。虽然英法和约将苏格兰包括在内，但亨利不愿放弃扰乱敌国政府的机会，承诺保护他们。

苏格兰举步维艰——连五个短命朝代，继而多次幼主长期在位。国王开始执法，却不断被大贵族的阴谋、党争、仇恨打断。神学论争增加了新的乱源，足以扰乱最根深蒂固的政府。政府失去了红衣主教的才干和精力，似乎大大削弱。但太后才德非凡，大力支持政府，弥补了监国艾伦不出所料的软弱。

英格兰护国公一旦国内初定，就准备向苏格兰开战。他决定尽可能执行计划，通过婚姻联合两国。先王对这个计划念兹在兹，临终还向顾命大臣提起。他征集了一万八千人的军队、六十艘船只。半数船只是战舰，另一半运输军火、粮饷。他命克林顿勋爵统率舰队，自己身先士卒，沃里克伯爵从驾。他采取这些敌对措施，借口报复苏格兰边民的掳掠。除此之外，萨默塞特还重提

^① 苏格兰著名宗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在 p.65 称詹姆斯·梅尔维尔为最温和、最节制的人。他记载的这次暗杀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得意洋洋，非常可怖，同时又相当有趣。值得注意的是，诺克斯著作第一版在页边上印有：詹姆斯·梅尔维尔圣洁的行动和言辞，但后来的版本删掉了。诺克斯自己原先没有参加刺杀，但他后来跟刺客联合，协助他们占据城堡。参见 Keith's Hist. of the Ref. of Scotland, p.43。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宗主权要求。除非苏格兰同意将女王嫁给爱德华国王，护国公拒绝其他谈判条件。

开战前，护国公公布他出师的种种理由。他说：自然的本意显然是想将这个岛屿缔造为一个帝国，切断了一切对外交流，用大洋保卫它。自然已经向岛民指出了幸福和安全的道路。人民的教育和习俗跟自然一致，语言、法律、风俗都相同，理应全面联合，不分彼此。命运最终排除了一切障碍，准备了一条捷径。他们可以就此联合，不用猜疑敌国之间自然产生的荣誉和利益问题。苏格兰王位由女性继承；英格兰王位由男性继承。两位君主年龄、身份相若，天作之合、两国之幸。两国之间盛行的敌意源于过去的伤害，但只要相互信任，建立长期、稳固的和平，仇恨不久就会消失。过去的不幸记忆点燃了两国当前的仇恨，然而将来只会让他们更珍惜先人久已未闻的幸福和安宁。两国宴安——苏格兰贵族无须永远枕戈待旦，犹如今日。他们可以学会和平的艺术；软化心灵，热爱国内的秩序与服从。这对两国都有利，苏格兰尤其如此。苏格兰国难深重、内外交困，随时可能被更富强的国民吞并。英格兰虽然有资格要求宗主权，但它愿意为了未来的和平而放弃所有要求，希望完全平等的联盟更为安全可靠。除此之外，完善联盟的积极措施已有安排——国民的荣誉和诚信可以保证完成利益和安全所急需的盟约。^①

萨默塞特不久就看到：这些说辞毫无用处。太后忠于法兰西和天主教，因而议婚劳而无功。因此，他只能用武力迫使苏格兰人接受盟约，但这种措施似乎唤起了苏格兰人最无可挽回的仇恨。护国公在伯维克越过边境，向爱丁堡进军，许久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只有一些小城堡，他不得不斟酌攻取。护国公有意惩罚一个城堡的总督和驻军，因为实力如此悬殊，他们竟敢螳臂当车。他们要求缓刑几小时，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但几小时后护国公已经息怒，愿意大

^① Sir John Haywood in Kennet, p. 279. Heylin, p. 42.

发慈悲。①

苏格兰监国集结全国所有军队，人数两倍于英军，占据爱丁堡四英里外、埃斯克河岸的有利地形。英军在法塞德进入视野，双方骑兵交锋。骑兵是苏格兰人最弱的部分，休漠勋爵身负重伤。护国公准备总攻，但他和沃里克伯爵审视苏格兰大营后，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给监国艾伦写了另一封信，提议：英军愿意撤出苏格兰，赔偿他们造成的一切损害；只要苏格兰保证不将女王许配给任何外国君主，而是留在国内，直到她成年时自己选择配偶。苏格兰人拒绝了，仅仅因为这个条件太温和。他们似乎能想象：护国公一定处境困窘、或是吓破了胆，才会降低原先的要求。苏格兰大营中有许多教士，煽动他们相信：英国人是可憎的异端分子，开罪于上帝；上帝会报复他们，绝不会让他们取胜。苏格兰人看到护国公改变阵地，向海边移动，更坚信了这种惬意的幻想。他们不再怀疑：护国公在这时向对面的海湾移动，一定是打算登船逃跑。② 因此，他们决定切断英军退路，便离开大营，渡过埃斯克河，进入平原。苏格兰人兵分三路：昂古斯统率前锋，艾伦统率主力，亨特利统率后卫。他们只有轻骑兵，部署在左翼；由阿盖尔专门为此招募的爱尔兰弓箭手作为加强兵力。

萨默塞特很高兴苏格兰军队移动，因为阵地战一般对英军有利，他抱有成功的厚望。他将大车部署在左翼，离海最远的地方；命令他们留守在他安排的高地上，等待敌人逼近。他将主力和后卫放在右翼；派格雷勋爵率领一队人马守在车阵外，等苏格兰人与英格兰车阵近战时从侧翼攻击苏格兰车阵。

苏格兰军队在平原上前进，受到英国舰队炮火轰击，颇有折损。格雷厄姆勋爵的长子阵亡，爱尔兰弓箭手阵形大乱，甚至其他部队也随之动摇。格雷勋爵意识到他们的处境，不顾命令，离开阵地，率领重装骑兵攻击苏格兰步兵，希

① Haywood. Patten.

② Hollingshead, p. 985.

望独占胜利的荣誉。他在前进的路上遇见沼泽和壕沟，敌军长矛兵在壕沟后面的休耕地上布防。休耕地沟渠纵横，保护了苏格兰前线，扰乱了英国骑兵的阵容。由于所有这些意外事件，使得这支骑兵部队的冲击丧失了力量，混乱不堪。英国骑兵的长矛没有苏格兰人长，立刻被他们刺穿、落马、败北。格雷本人身负重伤。护国公的儿子爱德华·西摩折损了战马。英军阵地濒临陷落。如果苏格兰人有出色的骑兵，乘机扩大战果，英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①

这时，护国公在拉尔夫·萨德勒爵士、拉尔夫·维恩爵士的协助下，努力重整军队，大获成功。沃里克指挥若定，保持了步兵阵形，击退了敌军骑兵。他派火枪步兵队长彼得·梅塔斯爵士率军前进，意大利和西班牙火枪骑兵队长彼得·甘博亚率部向苏格兰步兵齐射。他们向沼泽进军，向敌人倾泻弹雨。战舰从侧翼开炮。安置在高地上的火炮从前面袭击敌军。英国弓箭手箭如雨下。英军前锋下山，军容严整、从容推进。苏格兰人面对所有这些不利情况，军心动摇，车阵开始撤退。撤退很快就变成了溃逃，爱尔兰弓箭手首先崩溃。车阵的恐慌牵动主力，接着牵动后卫；整个战场充满了混乱、恐怖、溃败和惶惑。英军居高临下、追亡逐北；欢声雷动、杀声震天，给溃军的混乱雪上加霜。尤其是骑兵亟欲报复当天初战败北之辱，穷追不舍、血流漂橹。从战场到爱丁堡的五英里内，尸横遍野。教士，尤其是修道士劫数难逃；英军对这些不顾出家人身份的人恨之入骨，绝不容情。没有几次战役更举足轻重，征服者损失更小。英军损失不超过两百人；根据最温和的估计，苏格兰人丧师不下一万人。大约一千五百人被俘。根据邻近贵族领地的名字，这次战役称为“平基之役”。

太后和艾伦伯爵逃往斯特林城堡，几乎集结不起一支军队，以阻止英军偏师来犯。伦诺克斯伯爵和沃顿勋爵率领五千人马进军西境，攻掠安楠，蹂躏邻封。^② 萨默塞特若能乘胜追击，完全可以迫使苏格兰签订城下之盟。但他听说

^① Patten. Hollingshed, p. 986.

^② Hollingshed, p. 992.

有些枢密(包括他弟弟、海军上将)阴谋反对他的权威,急欲返回英格兰。他攻取休谟、道格拉斯、文茅茨、法斯特堡、洛克斯堡和其他小地方,征服若干边郡,然后从苏格兰撤退。英军舰队扫荡沿岸船只,攻取福斯湾泰河口的布罗特,设防留戍。艾伦要求护国公留下特使,谈判和约。萨默塞特指定伯维克为谈判地点,留沃里克为全权大使,但苏格兰特使没有光临。苏格兰人的提议只是为了争取时间,等待法兰西援助的计策。

护国公返回英格兰,召集国会。他多少因苏格兰战争的胜利而陶醉,从外甥手中取得了特许状:临朝称制、辅弼天家,荣誉、特权同于宗室、王叔。国王在这份特许状中搁置了前朝颁布的法案。^① 萨默塞特纵然有僭越之罪,但他在本届国会通过的法律仍然值得大加赞赏:缓解了前朝法律的严厉;给宪政自由提供了若干保证。除爱德华三世的二十五款法案以外,大逆罪的一切扩大以及针对罗拉德派和一切异端的前朝法律和六款法案皆予以撤销。^② 言论罪超过一个月就不得起诉。英格兰有史以来最严苛的几项法律就此废除。世俗和宗教自由的曙光初现。但普通法仍然将异端列为重罪,处以火刑。只是犯罪的定义和裁断仍然没有精确标准。为此,公共安全受益还是受害,全凭法官的看法。

圣旨与法律效力相同的法案践踏了一切法律,也在撤销之列。^③ 另一项法案规定:国王有权废除本朝二十四年前的所有法律,同样予以缓解。他可以防止以后执行这些法律,但无法收回过去已经产生的影响。^④

国会还颁布法案:否认国王的至高权力,宣扬教皇的至高权力;初犯者没收一切动产,^⑤ 随意监禁。再犯者坐大不敬罪。第三次坐大逆罪。但三月一日

① Rymer, vol. xv. p. 164.

② 1 Edw. VI. c. 12.

③ Edw. VI. c. 2.

④ Ibid.

⑤ Heylin, p. 48.

以后，任何人试图撰写、出版或公然行动，否定国王的领地、头衔，特别是至高权力，或是将国王的权力归诸其他人，皆坐大逆罪。任何王位继承人篡夺其他继承人，或是破坏继承顺序，他们及其从犯、教唆犯皆坐大逆罪。本届国会通过了这些最重要的法案。大多数议员对宗教问题态度消极，热心宗教改革者寥寥无几，另一些人暗中强烈倾向于天主教；但更多多数议员乐于顺水推舟，以追随利益、权威或当时的流行看法。

教务会议与国会同时召集。争论首先集中于六款苛法，国王要求他们在国会撤销之前废除该法。^① 教务会议下议院申请与国会下议院会议；他们如果得不到这个特权，就要援引古老的权利：不经他们同意和批准，国会不得通过任何关于宗教的法律。但当前主导的原则更趋向于世俗权力，而非教会权力；教务会议的要求遭到拒绝。

护国公已经同意废除圣旨与法律效力相同的法案，但他无意放弃圣旨的武断之治或自由裁量权。圣旨自古以来属于王室，很难跟完整的立法权区别。他甚至继续在当时明显认为最重要的方面运用这项权力。枢密院下诏：圣诞节、圣灰星期三、圣枝主日不得举烛游行。^② 这些古老宗教的习惯现在已经被称为迷信；不过迷信用在这种单纯无害的地方，实为人类之幸。所有改革派自然态度严厉，促使枢密院采取同样态度，废除古老宗教某些放纵、浮华的仪式。^③

枢密院还下诏：移除所有教堂的圣像。这是改革派强烈要求的革新；对民众而言，这一项就差不多相当于既存教会的全面改革。^④ 有人试图将使用圣像和滥用圣像、尊重圣像和崇拜圣像区别开来，但经过试验发现：这种做法实在难以操作，甚至完全不可能操作。

① Antiq. Britan. p. 339.

② Burnet, vol. ii. p. 59. Collier, vol. ii. p. 241. Heylin, p. 55.

③ Burnet, vol. ii.

④ Burnet, vol. ii. p. 60. Collier, vol. ii. p. 241. Heylin, p. 55.

法律为新圣餐礼的需要，废除了私人弥撒。枢密院走得如此之远，诏书序言完全不在意私下忏悔的习惯。^① 这是彻底废除私下忏悔的前奏。私下忏悔是有史以来最有力的工具，贬低平民信徒的地位，使精神导师完全凌驾于他们之上。可以公正地说：虽然教士通过赦罪、忏悔，多少安抚了软弱的心灵，使迷信的恐怖不至于直接爆发；但教士本身的做法只会强化迷信，由此为更猛烈的精神崩溃准备了条件。

传道者的观点彼此抵触，使当时的国民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判断双方进一步的推理，自然会认为教会的一切说法都有同等权威。教会众说纷纭，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和起伏。枢密院为了补救起见，对布道采取了若干限制措施；但他们发现这样不起作用，就完全取缔了布道，立刻终结了讲坛上所有的论辩。^② 就事物的本性而言，这种措施只能暂时起作用。公开敬礼跟外部炫耀成正比，因此遭到改革派的精简。国民只有从布道中获得消遣娱乐，因而才能对布道更加依恋。古老宗教让出家人忙于杂事，省去了思考的麻烦。只有在特殊的斋戒和节庆时，主要教堂才会举行布道。布道人如果滥用向民众慷慨陈词的惯例，布道就是产生党派、煽动骚乱的利器。这些年来，骚乱的范围和影响都大大减少了。

英格兰宗教改革越向前发展，护国公联合苏格兰的计划就越希望渺茫。苏格兰太后和教士更加憎恶联合这个远离一切古老教义的国家。萨默塞特攻取哈丁顿，命令格雷勋爵建立坚固的要塞、严加防守。他还在劳德建立了一些要塞。他希望：这两个要塞、布罗特和其他次要地点的英国戍军足以绥靖苏格兰，以方便他深入王国腹心之地。

监国艾伦屡攻布罗特不克，便把收复这些失地的主要希望寄托于法兰西援军。六千法军最终抵达福斯，其中半数为德国人。德塞指挥全军，安德洛

① Burnet, vol. ii.

② Fuller, Heylin, Burnet.

特、斯托茨、梅勒拉耶和莱茵格雷夫伯爵辅佐他。苏格兰人这时屡战屡败、士气低落，仅五百名英国骑兵就能蹂躏全国、所向披靡，直击首都爱丁堡城门。^① 法兰西援军一到，他们又鼓起勇气——相当强大的苏格兰军队跟德塞会师，围攻哈丁顿。^② 然而，他们即使有法军相助，仍然完全不能胜任，便把主要希望寄托于城堡绝粮。他们几次正规围城不克，采取封锁的方法，击退了守军几次突围。

先王和护国公几次进攻苏格兰，都没有竭尽全力、长期作战、不断进攻。结果只刺激了苏格兰人全心全意地憎恶这种恃强而来的联合。即使那些想跟英国联合的人，也不愿意受到武力胁迫。尤其是亨特利伯爵曾愉快地说道：他不是不喜欢结婚，只是讨厌求爱的方式。^③ 太后注意到这种流行的情绪，在哈丁顿附近的修道院召集国会，提出：为了更好地保证年轻女王的安全，应该送她去法兰西，由老盟友监护。有些人反对这种孤注一掷的措施，因为稍有差错就会毫无挽回的余地；苏格兰势必受制于外邦，卷入永无止境的英法战争；他们不再有安抚强邻的权宜之计。另一方回答：女王留在国内，就会构成英格兰的战争理由；等他们发现逼婚已经行不通，自然会断了念头。法王亨利负如此重托，保护他们的君主；势必竭尽全力保护苏格兰王国。法兰西的黄金慷慨地分发给贵族，更加强了他们的论据。监国获得一万二千里弗的年金，封为夏特莱特公爵；其儿子在军队中担任指挥官。^④ 教士们担心跟英国联合的后果，出于原则和利害，热忱而积极地附议。于是，国会决定送女王去法兰西。相应的必然结果是：女王许配给法兰西王太子。维勒盖农统率四艘法兰西战舰，停泊在福斯湾，似乎准备起航回家；但他一到公海，立刻掉头向北，穿过奥克尼群

① Beaugué, hist. of the Campagnes 1548 and 1549, p. 6.

② Hollingshed, p. 993.

③ Heylin, p. 46. Patten.

④ Burnet, vol. ii. p. 83. Buchanan, lib. xv. Keith, p. 55. Thuanus, lib. v. c. 15.

岛，在西海岸丹巴顿郡靠岸。对这种构造的船只而言，这次堪称非凡的航程。^① 厄里斯金勋爵和利文斯顿勋爵护驾到那里，将年轻的女王托付给他。女王出海，经历了一些暴风雨天气后，安全抵达布雷斯特，从那里前往巴黎。不久，她就跟法兰西王太子订婚。

萨默塞特在国内困难重重，放弃了苏格兰计划，希望两国议和。他向苏格兰提议：签订十年停战协定，但他坚持要保留已经占领的所有地方，使得谈判毫无结果。苏格兰人发动突袭，攻下了休谟城堡和法斯特城堡；英军卫戍部队全军覆没。他们首先向法夫、然后向蒙特罗斯发动突袭，兵不血刃地驱逐了西摩勋爵统率的英军。女王私生兄弟詹姆斯·斯图亚特在法夫之役中获得了荣誉；邓恩的厄里斯金勋爵在蒙特罗斯居功至伟。罗伯特·博维斯爵士和托马斯·帕尔默爵士统率着相当强大的军队，试图将给养送进哈丁顿；但他们遇上埋伏，几乎全军覆灭。^② 虽然一支二百人的小部队逃脱了法军的所有警戒，安全地将一批军资、粮秣送进哈丁顿，但要塞仍然困窘不堪，护国公必须提供更有效的救援。他派出一万八千人的军队，辅以三千德国人，这些德国兵分别来自德国各新教诸侯盟友。他委任什鲁斯伯里伯爵统率全军。^③ 德塞阻遏英军推进，排除万难撤回爱丁堡，在有利地形设防。什鲁斯伯里在进军中失去了战机，他在目前情况下不敢浪战。他利用战果，给哈丁顿补充给养，然后撤回英格兰。

虽然法兰西的保护支持苏格兰人抵抗英格兰，影响深远；但英格兰枢密院的内讧和朋党之争给苏格兰带来了更大的利益。护国公和海军上将兄弟不满足各自已经获得的高位和荣显，彼此极度猜忌。他们彼此敌对的密谋和觊觎将整个宫廷和王国分为两派。西摩勋爵野心勃勃、贪得无厌，且骄横、傲慢、无

① Thuanus, lib. v. c. 15.

② Stowe, p. 595. Hollingshed, p. 994.

③ Hayward, p. 291.

法安抚。他的才干胜过护国公，却不像护国公那样深受国民的信任和尊重。西摩娴于辞令，获得太后垂青；太后不顾她一贯的审慎和庄重，先王一死就嫁给了他。由此，如果她不久怀孕，孩子的父亲就难以判断。这次联姻使西摩富贵兼得，更有利于他的野心；但萨默塞特公爵夫人大为不满，因为弟媳占尽了他们夫妇的风光。公爵夫人运用她对丈夫的一切影响，首先产生然后扩大两兄弟之间的裂痕。^①

护国公统率英格兰军队时，误解的迹象第一次出现。秘书佩吉特对萨默塞特忠心耿耿，注意到西摩在枢密院内密谋结党，以贿赂腐化国王的仆人，甚至试图以不合礼法的纵容和慷慨赢得幼主的喜爱。佩吉特提醒他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劝他考虑家族崛起、树敌众多，敌人会贪婪地抓住他们兄弟不和的机会，把他们两人都搞垮。他发现忠言逆耳，就向萨默塞特告警，劝他放弃苏格兰的未尽之业，以便防范国内的敌人。在接下来的国会中，海军上将的提议对公共安宁甚至更加危险。他已经羽翼丰满，因此可以直接攻击哥哥的权威。他对朋友说：以前，国王没有成年时，王国的护国公和国王的监护人不能由同一个人兼任。目前萨默塞特身兼二任，非臣民所宜有。^② 他甚至说服幼主致信国会，要求任命西摩为监护人。西摩为了实现他的目的，在两院树立朋党，但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败露了。他在下议院里的有些朋友受命规劝他，但没有什么效果。他大放厥词，轻率地威胁说：他如果不能如愿以偿，就要让本届国会变成英格兰有史以来最倒霉的一届。^③ 枢密院传唤他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拒绝出席。接下来轮到枢密院威胁他了。他们说：国王的信件不能让他如愿以偿，反而会坐实他图谋不轨、私诱幼主、意图颠覆。他们甚至威胁：根据他的鲁莽轻率，送他进伦敦塔。海军上将发现此路不通，不得不屈服，希望

① Hayward, p. 301. Heylin, p. 72. Camden. Thuanus, lib. vi. c. 5. Haynes, p. 69.

② Haynes, p. 82, 90.

③ Ibid. p. 75.

跟哥哥和解。

萨默塞特的性情温和节制，愿意原谅海军上将的不臣之心；但西摩天性狂暴，难以安抚。他的妻子、前太后在分娩时去世，但他的野心非但没有告一段落，反而别出心裁。他向伊丽莎白女士求爱，她当时只有十六岁。公主年纪更大时，虽然胸怀大志、急欲用权，仍然不能忘情于儿女姻缘。西摩多才多艺，不负佳人错爱，公主似乎有动于衷。^① 但亨利八世遗嘱已经规定：女儿如果未经顾命大臣同意，私订终身，就会丧失一切继承权。西摩不可能指望顾命大臣会同意他，这说明他有更轻率、更罪恶的图谋——海军上将的所有其他举措都倾向于证实这种怀疑。他继续贿赂国王的左右近侍。他试图引诱年轻的君主站在他一方。他建立了联系国王的私人渠道。他公开谴责兄长的政府，宣称：护国公招募德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形成了一支雇佣军，可能危及国王的权威和国民的自由。他通过许愿和游说，诱使许多大贵族加入他一方；他的党羽遍布英格兰全境。他甚至没有忽略下层阶级的人，估计他一次能从仆人、佃户、家臣当中召集一万人马。^② 他已经为这些人准备了武器，跟约翰·夏林顿爵士通谋。夏林顿爵士是腐败的布里斯托尔造币厂总监，西摩因而自诩不愁缺钱。萨默塞特充分掌握了这些警讯，试图以最友好的方式：立约、说理、甚至再赐新恩等分式，让他放弃危险的图谋。但护国公发现一切手段都不起作用，开始考虑更严厉的补救措施。沃里克伯爵心怀二志，计划挑动他们兄弟相争、两败俱伤，从而为自己的前程开道。

沃里克伯爵达德利的父亲是亨利七世的大臣达德利，因掠夺、勒索、歪曲法律引起公众的仇恨，在亨利八世朝初年充当了平息民愤的牺牲品。先王明白判决不公，至少不法，后来通过国会法案恢复了达德利的公权。亨利八世发现他干练、勤勉、积极，多次委以重任，达德利总是不负厚望。先王封他为莱尔

① Haynes, p. 95, 96, 102, 108.

② Ibid. p. 105, 106.

子爵，任命他担任海军上将，在遗嘱中列为顾命大臣。幼主进一步施加恩宠，封他为沃里克伯爵。他暗中破坏南安普敦的信誉，在护国公的枢密院中占据要津。沃里克在平基大捷中英勇战斗、指挥有方，其功甚大。举世公认他文武全才，可惜他瑜不掩瑕、德不胜才：野心不知节制，贪婪永不餍足，体面轻如鸿毛，正义视同草芥。他发现西摩勋爵才高志大、轻举妄动，且主要担心西摩自取灭亡，自己受池鱼之殃。于是，他决定把西摩推下悬崖，为自己的飞黄腾达扫清障碍。

萨默塞特发现：在他弟弟的煽动，乃至叛乱和密谋之下，公共安全岌岌可危。这时，他很容易接受沃里克伯爵的意见，以王权对抗他。护国公首先罢免了其海军上将的官职，然后将他关进伦敦塔。一批同谋者也遭到拘押，三位枢密受命审查，报告巨细靡遗、罪迹昭彰。但护国公仍然留中不发，不忍大义灭亲。他提议：只要西摩衷心和解、放弃野心、退隐乡间、不问国事，他就撤销起訴；但西摩对这个友善的提议唯有威胁和蔑视，护国公下令提出三十三款罪名，^①全部提交枢密院。据称，所有条款都有证人和口供，无可置疑；不过枢密院为了更充分地审查犯人，认为拘入伦敦塔更得体些。西摩外表上毫不气馁，他大胆地要求公正审判，跟证人对质，还要求把指控留给他，且拒绝回答可能自证其罪的审讯。

显然，无论当局如何声称，指控西摩的证据确实存在一些缺陷。他这时提出的要求以法律与正义最清晰的原则为基础，却完全遭到拒绝。我们确实可以得出结论：仔细检查指控，许多条款是一般性的，证据几乎没有；许多条款即使是真的，也允许更有利的解释。总而言之，虽然西摩看起来确实是危险的臣民，但还没有达到归罪于他叛逆的程度。他真正的罪行似乎主要是海军上将任内的不法行径：保护海盗、勒索商民。

^① Burnet, vol. ii. Coll. 31. 2 & 3 Edw. VI. c. 18.

当时的政府有一个便利的报复工具，就是国会，因此有无罪行或证据，根本无关紧要。当局召集了一届国会，通过针对西摩的剥夺公权法案。年轻的国王几经游说，才予以同意。国王的批准相当有分量。事务首先提交给上议院；几位贵族起立，说明他们了解西摩勋爵的罪行、逆词和所作所为。上议院接受了这些叙述，作为确凿的证据。犯人原先在上议院有许多朋友和党羽，但谁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或公正地表示：应该听取他的辩护，不利证据应该有合法形式，应该让他跟证人对质。下议院顾虑稍多，甚至有些议员反对缺席通过剥夺公权法案的整个程序，坚持人人必须受到审判才能定罪。但国王派人传旨，吩咐下议院继续程序，且提供了安抚上议院的同样说辞，毫不费力地说服他们默许。^① 两院都通过法案；近四百人投票赞成，反对者不超过十人。^② 判决不久就予以执行，犯人斩首于塔山。萨默塞特签署了命令状，但由于过程激烈而饱受谴责。海军上将的图谋主要是为了平衡他兄长僭越的权威。虽然他和伊丽莎白公主联姻的前景刺激了他的野心和事业心，可能威胁公共安宁，但防患于未然的审慎堪称伟大。护国公的补救措施明显不合法。只能说：本朝的剥夺公权法多多少少比前朝更容易忍受。至少，本朝产生了一点证据的影子。

除了西摩的剥夺公权法案以外，本届国会关心的要事都是教务。宗教事务现在已经吸引了举国上下的注意。枢密院指定主教和神学家组成一个委员会，撰写祷告文；他们完成了委托的任务，并在这种微妙的任务中保持了节制。他们在改革派容忍的范围内保留了许多古老的弥撒；没有沉溺于斗争的精神，所有的大变革都会自然产生这种精神。他们自诩确定了各派基督徒都能毫不犹豫地同意的文本。唱弥撒总是用拉丁文——人们之所以没有觉得这个习惯荒谬，原因是教士想在仪式中给人留下神秘未知的印象，以验证跟他们的宗教如影随形的虚饰。但改革派声称在某些地方鼓励平民信徒个人判断，将祷告

① 2 & 3 Edw. VI. c. 18.

② Burnet, vol. ii. p. 99.

文和《圣经》都翻译为俗语，似乎更符合他们教派的精神。旧弥撒和新祷文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这次革新，以及删减圣徒祷告和某些迷信仪式。国会确定：所有教堂都要遵循这种礼拜形式，所有仪式和典礼都要保持一致。^①

本届国会还通过了另一项法案——以前的教规确定教士独身。这种习惯一般归因于罗马教廷的政策。他们认为：神职人员没有妻儿之累，就会对精神领袖更加忠诚，对世俗当局更少依赖。不过，人性固有的迷信将这种制度进一步推向极端。早在独身制度确定之前，古代教父就在这些迷信驱使下，经常颂扬未受玷污的贞洁。本届国会准许教士结婚，但还要在法案一开头表示：“教士和牧师最好守贞不婚，他们负有自愿节制的厚望。”强迫守贞和禁止婚姻造成了诸多不便，是这方面放纵不羁的主要原因。^② 苦修观念在其他方面也有相当遗存，因此国会通过法案：禁止在大斋和其他斋戒期间吃鲜肉。^③

天主教会的主要教义和惯例现在都已经废除，英格兰宗教改革几乎大功告成。虽然新圣餐礼严谴真在论，废除了许多古老仪式，但真在论仍然保存在许多人心中。这是国民最后抛弃的天主教义。^④ 这种顽固的态度部分源于先王对真在论的忠心不渝；但主要原因在于这条教义本身的极度荒谬和受到的

① 2 & 3 Edw. VI. c. 1.

② 2 & 3 Edw. VI. cap. 21.

③ 2 & 3 Ed. VI. cap. 19.

本届国会还通过了另一项法案。法案序言说：约克城原先人烟稠密，现在荒废衰败。因此许多堂区找不到能够胜任的神职人员。法案为了救治这种不便，授权地方官便宜行事、合并各堂区。教会史家 Collier, vol. ii. p. 230 认为：解散修道院是约克城衰落的主因，因为修道院的岁入落到远方人手中。本届国会向王国所有货物、资金，甚至工业征收苛税。身家十镑或十镑以上者，每年每镑征收一先令。外侨和外籍居民征收双倍。最后，年龄十二岁以上、身家二十先令以下者，每年征收八便士。一头阉羊每年征收二便士。一棵紫杉每年征收三便士。羊毛业根据他们生产的所有衣料的价值，每镑八便士。对资金征收苛税，就说明没有几个人依靠房贷取息生活。这种税高达所有资金拥有者年收入的一半，并根据法律允许的年利率估计。如果许多人都受到苛税的影响，就会无法忍受。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国会完全没有对土地征税。商业通常收益高，被认为能够忍受这种征敛。法律最荒谬的部分似乎就是对羊毛制造业征税。参见 2 & 3 Edw. VI. cap. 36。以后的国会撤销了对羊和毛料的征敛。参见 3 & 4 Edw. VI. cap. 23。但他们继续征收了一年时间的另一种税。参见 Ibid。教士自己在三年内每镑征收六先令。国会批准了这项税收，宗教改革以来成为惯例，暗示教士即使对自己都没有立法权。参见 2 & 3 Edw. VI. cap. 35。

④ Burnet, vol. ii. cap. 104.

深厚崇拜，当然也给想象力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教士同样喜欢这种赋予他们神奇力量的观念。人民相信他们分享了救世主的血肉，不愿意放弃如此非凡、（他们想象为）如此有益的特权。人们普遍热烈支持这个教条，因此路德派虽然跟罗马决裂，仍然以另一个名字把它保留下来。英格兰的天主教传道士在所有其他方面受到压制，忍受不了这一条的教导。邦纳因为这一次和其他的冒犯，而受到枢密院审判，被剥夺教区，受到拘禁。加德纳已经获释，仍然对引进最近革新的当局桀骜不驯。他似乎愿意赞同英格兰全体天主教徒相当喜爱的观点：国王确实是教会的首脑，但为幼主摄政的枢密院不是。他拒绝完全承认枢密院的首脑地位，被关进伦敦塔，受到枢密院的进一步威胁。

这些位高权重者受到严惩，在当时似乎是政治上的必要，目的是实现公共礼拜和信纲的统一。但另一些迫害除了神学家的偏执以外别无理由，这种偏执仿佛是不可救药的顽症。虽然新教神学家多年来对旧教一直持否定态度，但现在轮到他们坚信新体系，不容反对意见了。他们准备用自己死里逃生的同一把火，烧死跟他们意见不合的人。枢密院指派大主教和其他教会元老组成委员会，审查所有再洗礼派、异端分子或公祷书反对者。^① 特派员受命：尽可能让他们悔改；苦修赎罪；再赦免。如果这些人顽固不化，就逐出教门、投入监狱，交给世俗当局处理。这种审查不必遵循普通审判的方式，法律形式可以豁免；如果任何法案妨碍委员会的权力，就由枢密院废除和取消。委员会审查一些伦敦商人，控告他们的种种观念，包括：洗心革面的人没有罪孽；因为外在的人可能作孽，但内在的人绝不可能犯罪。委员会说服他们放弃观点，打发他们离开。但有个女人受到异端指控，名叫琼·波西。她顽固不化，委员会无法左右她。她的教义是：“基督并不真正是圣母所生。外在的血肉之躯生于罪孽、产生罪孽。因此基督与此无关。但圣言与圣母的内在一致，道成肉身。”^②这

① Burnet, vol. ii. p. 3. Rymer, tom. xv. p. 181.

② Burnet, vol. ii. coll. 35. Strype's Mem. Cranm. p. 181.

种观点显然并不符合正统，因此有必要烧死坚持己见的女人。但爱德华国王尚在冲龄，比他的顾问和导师更为明智，长期拒绝签署死刑令。克兰默想说服他听话，但他说：神学错误有两种，直接违反使徒信经和其他方面的错误相去甚远。违反使徒信经就是不敬上帝；国王身为上帝的代理人，必须镇压；正如下级法官必须惩罚冒犯国王的人。爱德华最后经不住一再纠缠，流着眼泪屈服了。他告诉克兰默：如果有冤情，一切罪孽都要落到他头上。大主教再次试图说服女人改变观点，但发现她顽固不化，一切论据都不起作用，最后将她烧死。一段时间后，荷兰人凡·巴黎被控为阿里乌斯派异端，受到同样的惩罚。他心满意足地受刑，拥抱、爱抚烧死他的柴堆。在当时的殉道者当中，狂暴的例子也有。^①

严厉的法律不久就迫使举国服从新教义和祈祷文，无论真心信仰还是表面功夫。只有玛丽夫人继续做弥撒，拒绝承认礼拜确定的新形式。她受到压力和威胁，便向皇帝申诉。皇帝和英国大使菲利普·霍比爵士商谈，为她争取到枢密院暂时的默许。^②

① Burnet, vol. ii. p. 112. Strype's Mem. Cramm. p. 181.

② Heylin, p. 102.

第三十五章

爱德华六世(二)

民心不满——叛乱——指挥苏格兰战争——法兰西战争——枢密院朋党——阴谋反对萨默塞特——萨默塞特请辞护国公——与苏格兰、法兰西议和——放弃布洛涅——迫害加德纳——沃里克封诺森伯兰公爵——他的野心——萨默塞特受审——伏诛——召开国会——新国会——变更继承权——国王病倒——国王驾崩

在世俗社会中,任何严重的滥权都不可能没有众多有益的附带后果。宗教改革开始时,失去这些益处的效果很明显,而改革的好处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慢慢见效,大多数国民很难有立竿见影的感受。大体上,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机构能比僧侣和修道士造福人类更少。不过,随着修道院解散,许多附带的益处也不复存在,英格兰国民对此颇为遗憾。僧侣常驻领地中心的修道院内,在地方和佃户当中消费,支持了一个现成的商品市场,保障了穷困潦倒的人。他们的慷慨博施虽然鼓励懒惰、妨碍国富增长,却能济危解困、所惠匪少。同样显而易见,修道士受戒律约束、生活方式特殊,没有勒索他人的同样动机。英格兰和罗马天主教国家公认:修道院是最善良、最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宽厚的地主。方丈、长老可以低价出租土地，佃户以大笔礼物回报。主教和大学目前还在沿用这种模式。一旦大贵族和廷臣瓜分了修道院的土地，他们的安排就完全不同了——地租上升，佃户难做。偏远地区的农民面临新主人的压迫，或是更贪婪的管家压迫。

当时还有另一些因素加重了平民的窘困。英格兰的制造业技术不如其他欧洲国家先进；甚至在英格兰，工业技术也比农业知识先进得多。所有工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大量的思索和经验。国内外需要大量羊毛，而低技术种植业的收益不如牧场有利。因此整个领地都放弃耕作，圈为牧地。佃户被视为无用的负担，流离失所。甚至乡民失去了以前放牛的公有地，处境每况愈下。王国随处可见人民生计恶化、以前的陇亩抛荒。^① 这种惨状现在已经是老皇历了；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皮里春秋——英格兰的羊群比狮子和狼更贪婪，吞下了整片村庄、城市和地区。

西印度发现以后，欧洲金银普遍增加；民生多艰，民怨鼎沸。国家日益商业化，需求日益增加；商品易于转运，各地价格普遍上涨。但英格兰劳动者想改变生活却不那么容易，劳动力的价格仍然大体不变。穷人抱怨说：他们的工作不再能养家糊口了。其实他们只要更加勤勉和积极就能谋生。虽然当前增加勤勉至少对社会有利，但人民很难放弃以前的懒散习惯。他们只有迫不得已，才会竭尽全力。

还必须注意：亨利八世虽然精于聚敛，但由于挥霍浪费，财政仍然窘迫。他只得饮鸩止渴，铸造贬值劣币，以救燃眉之急。护国公兴师于外，以致劣币进一步贬值。通常的后果随之而来：良币窖藏或外流；国内大铸劣币，或是由海外大量输入劣币。平民的薪资以劣币支付，无法以平价购买商品。于是骚动四起，商业停顿，英格兰各地怨声载道。

^① Strype, vol. ii. Repository Q.

护国公爱惜民望，体恤民情；他极力纾解民困，鼓励了这些怨言。他指派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圈地问题；诏命最近所圈的所有土地应该在指定日期公开。民众获得政府支持，在几个地方集结起来；集会现场骚动不安，但经过规劝和说服，还是平静下来。萨默塞特为了让他们更满意，委任了一个新委员会。委员会奉命巡抚各地，听取圈地、路政、村社等问题的一切原委、裁断曲直，享有无限的权力。^① 这个委员会不合绅士和贵族的心意，他们斥之为武断不法。平民害怕诏令得不到落实，迫不及待地要求补偿；他们不再压抑怒火，而是拿起武器。英格兰几处地方同时发生叛乱，仿佛平民结成了普遍的同盟。威廉·赫伯特爵士驱散了威尔特郡的叛乱。威尔特郡的格雷勋爵驱散了邻郡牛津和格洛斯特的叛乱。许多叛乱者战死沙场，另一些受到军法制裁。汉普顿、苏塞克斯、肯特和其他各郡的骚乱通过更温和的手段平定下来，但德文郡和诺福克郡的叛乱预示着更危险的结果。

德文郡平民一开始抱怨圈地和绅士的压迫，并无特殊之处；但桑普福德-考特尼的教区牧师向他们发表演说，将不满引向宗教。在当前的紧急状态下，这个微妙的问题立刻使暴动令人生畏。其他各郡绅士和政府关系密切，但许多德文郡绅士站在平民一边，包括圣米迦勒山总督汉弗莱·阿伦德尔。叛乱者纪律严明，为数多达一万人。罗素勋爵奉命率偏师定乱，但他发现实力悬殊，不能浪战。他勒兵避战，跟叛军谈判；希望拖延会平息他们的怒火，给养困难会使他们分散。叛军的条件是：恢复弥撒，归还半数修道院土地，执行六款法律，尊重圣水和圣饼，纠正所有其他个案。^② 罗素转呈枢密院，枢密院傲慢地回答：叛军应该解散；立刻服从命令，可望宽恕。叛军大失所望、怒不可遏，向埃克塞特进军。他们在队伍前面举起十字架、旗帜、圣水、圣烛台和古老迷信的

① Burnet, vol. ii. p. 115. Strype, vol. ii. p. 171.

② Hayward, p. 292. Hollingshead, p. 1003. Fox, vol. ii. p. 666. Mem. Crann. p. 186.

其他法器；住持在华盖下面随军前进。^① 埃克塞特市民关闭城门。叛军没有大炮，试图先以云梯、再以坑道攻城，但每一次都被击退。在此期间，罗素驻军霍尼顿，等待威廉·赫伯特爵士和格雷勋爵的援军，以及一批德国骑兵和巴蒂斯塔·斯皮诺拉指挥的意大利火枪手。诸军会师后，罗素决定先解埃克塞特之围，这时城里已经罗掘俱穷。他发动进攻，将叛军逐出所有阵地，在战斗和追击中斩杀甚众，^② 抓获大批俘虏。阿伦德尔和其他首领解往伦敦，受审、处决。许多次要人物由军事法庭判处死刑。^③ 圣托马斯的牧师是主要煽动者之一，其披天主教的黑纱、腰系念珠，在他自己的教堂塔尖上被绞死。^④

诺福克叛乱更加声势浩大，战斗更加激烈。诺福克人一开始像其他各地民众一样，因反对圈地而躁动；但他们发现人数超过两万，就傲慢起来，提出更加过分的要求。他们提出：镇压绅士，在君侧安置新枢密，重建古老教仪。制革工人凯特僭政，以极端傲慢、恶毒的方式行使权力。他占据了诺维奇附近的茅斯霍尔德山，在老橡树下开庭审案。他称这棵橡树为革新橡树，召绅士前来候审。他颁布的判决从他的性格和地位就可以推知。北安普敦伯爵首先奉命讨伐他；但叛军击退王师，谢菲尔德勋爵阵亡。^⑤ 护国公爱惜民望，不肯亲自跟叛军作战。因此，他派沃里克伯爵统率的六千人前去平叛；这支军队本来是去讨伐苏格兰的。由此，他给自己的死敌提供了增加声誉和人望的手段。沃里克几次跟叛军小规模交锋，最后发动总攻，将他们驱散。两千人死于战役和追杀。凯特在诺维奇城堡绞死，他的九位追随者吊在革新橡树枝上。叛乱遭到彻底镇压。约克郡有些叛乱者得知同伴的下场，接受赦免，放下武器。护国公不久就颁布了普遍补偿的法令。^⑥

① Heylin, p. 76.

② Stowe's Annals, p. 597. Hayward, p. 295.

③ Hayward, p. 295, 296.

④ Heylin, p. 76. Hollingshed, p. 1026.

⑤ Stowe, p. 597. Hollingshed, p. 1030 – 34. Strype, vol. ii. p. 174.

⑥ Hayward, p. 297, 298, 299.

虽然英格兰的叛乱迅速平定，没有留下丝毫后患，但英国的对外事务仍然因此而恶化。沃里克伯爵威震苏格兰，他一撤退，法国将领就因利乘便、好整以暇地平定了这个国家。该将领攻取布罗特，全歼戍卫英军。他围困哈丁顿，英军弹尽粮绝。虽然戴克斯勋爵能补充给养，增援卫戍部队，但据守要塞代价过高，并不现实。附近乡村经英国人和苏格兰人反复蹂躏，早已荒残，不能供应卫戍部队。此地离边境三十英里，因此必须有一支正规军从那里运送给养。军中瘟疫流行，每天都在减员，已经不堪一击。由于这些原因，英军奉命平毁哈丁顿要塞，将火炮和卫戍部队撤回伯维克。拉特兰伯爵现任东部边区巡按使，执行了命令。

法兰西国王抓住英国内乱的机会，试图收复布洛涅——该地是亨利八世从法国征服的。他以其他理由召集军队，奇袭布洛涅；塞拉克、布莱克、安布莱图斯城堡虽然军队、军资、粮秣充足，但都被攻陷。^① 他突袭博棱堡不克；但要塞部队看到其他城堡都已经陷落，自觉无法据守，便拆毁工事，退回布洛涅。秋季阴雨连绵，法军大营瘟疫流行；法王亨利丧失了袭取布洛涅的一切希望，返回巴黎。^② 他留蒂永勋爵加斯帕·德·科里尼统率军队，命令他初春前完成了围困。由于海军上将科里尼的缘故，这个名字后来非常著名。科里尼积极行动，冬天就完成了围困；守军几次突围，完全徒劳无功。

斯托茨统率法军舰队和帆船，企图袭击泽西；但遭遇英军舰队。战斗爆发，但没有决定性的胜负；因为两国史家各执一词。^③

英法两国一开战，护国公就着手加强英格兰和查理皇帝的联盟。他派国务秘书佩吉特前往布鲁塞尔，协助英国常驻大使菲利普·霍比爵士谈判。布鲁塞尔是查理宫廷的驻地。但这位君主的计划是：扮演天主教斗士的角色，借

① Thuanus, lib. vi. c. 6.

② Hayward, p. 300.

③ Thuan. King Edward's journal, Stowe, p. 597.

以扩展自己的领地。他虽然很希望跟英国结盟，反对老对手法兰西；但英格兰已经跟罗马教会断绝一切关系，他跟这样一个国家紧密联盟，不利于其觊觎其他地方。因此他拒绝英格兰的友谊，避见大使。霍比在一封信中保存了这次谈判的确切记录。值得注意的是：皇帝跟英国大臣谈判时，宣称英格兰国王的特权比法兰西国王更广泛。^① 贝尼特保存了这封信。作为类似例证，他补充了一项异议：如果苏格兰女王嫁给爱德华，他们的特权就会被英格兰更大的特权吞没。^②

萨默塞特见皇帝的援助已经无望，便有意跟苏格兰和法兰西议和。他觉得：非但无法支持下去这样破坏性的战争，而且敌对行动的目的已经不复存在了。苏格兰人已经送走了女王；即使她曾经有可能嫁给爱德华，现在已不可能了。1554年，亨利八世已经约定归还布洛涅。预期条约几年内就会执行，不成问题。但当他向枢密院提出这些理由时，却面对政敌的强烈反对。他们极力反对一切和平建议，批评他正是因为他的无能才导致失败。事情这样发展下去，给护国公的权威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萨默塞特获得摄政权特许状以后，不再注意其他顾命大臣和枢密的看法。尊贵的地位和平基的大捷使他得意忘形，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在一切事务上唯他马首是瞻。护国公对所有不完全忠心的人不屑一顾，对忤逆他意志的人报以愤怒或轻蔑。^③ 他决心日理万机，可惜处处志大才疏。沃里克更狡诈阴柔，虽内多欲而外饰仁义。他联合重新获准进入枢密院的南安普敦，形成了强大的朋党。这个朋党决心推翻护国公对他们的压迫，以求扬眉吐气。

枢密院异议派发现邦国形势有利于他们的策划——萨默塞特似乎偏爱人民，这引起贵族绅士不满。他们认为：最近受到的伤害都应该归咎于护国公优

① Burnet, vol. ii. p. 132, 175.

② Idem, p. 133.

③ Strype, vol. ii. p. 181.

柔寡断，貌似支持民众。他们担心：护国公目前爱惜民望，可能引起同样的动荡。萨默塞特为了救济民困，已经在自己的宅第里建立法庭。^① 他为人民的利益干预司法。如果当时任何特权配得上非法的称谓，护国公的举措无疑当之无愧。他这种做法扩张了权力，在政治上似乎更不明智；因为他得罪了贵族，而贵族是君主国权威最可靠的支持者。

萨默塞特虽然讨好民众，跟他们利害与共，却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回报。天主教派仍然在下层阶级中保持影响，是他公开的敌人，抓住每一个机会非难他的举措。他的弟弟被剥夺公权、明正典刑，影响极为恶劣；他将外国佣兵引入国内，招人反感；他牺牲教会和王室的利益，突然广置田宅，因此臭名昭著；他在斯特兰德大街大兴土木，府邸富丽堂皇；凡此种种，路人侧目。为了给他的府邸提供土地和材料，圣玛丽教区推倒了三位主教的宅第。护国公如此亵渎神明，仍然不知餍足。他还计划拆毁圣玛格丽特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为自己的府邸提供石料；但教区居民大噪，赶走了护国公派来的商人。他随后又对圣保罗墓园小教堂和附属修道院、停尸所下手。这些建筑物和耶路撒冷圣约翰大教堂都用在他的豪宅上。甚至死者的坟墓和其他纪念碑都遭到拆毁，尸骨迁往未经祝圣的地方，人民因此对他更深恶痛绝。^②

萨默塞特的敌人注意到他所有这些轻率的举动，决定加以利用。枢密院长圣约翰勋爵、沃里克伯爵、南安普敦伯爵、阿伦德尔伯爵和另外五位枢密在伊利宫集会，僭取了枢密院一切权力；他们指责护国公造成了所有的弊政和不幸，决定撇开他自行施政。他们致信英格兰主要贵族和绅士，通知他们目前的举措，要求他们协助。他们召来伦敦市长和市议员；命令后者只服从他们的命令，无视萨默塞特公爵任何相反的命令。他们向伦敦塔典狱长发布了同样的禁令，典狱长表示服从。第二天，大法官里奇、北安普敦侯爵、什鲁斯伯里伯

① Ibid. p. 183.

② Heylin, p. 72, 73. Stowe's Survey of London. Hayward, p. 303.

爵、托马斯·切尼爵士、约翰·盖奇爵士、拉尔夫·萨德勒爵士、首席法官蒙塔古加入枢密院异议派，一切发展都不利于护国公的权威。萨默塞特派秘书佩特里跟枢密院谈判，佩特里却宁可站在枢密院一方。市议会众口一词支持新政，通过了表示拥护的决议。^①

护国公一得知众枢密背弃他，就将国王从他驻节的汉普顿宫移驾温莎，将朋友和仆人武装起来，似乎准备跟所有敌人决一死战。但他发现：除了克兰默和佩吉特，没有任何有身份的人拥护他。人民也没有响应他的号召。伦敦市和伦敦塔公开反对他。甚至他最好的朋友都抛弃了他。他丧失了一切成功的希望，只好向敌人请求宽恕。他泄气的消息一传出去，罗素勋爵、下议院发言人约翰·巴克爵士和其他三位枢密迄今仍然保持中立的枢密就倒向沃里克一方。现在，人人都认为伯爵大局已定。枢密院通告天下，昭示举措和心迹。他们为了同样的目的，致信玛丽和伊丽莎白两位公主。他们以最谦卑的措辞，向国王表示忠心不贰。他们说：他们受先王重托，在国王成年前襄赞国务。他们选择萨默塞特任护国公，是有明确的限制条件的——萨默塞特应该遵循他们的建议和指示。护国公篡夺了一切权威，不仅事事无视，甚至忤逆他们的建议。他狂妄无天，发展到陈兵对抗枢密院、劫持陛下御体的地步。因此他们请求获准觐见陛下，以便陛下得以恢复他们的顾问身份、打发走萨默塞特的仆人，以大快君心。他们的要求获得同意。萨默塞特只求保证从轻发落。但他和一些朋友、党羽都被送进伦敦塔，^②包括塞西尔。塞西尔后来受到引诱，转而为控方作证，因此大名鼎鼎。^③ 萨默塞特篡夺政府、独揽事权的主要证据，至少最佳证据就是由塞西尔提供的。特许状授予他绝对权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条款从来没有用来反对他，原因显然是：根据当时的观念，这种权力在某种

① Stowe, p. 597, 598. Hollingshed, p. 1057.

② Stowe, p. 600.

③ Burnet, vol. ii. book i. coll. 46. Hayward, p. 308. Stowe, p. 601. Hollingshed, p. 1059.

程度上涉及摄政权。

天主教徒对这次革鼎欢欣鼓舞，因为他们认为萨默塞特的权威应该为最近所有的宗教改革负责。他们希望：护国公倒台是为复辟古老宗教开辟了道路。但沃里克目前主导枢密院，对所有这些争议漠不关心。他发现：爱德华国王沉溺于改革派观点，不易动摇；决定投幼主所好，不拿新获得的权力冒险。他注意一开始就表示支持改革派。他让天主教徒的首脑南安普敦大失所望，并把其视为危险的对手。这位心高气傲的贵族只得退出枢密院，不久就死于愤怒和沮丧。其他赞同改革派的枢密加官晋爵——罗素封贝德福德伯爵；北安普敦出任大冢宰；温特沃斯勋爵出任内大臣，还赏赐斯特普奈和哈克尼两处庄园，都是从伦敦教区划给他的。^① 亨利遗嘱指定国会通过的顾命大臣名单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但主要成员都是萨默塞特的朋友，他们的权威来源现在已经宣布为非法和篡夺。摄政委员会的组成没有遵循遗嘱，但当时的英格兰几乎不理解，更不用说尊重这些细枝末节了。

新一届国会召集。国会照例会默认每一个既存的权威。因此枢密院并不担心这方面的反对，且更有理由期待国会支持他们的权威。萨默塞特接受劝诱，跪在枢密院面前，承认指控他的所有罪状。他把这些罪行归諸鲁莽、愚蠢和轻率，没有任何恶意。^② 他甚至签署了认罪书。认罪书提交给国会。国会成立委员会审查他，投票通过决议，罢免他所有官职，一年罚款两千镑。圣约翰勋爵接替他的大司库职位，沃里克伯爵接替他的大司马职位。他受到的迫害到此为止。国王豁免了他的罚款，他获得释放。沃里克认为：他现在已经足够卑屈，他最近温顺和怯懦的行为已经大大削弱了他的权威，因此重新接纳他加入枢密院，甚至跟他的家族联姻。沃里克的儿子达德利勋爵迎娶了萨默塞特

① Heylin, p. 85. Rymer, tom. xv. p. 226.

② Heylin, p. 84. Hayward, p. 309. Stowe, p. 603.

的女儿简·西摩。^①

本届国会通过了一项镇压暴乱的严厉法律。^② 法案规定：十二人以上为国事集会，经法官要求而拒绝解散，即构成大逆罪。未经合法当局准许，破坏树篱或践踏圈地栏，就构成重罪。图谋杀害枢密者同罪。

各位主教请愿说：世俗法庭侵夺了他们所有的权力，目前教会法规形同具文。他们不能传唤冒犯者，不能惩罚恶行，不能推行信纲。他们声称：随着主教权威减少，不道德行为大受鼓励、与日俱增。有些主教开出的药方是：恢复原始教会的禁闭悔过制。但其他人认为：这样的权威托付给主教，会比罗马迷信发明的忏悔、赎罪之类更有压迫性。国会这时授权国王指定一个三十二人委员会，编辑确实可靠、但国会未曾批准的教会法规。他们这样含蓄地表示信任国王，不考虑这些教会法规是否会影响了他们的所有自由和财产。但，国王还没有御准新教规就去世了。^③

约翰·夏林顿爵士在西摩勋爵案中贪腐渎职、臭名昭著，国会剥夺了他的公权。^④ 此君开始谋求更激进改革派的青睐；拉蒂默主教断言：他以前虽然是臭名昭著的流氓，现在已经改过自新，变成非常诚实的人。

沃里克的摄政委员会开始行使权力，发现自己面临以前困窘护国公的同样问题。国库空虚，无法支持法兰西和苏格兰两处战争。战争对一个分裂的国家而言似乎是危险的。即使大获全胜、连战皆捷，这场战争仍然达不到任何目的。萨默塞特议和，给他们提供了鼓噪反对政府的借口。然而，他们派托马斯·切尼觐见皇帝，请求他保护布洛涅，结果徒劳无功，还是只得听取法王亨利的提议。亨利派一位佛罗伦萨商人，取道圭多提运河，把提议交给英国人。贝德福德公爵、约翰·曼森、佩吉特和佩特里奉命前往布洛涅，全权谈判。法

① Hayward, p. 309.

② 3 and 4 Edw. VI. c. 5.

③ 3 and 4 Edw. VI. c. 2.

④ Ibid. c. 13.

兰西国王断然拒绝支付拖欠的两百万克朗年金，这笔年金是法兰西先王答应付给英格兰王室的。亨利说：他绝不会同意向任何君主纳贡；但他同意为布洛涅支付至少四十万克朗作为直接补偿，立刻支付一半、明年六月支付另一半。他提供六位人质，以保证执行这个条款。条约将苏格兰包括在内：英国人应该归还劳德和道格拉斯，平毁洛克斯堡和埃尔茅斯要塞。^① 条约一旦签订，英法两国就可以结成亲密同盟。亨利乐于结盟，因为这种联盟非常符合他的利益和倾向。一段时间后，爱德华和法兰西公主伊丽莎白缔结婚约。双方稍经谈判，就确定了所有条款，^②但这个婚约永远没有生效。

亨利猛烈迫害法国新教徒，英国新教徒并不乐意接受英法联姻。不过枢密院在所有其他方面不断推进宗教改革，施行敌视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几位大主教仍然执迷于圣餐，他们虽然承诺推进新法，以便保住教区，但尽可能安全地拖延时间，支持疏忽或倔犟的圣俸领取者。因此，当局决心寻找到罢免这些主教的借口。这个意图更容易实现，因为主教接受委任时，都有义务宣布：他们的教区只源于国王的恩典。当局为了杀鸡儆猴，从加德纳开始下手。他受到猛烈的迫害，几乎没有任何法律和正义的色彩。当局命令他在布道中教导：即使国王尚未未成年，臣民也有服从国王的义务。他置之不理，就被投入监狱。他入狱两年；除了不服从武断命令以外，没有任何罪名。这时，萨默塞特公爵、佩特里秘书和其他几位枢密都受命试探他，寻找罢免他的依据。加德纳告诉他们：他的意图是服从政府、支持国王的法律、根据新祷文主持法事。他们大失所望。^③ 因此，当局派去了新代理人，要他签署几项条款：承认以前行为不当，承认监禁公正合理。还有，国王是教会的至高首脑；规定或取消宗教节日是王室特权的一部分；公祷书是神圣的、值得赞美的形式；幼主享有完整的

① Burnet, vol. ii. p. 148. Hayward, 310, 311, 312. Rymer, vol. xv. p. 211.

② Hayward, p. 318. Heylin, p. 104. Rymer, tom. xv. p. 293.

③ Heylin, p. 99.

君权；废除六款法律正当合理；国王有充分权威纠正、改革教会的信纲、管理和教义。主教愿意签署，只有第一条例外——他坚持说他没有恶意，宣称他不能承认莫须有的罪过。^①

枢密院发现他已经走到这一步，决定增加他的困难，以免他完全屈服。他们精心选择了自以为最难消化的条款，要他签署。他们不满足这样严厉的做法，还是坚持要他屈服，承认过去的错误。他们为了尽可能侮辱他，要求他承诺推荐、出版讲坛布道集。但加德纳明白：他们的意图是毁掉他或羞辱他，也许二者皆有，便决定不再满足敌人的要求。他仍然坚持无辜，要求公正的审判；除非获释，拒绝签署更多的条款。为了这种莫须有的冒犯，他的主教职位暂停了三个月。他并不比以前更听话，因此当局指派了一个委员会审判他，其实就是给他定罪。委员会包括：大主教；伦敦、伊利和林肯主教；佩特里秘书；詹姆斯·黑尔斯爵士和其他一些律师。由于委员会没有任何法律或成例为依据，加德纳拒绝承认其合法性。他想通过委员会向国王申诉，但无人理睬。委员会判他有罪。他丧失了主教区，遭到软禁。他的簿册和文据遭到查抄。他不得跟友邻来往，无法收发信件或消息。^②

加德纳和其他大主教一样，接受了主教职务从属于国王意志的原则。这个原则本身就极其武断、不法，但委员会不愿意利用这种让步，宁可应用某种司法形式。他们这种决心产生了更大的不公和苛政。但改革派的横暴并没有到此为止。奇切斯特主教戴伊、伍斯特主教希瑟、埃克塞特主教沃伊西都以抗命为借口，被剥夺了主教辖区。甚至兰道夫主教克曾、索尔兹伯里主教卡彭、考文垂主教萨姆森虽然事事顺从，当局仍然认为他们不够热忱，因此他们只得牺牲教区大部分岁入，向贪婪的廷臣行贿、求庇。^③

① Collier, vol. ii. p. 305, from the council books. Heylin, p. 99.

② Fox, vol. ii. p. 734, & seq. Burnet, Heylin, Collier.

③ Goodwin de praesul Angl. Heylin, p. 100.

这些掠夺者甚至不放过最细微的利益。枢密院下令清洗威斯敏斯特图书馆所有有关弥撒、传奇和其他迷信的文献，且把装饰品交给安东尼·奥切爵士。^① 因为许多书镶嵌金银和奇形怪状的饰品，这些装饰品可能会召来迷信的罪名。牛津图书馆同样惨遭蹂躏。书籍和手稿遭到同样的破坏。神学文献由于装潢富丽，因而遭劫。文学著作蒙受无益的谴责，几何学、天文学仅仅视为迷信的工具。^② 大学无力抵抗这些野蛮的破坏，因为自身随时也有被抄没之虞，何况沃里克伯爵及其同僚对大学的岁入虎视眈眈。

人人都向枢密院的权威臣服，只有玛丽女士例外。她继续坚持做弥撒，抵制新祷文。当局有时默许她的做法，但最终逮捕了她的两位教士。^③ 公主自己由于抗命而受到规劝。枢密院致信给她，试图改变她的看法、说服她相信：她的宗教观点没有充分依据。他们问公主：用外语祈祷、使用圣像、为死者行圣礼，在《圣经》中有什么依据？他们希望公主仔细研读圣奥斯丁和其他古代神学家的著作；由此她一定会看出罗马迷信的谬误，证明这种教义的基础无非是虚假的奇迹和编造的故事。^④ 玛丽女士顽固地反对所有这些建议，宣称宁死也不背教。她说：她只怕自己配不上为神圣的目的而殉道。至于新教书籍，她感谢上帝，因为她从来没有读过，也从来都不想读。她担心进一步受迫害，打算投奔亲戚查理；但计划失败，未能成行。^⑤ 皇帝代表公主提出抗议，甚至威胁说：如果她的信仰自由得不到保障，帝国就会采取敌对行动。但枢密院明白：王国现状无法支持一场光荣的战争，急欲妥协。他们发现：国王很难被说服，因为他受改革派教育，痛恨弥撒和其他天主教仪式，以及视为亵渎神明的偶像崇拜。爱德华以为：他如果接受皇帝的条件，就无异于共犯。最后，克兰默、雷

① Collier, vol. ii. p. 307, from the council books.

② Wood, hist. & antiqu. Oxon. lib. 1. p. 271, 272.

③ Strype, vol. ii. p. 249.

④ Fox, vol. ii. Collier, Burnet.

⑤ Hayward, p. 315.

德利、伯奈特勉强说服他同意。国王流下了眼泪，悲叹姐姐的顽固，自叹命苦：只能坐视她继续这种可憎的崇拜。

当时新教各派最大的公敌就是天主教派，准确地说就是教皇的支持者。他们视天主教为共同的敌人，时刻威胁福音信仰、用火与剑毁灭他们。新教各派还没有余暇来区分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异。后来，他们为这些分歧大动干戈，把王国弄得四分五裂。布塞尔、彼得·伯铎和其他几位在当时颇有声望的路德派神学家在德国受到皇帝的迫害，并接受劝诱，到英格兰避难。他们在英格兰获得保护和鼓励。波兰贵族阿拉斯科被严格的天主教派从祖国驱逐出境，在东弗里斯兰的埃姆登居留了一段时间，在改革派的圣会上传道。他预见到迫害会随之而来，就跟圣会一起迁往英格兰。枢密院鉴于他们是勤勉、有益的人民，希望招徕类似的移民。因此，不仅把奥古斯丁修道会教堂拨给他们做法事，还颁布宪章，为他们组成法人团体，包括一位主祭和四位助理。这种教会组织完全独立于英格兰教会，仪式和礼节各不相同。^①

新教徒这些分歧为天主教的胜利提供了口实。天主教徒坚持：人们一旦离开教会，就会丧失一切辨别真伪的尺度，四分五裂、莫知所从。每一个新教派别都不断分化出更多的教派，给他们提供了同样的论据。英格兰公祷书重新修订，删除了一些引起争议的礼仪。^② 教义信纲或宗教玄学简约为四十二条，意在避免进一步的教派分裂和衍生。信纲的编辑工作推迟到主祷文确定后，人们公认主祷文对人民更可靠。信仰告白宣示了地狱的永罚，且留心于谆谆教导：无论异教徒多么善良有德，都逃不了残酷的永罚。而且，任何人妄议坚持异教徒可能得救，自己就会面临永罚。^③

枢密院的神学热忱貌似激烈，但并没有使他们忽略世俗利益；在他们心目

① Mem. Cranm. p. 234.

② Mem. Cranm. p. 289.

③ Article xviii.

中，世俗利益永远至高无上。他们甚至有暇关注公益。不仅如此，还关注国家的对外贸易。当时，外贸还没有引起普遍的研究和关注。古老英格兰的贸易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主要是汉萨同盟或所谓东岸商人。亨利三世为了鼓励这些商人在英格兰定居，让他们组成法人团体，颁发特许状，授予他们特权，免除其他外侨需缴纳的重税。英国人对贸易一无所知。晚至爱德华一朝，几乎全部贸易都落入通称的院商手中。他们自然雇用本国商船，英格兰海运业因而奄奄一息。枢密院因此有意寻找借口，废除他们的法团特权——他们的特权允许他们的税率差不多跟英国人相同。当时，这些特许状源于国王的绝对权力，因此由同样的权威予以废除，人们不会感到惊讶。吕贝克、汉堡和其他汉萨城镇几次提出抗议，反对这次改革；但枢密院不为所动，国民获益不久就显而易见。英国商人身为土著，在衣料、羊毛和其他商品贸易上胜过了外商。不过，到那时为止，这些优势还不足以唤起他们的工业，不足以使他们跟这些富有的公司竞争。当外国人必须一致缴纳关税时，英国人就受到诱惑，涉足商业。王国开始出现工业的精神。^①

大约与此同时，英国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埃里克森签订条约，规定：如果他将金银锭运到英格兰，就可以出口英国商品，不用付关税；他不得向其他君主出口金银锭；如果他向英格兰出口钢铁铜矿之类，就可以出口英国商品，跟英国人付同样的关税；如果他向英格兰出口其他货物，就可以自由交易，跟外商付同样的关税。^② 瑞典运来的金银锭虽然为数不多，铸币厂却能用这些原料铸出良币。能使以前提到的劣币收回销毁。良币非常有利于贸易发展。

但所有这些促进工业的计划都不大可能起作用，原因在于担心沃里克的野心引起内乱。这位贵族不满足于他已经获得的地位，纠集党羽；这些人在所有的事业中都会支持他。诺森伯兰末代伯爵死而无嗣；他弟弟托马斯·佩尔

① Hayward, p. 326. Heylin, p. 108. Strype's Mem. vol. ii. p. 295.

② Heylin, p. 109.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西爵士牵涉前朝约克党人叛乱，被剥夺了继承权。伯爵门第现已绝嗣，领地由王室收回。沃里克攫取了这些丰厚的产业，这些领地大部分位于北方、王国最尚武的地区。他享用诺森伯兰伯爵的尊号。他的朋友、大司库圣约翰勋爵鲍勒特首先封为威尔特郡伯爵，然后封为温切斯特侯爵。威廉·赫伯特爵士封为彭布洛克伯爵。

但诺森伯兰新伯爵野心勃勃，认为自己和同党获得的财产和爵位不过是通向更远大目标的一个步骤。他发现：萨默塞特虽遭贬谪，因怯懦为公众所轻，但仍然颇孚民望。他认为：此人是实现希望的障碍，必须斩草除根。两家联姻缺乏诚意，只能让诺森伯兰更准确地毁掉对手。北安普敦秘密收买了这位不幸贵族的朋友和仆人。接着，有时用危险的表象恐吓他，有时用不法手段刺激他。萨默塞特毫无防备，经常有威胁诺森伯兰的表示。另外几次，他形成了轻率的计划，随即抛弃。他背信弃义的朋友向敌人报告了他随口说出的每一句气话。甚至于他们自己为萨默塞特出谋划策，然后泄露这些计划。^① 诺森伯兰现在觉得时机已到，开始公开反对他。

一天晚上，萨默塞特公爵、格雷勋爵、大卫和约翰·西摩、公爵的仆人哈蒙德和纽蒂格特、拉尔夫·维恩爵士、托马斯·帕尔默爵士被捕拘押。第二天，萨默塞特公爵夫人及其宠儿克兰夫妇、迈尔斯·帕特里奇爵士、迈克尔·斯坦霍普爵士、班尼斯特和其他人被捕入狱。托马斯·帕尔默爵士一直在刺探萨默塞特，指控他阴谋煽动北方叛乱，约期攻取伦敦塔，发动伦敦暴乱。他还声称：萨默塞特很可能策划在宴会上谋害诺森伯兰、北安普敦和彭布洛克。佩吉特勋爵给他们送来了邀请。克兰夫妇证实了帕尔默提出的最后一个阴谋。似乎确实有过某种轻率的策划，但没有形成正式的阴谋，也没有准备施行。哈蒙德承认：一天晚上，公爵让武装人员保卫他的格林威治宅第。

^① Heylin, p. 112.

萨默塞特受到大司寇温切斯特侯爵的审判。二十七名贵族组成陪审团，诺森伯兰、北安普敦和彭布洛克都在其中。他们如果稍有自重，就不会在主要敌人的案子里担任法官。萨默塞特被控：策划叛乱，大逆不道；谋害阁臣，罪大恶极。

那时所有政治案件的记录都支离破碎。但本案似乎比以往的所有类似案件都更规范。枢密院至少盘问过证人，但他们既没有出庭，也没有跟被告对质（这些都是严格的公正准则所必需的条件）。证人的口供提交给陪审团。证据显然残缺不全，不足以支持大逆罪。萨默塞特辩护有理，贵族们的裁决对他有利。谋害阁臣的证据还站得住脚，陪审团判他刑事罪成立。被告自己承认：他曾表示谋害诺森伯兰和其他几位勋爵的意图，但没有形成真正的计划。他接到判决时，向他企图谋害的贵族请求宽恕。人民爱戴萨默塞特，听说他免于大逆罪，欢声雷动；但听到他因刑事罪被判处死刑，欢呼声突然沉寂下来。^①

诺森伯兰的间谍留心挑唆国王反对他舅父，不让萨默塞特的朋友接近他，以免他心软。他们用连续不断的消遣和娱乐麻痹国王。最后，犯人在塔山伏诛。观者如山，衷心同情他；直到最后一刻，仍然希望他遇赦。^②许多人冲过去，用手帕蘸他的血，作为珍贵的圣物长期保存。不久后，诺森伯兰落得同样的下场，许多人斥骂他的残暴，让他看自己的罪证。确实，萨默塞特一生有许多可议之处，但大体而言，理应有较好的命运。他的错误源于软弱，而非恶意。他的美德更适合私生活，而非公共事务。他缺乏洞察力和毅力，很容易陷入当时盛行的阴谋和暴行中。托马斯·阿伦德尔爵士、迈克尔·斯坦霍普爵士、迈尔斯·帕特里奇爵士、拉尔夫·维恩爵士和萨默塞特的全部朋友都受审、定罪、伏诛。他们的审判显然极为不公。公爵的冢宰佩吉特勋爵根据某些借口，受到星室法庭审判，判处六千镑罚款、罢官退职。当局为了进一步打击他，夺

① Hayward, p. 320, 321, 322. Stowe, p. 606. Hollingshead, p. 1067.

② Hayward, p. 324, 325.

去了他的嘉德勋位；理由是：他出身寒微，配不上如此殊荣。^① 大法官里奇勋爵对萨默塞特有过友谊的表现，也被迫辞职。

萨默塞特伏诛后，新一届国会召集。本届国会进一步推进宗教改革，确定新仪式，颁布法令：惩罚任何不参加公共仪式的人。^② 禁止弥撒，违者严惩不贷。由此可见：无论改革派给自己的个人判断留了多大余地，他们跟古老宗教争论教义时，也绝不容许其他人享有同样的特权。当时所有教派和党派都不理解宽容的做法，更不用说宽容的原则。法官通常认为：宗教异议质疑他的资格、反叛他的权威，属于犯罪行径。

国会颁布了一条反对高利贷的法令，其实就是禁止收取任何利息。^③ 这是古老迷信的遗痕，但本身极不公正，对贸易非常有害，后来在伊丽莎白即位第十二年被废除。虽然法有明文，但当时的普通利率仍为百分之十四。^④

阁臣向上议院提出议案，恢复严厉的大逆法。这项法律已经在本朝初年废除。贵族身居高位，最有可能受到政治风暴的触动，但他们既不考虑公共安全，也不考虑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通过法案，只有一票反对。^⑤ 但下议院拒绝，准备了一份新法案，予以通过。法案规定：任何人称前朝第三十五年法案规定的国王及其继承人为异端、分裂派、暴君、异教徒、篡位者，初犯应该没收全部动产、监禁；再犯坐大不敬罪；第三次坐大逆罪。但如果任何人轻率地通过写作、印刷、绘图、雕塑、雕刻诽谤君上，初犯即以叛逆论处。^⑥ 值得注意的是：国王及其顺位继承人玛丽女士的宗教信仰不同，相互指责对方为异端、分裂派、偶像崇拜者、亵渎神明、无信仰、邪恶和宗教热忱发明人等的种种污名。因此，人民只要谈到这些题目，不可能不受严惩。下议院虽然关心自由，拒绝

① Stowe, p. 608.

② 5 & 6 Edw. VI. c. 1.

③ Ibid. c. 20.

④ Hayward, p. 318.

⑤ Parliamentary Hist. vol. iii. p. 258. Burnet, vol. ii. p. 190.

⑥ 5 & 6 Edw. VI. cap. 2.

了上议院提交的大逆法，但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积极、警醒和明见。

下议院给法案增加的补充条款比法案本身更重要：除非有两名证人当着被告面前宣誓作证，不得判任何人犯有大逆罪。虽然法案明显符合公正的原则，上议院还是经过一段时间后，才犹豫不决地通过了这项法案。贵族保护目前的个人利益和权力，却忽视了法律保证的最高贵、最持久的安全。

上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目的是救济穷人。但下议院决定：财政法案不应由上议院发起。他们拟定了目的相同的新法案——新法案授权教区募集慈善捐款。如果任何教区拒绝支付福利，或是劝阻其他人支付，主教有权控告他们。如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委托给主教，自然引起上议院的猜忌，因为他们自以为这是自己的职权。^①

国会还有一次对主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信任：授权他们起诉不守星期日和宗教节日的人。^② 不过，这些只是疏忽大意的让步。时代的普遍倾向是剥夺教会的一切权力，甚至掠夺他们的产业。当时许多教士为了生计，改做木匠、裁缝，甚至开酒馆。^③ 主教们通常沦落为赤贫，岁入和神职都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

达勒姆主教汤斯达尔是当时最杰出的教会长老之一，这主要因为他个人的品德：博学、温和、仁慈、博爱，而非他的教区职位。他凭借投票和威望，反对每一次宗教改革；但改革一旦确定，他总是服从、遵守所有神学体系。他为人正直，众所周知，因此人们没有将他的服从归因于贪图利禄、趋炎附势，而是归因于责任感。他出于责任感，认为一切个人观点都应该为公共和平和安宁而牺牲。他的人格受到普遍尊重，保护他没有在萨默塞特执政时期受到严厉的迫害。但诺森伯兰一掌权，就将他投入监狱，因为这位贪婪的贵族计划攫取达

① 5 & 6 Edw. VI. cap. 2.

② Ibid. cap. 3.

③ Burnet, vol. ii. p. 202.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勒姆教区的岁入，并入他在北方各郡的领地。他为了这个目的，决心夺取汤斯达尔的教区。因此，上议院借口知情不报叛逆罪，通过了针对主教的剥夺公权法案。反对者只有斯托顿勋爵和克兰默大主教。斯托顿是热忱的天主教徒；克兰默一直是达勒姆主教热心、诚挚的朋友。但法案提交下议院时，议员要求：审查证据；准许汤斯达尔自辩；双方对质。这些要求没有获准，他们就否决了法案。

当时的国会很少如此公正，原因不在于诺森伯兰及其党羽尊重自由和公正，而在于萨默塞特的党羽遍及下议院。上议院通过了剥夺萨默塞特及其同党公权的议案，下议院却予以否决。这时，他们更坚定了这个观点。因此，他们决定解散与本朝一起开始的本届国会，不久后召集了一届新国会。

诺森伯兰为了确保下议院言听计从，冒险采取权宜之计——如果时代对自由的理念有丝毫领会，这样措施就根本无法想象，更不用说实施了。他安排国王致信各郡郡长，嘱咐他们通知世袭地产保有人，选出有知识、有经验的人做代表。国王首先泛泛劝诫，然后接着说：“不过，如果枢密阁臣或是代表我们的任何人在其辖区内推荐博学睿智之士，你们应该尊重并遵循他们的指示，因为我们的目的相同：让王国内最适合提供建议和忠告的人组成国会。”^①国王送来几封信，推荐各郡候选人。汉普顿郡是理查德·科顿爵士；伯克夏郡是威廉·菲茨威廉爵士和亨利·内维尔爵士；萨福克郡是威廉·德鲁里爵士和亨利·本宁菲尔德爵士。虽然有些郡只收到国王的“选举许可令”，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枢密院和阁臣推荐候选人的做法范围更大，甚至可能遍及全国。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发生在幼主时期，这时王权通常最为软弱。

国会满足了诺森伯兰的期望。这时，由俗人组成的委员会审判汤斯达尔，剥夺了他的教区。国会通过法案，将达勒姆教区及其岁入一分为二。国王将

^① Strype's Ecclesiastical Memorial, vol. ii. p. 394.

教区的权力，包括帕拉丁伯爵的司法管辖权，授予诺森伯兰。无疑，这位贵族也有意掠夺丰厚的教区岁入。只要主教辖区虚悬，当时的廷臣通常都会这么做。

下议院向大臣矢忠，采取了当时最诚挚、热忱、难得的措施——他们批准了两份补助金和十五分之二税。他们为了使这份礼物更合大臣的口味，投票通过一篇序文，其中长篇大论地指控萨默塞特“将国王卷入战争；靡费御库；大笔举债；大铸劣币；引起最可怕的叛乱。”^①

王室当时负债累累。国王割让布洛涅，从法兰西获得四十万克朗。他出售附属教堂土地以筹款。枢密院没有任何法律和公正的借口，将教会所有贵重器皿、饰品熔化，用于王事。^② 然而，贪婪的廷臣大肆掠夺，王室负债达三十万镑。^③ 同时，王室领地荒残已甚。年轻的国王颇有俭德，试图挽回这些损失，但他的身体迅速恶化，大限不远。诺森伯兰的野心随之而生，但国库空虚对他是一个明显的障碍。

国王年幼、病重，容易受人影响。诺森伯兰向他提议：国会法案已经宣布他的两个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为私生女。虽然亨利国王的遗嘱重新将她们纳入继承顺序，但国民绝不会允许私生子窃据英格兰王位。她们跟国王同父异母，即使是婚生女，也不能继承他的王位。先王的遗嘱排除了苏格兰女王，因为她是外国人，依法不能享有继承权。更不用说，她许配给法兰西王太子，已经把苏格兰变成了法兰西的行省。如果让她继承王位，英格兰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如果他姐姐玛丽或是苏格兰女王继承王位，肯定会废除新教，撤销有利于宗教改革的法律，重建罗马天主教的僭越和偶像崇拜。英格兰幸甚，公正的继承顺序正是最符合公共利益的继承顺序。任何一方都没有怀疑或顾虑的

① Edw. VI. cap. 12.

② Heylin, p. 95, 132.

③ Strype's Ecclesiastical Memorials, vol. ii. p. 344.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正当理由。三位公主都有排除继承资格的可靠理由,继承权就要归于(前王御妹)法兰西王后和萨福克公爵的长女多塞特侯爵夫人,侯爵夫人的顺位继承人是简·格雷女士。她为人最为和蔼可亲,受过最好的文学和宗教教育,各方面条件都配得上王位。即使她的王室血缘很成问题,但国王也可以理直气壮地主张:他享有先王同样的权力,可以颁布特许状,将王位传给她。

这些理由打动了年轻的国王。尤其是,他热心于新教的事业,担心姐姐玛丽继位的后果,因为玛丽仍然愚忠于天主教。国王对伊丽莎白公主怀有温情,公主也没有教派的问题;但大臣自有办法说服他:以私生子为理由排除了一个姐姐,就能同样排除另一个。

诺森伯兰发现他的论据似乎对国王很起作用,便继续推行下一部分计划。萨福克公爵二子死于汗热病,门第绝嗣。诺森伯兰安排国王把萨福克爵位赐予多塞特侯爵。他借助诸如此类的施恩,说服诺福克新公爵夫妇将女儿简女士嫁给自己第四个儿子吉尔福德·达德利勋爵。他为了进一步加强姻盟,商议将萨福克的二女儿凯瑟琳·格雷女士嫁给彭布洛克伯爵的长子赫伯特勋爵。他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亨廷顿伯爵的长子黑斯廷斯勋爵。^① 这几次婚礼铺张绚丽,盛况空前。人民痛恨诺森伯兰,看到他在幼主垂危之际公然欢庆,怒形于色。

爱德华去年患麻疹,继而合并天花,但他已经痊愈。举国期望这些疾病只会增强国王的体质。国王后来巡视王国某些地区,可能在运动中过于劳累。他患上咳嗽,经久不愈;调养无功、药石无灵,出现致命的肺痨征象。人民关切地看到他日渐憔悴萎弱。国民普遍热爱年轻的国王,憎恶达德利。他们注意到:自从达德利担任近侍起,国王的身体就每况愈下了。

爱德华日薄西山,诺森伯兰更加跃跃欲试。他将君侧侍从全部换成了自

^① Heylin, p. 199. Stowe, p. 609.

己的间谍，同时亲自侍奉君王，殷勤备至。他假装非常关心国王的健康和福利。他用尽花言巧语，最终同意了拟议的计划。枢密院召集首席民事法官爱德华·蒙塔古爵士、法官约翰·巴克爵士和托马斯·布罗姆利和正副检察长，向他们宣读拟议的条款。国王命他们拟成特许状形式。他们犹豫不决，要求给予时间考虑。但他们越考虑，就越清楚遵命的危险性。亨利八世即位就是国会法案的结果。亨利八世一朝初年通过的另一项法案规定：背叛任何王位继承人、图谋另立君主或改变继承顺序皆为大逆，从犯、教唆犯同罪。法官向枢密院申诉这些理由。他们争辩说：这样的特许状完全站不住脚。不仅拟定特许状的法官，连每一位签署特许状的枢密都会深陷大逆罪。新体制要想站得住脚、与谋者要想保证安全，唯一合适的方法就是召集国会，获得国会同意。国王说：他打算以后采取这种方式召集国会，批准他们的体制。但此时此刻，他要求法官忠贞不贰，根据要求的形式，拟定特许状。枢密院告诉法官：他们如果拒绝，就会全体构成大逆罪。诺森伯兰称蒙塔古为叛徒，还说：简女士继位，理据充分正当；他愿意为此跟任何人决斗。一面是法律的威胁，一面是当局近在眼前的凌迫，使得法官左右为难。^①

枢密院和法官几次开会详细论证，但都找不到解决这些困难的途径。最后，蒙塔古提出一项同时满足法官和枢密的权宜之计。他要求：国王和枢密院通过特别委任状，要求法官拟定新王位继承顺序，然后立刻下诏赦免法官遵命可能产生的任何冒犯。特许状交给大法官伊利主教用玺，这位教会长老要求所有法官预先签字。戈斯纳尔德首先拒绝，几经周折才在诺森伯兰的暴力威胁下就范。但詹姆斯·黑尔斯爵士坚定不移，他虽然是热忱的新教徒，这时却将公正置于党派偏见之上，不为一切威逼利诱所动。大法官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接下来要求所有枢密签字。诺森伯兰大获成功——枢密或是鉴于他的

① Fuller, book viii. p. 2.

诡计,或是畏惧他的威胁,接受了这个要求。只有克兰默犹豫了片刻,最后在国王真诚、悲哀的恳求下屈服了。^① 塞西尔当时担任国务秘书,假称他只是见证了国王的签署。于是,国王的特许状排除了玛丽和伊丽莎白两位公主,王位落入萨福克公爵夫人一脉。公爵夫人同意让位给女儿。

特许状签订后,爱德华多灾多难、日见憔悴。根据诺森伯兰的建议和枢密院的命令,御医被辞退,情况更加恶化。一位愚昧的妇女照料国王,保证迅速药到病除、御体如昔。国王服药后,所有病情急剧恶化。他感到说话、呼吸困难;脉搏停顿、双腿浮肿、面如土色;种种症状表明大限将临。爱德华在格林威治驾崩,终年十六岁,享国七年。

所有英国史家都称颂年轻君主的懿德——许多真正的美德加上想象的希望,为他赢得了公众怜爱。国王性情温和,好学勤政,热爱正义。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时代精神,他在宗教问题上失之狭隘,多少倾向于偏执和迫害。但新教徒的偏执不像天主教那么受教士支配,更有节制——即使爱德华有更长的寿命,也无须过于担心这个缺点。

① Cranm. Mem. p. 295.

第三十六章

玛丽(一)

简·格雷昭告登基——被国民抛弃——女王昭告登基、获得承认——诺森伯兰伏诛——天主教复辟——召开国会——商议女王的婚姻——女王与菲利普联姻——怀亚特叛乱——简·格雷伏诛——召开国会——菲利普抵达英格兰

爱德华驾崩，玛丽公主的继承权一目了然。简·格雷女士一党新提出的反对意见，举国闻所未闻。虽然所有新教徒，甚至许多天主教徒相信：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之间的婚姻非法无效，但这次婚姻没有任何不正当的意图——由双方父母缔结，经邦国认可，似乎建立在法律和宗教原则的基础上。这些原则在当时占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人想象：他们的后裔应该为此被视为私生子。国会受到亨利的胁迫，为此发布宣言，原因只是亨利一贯的横暴和反复。但君主后来回心转意，恢复了女儿的继承权。她现在享有经国会批准的合法继承权，且公正、自然、一如既往。公众熟知其事，为时已久。终爱德华一朝，公众都认为玛丽公主是他的合法继承人。虽然

新教徒害怕她的偏见，但他们普遍深恶痛绝的对象却是达德利。^① 人们预见到：他会以简的名义，掌握实质的君权，这种危险绰绰有余地抵消了新教派对宗教的忠诚。诺森伯兰最近破坏继承顺序，充分暴露了他的野心和不义。人民一五回顾起他长期以来为这个计划所犯下的欺骗、不义和残暴行径，西摩两兄弟的生命和公主的继承权都将为此牺牲，人们就会义愤填膺，反对这个罪恶的计划。亨利八世余威犹在，促使国民保卫他后裔的权利。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古代内战的酷烈，为了维护合法继承权，甘愿承担流血和杀戮的风险。

诺森伯兰明白：反对不可避免。他小心利用国王，隐藏自己真实的目的。国王去世前，他为了控制两位公主，安排枢密院以国王的名义给她们写信：借口身体虚弱，需要她们陪伴，提供经验和安慰。^② 她们还没有到，爱德华就去世了；但诺森伯兰为了诱使公主落入陷阱，秘不发丧。玛丽公主已到霍德斯顿，离宫廷只有半天路程。幸而阿伦德尔伯爵送来密信，报告她弟弟的死讯和诱捕她的阴谋。^③ 她立刻迅速撤离，首先去诺福克的肯宁大厅，然后去萨福克郡的弗拉明汉姆；她打算万一无法保护自己的继承权，就在那里登船逃往佛兰德。她致信英格兰各郡贵族和主要绅士，命令他们协助保卫她的王权和人身。她送信给枢密院，通知他们：她已经获悉弟弟的死讯，承诺赦免他们以前的罪行，要求他们立刻下令在伦敦为她昭告登基。^④

诺森伯兰发现：进一步伪装已经毫无意义。于是，他和萨福克公爵、彭布洛克伯爵以及其他贵族前往简女士驻跸的锡安宫，^⑤ 以君主之礼迎接新君移驾。简对大部分事务一无所知，闻讯后，哀恸与惊讶不相上下。^⑥ 她为人温厚、性格可爱、多才多艺。她跟先王爱德华同龄，一起受教育，各种刚健和高雅文

① Sleidan, lib. 25.

② Heylin, p. 154.

③ Burnet, vol. ii. p. 233.

④ Fox, vol. iii. p. 14.

⑤ Thuanus, lib. xiii. c. 10.

⑥ Godwin in Kennet, p. 329, Heylin, p. 149. Burnet, vol. ii. p. 234.

学的造诣还略胜一筹。她除了现代语言，还娴于希腊、罗马古典，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对其他跟她性别和地位相称的消遣娱乐没有多少兴趣。伊丽莎白女士的导师罗杰·阿斯卡姆有一天拜访她，发现她正在读柏拉图。这时，家里其他人都在园林里打猎。阿斯卡姆奇怪她为什么宁可读书；她说她从作者那儿获得的愉悦，超过别人从竞技和节庆中获得的愉悦。^① 她全心全意热爱文学和高雅艺术，对丈夫温情脉脉。丈夫不负她的恩爱，从来没有自诩野心的诱惑，明白她丝毫不喜欢称孤道寡。她甚至拒绝劝进，声辩说两位公主更适合登基，表示害怕这种危险举动的后果，希望继续过她一向的隐居生活。她最后禁不住父亲、岳父，尤其是丈夫的恳求而非说理——向他们的意志屈服，放弃了自己判断。然后，英格兰列王登基后的第一天照例在伦敦塔度过，诺森伯兰立刻送新君去那里。全体枢密只得从驾前往要塞，由此事实上变成了诺森伯兰的俘虏，只能服从他的意志。枢密院昭告全国，但只有伦敦和附近地区执行了这些命令。接下来，没有欢声雷动。人民沉默而忧虑地听取着昭告，有些人甚至表现出嘲笑和轻蔑。比如，葡萄酒商的学徒波特因此受到严惩。当局雇用新教传教士，向人民宣扬简的继承权。这些传教士发现自己的滔滔雄辩劳而无功。伦敦主教雷德利为此向公众布道，一无所获。

在此期间，萨福克人民群起拥戴玛丽。他们对改革派教会非常忠心，因此一面尽忠君义务，一面表现出对宗教的担心。但玛丽保证：她从来无意改变爱德华的法律；于是，他们热忱而忠诚地聚义勤王。投奔她的贵族和绅士每天都络绎不绝，增加着她的实力。巴斯伯爵和苏塞克斯伯爵、沃顿勋爵和莫当特勋爵的长子、威廉·特鲁里爵士、亨利·博宁菲尔德爵士、亨利·杰勒根爵士在附近有产业，他们率领佃户、家臣勤王。^② 亨丁顿伯爵的弟弟爱德华·黑斯廷斯奉枢密院命令，在白金汉郡为简·格雷女士征兵。他率领为数达四千人的

① Ascham's works, p. 222, 223.

② Heylin, p. 160. Burnet, vol. ii. p. 237.

军队，投奔玛丽。甚至诺森伯兰派到萨福克沿岸的舰队被风暴赶进了雅茅茨港，也宣布拥戴玛丽。

迄今为止，诺森伯兰因野心而盲目，现在才发现危机四伏，不知如何是好。他在伦敦集结军队，但害怕廷臣和枢密的阴谋，决定留在简女士身边，派萨福克统率军队。他知道，公卿的服从只是恐惧和欺骗的结果。但枢密阁臣希望摆脱他，^①便利用简的孝心，夸张她父亲所面临的危险。他们说：诺森伯兰以前在这些地方镇压叛乱，所向有功、声誉卓著，更适合率军出征。诺森伯兰公爵自己明白萨福克资质庸劣，开始认为：除了他本人，谁也无法应对眼前的危局。他同意亲征。众枢密送他出征，表示无限忠诚，他的死敌阿伦德尔态度最为诚恳。^②他一路前进，注意到民情不惬，预感到野心的致命后果。他对格雷勋爵说：“许多人出来看我们，但没有一个人说：上帝为你加油。”^③

公爵刚到圣埃德蒙陵，发现所部不足六千人，无法抵抗女王两倍于此的军队。^④他致信枢密院，要求他们派来援军。众枢密立刻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樊笼。他们离开伦敦塔，仿佛准备执行诺森伯兰的命令；其实却在彭布洛克的巴纳德堡集会，考虑如何动摇僭主的暴政。阿伦德尔陈述了诺森伯兰的邪恶残暴、不知餍足的野心、他策划的罪恶事业、他拉全体阁臣下水等罪行。他断言，大家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补赎以前的罪孽：尽快恢复对合法君主的效忠。^⑤彭布洛克附议，他拍打着宝剑，发誓要跟任何反对者决一死战。他们立刻召来伦敦市长和市议员，后者很乐意服从昭告玛丽即位的命令。人民欢声雷动，表示赞同。甚至镇守伦敦塔的萨福克也发现抵抗毫无意义，只好开门拥戴女王。简女士称孤道寡不过十天，又退居私邸，她觉得这里比宫廷的生活更惬意。^⑥

① Godwin, p. 330. Heylin, p. 159. Burnet, vol. ii. p. 239. Fox, vol. iii. p. 15.

② Heylin, p. 161. Baker, p. 315. Hollingshed, p. 1086.

③ Speed, p. 816.

④ Godwin, p. 331.

⑤ Godwin, p. 331, 332. Thuanus, lib. xiii.

⑥ Godwin, p. 332. Thuanus, lib. xiii. c. 2.

他们遣使命令诺森伯兰放下武器，发现他已经众叛亲离、无望成功，所有部众都已经拥戴女王、欢欣鼓舞。^① 女王向伦敦前进，各地人民纷纷拥戴、效忠。伊丽莎白女士征集了一千骑兵，反对篡位者，保卫她们姐妹共同的权利，她率领这支部队迎驾。^②

女王下令拘押诺森伯兰公爵，公爵跪在前来逮捕他的阿伦德尔面前，卑屈地求饶。^③ 他的长子沃里克伯爵、次子和幼子安布罗斯勋爵和亨利·达德利勋爵、弟弟安德鲁·达德利爵士，以及北安普敦侯爵、亨丁顿伯爵、托马斯·帕尔默爵士、约翰·盖兹爵士同时被捕。女王随后监禁了萨福克公爵、简·格雷女士和吉尔福德·达德利勋爵。但玛丽希望即位伊始，以宽厚仁慈收买民心。众枢密借口行动受到限制，掩饰不忠——女王赦免了他们大部分人。萨福克获释——有人觉得这种宽容主要是轻视他的能力。但诺森伯兰罪行太大，野心和勇气太危险，实在无望侥幸偷生。他受审时，只求获准向陪审团的贵族提两个问题：服从枢密院颁布、用玺的诏令，是不是叛逆？他的同犯有没有资格审判他？他得到的答复是：篡位者的御玺没有权威。任何人除非剥夺公权，在法律上仍属无辜，可以参加任何陪审团。^④ 他勉强默认、服罪。他伏诛时，表白自己信奉天主教。他告诉人民：他们只有重返祖先的信仰，才能享有和平安宁。也许这是他真实的观点，以前只是为了利益和野心而伪装；也许他的宣示只是为了迎合女王，希望她善待自己的家人。^⑤ 爱德华·帕尔默爵士、约翰·盖兹爵士跟他一起伏诛。危险、罪恶的篡位计划总共只流了这些血。简女士和吉尔福德勋爵也被判有罪，但当前无意执行。因为他们年轻、无辜，两人都不到十七岁，且提供了最有效的辩护。

① Stowe, p.612.

② Burnet, vol. ii. p. 240. Heylin, p. 19. Stowe, p. 613.

③ Burnet, vol. ii. p. 239. Stowe, p. 612. Baker, p. 315. Hollingshed, p. 1088.

④ Burnet, vol. ii. p. 243. Heylin, p. 18. Baker, p. 316. Hollingshed, p. 1089.

⑤ Heylin, p. 19. Burnet, vol. iii. p. 243. Stowe, p. 614.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玛丽首先驾临伦敦塔。终爱德华一朝，诺福克公爵一直被关押在那里。埃克塞特侯爵的儿子考特尼自从父亲被剥夺公权，虽然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同样一直被关押在塔里。加德纳、汤斯达尔、邦纳因为坚持天主教信仰而入狱，请求女王开恩、庇护。^① 玛丽将他们全部释放，立刻施恩、任用。剥夺诺福克公权的法令虽然经国会通过，仍然宣布无效、予以撤销；因为指控他的不法行为只有一项：他和列祖列宗的盾徽纹章存在问题。对此，宫廷、举国众目睽睽，知其并无恶意。考特尼不久就封为德文郡伯爵。他在狱中受到的教育很不完善，但他很快就掌握了廷臣和绅士的造诣，获释后几年内就位居显要。^② 女王的恩惠虽然仅仅施与个人，但在国民当中深得人心。她为了迎合公众，宣布大赦，豁免最近一届国会拨给她弟弟的补助金。不过，大赦保留若干例外。^③

国民庆幸合法继承人的胜利和君主的德政，但无法遏制他们对国教的担心。大多数国民是新教徒，普遍顾虑新君的信仰和偏见。玛丽出身的合法性多少跟教皇的权威有关；公主受母亲教养，坚定拥护天主教会、极其敌视新教义。她相信：新教是她家庭一切不幸的根源。她屈从于父王，最后不得不遵旨，这些挫折更增添了她对改革派的厌恶。爱德华一朝，护国公和枢密院给她带来的苦恼只是进一步地坚定了她的偏见。她天性尖刻、固执，被挫折、逆境激怒，具备偏执的一切特质。她极其无知，因而没有能力怀疑自己的信仰，或宽容别人的观点。因此，举国忧惧：玛丽在宗教热忱的驱使下，可能不仅废除，还会迫害现存教会体制。她没过多久，就将自己的意图付诸实施。

加德纳、邦纳、汤斯达尔、戴伊、希斯、维塞恢复教职——或者通过直接命令，或者通过重审委员会的调查。虽然国会法案解散了达勒姆教区，但女王通过特许状重建教区，恢复汤斯达尔的职权和岁入。她借口平息宗教争议，利用

① Heylin, p. 20. Stowe, p. 613. Hollingshed, p. 1088.

② Depeches de Noailles, vol. ii. p. 246, 247.

③ Stowe, p. 616.

王室特权下诏：英格兰全国传道士未经特许，不得布道。不难看出，只有天主教徒才能从中获益。约克大主教霍尔根、埃克塞特大主教科弗代尔、伦敦主教雷德利、格洛斯特主教休柏入狱，年老的拉蒂默随后入狱。热忱的主教和教士鼓励积极的信徒恢复弥撒，尽管现行法律禁止这样做。黑尔斯法官曾经坚定地保卫女王的特权，但因为反对这些不法行径而完全失宠。他受到拘押和苛待，愤而自杀。萨福克郡居民心惊胆战，因为他们勤王时，女王曾经许诺保存他们的改革派教会，人们推测他们会援引这个承诺。有人胆大妄为，要求女王不忘旧盟，便受到枷刑示众的惩罚。女王当着枢密院公开宣布：宽容那些跟她信仰不同的人。但人们预见到：涉及敌对的宗教偏见，这个承诺和以前的承诺一样靠不住。

女王早在亨利前朝就受惠于克兰默大主教的品德，他斡旋成功，缓和了亨利对她最苛刻的偏见。但玛丽始终痛恨他促成了母亲的离婚案和宗教改革。加德纳虽然同样促成了离婚案，但他后来为天主教事业受难，已经将功折罪。因此，大主教没有理由指望本朝的青睐，但他自己轻率的热忱造成了第一次暴行迫害。流言称：克兰默为了讨好女王，答应用拉丁文主持法事。大主教为了辟谣，出版了一本辩护录。他在书中写道：魔鬼一开始就是骗子、谎言之父。魔鬼这一次派自己的仆人造谣，就是要迫害基督和真正的教会。地狱之灵现在打算恢复他自己的发明和工具：拉丁文赎罪弥撒。魔鬼的党羽为了这个目的，才盗用克兰默的名义和威望。弥撒不仅在《圣经》和原始教会的实践中没有依据，而且跟古代遗俗和圣灵启示的著作直接矛盾；此外，弥撒还充满了可怕的亵渎。^① 这份煽动性的论文将克兰默送进了监狱。他受到指控：通谋简女士，反对女王继位；判处大逆罪。虽然整个枢密院都跟他同罪，而且大部分比他更严重；但这个判决无论怎么严厉，终归完全合法。不过这个判决没有执

^① Fox, vol. iii. p. 94. Heylin, p. 25. Godwin, p. 336. Burnet, vol. ii. Coll. No 8. Cranm. Mem. p. 305. Thuanus, lib. xiii. c. 3.

行,克兰默大主教留待着更残酷的惩罚。

改革派四面楚歌,殉道者彼得的遗体难以存身。^① 几位热忱的天主教徒取而代之。加德纳为此亲临辩护,政府慷慨资助他旅行。但宗教狂热仍然不断上升。彼得妻子的遗体葬于牛津,官方后来下令挖出尸体,葬于粪堆之中。^② 外国宗教改革者布塞尔和法吉乌斯的遗骨同时在剑桥被焚毁。^③ 当局首先禁止约翰·拉斯科布道,然后命令他和他的会众离开英国。更多的外国改革派跟随他一起离去,邦国由此损失了许多有用的技艺和工业。几位英国新教徒也避难海外,一切形势都不利于宗教改革。

一旦宫廷易主,改革派就不能指望得到新召集的国会保护。一位热忱的改革派^④声称:选举存在严重的暴行和不公。但记录的作者缺乏权威性,因为从英格兰迄当时为止的情况看,政府几乎没有必要这样做。仍然有许多人从观点或感情出发,忠于古老宗教;且在大部分选举中,王室的权威能保证这样的候选人胜出。许多人不愿意在宗教信仰上迎合王室,就不愿进入国会;以免开罪女王,以后面临王室特权的迫害而无法自保。因此,下议院大多数议员不久就逢迎玛丽的计划。上议院的利益和期望主要有赖于宫廷,不能指望他们有丝毫反对之意。

国会召集期间,宫廷不待两院集议,就举行拉丁文圣灵弥撒和所有古老仪式祭礼。这些都是国会法案明令废除的对象,但宫廷公然蔑视法律。^⑤ 林肯主教泰勒拒绝在仪式上跪下,而受到严厉处置,被粗暴地逐出宫廷。^⑥ 不过,女王还是保留了英格兰教会首脑的资格。宫廷通常声称:只想恢复亨利八世去世时的状况,但永远不会恢复伤害邦国最深的天主教滥权行径。

① Heylin, p. 26. Godwin, p. 336. Cranm. Mem. p. 317.

② Heylin, p. 26.

③ Saunders de Schism. Anglic.

④ Beale. But Fox 当时就在现场,叙事巨细靡遗,丝毫没有提及此事。参见 vol. iii. p. 16.

⑤ Fox, vol. iii. p. 19.

⑥ Burnet, vol. ii. p. 252.

国会通过的第一项法案深得人心：废除了爱德华六世法案没有包括的所有大逆罪、亨利八世第一个法案以前不存在的所有重罪。^① 国会接着宣布女王为婚生子，批准亨利和阿拉贡的凯瑟琳婚姻有效，废除克兰默宣布的离婚案。^② 克兰默因此大受指责。不过，国会没有提到教皇的权威是这次婚姻的基础。爱德华国王的宗教事务法案全都在一次投票中废除。^③ 剥夺诺福克公权的法案予以撤销，这种司法程序比宣布剥夺公权无效、不再确认更合理。前朝通过的取缔暴乱法案有许多条款重新生效。国会第一次会议颁布的法案深得人心，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个举措抵消了。

两院虽然服从女王的旨意，但在某些特殊条款上仍然有所保留。比如，女王择夫尤属社稷之重，国会就此不能唯命是从。玛丽即位后有三家可能的婚事。^④ 第一个求婚者是德文郡伯爵考特尼。他是英国人，几乎跟王室联姻；国民能够接受。考特尼风度翩翩、辞令娴雅，赢得了女王的青睐，^⑤ 暗示她情有独钟。^⑥ 但这位绅士忽视了种种迹象，明显更倾向于伊丽莎白女士。他宁愿选择公主的青春年少、谈吐和悦，而非女王的权力与显赫。结果，女王对考特尼冷淡下来，并对伊丽莎白公然表示敌意。两人母亲昔日的争执在女王心中留下了恶意的种子。国会宣布凯瑟琳的婚姻合法后，她对妹妹的不合法出身不再伪装。伊丽莎白忠于改革派，又触怒了玛丽的宗教偏执。年轻公主难以伪装自己的感情，女王以横暴的威胁迫使她服从。^⑦ 公主坚定不移，女王怒不可遏。玛丽在骄傲的驱使下，几乎不能自制。公主的处境岌岌可危。^⑧

① *Mariae, sess. i. c. 1.* 这次废除深得民心，但失传的 5 & 6 Edw. VI. c. II. 条款已经要求：大逆罪必须有两名证人对质。

② *Mariae, sess. 2. c. 1.*

③ *Mariae, sess. 2. c. 1.*

④ *Thuan. lib. ii. c. 3.*

⑤ *Depeches de Noailles, vol. ii. p. 147, 163, 214, 215. vol. iii. p. 27.*

⑥ *Godwin, p. 339.*

⑦ *Dep. de Noailles, vol. ii. passim.*

⑧ *Heylin, p. 31. Burnet, vol. ii. p. 255.*

未曾就职的波尔红衣主教是女王的另一位求婚者。女王有许多理由选择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人品高贵，慈悲为怀。天主教会尊重他，保罗三世去世时，他几乎问鼎法座。^① 他母亲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以前是玛丽的家庭教师，女王对她感情深厚。波尔忠于罗马天主教，因此经受了狂暴的仇恨。所有这些考虑对玛丽影响极大。但红衣主教现在已经是风烛残年，习惯于研究和退隐的生活。他表示难以适应宫廷喧闹和政务繁杂。^②

因此，女王放弃了所有联姻的念头。但她非常尊重波尔的智慧和品德，仍想向他咨询政务，从中获益。她跟康蒙多秘密谈判——教皇特使丹迪诺红衣主教驻节布鲁塞尔，康蒙多是他的代理人。她向当时的教皇尤利乌斯三世保证：女王和王国愿意跟神圣教会和解。她希望教廷任命波尔为特使，来执行这项虔诚的任务。^③

两次议婚不成，女王的视线转向皇帝的家族。她母亲就出身于这个家族；她自己有难时，也总是向他们寻求支持与保护。几年前，查理五世几乎完全控制了德国。他以武断的方式行使权力，举国恐惧君主的侵凌会完全毁灭他们的自由。^④ 宗教为他提供了篡夺的借口，也给他带来了敌人，后来君威扫地、雄图如梦，皆由此故。赫斯伯爵领主接受萨克森选帝侯莫里斯的建议和保证，信托皇帝而被非法扣押。莫里斯因而大怒，秘密联合新教诸侯。他掩饰自己的意图，突然率军向查理挺进，几乎俘获皇帝本人。各地新教徒纷纷拿起武器。他们的暴动获得法军入侵的支援；皇帝陷入困境，只得求和。和约保证了德国各邦独立。皇帝为了挽回荣誉，率领十万大军进攻法兰西、围困默兹。他御驾亲征，似乎志在必得，不惜一切代价。全欧洲拭目以待。但吉斯公爵率领法国最勇敢的贵族守卫默兹，而且他警觉、干练、勇武，一直坚守到暮冬。皇帝知道

① Father Paul, book iii.

② Heylin, p. 31.

③ Burnet, vol. ii. p. 258.

④ Thuanus, lib. iv. c. 17.

再不撤退的危险，便率领余部撤回低地国家。命运在他垂暮之年逆转，给他以致命打击，使他非常沮丧。

查理一听说爱德华去世，他的亲戚玛丽继位，就策划将英格兰王国纳入他的家族治下。他希望：这次事件可以弥补他在德国的损失。他的儿子菲利普是鳏夫。虽然菲利普只有二十七岁，比玛丽小十一岁；但这一不利条件无足轻重，玛丽完全可能子孙满堂。因此，皇帝立刻派代理人向玛丽表达意向。玛丽乐于获得如此强大的联盟，接近她非常依恋的外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求婚。诺福克、阿伦德尔、佩吉特也建议联姻。加德纳现任首相，升任大法官，他明白玛丽的心愿，附议支持西班牙联姻。同时，他向女王和皇帝指出：完婚以前，有必要停止一切宗教改革。他注意到：国会在种种抱怨中，流露出猜忌的迹象，似乎当时决心不再向天主教继续让步。他们虽然愿意为君主牺牲一些自己不理解的、一些似乎无足轻重的抽象原则，却已经吸收了强烈的偏见，反对罗马教廷的僭越和勒索。因此，他们很难再次向罗马的权威屈膝。贵族和绅士害怕归还修道院的土地，因而鼓励民众的先入之见。民众普遍反对天主教会的教义和仪式。这些因素加强了国民反对西班牙联姻的偏见。如果首先在这一点，继而在宗教变革问题上大做文章，就有举国叛乱和暴动的危险。女王一旦完婚，就会受到婚姻的影响，接着推进她已经着手的虔诚事业。因此必须未雨绸缪，安抚国民。所以，婚约条件应该极其有利于英国人，以便保证他们的独立，保证他们古老的自由和特权完好无损。^①

皇帝熟悉加德纳的审慎与经验，同意所有这些理由。他试图缓和玛丽的热忱，表示点化这个国家的伟大任务应该逐步推进。波尔红衣主教对宗教观点更诚实，不太考虑政治箴言，提出了相反的建议。他起程前往英格兰，行使教皇特使的职权。他认为最好在多瑙河上的狄林亨镇暂停，此事后来取得了

^① Burnet, vol. ii. p. 261.

女王的同意。在此期间，婚约谈判进展迅速。玛丽有意嫁给菲利普，举国皆知。下议院原本希望：他们已经作出让步，可以把女王争取过来；但听说她决定联姻海外，惊恐不安。他们派委员会提出措辞强烈的抗议，反对这种危险的举措。女王为了防范诸如此类的申请，解散了国会。

教务会议与国会同时召集。看来多数派和宫廷信仰相同。罗马派坦率地提议：辩论双方争执的问题。他们认为：在所有问题中，变质说最清楚，基础最无可置疑。他们在辩论中要求天主教徒公开承认：根据他们的教义，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中手握自己、吞食自己。^① 不过，这次胜利只限于他们自己一派。罗马派坚持：他们在当天明显胜出；他们的对手是盲目而顽固的异端；这些人质疑不证自明的原则，原因只能是心灵极端堕落；这些人执迷不悟，理应严惩不贷。他们在这个心爱的问题上志得意满，不久就在牛津重开辩论。他们为了表示理直义正，无所畏惧于博学多才。他们把问题交给拘押的克兰默、拉蒂默和雷德利，看这些著名辩士能否找到论据，以保卫他们摇摇欲坠的信条。^② 这次辩论的结果非常不同于爱德华一朝几年前在同一地点举行的著名会议。

国会和教务会议解散后，不出所料：在大多数地方，关于宗教问题的新法律获得天主教徒的热忱响应，在政府支持下更加公开地施行——各地恢复弥撒；圣职不得结婚。有些作者声称：四分之三的牧师在这时失去了生计。不过其他史家更精确，^③ 估计受害者人数远远达不到这个比例。当局派出按察使，监督弥撒和古老仪式的重建。按察使奉命禁止受禄教士向至高权力宣誓。^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亨利八世确定的誓言仍然有效。

宗教事务剧变，新教徒怨声载道。许多人因此而受难，甚至漠不关心的旁观者都有动于衷。但普遍关注的是——联姻西班牙，举国上下为邦国的自由

① Collier, vol. ii. p. 356. Fox, vol. iii. p. 22.

② Mem. Cranm. p. 354. Heylin, p. 50.

③ Harmer, p. 138.

④ Collier, vol. ii. p. 364. Fox, vol. iii. p. 38. Heylin, p. 35. Sleidan, lib. 25.

和独立担忧。为了避免一切鼓噪，婚约条款尽可能保证英格兰的利益、安全，甚至伟大。双方议定：虽然菲利普应该享有国王的头衔，但政府完全由女王掌握；任何外国人不得在王国任职；英国的法律、习俗、特权不得有任何变革；未经女王同意，菲利普不得偕女王出境；未经贵族同意，菲利普不得偕女王的任何子女出境；女王应该享有一年六万镑的专属遗产；这次联姻的男性后裔除了英格兰以外，还应该继承低地和勃艮第；如果菲利普上次婚姻的后裔唐·卡洛斯去世、家嗣断绝，女王的男女后裔可以继承西班牙、西西里、米兰和菲利普所有的其他领地。^① 皇帝派埃格蒙特伯爵和另外三位大使渡海到英格兰签订婚约。^②

婚约条款公布，但国民并不满意。普遍传言：皇帝为了占据英格兰，口头愿意接受任何条款，因此他承诺的条件越是有利，就越是可以得出他无意愿执行的结论。查理一贯野心勃勃、两面三刀，英格兰国民对他的手段已经了然于心；他儿子菲利普不仅继承了父皇这些恶德，还增加了专横、阴险、骄傲、残暴等等这些更危险的恶德。英格兰将会沦为一个省份，其主君惯于对所有属地施行暴政。尼德兰、米兰、西西里、那不勒斯在西班牙暴政的压迫下呻吟，新征服的美洲处处都是人类迄今闻所未闻的暴政景象。这个残暴的国家发明了宗教裁判所这种暴政。毫无疑问，西班牙人会将他们的其他法律和制度引进英格兰。英国人因宗教问题而四分五裂，势必屈膝于邪恶的暴政，最终举国夷为臣妾。^③

于是，怨声载道，民情汹涌；苟有外力因利乘便、豪杰倡义争先，王灵势必扫地。但法兰西国王虽然敌视皇帝，但仍然拒绝支持任何叛乱，以免给玛丽提供任何向他宣战的借口。^④ 比较审慎的贵族认为：联姻西班牙之患，不过远忧。

① Rymer, xv. p. 377.

② Depeches de Noailles, vol. ii. p. 299.

③ Heylin, p. 32. Burnet, vol. ii. p. 268. Godwin, p. 339.

④ Depeches de Noailles, vol. ii. p. 249. vol. iii. p. 17, 58.

举国叛乱，准备尚未充足。不过，比较桀骜不驯的贵族认为：与其事后救弊，毋宁先发制人。他们密谋举事，宣言反对女王与菲利普联姻。托马斯·怀亚特爵士计划举兵肯特郡，彼得·卡雷爵士举兵德文郡。他们联络萨福克公爵，希望经略中部各郡，以恢复简女士的王位。^① 卡雷爵士出于急躁或恐惧，不到约定日期就首先发难。他不久就遭到贝德福德伯爵镇压，只得亡命法兰西。萨福克闻讯，害怕被捕，突然跟弟弟托马斯勋爵、伦纳德·格雷勋爵离城，准备发动沃里克、莱斯特各郡民众。他在这些地区广有产业，能呼风唤雨。但亨丁顿伯爵率领三百名骑兵穷追不舍；他只得分散随从隐蔽起来，结果被追兵捕获，解往伦敦。^② 怀亚特第一次举兵更成功；他在肯特郡的梅德斯通宣言反对君侧的奸臣和西班牙联姻，没有提到宗教问题。民众成群结队聚集在他的旗帜下。诺福克公爵和亨利·杰内根爵士奉命讨伐；他们统率卫队和其他军队，布雷特统率五百名伦敦人组成的援军。他在罗切斯特进入叛军视野，叛军指挥部就在罗切斯特。乔治·哈柏爵士假装抛弃叛军，暗中却争取了布雷特；两人巧妙地说服伦敦人，全军投奔怀亚特，宣布他们不会为奴役自己的祖国而出力。诺福克公爵害怕诸军效法，立刻撤退，退城固守。^③

国民、特别是新教徒占大多数的伦敦人，就此表明了自己的倾向。怀亚特士气大振，乘胜前进。他进军萨瑟克，向女王提出以下要求：交出伦敦塔；派四名枢密为人质；为了保证国民的自由，立刻嫁给英国人。他发现王师已经阻断桥梁、慑服伦敦，就向金斯顿进军，率领四千人在那里渡河，然后掉头向伦敦挺进，希望鼓励同党响应。他轻率地在萨瑟克浪费了太多时间，因此当他从金斯顿进军的关键时刻，仰仗的民情已经完全消失。他虽然兵不血刃地进驻了威斯敏斯特，但部众见无人响应，便悄悄溜走。他最后在寺院栅栏附近被莫里

^① Heylin, p. 33. Godwin, p. 340.

^② Fox, vol. iii. p. 30.

^③ Heylin, p. 33. Godwin, p. 341. Stowe, p. 619. Baker, p. 318. Hollingshed, p. 1094.

斯·贝克莱爵士逮捕。^① 据说,四百人在这次叛乱中丧生。^② 更多人颈系绳索跪在女王面前,请求宽恕。女王赦免了他们,打发他们离开。怀亚特被定罪、处决。据称,他在审讯时指控伊丽莎白女士和德文郡伯爵是他的同谋;在刑台前,他又向全体民众表示他们二人与叛乱无关。

有一段时间,伊丽莎白女士受到姐姐苛待,面临许多处心积虑的打击和贬损。她在宫廷中的位置排在伦诺克斯伯爵夫人和萨福克公爵夫人后面,仿佛她是私生子。^③ 她的朋友到处受到羞辱。她的良才美质现已出类拔萃,吸引了所有的年轻贵族,赢得举国爱慕。^④ 在此期间,女王每天都表现出新的恶意,迫使公主退隐乡间。玛丽抓住这次叛乱的机会,希望发现妹妹的罪证,以便对其严加监管,送往伦敦塔,命枢密院严查。但怀亚特公开宣告后,不可能再用假证陷害她。加上公主巧于辩护,女王只得释放她。^⑤ 当局为了让她离开王国,提议将她嫁给萨伏伊公爵。公主拒绝了这门亲事,就被软禁在伍德斯托克,严加监护。^⑥ 德文郡伯爵虽然同样清白无辜,却被关进弗瑟林盖伊城堡。

但这次叛乱对简·格雷女士和她丈夫更为致命。萨福克公爵的罪行连坐到她身上。虽然叛军变民主要寄希望于伊丽莎白女士和德文郡伯爵,但女王缺乏慷慨仁慈,决心排除哪怕是最轻微的危险。简女士收到死刑通知,她早已做好迎接命运的准备。她这样结束长期清白而不幸的生活,并非不满意。女王醉心宗教,借口施恩于犯人的灵魂,派神学家跟她争论不休,甚至缓刑三天,希望在此期间能说服她及时改变信仰,多少考虑一下拯救不灭的灵魂。简女士虽然朝不保夕,仍然镇静自若。她不仅用当时所有的论据为自己的信仰辩

① Fox, vol. iii. p. 31. Heylin, p. 34. Burnet, vol. ii. p. 270. Stowe, p. 621.

② Depeches de Noailles, vol. ii. p. 124.

③ Ibid. vol. ii. p. 273, 288.

④ Ibid. p. 273.

⑤ Godwin, p. 343. Burnet, vol. ii. p. 273. Fox, vol. iii. p. 99, 105. Strype's Mem. vol. iii. p. 85.

⑥ Depeches de Noailles, vol. iii. p. 226.

护,还给妹妹写了一封希腊文信件,附送上一本希腊文《圣经》。^① 她在信中劝诫妹妹:无论成败利钝,都要坚定不移。行刑当日,她的丈夫吉尔福德勋爵要求看望她;但她拒绝了,送信告诉他:生离死别有损两人的刚毅之气,会软化他们迎接大限所需的坚定不移。她说:他们不过暂时分手,不久就会重逢。在那里,爱情永远如胶似漆;死亡、失望、不幸再也不会接近他们,再也不会扰乱他们永恒的幸福。^②

当局原计划在塔山同一个刑台处决简女士和吉尔福德勋爵,但枢密院害怕他们的青春、美貌、无辜与出身高贵会引起人民的同情,修改命令,在塔内将她斩首。她看到丈夫被带去处决,从窗口留下最后的忆念,然后平静地等待自己的末日。她甚至看到马车带回丈夫无头的尸体,听说他在最后一刻仍然勇敢坚定,但如此温柔而悲惨的场面没有使她动摇,反而使她更加坚定。伦敦塔典狱长约翰·盖奇爵士带她去刑场,且请求她送一件小礼物,作为永久的纪念。她把笔记本留给他,上面有她看到丈夫尸体时刚刚写下的三句话:一句希腊语,一句拉丁语,一句英语。^③ 大意是:人间的法庭戕害了他的肉体,但上帝的慈悲会恩宠他的灵魂;如果她罪有应得,至少应该考虑她的年轻和轻率;她相信:上帝和后人会体谅她。她性情温和,临刑前向旁观者讲演,自己承担一切责任,没有片言只句抱怨严刑。她说:她的罪不是篡位,而是没有足够坚定地拒绝篡位。他们不是野心勃勃,而是敬畏父母,因为他们受到的教育是尊重和服从父母。为了弥补国家受到的伤害,她唯有甘愿就死。虽然她并非自愿违法,但还是自愿就刑,以补赎她的愚孝之罪。她是其他人野心的工具,就像这座刑台一样。她希望,她的遭遇可为晨钟暮鼓:昭示无辜的理由不能开脱任何可能毁灭国家的大罪。她说完后,召侍女解衣,然后从容就刑。^④

① Fox, vol. iii. p. 35. Heylin, p. 166.

② Heylin, p. 167. Baker, p. 319.

③ Heylin, p. 167.

④ Heylin, p. 167. Fox, vol. iii. p. 36, 37. Hollingshed, p. 1099.

萨福克公爵受审、定罪，不久后也被处决。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蛮干害死了女儿，她本来会获得更多的同情。托马斯·格雷爵士因同罪而丧命。尼古拉斯·塞格莫顿爵士在市政厅受审，但没有确凿的证据。他能够提出有力的辩护，获得了陪审团的有利判决。然而，女王大怒，非但没有依法释放他，反而重新将他投入伦敦塔，严密禁闭了一段时间。她的愤怒没有到此为止。枢密院传唤全体评审员，将他们投入监狱，后来分别处以一至两千镑的罚款。^①这种暴行给一些人以致命打击，包括尼古拉斯爵士的兄弟、约翰·塞格莫顿爵士（他被定罪的证据并不比以前驳回的证据更充分）。女王将贵族和绅士塞满了伦敦塔；她猜忌的原因不是他们有罪迹，而是他们关心国事。她发现自己不得人心，就决心让人民无法抵抗。她下诏清点人口；命钦使收缴民间武器，存放在城堡、要塞中。^②

女王镇压怀亚特叛乱后，国民普遍憎恶政府，因此大臣发现新召集的国会有关对情绪。皇帝为了安抚国会，至少借了四十万克朗，送到英格兰贿赂议员、分发年金。迄当时为止，这种弊政在英格兰还没有先例。女王为了不在教会土地问题上引起公众的惊惶，不顾她笃信的教义，重新行使她在三个月以前放弃的英格兰教会首脑职权。大法官加德纳在国会开幕时致辞，宣布：女王继承祖传王位，有权自己择夫；她恰当地行使权力，选择了老盟友、勃艮第宗室的后裔。他指出：亨利八世的后裔已经只剩下女王和伊丽莎白女士。他补充说：为了排除各种王位觊觎者，必须通过法律赋予女王处置王位、指定继承人的权力。他说：国会早已将这种权力授予亨利八世，因此不能认为在英格兰没有先例。^③

国会很愿意满足女王的一切愿望，但邦国的自由、独立和生存显然危在旦

^① Fox, vol. iii. p. 99. Stowe, p. 624. Baker, p. 320. Hollingshed, p. 1104, 1121. Strype, vol. iii. p. 120. Dep. de Noailles, vol. iii. p. 173.

^② Dep. de Noailles, vol. iii. p. 98.

^③ Depeches de Noailles.

夕，他们不可能服从。国会明白女王对伊丽莎白女士抱有根深蒂固的仇恨，对奥地利宗室忠心耿耿。他们熟悉女王极端的宗教偏执——她为了确立天主教会，就会置一切正义准则和国民利益于度外。^① 他们注意到：加德纳在措辞中刻意避免称伊丽莎白女士为女王的妹妹。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当局已经拟订计划，剥夺伊丽莎白女士的婚生女地位。他们预料到：玛丽如果获得她要求的授权，就会立下有利于她丈夫的遗嘱。由此，英格兰就会永远沦为西班牙君主国的一个省。他们听说菲利普小心地坚持他是兰开斯特宗室的后裔，并公开宣示了他享有真正和唯一的继承权时，更为惊恐。

因此，国会意识到危险，决定悬崖勒马。他们不可能避免批准非常有利于英格兰的婚约，但他们拒绝批准大法官提交的任何法律。他们甚至没有宣布：女王在世时图谋或实际谋害王夫为大逆罪。提交的这种法案在一读中就予以搁置。他们为了更有效地打消菲利普在英格兰掌权的任何希望，通过了一项法案：“陛下是唯一的女王、唯一的君主，享有王位、王国的君权，以及由此而来的荣衔、尊位和权利；婚后和婚前，其权利同样广泛、充分。西班牙王子没有任何头衔和资格，以王国贵宾或其他身份寄居于王国境内。”^②

本届国会决议重建达勒姆教区，爱德华前朝的上届国会曾经决议解散该教区。^③ 女王已经运用她的权威，把教区交给汤斯达尔。虽然当时王室行使权威完全合法，但获得国会批准总是更安全、更可靠。当局提出了压制异端书籍的法案，企图复活六款法案和制裁罗拉德派、异端和谬误布道的法律；但两院没有批准任何一项，这证明国会甚至为了宗教问题而让步时都会有所保留。他们似乎对宗教问题不那么顾虑。因此，当女王发现国会完全不为她的目的服务时，便解散了本届国会。

① Mar. Parl. 2. cap. 2.

② Ibid. cap. 1.

③ Ibid. cap. 3.

玛丽现在全心全意地期待唐·菲利普抵达英格兰。她度过了多年寂寞的隐居生活，没有出嫁的希望或前景；现在她对从未谋面的年轻丈夫充满温情，迫不及待地等待完婚。任何障碍都会让她焦躁不满。^① 她抱怨菲利普迟缓其行，不能隐藏她的烦恼。因此，虽然她给菲利普带来了一个王国做嫁妆，但菲利普却对她置若罔闻，甚至没有只字片言。^② 但这种高傲的态度反而增加了她的喜爱。她发现臣民极其憎恶她的婚姻，这是她最心爱的希望；于是，英格兰全体国民都成了她憎恶的目标。艾芬汉勋爵率领舰队，去菲利普当时驻跸的西班牙迎接他；但海军上将告诉她：水手非常不满，因此菲利普上船会不安全。女王下令解散舰队。^③ 她随后就害怕法国舰队控制海面，可能拦截她的丈夫。一切危险的传言、风暴的征象都会让她陷于恐慌和混乱。这种极端急躁的情绪明显影响了她的健康，甚至影响了她的理解力。她还有新的忧虑，担心年龄老大、疾病缠身，配不上未来的夫君。她对镜自照，看到自己的惶恐，发现红颜不再，不知道自己是期待菲利普，还是害怕菲利普前来。^④

最后，期待的时刻来临。菲利普抵达南安普敦，女王闻讯迎接。^⑤ 几天后，他们在威斯敏斯特举行婚礼；菲利普夸饰财富，他们盛装进驻伦敦。玛丽带菲利普去温莎宫，他们以后就驻跸该地。王子的做法非常不适合改变英国国民对他的偏见。他淡漠、寡言，甚至对最显赫的贵族都不理不睬，而且用繁文缛节使自己难以接近。^⑥ 不过，女王希望夫妇单独相处，不愿意让任何事情打断她的快乐，这种情况正中她下怀。最短暂的缺席都会使她烦恼；只要菲利普对任何女人表示礼貌，她都无法掩盖嫉妒和愤怒。

① Strype, vol. iii. p. 125.

② Depeches de Noailles, vol. iii. p. 248.

③ Ibid. p. 220.

④ Depeches de Noailles, vol. iii. p. 222, 252, 253.

⑤ Fox, vol. iii. p. 99. Heylin, p. 39. Burnet, vol. iii. p. 392. Godwin, p. 345. Sir William Monson, p. 225告诉我们：英格兰海军上将向西班牙海军开火，因为他们没有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落帆，表示服从英国海军。这时，菲利普正在船上，且非常勇敢，非常不像当时的做法。

⑥ Baker, p. 320.

玛丽不久就发现：主导菲利普感情的是野心。只有让他统治英格兰，才能满足他的欲望，保证他的感情。跟丈夫的喜爱相比，国民的利益与自由无足轻重。她召集新国会，希望他们完全服从。她希望获得更大的权威，效法前朝先例，下旨慎选国会议员。^① 天主教的热忱；西班牙黄金的影响；王室特权的力量；绅士，特别是新教徒的沮丧；再加上加德纳的巧妙策划；使王党在下议院取得胜利，使她大为满意。据此，虽然法律规定：英格兰教会首脑头衔跟英格兰王冕不可分割，但民情似已允许她安全地无视《至高法案》。^② 红衣主教波尔现已抵达佛兰德，教皇授予他特使的职权。国会为了准备他进驻英格兰，撤销了他的剥夺公权法案，恢复了他的宗室资格。女王豁免了旧《圣职法》，保证他就任教皇特使。红衣主教渡海觐见女王夫妇，然后要求国会和王国与罗马教会和解，结束长期、不幸的分离。国会欣然接受，两院投票通过，并向菲利普和玛丽致辞，称他们背弃真正的教会、犯下了最可怕的罪行。他们真诚忏悔过去的罪孽，宣布决心撤销所有敌视罗马教会的法律。国会为两位陛下祈祷——因为他们幸而没有沾染罪恶的分裂派，可以向圣父求情：宽恕、赦免悔过自新的臣民。^③ 君主毫无困难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教皇特使以圣父名义赦免国会和王国受到的所有谴责，接受他们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当时的教皇尤利乌斯三世获悉此事，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幸运”；他本来应该感谢英国人，却受到英国人的感谢。^④

虽然当时支持或反对教皇的宗教热情高涨，但最重要的问题一直是贵族绅士的金钱和领地。他们获得女王和教皇的双重保证：他们侵占的教会产业不会受到调查，修道院和教会的土地都会保留在现在的业主手中；然后才作出

^① Mem. of Crann. p. 344. Strype's Eccl. Mem. vol. iii. p. 154, 155.

^② Burnet, vol. ii. p. 291. Strype, vol. iii. p. 155.

^③ Fox, vol. iii. p. 3. Heylin, p. 42. Burnet, vol. ii. p. 293. Godwin, p. 247.

^④ Father Paul, lib. iv.

有利于罗马的让步。^① 但国会不完全信任这些承诺，在废除以前通过的反罗马教会法律时，加入了一些条款：规定分裂时期的所有婚姻有效；确定现任圣俸领取者的权利；^② 占有教会土地的业主不受教会的任何谴责。为了消除这方面的担心，又提交了同样意图的陈情书。^③ 特使以教皇名义批准了所有的安排。现在很明显：虽然有女王和国王的努力，教皇权力已经有效地笼罩了英格兰，但教会的重建仍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虽然教会管辖权暂时复辟，但权力基础已经无法挽回地丧失，恢复无望。甚至这些武断、强大、偏执的君主除了最近的事务，都不能收回不久前从教会夺走的产业。教士自肥的权宜之计只剩下他们一开始的做法，必须经过多年蒙昧、野蛮和迷信，才能左右人类。^④

国会保障了自己的产业之后，对宗教乃至同胞的生命就不那么关心了。他们恢复了古代制裁异端的残酷法律^⑤（上届国会曾经拒绝批准）。他们颁布了几项针对煽动、造谣的法律。^⑥ 他们规定：在菲利普和女王婚姻期间，图谋或谋害菲利普构成大逆罪。^⑦ 迄当时为止，每一届国会都受到诱导，比前任走得更远，但没有一届国会完全不顾国民利益。他们仍然普遍憎恶西班牙、疑忌菲利普的觊觎。虽然女王想让丈夫成为假定继承人，把政府交给他，但她的所有图谋完全失败，国会拒绝给菲利普加冕。^⑧ 她还想从下议院获得补助金，支持

① Heylin, p. 41.

② 1 & 2 Phil. & Mar. c. 8.

③ Heylin, p. 43. 1 & 2 Phil. & Mar. c. 8. Strype, vol. iii. p. 159.

④ 教皇第一次授权红衣主教波尔：不仅考虑教会过去的土地，还要当心恢复土地的危险。他增加了红衣主教的权力，准许他保证目前的业主将来继续占有教会土地。红衣主教的授权只有一个条款需要推敲。波尔认为一种例外相当重要，需要跟神圣教会联系。但波尔直截了当地批准了对所有教会土地的占有，他的委任状赋予他这方面的充分权力。参见 *Harleyan Miscellany*, vol. vii. p. 264, 266。确实，有些枢密已经宣称：教皇无权出让教会土地。教皇便宜行事，可以坚持或撤销这个宣言。但业主占有教会土地的权利日益坚固，教皇的权威日益减少。因此，以后的人敌视教皇主要出于党派或宗教热忱而非实际原因。

⑤ 1 & 2 Phil. & Mar. c. 6.

⑥ Ibid. c. 3. 9.

⑦ Ibid. c. 10.

⑧ Godwin, p. 348. Baker, p. 322.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皇帝对法兰西作战，同样毫无结果。英格兰对法兰西通常的猜忌和敌视，现在都让位于对西班牙的类似感情。菲利普意识到英国人的偏见对他不利，但想要释放几位贵族犯人，以收买人心。他们是亨利·达德利勋爵、乔治·哈柏爵士、尼古拉斯·塞格莫顿爵士、埃德蒙·瓦纳爵士、威廉·圣洛勋爵、尼古拉斯·阿诺德爵士、哈灵顿爵士、特里米恩爵士，他们因为宫廷的猜忌或憎恶而入狱。^① 但他最得民心的举措莫过于保护伊丽莎白公主免受女王的刁难与恶意，恢复了她的自由。菲利普不具备慷慨恢弘的天性，他的举措源于微妙的政治谋划。他预见到：如果公主伏诛，下一位合法继承人就是英格兰女王。她一旦继位，就会使英格兰永远附属于法兰西王国。德文郡伯爵也得益于菲利普收买人心的举措，重获自由。但这位贵族明知道自己是猜忌的对象，便请求出国旅行。^② 他不久在帕多瓦去世，据说是皇帝的支持者下的毒。他是第十一代和最后一代德文郡伯爵，德文郡伯爵是欧洲最显赫的贵族世家之一。

女王极其渴望儿女，因而喜欢任何怀孕的迹象。教皇特使觐见时，她自觉子宫内有胎儿。^③ 献媚者将胎儿的活动比作施洗者约翰——他从母亲腹中跳出来，向圣母致敬。^④ 英国宫廷立刻遣使通告各国宫廷，诏命国民感谢天恩，大举欢庆。小王子一应家政已经万事俱备^⑤——之所以称小王子，原因是天主教徒确信：孩子一定是男性。伦敦主教邦纳公开祈祷：上天定将赐予王子英俊、勇健、智慧。但国民仍然有几分怀疑。传闻言之凿凿：女王身体虚弱，不能生孩子。事实证明：她的怀孕只是水肿病的开始、身体失调的表征。不过，当局千方百计地支持她怀孕的信仰。这种伎俩有利于菲利普在王国的权威。国会通过法律：万一女王去世，菲利普在新君成年以前任护国公。女王发现得不

^① Heylin, p. 39. Burnet, vol. ii. p. 287. Stowe, p. 626. Depeches de Noailles, vol. iv. p. 1, 6, 147.

^② Heylin, p. 40. Godwin, p. 349.

^③ Depeches de Noailles, vol. iv. p. 25.

^④ Burnet, vol. ii. p. 292. Godwin, p. 348.

^⑤ Heylin, p. 46.

到更多让步，便突然驾临威斯敏斯特，解散了国会。

本届国会有一件事不应忽略——几位下院议员不满国会的举措，又无法阻止；他们拒绝参加会议，退出国会以示反对。^① 国会解散后，王室法庭课以其藐视罪。六人缴纳罚款，请求宫廷宽恕。其他人继续抗争，事犹未了，女王就去世了。下议院后来声称拥有事务裁判权。确实，依据自由宪制的真正原则，女王对待大臣的行径只能视为滥用特权，但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不满。本朝后来几届下议院从来没有提出质疑。法国大使诺阿耶伯爵曾说：几位议员由于放言无忌，女王将他们投入监狱。^②

① Coke's Institutes, part iv. p. 17. Strype's Memor. vol. i. p. 165.

② Vol. v. p. 296.

第三十七章

玛丽(二)

反对宽容的论证——迫害——召开国会——女王的勒索——皇帝退位——克兰默伏诛——对法兰西开战——圣昆丁战役——法军攻取加莱——苏格兰事务——法兰西王太子与苏格兰女王联姻——召开国会——女王驾崩

加德纳采取谨慎和审慎的措施，成功地引导国会，安排他们接受西班牙联姻和重建古老宗教。据信，他们对此二者都抱有极端的敌意。加德纳运用智慧和谋略出神入化，枢密院接受他的观点，犹如接受神谕。他在天主教党派中一向德高望重，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反对或限制了。波尔红衣主教虽然因美德和公正深受爱戴，出身和地位比加德纳更优越，但管理庙谟远不及加德纳一言九鼎。红衣主教博学、虔诚、仁慈，受到无限敬仰，主要因为他善良有德，而非雄才大略。两教派经常在女王和枢密院面前争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最近重新生效的反异端法应不应该付诸实施？或者，这些法律只用于威慑、限制狂热分子的鲁莽行径？波尔在教义问题上极其诚实。他虽然性情温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和，在罗马蒙受了同情路德派的嫌疑，但在事关天主教义的问题上绝不苟且，他认为其与世俗政治相形之下从来不足挂齿。加德纳相反，他对亨利无限顺从，如果在先王治下没有走投无路，他完全可以牺牲原则，迁就既存教会。这两位朝廷柱石的性格众所周知。不过，性情比体系更重要。波尔宽厚慈悲，建议宽容他深恶痛绝的异端。加德纳苛刻严厉，支持迫害他骨子里漠不关心的宗教。^① 此项施政无比重要，枢密院讨论的问题很快就变成举国争议的焦点。我们应该简要介绍一下双方支持，或可能支持的论点和政策，并且展示双方长期争执、反复考查的论据。

波尔一派主张：迫害只能针对各教派的丑闻。神学争执如此激烈、正反论证如此参差，只是充分证明——在遥远而崇高的问题上，谁都永远无法说服谁。即使在其他辩论中最急躁好斗的人，跟争论的神学家相比，都堪称温和节制。如果一个人根据知识和经验，能够绝对肯定其判断，那么他对其他人的反对和谬误就会报以轻蔑，而非愤怒。但人们狂热地坚持他们既没有清楚理解、又没有完全相信的教义时，相反的论证，甚至其他人的怀疑都会动摇他们心中的信念。理解不完善的自然结果，就是急躁地迁怒于对手。他们这时很容易接受任何借口，称对手不敬上帝、亵渎神明。如果他们还能寻找借口，将暴行和世俗政府的利益联系起来，就再也不能节制报复和仇恨。无疑，最不幸的事业莫过于依靠政治力量进行迫害；或是为了太平而确定完全一致的观点标准，却完全不符合其他人心目中的人类理性标准。在宗教问题上，某种观点普遍盛行，未遭反对；一开始的原因可能是人民愚昧、野蛮，从来不具备推断、研究的能力。后来人们执著迷恋、全体一致，实在没有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永远消除所有好奇心以及学术和文化的所有进步。持之以恒的严格管制确实可以将一切争议扼杀在萌芽中，但这种政策附带的后果是：国民永远陷于迷信卑怯的恐怖之中，俗权会不断侵蚀教会。人们还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不能容忍反对

① Heylin, p. 47.

的声音。他们长期迷恋虚假的太平，将来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就如同细致入微的养生之道会毁掉健康的身体；由此，身体会无法应对人生无法避免的种种意外。如果始终不许一个民族思考他们本来可以讨论的教义，一旦无望形成神学派别（这样的事件总是司空见惯）、教旨和观点的分歧，就会突然爆发最可怖的暴行。无论迫害异端一开始有什么所谓的好处，但是用严刑峻法株连群众、用极刑消灭各等级广泛流行的观点，都不可能建立他们自诩的可靠论证。这种手段不仅极端野蛮，而且通常实现不了预期的目的；只会使人们更加顽固、难以说服，增加改革者的人数，因为悲惨和死亡、酷刑、迫害的恐惧是催生教派、培育宗教热忱的良田沃土。永恒的希望近在咫尺，压倒了尘世惩罚的恐惧。殉道的荣耀激发了越来越多的狂热分子，尤其是首领和传道士。压迫激起狂暴的仇恨——人们自然从仇恨暴君个人出发，进而对他们的教义更加深恶痛绝。旁观者同情假定的烈士，很容易受到诱惑，接受他们的教义。这些教义能激发人们表现出近乎超自然的坚定不移。如果打开宽容之门，教派之间的仇恨就会松弛；他们对特殊宗教模式的依恋就会消退，日常生活的消遣娱乐就会取代尖刻的论战。同一个人在其他情况下会勇敢面对火焰和酷刑，现在却会因为最小的偏爱和利益而改变教派。如果宽容的准则可以允许例外，也只能适用于全新的神学体系——这些体系从外邦输入，跟邦国的古老宗教毫无联系，很容易突然斩草除根、不留未来革新的种子。但这种例外隐含的意义，可以为古代迫害异教、消灭基督徒的行径辩护。鉴于这种可憎的后果，无疑应该将这种例外永远埋葬在沉默和遗忘中。

这种论证似乎尽善尽美，但人类智慧如此微妙，加德纳和其他反对宽容的人并没有就此沉默。他们仍然可以找到继续争论的题目。他们说：良心自由的教义建立在臭名昭著的亵渎神明基础上，对各教派一视同仁。这样模糊的神学教义，使教俗两界无法确定什么是上帝的真言、什么仅仅是人类想象的虚构。如果上帝向人类启示教义，肯定也会提供确定教义的准则。一位君主故

意坐视这些准则遭到颠覆和掺杂，就犯下了滔天大罪，比他允许毒药冒充食品卖给所有臣民更为恶劣。确实，迫害更容易使人伪善而非改宗；但经验教导我们，伪善的习惯往往可以弄假成真。至少，儿童不理解父母的虚伪，可以有幸地享受更正统的教育。为了世俗社会短暂而琐屑的利益，牺牲如此无可名状的重要性，实属荒谬绝伦。只要全面审查，甚至表面上有利于宽容的论据也未必如此。教派纷起，相互诅咒、痛恨、谴责对方的基本教义。这时，世俗当局只有参加争论，让一派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暂时恢复公共安宁。除此之外，他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呢？政治机体已经病倒，不能像健康时一样对待。君主虚伪的中立，甚至冷淡的偏爱，只能鼓励各教派的希望，保持他们仇恨的活力。新教徒完全不宽容祖辈的宗教，视之为亵渎神明的偶像崇拜。前朝摄政时期，新教徒大权独揽。他们颁布极其严厉的法律制裁所有天主教信徒，甚至制裁那些仅仅拒绝参加他们亵渎神明的仪式和圣礼的人，只是还没有使用极刑而已。他们以最严厉的措施维护想象出来的正统，铁证如山。加尔文在日内瓦烧死了塞尔维特。克兰默烧死阿里乌斯派和再洗礼派教徒。既然宗教迫害必不可少，那么最血腥、激烈的措施最能见效，理由因此也最充分。监禁、罚款、没收、鞭刑只能激怒各教派，不能压制他们的反抗。而火刑、轮刑、绞刑很快就能消灭和驱逐所有想要捣乱的异端分子，彻底慑服剩下的人。

加德纳的论证更符合菲利普和玛丽残酷、偏执的性情，受到更多的采纳。不过，波尔向皇帝申诉，获得了他的支持。^① 皇帝建议儿媳不要暴力迫害异端，并参考他自己的先例。他毕生致力于消灭异端，到头来只获得混乱和沮丧。不过宽容的建议遭到彻底拒绝，宫廷决定彻底执行针对改革派的严刑峻法。英格兰不久就充满了恐怖的场面——证明人类堕落之甚，莫过于宗教掩盖的报复与残酷。从此以后，天主教永远成为国民普遍憎恶的目标。

^① Burnet, vol. ii. Heylin, p. 47. 不过，查理不大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因为这时他自己就在穷凶极恶地迫害佛兰德改革派。参见 Bentivoglio, part i. lib. 1.

迫害始于圣保罗的受俸牧师罗杰斯。他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是他那一派的佼佼者。加德纳计划首先打击这种人，希望恐吓他们屈服。他们不是受到惩罚，就是改变论调，最终自然会影响群众。但他发现罗杰斯勇敢坚定，他的这些品质在人性中颇为罕见，但所有时代、所有教派都不乏其例。罗杰斯除了自我保护以外，还受到许多强有力的诱惑，本来应该促使他屈从。他有心爱的妻子，有十个孩子，但他定罪后仍然镇定自若。据说，行刑前他正在酣睡，狱卒只得叫醒他。他希望临死前见妻子一面，但加德纳答复说：他既然身为教士，不可能有妻子，就这样在残酷之上增加了侮辱。罗杰斯在史密斯菲尔德被烧死。^①

格洛斯特主教休柏跟罗杰斯同时受审，但在他自己的教区行刑。当局的意图是进一步恐吓他的教民，休柏却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安慰；他很高兴能在以往布道的教民当中为信仰作证，以身殉教。他被绑在火刑柱上，前面的凳子上放着女王的赦书，他仍然有机会改变论点。但他吩咐拿走赦书，欣然就刑。他受苦最重。狂风大作，把芦苇的火焰从他身上吹走。木柴太湿润，不容易着火。他下半身已经烧尽，人还没有死。他的一只手已经掉下来，继续用另一只手捶胸。人们听到他祈祷、规劝，直到在垂死挣扎中说不出话为止。他受刑四十五分钟，一直坚定不移。^②

桑德尔在考文垂烧死。赦书也提供给他，但他拒绝了，抱住火刑柱说道：“欢迎基督的十字架，欢迎永恒的生命。”哈德利牧师泰勒在那里受刑，四周都是他原来的朋友和教民。他绑在火刑柱上，唱起英文圣诗。一个卫兵打他一耳光，命令他说拉丁语。另一个士兵愤怒地用戟戳他的头，正好结束了他的刑罚。

温切斯特会吏长菲尔波特醉心于正统性。他有一次跟一位阿里乌斯派争论，唾对手的脸，以示憎恶异端。他后来写了一篇论文，为自己无礼的热忱辩护。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减轻这种可怕亵渎造成的痛苦，表明这个恶棍根本

① Fox, vol. iii. p. 119. Burnet, vol. ii. p. 302.

② Fox, vol. iii. p. 145, &c. Burnet, vol. ii. p. 302. Heylin, p. 48, 49. Godwin, p. 349.

配不上任何基督徒社会的接待。^① 菲尔波特是新教徒，现在落入跟他同样热忱、但更有力量的人手中。他被判处火刑，在史密斯菲尔德行刑。只有真正的宗教才有殉道者，受害者同样乐于烧死异己，这几乎成了普遍规律。双方对推断的观念抱有同样的热忱。

几乎所有的新教徒都被判有罪，因为他们拒绝承认在论。加德纳徒然指望杀鸡儆猴，发现任务每天都在成倍增长。他将这项不义的职务移交给别人，主要是邦纳。邦纳生活放荡、性格粗野，似乎以折磨受害者为乐。^② 他有时亲手鞭打犯人，直到打累为止；他撕掉一位纺织工人的胡子，因为他拒绝改宗；他用犯人的手做实验，在蜡烛上烧到筋肉和静脉收缩、爆裂。^③

无须枚举英格兰在三年迫害中经历的所有暴行。一方野蛮地施暴，另一方坚定地忍受。所有这些殉道者彼此非常相似——叙事本身既不愉快，又很单调。在宗教迫害中，人性表现得如此可憎，同时如此荒谬，而且已经无以复加。宗教迫害使人的邪恶超过恶魔，愚蠢超过野兽。可能只有几个事例值得保存——如果可能的话，能够警示宗教狂热分子，永远避免这种恶毒而徒劳的野蛮。

圣大卫主教费瑞尔在自己的教区烧死。他向波尔红衣主教申诉，没有获得受理。^④ 伦敦主教雷德利、前伍斯特主教拉蒂默都以德才兼备著称，一起在牛津的同一个火刑柱上烧死，相互鼓励对方坚定不移。拉蒂默被绑在火刑柱上，对同伴说：“兄弟，鼓起勇气。今天我们要点燃英格兰的火炬。我相信这个火炬不会熄灭，正如我相信上帝。”刽子手大发慈悲（他们发慈悲比宗教狂热分子更自然），把一包火药系在长老们身边，好让他们的刑罚快点结束。拉蒂默已经风烛残年，立刻死于爆炸。雷德利在火焰中苟延了一段时间。^⑤

① Strype, vol. iii. p. 261. and Coll. No 58.

② Heylin, p. 47, 48.

③ Fox, vol. iii. p. 187.

④ Ibid. p. 216.

⑤ Burnet, vol. ii. p. 318. Heylin. p. 52.

十九岁的年轻学徒亨特受到教士的引诱，在争论中不小心否认了真在论。他意识到危险，立刻逃之夭夭。但邦纳扣押了他的父亲，威胁他如果不让儿子出庭，就对他严惩不贷。亨特听说父亲有难，只好自首，被野蛮的主教邦纳判处火刑。

托马斯·郝克斯赴刑场时，答应朋友：如果他能忍受，就在火焰中向他们做一个姿态。他在为宗教受难的热忱支持下，伸出手臂做出约定的姿态，保持这个姿态直到气绝。^① 诸如此类的坚定事例鼓励群众不仅忍受，而且追求、渴望殉道。

女性通常更倾向于宗教，且提供了许多事例——面对迫害者的狂怒，对信仰坚定不移。尤其是一次令人震惊的行刑，即使在当时也是不寻常的野蛮。一位接近分娩的根西妇女受火刑，行刑当中肚子爆裂。一名卫兵从火中抢出婴儿，想救他一命。但法官站在旁边，下令把婴儿扔回去。他说：如此顽固的异端理应斩草除根。^②

这些受刑人的罪名是：传播违背国教的教导、断言，但没有确证。他们仅仅因嫌疑而被捕，一旦拒绝签署提供给他们的条款，就被判处火刑。^③ 这些野蛮的反常事例激起了国民的恐怖，殉道者的坚定引起了万众敬仰。公正的原则已经在人们心中留下了印迹，虚假的宗教也不能完全抹去；他们看到正直、可敬、虔诚的人受到的惩罚比颠覆世俗社会的最大恶棍更重，惊骇无比。明知不可能消灭新教徒，最大的不义莫过于折磨他们当中最有良心和勇气的人，让懦夫和伪君子逃脱。因此，每一次殉道都相当于一百次反对教皇派的布道。人们要回避这种可怕的场面，要么返回时对迫害者义愤填膺，但敢怒而不敢言。枢密院三令五申，要求地方官勉力缉拿异端。有些地方，绅士不得不出席这些野蛮的场面。这些暴行只能让国民日益憎恶西班牙政府。菲利普知道自

① Fox, vol. iii. p. 265.

② Ibid. p. 747. Heylin, p. 57. Burnet, vol. ii. p. 337.

③ Burnet, vol. ii. p. 306.

已众怨所归，只好乞灵于拙劣的诡计。他命令自己的忏悔师当着他的面举行布道，颂扬宽容——这种教义出自西班牙修道士之口，实在颇为怪诞。^①但宫廷发现：邦纳无论多么无耻、野蛮，无法一个人施行暴政，很快就撕下了假面具。菲利普和女王性情冷酷，没有丝毫节制的迹象。当局甚至胆大妄为，企图将宗教裁判所引进英格兰。主教法庭虽然极其武断，不受任何普通法律形式的限制，但没有获得充分的授权。女王运用王室特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更有效地根除异端。她提名二十一名委员，但只要三人就可以行使委员会的全部权力。委员会执行以下条款：“鉴于臣民当中谣言纷起，众多异端流布，委员会奉旨纠察，通过控诉、举证或他们设计的其他政治方式，查察一切异端。携入、出售、阅读种种异端书籍者同罪。委员会纠察所有教堂或小礼拜堂的不当举措和玩忽职守，惩办所有不行圣餐礼的教士。任何人不听弥撒、不去教区教堂做礼拜、不参加宗教游行、不接受圣饼或圣水者同罪。委员会如果发现任伺人坚持异端、顽固不化，就交给当局，按教法处置。委员会有权便宜行事，本着良心的指引行使自由裁量权，发明任何手段以便查察前述异端。委员会获得授权：随心所欲地传唤证人，强迫他们宣誓证明可能发现的事情。”^②委员会还获得某些世俗方面的授权：惩罚流浪汉和好事者。

当局为了使英格兰的法律程序更接近于宗教裁判所，下旨给诺斯勋爵和众卿：“授权众卿自由裁量，拷问拒不忏悔的顽固分子。”^③当局还根据这种不义的法庭程序，利用间谍和告密者：“应该在权限内秘密召见一两位诚实人，或者更多，根据自由裁量权要求他们宣誓。或者相反，秘密了解、调查教会中举措不当、玩忽职守、公开鄙视国王或女王旨意、煽动骚乱、传播煽动性情节或消息。通知同一批治安官，指派同样人选，纠察不检乱民的不法活动或可疑人物

① Heylin, p. 56.

② Burnet, vol. ii. Coll. 32.

③ Burnet, vol. iii. p. 243.

的其他轻罪。同一批线民向同一批法官告密，法官传唤、审问被告，不说明揭发者的身份。同一批法官应该根据揭发和审问，在审判中量刑罚罪；运用自由裁量权，施行公开性的惩罚或容忍。”^①这份暴政诏书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宗教裁判所的压迫，在政府所有部门引进了同样的不义；以消灭异端为法庭的唯一和真正的目的，结果只能如此。

但宫廷已经设计了支持正统的方略，比宗教裁判所本身更迅速、更简易。他们下诏取缔异端、大逆、煽动等书籍：“任何人持有这些书籍，没有立刻烧毁，读给或显示给其他人；皆以叛乱罪论处；立刻军法从事，不得拖延。”^②就英国政府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些不法举措残暴恶毒、莫此为甚，理应口诛笔伐。

我们已经大致介绍了三年来施行的大部分反异端举措，惊人的残暴和野蛮实在不堪回顾。估计二百七十七人死于火刑柱，监禁、罚款、抄没尚未计入。火刑的牺牲者包括五位主教，二十一位教士，八位平民信徒绅士，八十四位商人，一百位农夫、仆人、劳工，五十五位妇女，四名儿童。坚定不移的残暴令人惊骇，但仍然不及其他国家的迫害。一位大家^③估计：仅仅尼德兰一地，查理五世下诏制裁改革派以来，五千人因宗教原因被绞死、斩首、活埋、烧死。法国的受难者人数相仿。但同一位作者补充说：这两国的新教不仅没有停顿，反而更有进境。

烧死异端分子是英格兰王国与罗马教会和解的自然途径。教皇用不着多少恳求，乐于接纳迷途的羊群，他从羊群中获利匪浅。不过，使团郑重其事，携带英格兰的降表前往罗马，恳求重新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中。^④使节有：安东尼·布朗爵士，封为蒙塔丘子爵；伊利主教；爱德华·卡恩爵士。法座经短暂空缺后，现在由保罗四世占据，他是几代以来最傲慢的教皇。玛丽的头衔中仍然包括爱尔兰女王；他大为不满，宣称爱尔兰只属于教廷。他认为合适，就可

① Ibid. p. 246, 247.

② Burnet, vol. ii. p. 363. Heylin, p. 79.

③ Father Paul, lib. 5.

④ Heylin, p. 45.

以建立新王国、废除旧王国。但他为了避免跟新改宗者争执，随后宁愿承认爱尔兰并入英国，仿佛这是他的让步。这是教皇惯用的诡计：批准他们无法制止的事情，^①然后僭称君主行使的权力仅仅源于教皇的权威。保罗一开始想迫使玛丽放弃爱尔兰女王的头衔，然后再由教廷封授给他；但为了审慎起见，还是采取了不那么傲慢的方式。^②

教廷和英国使节的其他争论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保罗坚持收回教会所有的产业和财产，一文不少。凡是属于上帝的东西，任何法律都不得转交给俗人。任何人占据教产，都会面临永罚。鉴于英国人谦卑的服从，他个人乐于以教会收益为礼物，但这种让步超出了他个人的权限，人民肯定知道：这样严重的亵渎会导致永远被革出教门，葬送一切来世的福祉。如果他们确有虔诚之意，就应该恢复罗马教会所有的特权和收益，包括彼得捐。如果英国人指望使徒为他们打开天国的大门，就不能侵吞使徒在地上的遗产。^③这些严正抗议传到英格兰，虽然对国民毫无影响，但对女王却有巨大的影响。她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全部归还了仍在王室手中的教产。她为了进一步表示虔诚，虽然国库空虚，但还是建立了新的男女修道院。^④这一措施在枢密院引起争论。有些阁臣反对说：损失这样一笔可观的岁入，势必削弱王室的尊严。但女王回答说：为了拯救她的灵魂，即使十个像英格兰这样的王国也不足惜。^⑤如果加德纳没有正好在这段时间去世，如此轻率的决定大概很难执行。约克大主教希瑟接掌御玺，神职人员仍然位极人臣，继续迫害新教徒更为有利。

这时，国民对宗教迫害已经深恶痛绝。公众不满的影响体现于威斯敏斯

① Ibid. Father Paul, lib. 5.

② Father Paul, lib. 5.

③ Father Paul, lib. 5. Heylin, p. 45.

④ Depeches de Noailles, vol. iv. p. 312.

⑤ Heylin, p. 53, 65. Hollingshed, p. 1127. Speed, p. 826.

特召集的新国会。^① 国会通过一项法案：^②恢复什一税和初税，归还王室保管的教产。虽然这些措施仅仅直接涉及女王个人，但下议院仍然强烈反对。王室请求两年补助金和十五分之二税，下议院否决了后一项。许多议员说：既然王室这样糟蹋自己的收益，给她拨款纯属徒劳。国会还否决了另外两项法案，其中一项规定：流亡者可以在某些惩罚条件下返回；另一项规定：镇压异端不力的治安官应予罢免。女王发现下议院桀骜不驯，决定国会以解散为宜。

菲利普受不了玛丽纠缠不休的爱情和嫉妒，又发现他在英格兰的权威非常有限，便抓住第一个机会离开她，去年夏天去佛兰德跟皇帝会合。玛丽因此心情恶劣，故意开始主导国会，尤其雪上加霜。怀孕的希望落空，菲利普的冷漠和怠慢更让她深陷忧郁。她不断强化对新教徒的迫害，借此发泄怨气，甚至公开表示痛恨全体臣民。她相信菲利普感情上疏远她，很少陪伴她；原因在于国民痛恨她，通过拒绝服从菲利普来反对她。^③ 她的爱情越是得不到回报，就越是增加她的痛恨。她大部分时间在隐居中度过，或者以泪洗面，或者给菲利普写温柔的信件。菲利普很少回信，几乎不曾费心向她伪装任何爱情，甚至感激之情。她主要的政务就是勒索臣民，以便满足菲利普的需要。国会给她的拨款颇为吝啬，因此她乞灵于不法和强暴的手段。她向一千人贷款六万镑，理由是他们的富裕或忠爱。但区区此数不敷用度，她向岁入二十镑以上的所有人借贷。这种征敛的沉重负担落在绅士头上，他们许多人只得缩减开支、解雇仆人，以满足女王的索需。这些仆人习惯于懒散，一旦失去生计，大抵流为盗贼。女王下诏，命他们的前主人重新雇用他们。她向七千名自耕农征收了六万马克，这些人没有支付贷款。她向商人索取了三万六千多镑。她为了迫使伦敦人更配合她层出不穷的勒索，下诏在四个月内禁止英格兰商人向尼德兰

① Burnet, vol. ii. p. 322.

② 2 and 3 Phil. and Mar. cap. 4.

③ Depeches de Noailles, vol. v. p. 370, 562.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出口衣料和呢绒，这样，以前运到那里的货物就可以卖个好价钱。她的贪婪不断骚扰、中断贸易。安特卫普的英国公司拒绝贷款四万镑，她掩饰住怨恨，等待商人为安特卫普市场购买、装运大批衣料的时间接近，然后下令禁运。商人不得不支付给她一开始要求的四万镑贷款，两万镑以上限期支付，且为每匹布料缴纳二十先令武断的征敛。有时，她获悉意大利商人运载四万匹布料，前往利凡特，缴纳的税款通常为每匹一克朗。她便跟伦敦的冒险商公司达成协议，禁止外国人出口货物。英国商人为她的不义之举支付了五万镑，每匹布料出口缴纳四克朗。她想从海外大笔贷款，但信用低落，因此即使提供百分之十四的利率，仍然无法从安特卫普获得贷款。只有在她强迫伦敦市提供担保之后，安特卫普人才同意借钱。^① 她施行诸如此类的暴政时，跟全世界都保持稳固的和平，除了供应丈夫的需要，没有明显的用途。菲利普只顾自己方便，明显完全不顾她的利益。

菲利普现在已经掌握了新世界的全部财富，财富领土甲于全欧。查理五世仍然年富力强，但他厌烦俗世，自愿退位。战争的骚乱、永无止境的野心没有给他带来幸福，他现在想在宁静的隐居生活中寻找幸福。他召集低地国会，最后一次坐在宝座上，向臣民解释退位的原因，解除他们所有的效忠誓言，把权威移交给菲利普。皇帝告诉菲利普：一想到加在儿子身上的重负，父爱就使他流下眼泪。^② 查理谆谆教导：君侯主要和唯一的职责就是研究人民的幸福；表示他宁愿依靠爱戴而非恐惧，统治他属下的各邦。他现在已经到了冷静反思的年龄，发现以往的追求全属虚空。他发现扩张帝国的计划徒劳无益，产生了无穷的敌对和失望，使自己、邻国、臣民永远不得安宁，破坏了政府的唯一目的——照料国民的幸福。这个目的面临的反对更少，只要持之以恒，就能产生

^① Godwin, p. 359. Cowper's Chronicle. Burnet, vol. ii. p. 359. Carte, p. 330, 333, 337, 341. Strype's Memor. vol. iii. p. 428, 558. Annals, vol. ii. p. 15.

^② Thuan. lib. xvi. c. 20.

持久、可靠的满足。

几个月后,他将其他领地移交给菲利普,登船驶向西班牙,前往埃斯特雷马杜拉的于斯特修道院。此地气候宜人、风景秀丽,他选为退隐的去处。他抵达布尔戈斯时,发现西班牙贵族态度冷淡、疏于迎候,明白自己已经不再是皇帝了。这种观察更证实了尘世的空虚,使他更加衷心鄙视放弃的荣华富贵。他发现以往的逢迎和礼敬都是针对他的地位,而不是针对他自己,不禁发出慨叹。菲利普忘恩负义,让他长时间等待保留的一小笔年金,这让他更为感慨。但他的决心坚定不移,闭门隐修、完全弃世,克制一切对外界的好奇心。他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跟病痛作斗争;间歇时,他以查看神学论战为乐。这些论战扰动了他的时代,他以前一直只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或者,他模仿著名艺术家的作品,特别是他一直仰慕和鼓励的机械学。据说:他在修道院里发现了倾向于新教的教义,经常暗示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他研究钟表构造取乐——由此注意到他大权在握时的经营是多么不切实际——他从来都无法构造两座一模一样的机械,怎么可能使人类的信仰和观点完全相同。他退隐两年后去世。

查理皇帝早年就发现:统治遥远的领地,诸多不便。皇帝安排弟弟斐迪南当选为罗马人的国王,着眼于让他继承皇位和德国的领地。但他后来扩大计划,为光大宗室考虑,懊悔不该肢解如此重要的各邦。他试图通过最诱人的建议、最诚恳的劝导,让斐迪南为菲利普的利益放弃觊觎。查理发现他的努力毫无用处,就辞去了皇位和其他一切尊位。斐迪南循常例,请求教皇为他加冕。傲慢的教皇拒绝了这个要求。他声称:虽然皇帝去世,他有义务为当选的君主加冕,但在皇帝退位的情况下,权力由圣教继承,只有教皇有权指定皇帝人选。保罗的一切举措,无不配合着他夸张的觊觎。他一直向各国大使咆哮:教皇位居尘世一切君侯之上,他无需任何君主协助,因此他不习惯任何君主跟他不分彼此、平起平坐。他有权改变和规范诸王国,继承退位的诸王诸帝遗产;而非屈从下位者的意志。他在全世界四面八方煽风点火。他如此过分,在众人面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前,甚至在宗教会议上公开说:他不承认任何君主为同侪,所有君侯都是他的臣属,他要让列王匍匐在脚下。他一面这么说,一面用衰老虚弱的脚跺地,因为他这时已经年过八十。^①

查理五世身为君主,受教于战争和政治的纠葛;他为了避免年老体衰,甘愿放弃皇位,留下思索和回顾的时间。一位教士已是风烛残年,却自鸣得意;他为了永无止境的野心和报复,甘愿置万国于汤火。保罗对奥地利宗室怀有根深蒂固的仇恨。法兰西和西班牙已经达成五年休战协定,但教皇唆使法王亨利破坏协定。保罗承诺帮助亨利收复那不勒斯,法兰西对意大利这块领地有主权要求——这个目标一直给法兰西历代先王造成无穷无尽的损害。教皇自己跟那不勒斯总督阿尔瓦公爵有冲突。法兰西国王派吉斯公爵率军支援教皇;两国战火复炽,似乎不可避免。菲利普不如父皇尚武,但野心并不稍逊。他相信:在会议密谋中,他的警惕、阴柔、审慎高人一筹,足以征服所有敌人,扩张他的权力与领地。鉴于这个原因,他希望奠定新的帝国,所以他宁愿维持对法和平。但他发现——除非牺牲荣誉,他不可能对亨利的敌对行动视而不见,因此,他勤勉地准备战争。他为了增加自己的优势,准备在争执中登船前往英格兰。他希望:女王虽然极其厌恶他的备战措施、经受了他接二连三的怠慢,但仍然对他痴心不改,终归会有效地支持他的要求。如果事情仅仅取决于玛丽个人,她肯定无法拒绝丈夫的命令,但她左右枢密院的能力有限,支配国民的能力更小。她的政府日益不得人心,在天下太平时尚且难以维持,更不用说点燃战火了。一旦英法开战,苏格兰在强大的法兰西君主国支持下,势必卷入对英战争。

这一年,英格兰施行一项野蛮的举措,它与许多其他同类的暴政一起,使政府极其不得人心。克兰默长期服刑,女王这时决定明正典刑,她为了更充分地满足复仇欲,决定以异端罪而非大逆罪制裁克兰默。大主教受到传唤,赴罗

^① Father Paul, lib. v.

马接受教皇审判；尽人皆知他在牛津受到严密拘押，是因为没有出庭而判处他抗拒法庭罪。伦敦主教邦纳、伊利主教塞勒贝奉命羞辱他。邦纳得意忘形，很符合他野蛮的天性。^① 女王意志坚定——只有克兰默受到永罚，她才能心满意足，她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可怕的判决进而鼓励她诬毁克兰默的荣誉和声望。当局雇用人员攻击他——不是通过他完全能够应对的辩论，而是通过奉承、暗示、恭维。他们表示：只要他愿意改变论调，仍然可以坐享跟他的美德相般配的尊位。他得意时，宽厚慈惠的品格吸引了许多有势力的朋友，他们用长享友谊的希望诱惑他。^② 克兰默留恋生命，害怕酷刑，一时缺乏警惕，让天性压倒了决心。他同意签署承认教皇至高权力和真在论的文件。然而宫廷既残暴又无信，决定让他改变论断，不予回报。他们下令：他应该向全体国民承认在宗教问题上犯下的错误，然后立刻处决。克兰默要么暗中获悉他们的密议，要么懊悔自己的软弱，他作出了相反的宣示，这让观众大吃一惊。他说：他完全清楚服从君主和法律的义务，但这种义务仅限于耐心服从他们的命令，不辞他们要求的任何劳苦。他对造物主负有更高的义务，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宣示真理，不得以卑劣的否认抛弃造物主向人类启示的神圣教义。他毕生最痛悔的失误，莫过于违心地否认信仰——原因仅仅是软弱和怕死，没有经受住勒索。他要抓住这一次机会，诚实而公开地改变论断，从而补赎前罪。他甘愿以鲜血为他笃信的天国教义作证。他的手犯下了违心的错误，因此理当首先受到罪有应得的严厉惩罚。他随后就被解往火刑柱，受到围观天主教徒的侮辱。他此刻鼓起一切意志力，以非凡的毅力忍受着他们的戏侮和刑罚。他伸出手，放进火里，直到完全烧尽；表情和动作没有流露丝毫软弱，甚至丝毫感情的迹象。他的思想似乎完全集中于忏悔前罪，大叫几声：“这只手犯了罪。”他对赎罪感到满意，表情随后变得宁静。火焰焚烧身体时，他似乎完全感受不到外在

① Mem. of Cranm. p. 375.

② Heylin, p. 55. Mem. p. 383.

的痛苦,依靠希望和决心集中精神,击退了烈焰的考验。据称:他的身体已经烧尽,只有心脏留在灰堆中完好无损。虔诚的新教徒乐于相信此事,因为可以表现出他的坚毅。克兰默无疑是有德之士——学识和才干兼备,辅以廉正、诚实、慈惠和其他品德——适于造福社会,博施济众。他的道德操守赢得普遍尊重。虽然许多人认为他欠缺一贯的坚定性,但以身殉道的勇气使他成为新教徒的英雄人物。^①

克兰默死后,已经接受神职的红衣主教波尔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于是,他身兼坎特伯雷和教皇特使的职位,行使英格兰教会首脑的权力。但他反对所有强迫异端改宗的血腥措施,认为应对异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更有效地改革教会。^② 他发现自己没有足够权威反对女王及其阁臣的野蛮和偏执。他明白,自己就蒙受了倾向路德宗的嫌疑。现任教皇保罗积极迫害异端,是波尔的私敌。他性情温和,因而宁愿保留信用,用在其他成功希望更大的地方。^③

法兰西和西班牙点燃战火,女王的首要目的就是参战。红衣主教波尔和许多其他阁臣公开而积极地反对这样的举措。他们不仅坚持反对这种做法的婚约条款,还指出英格兰国内朋党斗争激烈、财政混乱。他们预见到:所有这些措施最终将使王国完全依附于西班牙。菲利普到伦敦的目的是支持他的党派,他告诉女王:如果无法满足如此合理的要求,他再也不会踏上英格兰的土地。这一宣示极大地提高了女王促进菲利普利益的热忱,压倒了枢密院的顽强反对。女王运用了其他更加横暴的威胁手段后,扬言罢免全体阁臣,另建更愿意配合她的枢密院。但她不敢冒险投票通过对法宣战。最后,当局查出斯坦福和其他几位密谋者策划奇袭了斯卡伯勒。^④ 他们屈打成招,承认密谋受到了法王亨利的教唆。女王的压力生效,政府决定以此事和其他性质暧昧可疑的类似事件作为

① Burnet, vol. ii. p. 331, 332, &c. Godwin, p. 352.

② Burnet, vol. ii. p. 324, 325.

③ Heylin, p. 68, 69. Burnet, vol. ii. p. 327.

④ Heylin, p. 72. Burnet, vol. ii. p. 351. Sir James Melvil's Memoirs.

开战的理由。英格兰相应地对法宣战，准备进攻法兰西王国。

英格兰当时的岁入不过刚刚超过三十万镑。^① 鉴于目前国民的态度，几乎不能指望国会提供多少拨款。战争显然会减少关税和资产收益——可以预见：甚至朝廷正供亦将不足，战争开支更不必论。女王虽然拖欠所有仆人的薪资、强索臣民提供贷款，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影响。她为了备战，一如既往地运用武断强暴的手段。她强迫伦敦市给丈夫供给六万镑；在法定期限前召集国会，预征第二年补助金；重新下达许多向国民贷款的诏书。她装备了一支舰队，却无力供应昂贵的粮秣，就将萨福克和诺福克两郡的谷物掠夺一空，却不向主人支付分文。她借助诸如此类的权宜之计，辅以高压，征集了一万人马，由彭布洛克伯爵统率，前往低地国家。在此期间，她为了防范国内动乱，将许多最重要的绅士投入伦敦塔；为了避免人们了解他们的遭遇，继之以西班牙式的举措：或者在夜间抓人，或者命令士兵罩住他们的头。^②

西班牙国王召集军队——跟英军会师后，总数达六万人，由当时最伟大的将领萨伏伊公爵菲利贝尔统率。卫成长蒙莫朗西率领的法军不过敌人的半数。萨伏伊公爵佯攻玛丽博格和洛克欧伊，突然兵临圣昆丁城下。圣昆丁防卫不周、戍卒寥寥，公爵预计在几天内就能破城。但该省总督海军上将科里尼认为：援救如此重要的要塞关系到自己的荣誉，便亲自率领一批法兰西和苏格兰贵族，进驻圣昆丁。他激励士卒、以身作则，积极保卫要塞。科里尼遣使向叔父蒙莫朗西要求援军。卫成长全军逼近圣昆丁，以便使入城救援更加容易。但萨伏伊公爵突袭援军，大获全胜；入城者不及五百人。他随即进攻法军；法军全线崩溃，丧师四千人，残部四散奔逃。许多法兰西大贵族在这次败绩中阵亡或被俘，后者当中包括年老的卫成长。他虽然英勇战斗，宁愿战死而不愿兵败苟存，但敌人四面包围，还是落入他们的手中。法兰西举国惊惶，巴黎匆忙

① Rossi, Successi d'Inghilterra.

② Strype's Eccles. Memorials, vol. iii. p. 377.

英国史 III
都铎王朝早期

加固城防。如果西班牙人即刻向那里前进，可以轻取巴黎。但菲利普为人谨慎，决定首先攻取圣昆丁，以保证军队跟本国的通道。圣昆丁陷落似乎指日可待，但科里尼英勇抵抗，又坚守了十七天，保障了法兰西的安全。在此期间，法兰西征发、集结了一批军队。另外，使节奉命前往意大利，召回吉斯公爵及其军队。法国已经从最初的惊恐中恢复过来，做好了防御准备。菲利普攻陷哈姆和卡特莱特以后，见季候已晚，不再兴师。他平毁大营后，回军冬营。

但吉斯积极活跃，不满足于在严冬季节保卫边界。他制订了计划——法兰西即使在最伟大的胜利中，都会认为其不切实际，从未想到实施。当时人们认为加莱要塞坚不可摧——这里是英格兰国民特别青睐的地方，增援便利，法兰西早已无望收复。但科里尼已经注意到：加莱四面环绕沼泽地，在冬季不可逾越，堤岸上有圣阿加莎和纽纳姆桥两座城堡守卫。英国人由于财政紧张，近来习惯于在秋末解散戍卒，春天再召回。因此，他们认为只有春天才需要用兵。他据此策划突袭加莱。他派一批工程师秘密观察加莱要塞，在圣昆丁围城中就制订出计划的蓝图。他建议吉斯公爵施行这个计划，并指导公爵采用了一些举措。

几支部队以各种借口接近边界，突然会师，形成一支大军。吉斯公爵出其不意，直取加莱。同时大批法军舰队伪装成英国水师，驶入海峡，从海上进攻要塞。法国人以三千火枪手强攻圣阿加莎堡，守军虽然英勇防守，仍然只得弃城撤退到纽纳姆桥。法军围困纽纳姆桥，即刻攻城。同时舰队连续炮击守卫港口的护堤，两个城堡都暴露在迫在眉睫的危险中。总督温特沃斯勋爵是一位勇敢的军官，但他发现弱小的戍军大部分已经困在纽纳姆桥和护堤上，便命令他们有条件投降，撤回加莱跟他会师，因为没有这些部队，他会势单力孤，无力保卫加莱。纽纳姆桥戍军欣然达成协议，但护堤戍军没有争取到这样有利的条件，只得无条件投降。

吉斯公爵此刻已经从海陆两面封锁了加莱，认为胜利已有把握，但他为了

防止一切意外事件，刻不容缓地发动了进攻。他猛轰城堡，打开一个大缺口，命令科里尼的弟弟安德洛特排干护城河。他亲自率军进攻，胜利渡河。法军占据了要塞的滩头阵地。夜幕降临后，温特沃斯发动猛烈反攻，企图夺回阵地。他损失了两百人，^①发现戍军已经不堪一击，只得投降。哈姆和圭斯奈随即陷落。当年爱德华三世率领从克雷西战役凯旋的大军，用了十一个月才攻陷加莱——吉斯公爵就这样，在寒冬的八天内占据了这座坚固的要塞。英国人占据加莱两百多年，从这里可以轻易入侵法兰西——被视为王室最重要的财产。法国人的喜悦和吉斯公爵的光荣登峰造极。这时，全欧洲都以为法兰西时乖命蹇、兵败圣昆丁。英国和西班牙联军占据的地方，即使在约克和兰开斯特宗室内战的纷扰中，法兰西历代先王都不敢问津。另一方面，英国人丧失了宝贵的要塞，便大声疾呼，抱怨女王和枢密院缺乏远见——他们为外邦利益卷入一场徒劳无益的战争，而且如此丧师辱国。府库空虚、负债累累；国民四分五裂、灰心绝望。女王目无臣民的福利，菲利普虽然提出了漂亮的教义和承诺，加莱还是几乎没有收复之望。苏格兰人在法兰西阁臣的唆使下，开始越过边界。英国人这时有必要致力于保卫本国，而不是考虑征服外邦。

当年英王爱德华和法王亨利议和后，英格兰与苏格兰也达成和平。苏格兰太后借口探望女儿和亲戚，前往法兰西。她带走了亨特利伯爵、萨瑟兰伯爵、马尔夏尔伯爵和许多大贵族。她秘密策划，让艾伦伯爵将王国政权移交给她。她的兄弟吉斯公爵、洛林红衣主教、奥马尔公爵在法兰西宫廷威势赫赫。她很容易说服亨利国王，利用他的权威，让苏格兰贵族就范。她已经争取到监国的三位亲信：金奈德的卡奈基、罗斯主教潘特、基尔温宁教长加文·汉密尔顿。太后通过他们，说服监国同意逊位。^② 她万事俱备，便起程前往苏格兰，途经英格兰。爱德华以殊礼相待，但他并不掩饰续订联姻旧盟之意。他说：联姻

① Thuan. lib. xx. cap. 2.

② Buchanan, lib. xiv. Keith, p. 56. Spotswood, p. 92.

将两国的和平、利益、安全照顾得面面俱到，是保证两国长享安宁的不二法门。他补充说：如果苏格兰女王另选丈夫，他永远不可能跟此人真心亲善。他不可能原谅这样的人：既破坏他最自然的联盟，又夺走他自幼恋慕、忠心不二的新娘。太后回避了他的要求，告诉他：如果他们有任何举措让爱德华不满，都应该归咎于萨默塞特公爵的轻率。公爵没有用殷勤、爱抚和体贴这样适当的手段来赢得年轻公主的欢心，却乞灵于战争和暴力；迫使苏格兰贵族为了王国的利益、保护他们的自由与独立，而将他们的女王送往国外。^①

太后抵达苏格兰，发现监国非常不乐意履行承诺。他经过再三拖延，才接受劝告，放弃权威——他发现公主快要成年、太后已经赢得所有大贵族的支持，才审慎地屈从。艾伦约定：他应该是王位的下一位继承人，且摄政时期的一切举措不受法律追究，然后向太后移交摄政权。太后从此享有监国称号。^②通常传说：如果太后能让朋友获得幸福、自己享有美誉，她完全不在乎面临的后果。这种性情大受虔诚的改革派责难，^③因为她只顾世俗考虑，处处适应王国政治。法国人德奥塞尔以干济之才著称，担任法王亨利驻苏格兰大使，但真正的任务是参赞太后管理微妙政事。此人献策：向王国普遍征税，以便供养常备军；对外可以及时击退强邻入侵，对内可以绥靖苏格兰贵族骚乱。当局虽然争取到某些廷臣支持此项计划，但引起了国民普遍而强烈的反感。摄政太后直言不讳，称此事对王国有害无益，然后审慎地撤回计划，完全将自己的安全托付给臣民的善意和爱戴。^④

这种值得赞赏的决心似乎是太后施政的主要目的，但她跟法兰西关系密切，往往受兄弟们支配。玛丽对法兰西开始敌对行动，法王亨利要求摄政太后加入争执。她在纽波特召集国会，要求他们同意向英格兰宣战。苏格兰贵族

① Keith, p. 59.

② 12th April, 1554.

③ Knox, p. 89.

④ Keith, p. 70. Buchanan, lib. xvi.

猜忌法兰西的影响力，不亚于英格兰贵族猜忌西班牙的影响力，不肯同意。太后为了如愿以偿，只得乞灵于策略。她命令德奥塞尔在文茅茨修建堡垒，而爱德华前朝签订的和约已经规定平毁此地一切堡垒。不出她所料，伯维克的英格兰戍军越境阻止工程。太后成功地利用这种借口，点燃了苏格兰国民的怒火，促使他们仇视英格兰。^① 不过，苏格兰人的敌对行动不外乎几次越境入侵。德奥塞尔亲自率领炮队和军队，围攻维克堡；苏格兰枢密院迅速制止他，召回了军队。^②

法王亨利为了加强苏格兰和法兰西的联系，增加自身的影响力，举行法兰西王太子和苏格兰女王的婚礼庆典。苏格兰国会派出代表团参加婚礼，签订婚约。

苏格兰和法兰西的紧密联盟对玛丽的安宁和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可以预见到：即使君主不在国内，苏格兰政府自然会产生朋党和混乱，力量有所削弱；但这个王国至少可以为法兰西提供一条入侵英格兰的道路。因此女王有必要召集国会，要求补充枯竭的国库。这样的紧急情况通常非常有利于国民，因为本朝国会已经显示：一旦王国的自由和独立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他们不会完全被宫廷吓倒。据此，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预期：国会将对最近的武断勒索提出责难，或许还会有某些未来的防范性补救措施。然而下议院不顾前例，投票通过了十五分之一税和补助金。土地每镑缴纳四先令补助金，动产每镑缴纳两先令八便士。教士缴纳八先令补助金，相当于平民信徒四年的份额。

国会还通过一项法案，确认女王过去和下一年出售或赏赐的王室土地。从玛丽当前的性情和处境来看，不难预见：这次授权以后，王室将转让大片土地。君主大权在握，却又捉襟见肘，违背良治的准则，莫此为甚。这项法案在下议院遭到反对。科普勒议员表示担心女王借口授权，改变继承顺序、剥夺合

① Buchanan, lib. xvi. Thuan. lib. xix. c. 7.

② Knox, p. 93.

法继承人的王位。但他的发言被定为大不敬罪，下议院警卫官将他逮捕。他虽然表示悔过，还是在请求女王宽恕后才获释。

终玛丽一朝，英格兰国民一直担心：伊丽莎白女士的继承权，甚至生命可能朝不保夕。女王处处流露出对她的深恶痛绝，但菲利普竭尽全力，再加上玛丽自己的谨慎，才勉强避免了致命的后果。公主退隐乡间。她知道四周都是间谍，便不问世事，几乎不见宾客，把所有时间用于读书求学。她韬光养晦、暂时蛰伏，但精神上已经做好准备，发起她日后因而著称的更伟大行动。瑞典大使以国王的名义向她求婚。大使告诉她：国王身为绅士，自认为有义务首先向她致意。如果公主同意，国王接下来就向她姐姐求婚。但公主不让他继续下去。女王感谢她的忠诚，询问她对瑞典国王求婚的感受——伊丽莎白如果期待更好的前景，就会立刻面对许多危险和屈辱——她掩饰住拒绝的原因，表示她喜欢独身生活，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生活方式。^① 公主以类似的审慎掩饰她的宗教感情，遵守当时的礼拜模式，避免争论这些微妙的问题。^②

女王获得国会的拨款，得以装备一支舰队，包括一百四十艘帆船，再加上三十艘弗拉芒船只。舰队载运六千陆军，试图夺取布列塔尼海岸。克林顿勋爵指挥舰队，亨丁顿伯爵和拉特兰伯爵指挥陆军。但海陆两军的装备拖拖拉拉，以至于法国人掌握了整个计划，做好了应战准备。英国人发现布雷斯特戒备森严、无从进攻，只好在康奎斯特登陆，焚掠城镇和邻近村庄。布列塔尼绅士克斯蒙率领偏师突袭他们，英军大乱、崩溃，逃回船上，损失颇多。不过，十艘船只组成的英军分舰队有机会充分报复这次可耻的失败。加莱总督、大司马德·塞莫率领一万四千人入侵佛兰德，渡过阿河开路，攻取敦刻尔克和博

① Burnet, vol. ii. Collect. No. 37.

② 理查德·贝克说：真在论是当时捕获新教徒的常用罗网，用在了伊丽莎白女士身上。有一次，人们问她对基督的真言“这是我的身体”怎么看？是否认为圣餐就是基督真正的身体？据说，公主犹豫片刻后，就这样回答：“基督说出真言，他拿起面包掰开，真言将其造就，我相信并接受这些。”这话表面上轻描淡写，但比初听起来更有分量，至少当时有助于她逃避罗网。她如果直接回答，就会陷入罗网。参见 Baker's Chronicle, p. 320。

格·圣·沃尼克，直至纽波特。但埃格蒙特伯爵以优势兵力突袭他，他只得撤退。西班牙人在格拉沃利纳附近追上法军，大司马发现战斗不可避免，便非常老练地选择战场。他尽可能谨慎地加强左翼，沿河部署右翼——有理由相信这一部分已经充分受到河流的保护。但英军舰队碰巧听见交火的声音，出现在海岸上。他们沿河而上，攻击法军侧翼。法军在英军舰队的炮火轰击下逃走，西班牙人大获全胜。^①

在此期间，吉斯公爵统率法军主力、萨伏伊公爵统率西班牙军队主力，在皮卡迪边界相遇。两位君主率领贵族的精华，进入各自的营地。这些尚武的民族争强斗胜，人们期待着重大事件随后发生。菲利普虽然野心勃勃，却没有征服者的天赋。他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又有圣昆丁和格拉沃利纳的两次胜利，但仍然愿意签订条约、结束战争。两国为此开始谈判，两位君主多多少少漫天要价；双方军队退入冬营，等待君主达成较好的协议。亨利除了其他条件，还要求西班牙将纳瓦拉归还给合法的主人。菲利普要求法兰西将加莱及其附属地区归还英格兰。但谈判正在进行时，玛丽的死讯传来——菲利普跟英国不再有关系，不再严格坚持这一重要条款——玛丽去世，国民只在这一点上感到遗憾。

长期以来，玛丽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她一度将水肿误认为怀孕，采用了不合适的养生术，病情日益恶化。这时她受到种种反思的折磨。她意识到臣民的痛恨、伊丽莎白继位的前景；明白天主教会面临的危险；悲痛加莱失陷；忧心国事岌岌；尤其是操心丈夫不在。她知道：菲利普有意不久后去西班牙，在那里度过余生。所有这些悲哀的思绪折磨着她的精神与身体，发烧始终不退，因此而去世。她短暂而不幸的朝代历时五年四个月零十一天。

这位公主的性格无需多言——她几乎没有可敬或可爱的品格，个人行为

① Hollingshed, p. 1150.

和追求都乏善可陈。她顽固、偏执、狂暴、残酷、恶毒、报复、专横，恶劣的性情和狭隘的理解力给她各方面的性格蒙上了阴影。她的性格主要由这些错综复杂的恶习组成，除了诚实以外，几乎别无美德可言。她似乎终生保持诚实，只有即位开始时例外——当时她不得不向新教徒承诺，肯定从来无意履行。但在这些问题上，一个软弱盲目的女人受到教士支配，很容易找到诡辩法，为撕毁承诺辩护。她跟父王一样，能容下友谊，但没有亨利那样反复与任性。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她一生许多次显示出的决断和气势，似乎是都铎家族固有的品质。

红衣主教波尔长期患有间歇热，跟女王在同一天去世，只晚了十六小时。大主教性情和蔼、行为温和仁慈，因此受到普遍爱戴。虽然国家施行最横暴的迫害，狂热的教派冲突完全压倒了正义，但他的美德仍然受到甚至大多数改革派的景仰。傲慢的教皇保罗四世对他颇有偏见。英格兰对教皇的盟友亨利宣战时，保罗抓住了报复的机会，撤销了波尔的教皇特使职位，改任红衣主教佩托、女王的方济各会修士和忏悔师。但玛丽一直不准新任特使就职。保罗后来只有恢复红衣主教波尔的特使权威。

除了前文所述，王国在本朝时期的一般状况很少有记录。那时，英格兰的海权仍然微不足道。因此，当局下令用一万四千磅装备舰队，用于修理和粮秣；后来估计一年十万磅就能满足所有必要的开支了。^① 如前所述，女王及其父王的武断之治增加了许多垄断公司，阻碍了商业发展。所有其他欧洲君主要么不能，要么不必施行这样的暴政。前朝末年和本朝初年，院商跟其他外国人税率相同，但女王婚后不久，受到皇帝的唆使，运用她的特权，暂停实施这些法律。^② 当时没有人质疑这样施行王室特权的问题。史家对此完全保持沉默，我们只能依靠流传下来的公共文献。

^① Burnet, vol. iii. p. 259.

^② Rymer, vol. xv. p. 364.

前朝制定了一项荒谬的法律：任何人只有经过七年学徒期，才能制作衣料。女王在第一年就废除了这条法律，明显的原因是毛料制造业因此而受害，几个市镇因而毁灭。^① 奇怪的是：爱德华一朝的法律在伊丽莎白朝复活，更奇怪的是——它存留至今。

英国人在前朝发现了一条价值连城的水道，便跟莫斯科人建立了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沙皇郑重其事地派出使团，交聘玛丽女王的宫廷。途中，大使的船只在苏格兰海岸失事，不过受到了殷勤的招待。他们继续前进，以盛大庄严的仪式进入伦敦。^② 这似乎是莫斯科帝国与西欧各君主国的第一次交流。

本朝通过一项法律：^③根据各人财产多少，来确定他们为王国防务供应的马匹、武器、装备等数量。例如，岁入一千镑的人应该装备六匹符合短矛骑士需要的战马，至少三匹充分配备短矛骑士的甲胄、武器和鞍具；十匹符合轻骑兵需要的战马，以及相应的装备和武器。他有义务供应四十套体甲、五十套日耳曼护甲；或是四十套板甲、体甲、锁子甲。他还供应四十只矛、三十只长弓、三十捆箭、三十顶钢盔、二十支黑戈或黑戟、二十支火绳钩枪、二十顶轻盔或无面甲头盔。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人拥有一千马克动产就相当于岁入一千镑。这说明：当时没有或没有多少人依靠动产资金生活；商人在贸易中可以获利丰厚。岁入一千镑就是最高层次。

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情中得出结论：这一时期的藝術和风雅几乎没有进步。一个人的等级不低于爱德华四世时代的审计官，在茹运河拥有房产，只缴纳了相当于今天三十先令的税款。^④ 由此可见：劳动力、食品乃至房产的价格只有今天的三分之一。伊拉斯谟将英格兰瘟疫频繁归因于人民肮脏、污秽、懒散的生活习惯。他说：“地板上通常是黏土，洒满灯芯草；地下尽是积年不扫的啤

① 1 Mar. Parl. 2. cap. 7.

② Hollingshead, p. 732. Heylin, p. 71.

③ 4 & 5 Phil. & Mar. cap. 2.

④ Nicolson's Historical Library.

酒、油水、残渣、骨头、唾沫、狗屎、猫屎。到处乌七八糟。”^①

霍林塞德生活在伊丽莎白朝，他为前代简陋，甚至粗野的生活方式留下了奇怪的记录：即使重要市镇的房屋都很少有烟囱；炉火在墙边点燃，烟雾从屋顶、门窗冒出；房屋无非是黏土涂上灰泥；人民睡在稻草铺成的床上，用圆木做枕头；几乎所有家具和餐具都是木制的。^②

我们在本朝第一次发现了涉及道路的普遍法律，规定全英格兰各教区都有维修道路的义务。^③

^① Eras. Epist. 432.

^② 霍林塞德的记录见于他的 *History* 前言对话录，有些人认为是哈里森所作。其中提到财富的增长：“我无意指责任何人，上帝是我的法官。我只想指出：我很高兴看到上帝如何赐福我们。一段时间以来，百物昂贵逾分。我们已经不可能像以前一样打造家具。村里剩下的老人根据记忆，注意到英格兰发生了三种奇异的变化。其一是最近树立的大量烟囱，他们小时候至多有两三个。只有王国的上流市镇才有许多烟囱（常建在宗教建筑物、贵族庄园，或者还有其他显贵的地方）。不过每一个都在他吃饭、烤肉的餐室里生炉火。其二是生活用具大大改善。父辈和我们自己的粗布（照他们自己的话）床单下面垫稻草，只有圆木，没有长枕。一家之主只要有一张毛屑床、一个装满糠的麻袋垫头部，就会自以为跟城里的爵士一样好。他们心满意足。他们说，枕头是妇女儿童才用的东西。至于仆人，他们只要有床单就不错了。他们顶多在身体下面垫帆布，免得让稻草刺痛。他们说起的第三件事就是：木盘（我想是树木制成的）变成了锡盘，木勺变成了银勺或锡勺。古代普遍用木器；今天富裕农场所家里已经很难找到一套四件木器（其中之一是盐瓶）。”

第十章和十六章再次描写英国：“过去，人们满足于黄柳、垂柳木屋。橡木专用于教堂、教会、王宫、海船。但现在谁也不要黄柳，要用就是橡木。变化还有：黄柳造屋时，人就像橡木。现在我们用橡木造屋，人却变成了黄柳，许多人甚至是稻草。这个变化令人悲哀。原来主人的勇气足以保证家宅安全；但现在要靠木屋防备抢劫。现在我们有许多烟囱，身体却弱不禁风，抱怨伤风、感冒、咳嗽。那时人们床铺简陋，从不头痛；因为当时认为烟雾可以硬化房屋木料，有好处；是保证一家之主和全家不感冒咳嗽的良药。那时的人对这些病非常陌生。”

第十八章又说：“过去的锡匠只做盘子、水罐和其他小件。现在他们精工细作、刻意模仿、争奇斗妍，打造各种风格的杯子、盘子、盐瓶、碗、高脚杯。以前这些是金匠的手艺，他们从不好奇或人为模仿。在海外各地，英格兰锡器佳品（我坦白地说：在我的时代，盘子和浅口盘开始变深，像碗一样。这样确实更方便装沙司或者给肉保暖）几乎跟精工银器一样精美著名。”

如果读者对伊丽莎白朝的饮食有好奇心，可以向同一位作者取经。贵族、绅士、学生通常在午前十一点进午餐，在下午五点或六点之间进晚餐。商人的午餐和晚餐很少在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六点以前，伦敦尤其如此。农夫也在他们所说的正午进午餐，在晚上七八点进晚餐。但我们大学规定学者晚上十点钟进餐。Froissart 称：兰开斯特公爵在下午五点进晚餐。很难解释：为什么随着时风日益奢靡，到处的进餐时间都不断推迟。是不是群众的消遣逐步推迟了时间？或者是时尚人士更喜欢夜间的私密与安静，因为这时劳作的平民都已经安睡？在粗野的时代，只有白天才有为数不多的娱乐消遣。

^③ 2 & 3 Phil. & Mar. cap. 8.